

杭大人出版社

杭大軼事

第二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二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二集

杭大轶事

(第二集)

温时幸 主编

杭大人出版社

2023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二集

图书编目数据

杭大轶事（第二集）/温时幸编。--美国西雅图：杭大人出版社，2023.4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37-1

I. 杭大轶事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回忆录

杭大轶事

（第二集）

温时幸 主编

封面设计：吴延风

封面题词：任 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03 N 147th Street Unit B, Shoreline, WA 98133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出版日期：2023年4月5日

本书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ys2.pdf>

开 本：小 16K

字 数：22万4千字

定 价：免费阅读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37-1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二集

【杭大轶事】

第二集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宝钺（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二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张美凤和史晋川向我推荐由杭大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杭州大学回忆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杭大轶事》和《杭大诗词》。细细阅读了这两部新作，我被文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感动了，也说几句。

首先，我被同学们对母校杭州大学的深情怀念打动了。作者编者大多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那几年的大学生。大约四十年了，同学们对当年的青春生活记忆犹新，朴实无华，真情流露，感人肺腑，逾久弥香。实际上，那个时候各方面还在恢复和发展当中，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同学们在回忆文章和诗词里，记录了那个时候的求学经历；在相对简单的生活里，体现了勤奋、乐观、胸怀大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不只是一个大学生要有的，也是人生必须有的。

其次，同学们的诗文回忆，也反映了历史的痕迹。很多同学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严峻考验：高等教育遭受破坏，同学们面临青春荒芜的危险。高中阶段的同学，失去高考机会，当兵当工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年龄稍小一点的，可能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实际上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幸好等来了重启高考，恢复了大学教育。你们被时代耽误过，而最后还是成了时代的幸运儿。有这些复杂和艰苦的经历，你们人生目标特别明确，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教授们称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优秀学子。大多数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最倚重的人才，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各界发展的中坚力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注意到，《杭大轶事》也梳理了杭州大学的源流，对于“求是育英”这个校训的来源和意义都有诠释。这些，对于人们了解杭州大学曾经有过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和办学成果等，都是有意义的。杭州大学在 1958 成立挂牌，通过浙江师范学院

承继了求是育英的百年滋养，至 1998 年四校合并，经历了整整四十年，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杭大诗词》给了我一个惊喜。没想到同学们不只是学业各界的优秀人才，也很有才情和诗意，也是诗人词人。正如一句“时髦”的话说的，人生不止要学习和工作，还要有诗和远方。读同学们的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咏西溪，咏校园，每每把我也带回到自己过去的青春岁月。

我自己也是一辈子的杭大人。我从 1952 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杭州大学工作。经历了从浙师院到杭大的全过程，经历了杭大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停顿，经历了高考恢复以后杭大重新焕发青春的岁月，直至 1992 年离任，也是整整四十年。同学们说，“火红的青春年代”跟母校杭大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青春，也是跟杭州大学连在一起的。

如今，我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同学们对杭大的缅怀，对杭大的歌咏，我读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因此，乐为之序。



原杭州大学校长
2019 年 1 月 15 日

《杭大轶事》 第一版（集） 前言

才忆校园书声朗，不觉两鬓竞成霜。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路上车马今胜昔，花前楼馆似而非。我们杭州大学的校门呢？

自 1958 年杭州大学正式挂牌，我们的母校像杭州西湖一样，一直是一颗全国闪亮的明珠。它文脉久远，历经曲折。到 1978 年，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内两届特别的新生到来，杭大开始焕发第二春。先是省内唯一的重点大学，继而跻身全国 211 名校，一直名列省级大学的前茅。

我们杭大人曾经是幸运的，自豪的。我们等来了邓公力挽狂澜，为我们重新打开大学校门。从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开启一个崭新的阶段。进入杭大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荣耀。

然而，时至 1998 年 9 月，因高校合并，杭州大学被摘了牌子，变成西溪校区。从此，我们的杭州大学和我们的青春一样，只留在回忆里。我们杭大人何等遗憾！有人说，假如地处杭州的这所综合型大学发展至今，那将是何等格局！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意去评说这场高校合并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回顾我们的青春。

承百年渊源，杭州大学经历了四十年。我们这些杭大人，较早的从 1978 年入校算起，至今也是四十年。四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人生已大半，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半！每当我们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就想起我们已经消失的母校。因为，母校就是我们的青春。

四十年过去，杭大人数以万计。如今，很多人已经是学界名人，商界大款，政界精英，或者桃李满天下的默默园丁，还有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名媛。或不倦深耕于家乡本土，或游刃有余于全国各地，或开枝散叶于五洲四海。不论身在何处，无分贫富贵贱，母校杭州大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杭大人”微信群是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花坛。这里，人气旺、地域广、阅历深、感受强、主题明、才艺多。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不分先进后学，我们共同拥有曾经的杭大。这个纽带凝聚着杭大人一起缅怀青春岁月，抒发杭大人的情怀。

“杭大人”微信群成了最活跃的杭大校友联谊会。建群一年来，日日高楼，昼夜无歇，散文佳作，诗词歌赋，书法画作等等接踵而至，精彩纷呈，目不暇给。有感于此，“杭大人”微信群发起人温时幸、金友元等，秉建群之初心，提议编辑出版《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将各位学友的名篇佳作汇编成册，既是记录我们的青春，也是对母校杭州大学的缅怀；既便于校友相互学习交流，亦或可流传于世！

本册《杭大轶事》即为丛书之一，是“杭大人”微信群校友们抒情忆旧的散文佳作选编。入选的文章内容、篇幅不拘，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也有短短的三言两语。凡校友回忆杭大旧事，兼收并蓄。“轶事”虽非正史，却是校友们真实的经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读来饶有趣味，也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比如高考，是在那个青春荒芜、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转折的关口，自然是充满着惊喜、奋斗、角逐、继而有所期待的焦虑和入榜的喜悦；

比如入校和学习，因人生开启了新的阶段，既充满了新鲜，更多是奋发立志，和刻苦求索；

比如生活、同学和校园，则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当年青春的赞美，温馨校园里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学间友谊的怀念，也偶尔透露了年少时期的某些谬误，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比如师长，除了尊敬、缅怀和感恩，也往往记录着自己学业和事业的发展轨迹。

最后一部分荟萃，综合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推重其中有关杭州大学校史和学术成就地位的几篇重头资料，相信有助于读者对于母校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谈笑间，四十年。这样的抒情忆旧就不只是停留于过去的岁月，而是基于这些鲜活的回忆，透露着人生几十年之后的回望和

对过去的审视，亦或夹杂着理性的剖析。回忆就不仅仅是回忆，而是充满着对人生青春美好的赞扬，对人生道路真谛的思考，因而也可能作为对未来人的警示，启迪和参考。如此，则幸甚。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一版于2018年12月19日，即“杭大人”微信群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问世后，《杭大轶事》先后被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图书馆收藏，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此外，我还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电子邮件：

“我在几天前推荐了这本书。然而，我们的图书收购馆员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楚如何处理中文电子书捐赠，因为你们的这本电子书是我们想要收藏的第一本中文电子书。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们将先在图书编目里添加链接，到时把这本电子书添加到开放存取（即，open access，免费阅读）电子书馆藏，以便今后在国会图书馆网上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如今，读者可以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下面这个链接，免费下载那本电子书：<https://www.loc.gov/item/2018372764/>

当初策划出版《杭大轶事》一书时，曾设想每年出一个增订版。那样的话，所有的回忆文章都会收录在最新的增订版中。后来在创办《杭大人》月刊时，也特地设立了“杭大轶事”栏目，为以后出版《杭大轶事》增订版提供素材。

然而，随着《杭大人》月刊收录的“杭大轶事”文章逐年增多，显而易见，按照原来的设想，《杭大轶事》一书会变得越来厚，长达几万页，甚至几十万页！那么厚的书，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恐怕都会望而却步。而我们出版《杭大轶事》电子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广为传播，让人们记得曾经有过一所辉煌的杭州大学。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决定修改原定计划。每年或每两年出版一集新的《杭大轶事》，视稿件情况而定。

自《杭大轶事》第一版问世以来，至今已有4年。是时候出版《杭大轶事》第二集了。

《杭大轶事》第二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19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第一版，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第二集收录了 52 位校友的 92 篇回忆作品。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3 月 15 日

目录

作者	标题	页码
薛艳庄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i
郑良根	《杭大轶事》第一版（集）前言	ii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vii

第一章：高考

王 俐	高考第一天我迟到 15 分钟	2
方 巍	我的两次高考	6
张克夫	我的高考故事	10
张德强	高考结束次日，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	14
张也频	四十年前的印象	17
岳耀勇	40 年前坎坷的高考之路	21
黄永红	可贵的一九七七：我的高考之路	25
黄朴民	母亲的目光 我的高考	30
陆璇辉	我的高考	35
胡伟白	我的高考	40
任 平	我的高考	46
王 蓓	我的高考	51
童国梁	高考进行时	53
徐 川	感谢再感恩	59

第二章：入校

沈加红	入学通知书	64
徐涌金	新生入学	67

第三章：学习

王 耕	1 支冷凝管和 30 块大块肉	70
-----	-----------------	----

王 耕	食盐、丙酮、酒精灯和手	71
王 耕	防患于未然（燃）	72
周遇春	专业节奏	73
赵建中	买书杂忆	74
全根先	令人头痛的体育考试	78
史晋川	英语书里有一篇课文说了这个事情	83
宋宏亮	我的杭大课桌	84
谢为群	分数	86
徐涌金	大一印象	87
徐涌金	大二印象	89
徐涌金	大三(上)印象	91
徐涌金	大三(下)印象	93
徐涌金	大四(上)印象	95
徐涌金	大四(下)印象	97

第四章：生活

王 耕	大块肉和走油肉	100
王 耕	三世同堂的大寝室	101
蔡小平	心猿意马	102
宋宏亮	住校生活	103
伊 勇	谁扔雪团？	105
史晋川	姐姐好香	105
刘 榕	暖情	106
蔡小平	忆河东平房	108
蔡小平	校园修表记	110
赵建中	吃饭杂记	114
赵建中	大皮鞋的故事	119
宋宏亮	夏超画老食堂引起的遐想	124
岳耀勇	我的“戏子”岁月	125

童国梁	露天影院	128
徐涌金	苏沪游记	132
徐涌金	登山比赛	135

第五章：师长

郭世佑	今日难寻沈善洪	140
姜亮夫	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148
王魁伟	怀念姜亮夫先生	153
王魁伟	怀念郭在贻先生	156
王魁伟	怀念沈文倬先生	159
王魁伟	怀念倪士毅先生	162
金城濠	读琦君散文 忆任铭善老师	166
金城濠	夏承焘先生几句话受用一辈子	168
金城濠	我的写作老师陈企霞	170
伊 勇	忆微分几何学大师白正国先生	174
许高渝	忆冯昭均老师	177
黄朴民	质朴的仁者——魏得良老师	182
黄朴民	一张试卷中的历史记忆——黎子耀教授	186
董绍林	哲人夏基松	191
董绍林	闽人陈村富	196
刘云泉	我与杭州大学同行	201
李纪定	感谢和想念吴洁敏老师	208
戚志红	与吴洁敏朱宏达为邻的记忆	209
孙淦钊	悼念程贤政老师	218
刘 榕	静水流深	220
蔡小平	外教杰森	222
蔡小平	老专家楼 80 年代中期的人和事	224

第六章：同学

岳耀勇	永远忘不了我的6组同学	234
祝静波	忆珊梅	238
胡雪梅	追忆王清燕：外语系的夜莺	241
周遇春	老鞠	245
苏敏	杭大那些楼的人	246

第七章：校园

苏敏	杭大那些楼	254
郭占恒	难忘的文二街杭大政治系	262
张跃	我们在中文系的求学日子	270

第八章：荟萃

徐涌金	我的杭大情缘	280
吴晓	永远的杭大梦	284
孙崇涛	我的大学时代	292
岳耀勇	回望我的大学	306
郑小明	郑小明校长口述史	308
周黎明	西子湖畔的种子	311
钱晓霞	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314
许高渝	杭大四年（1959-1963）学习生活追忆	317
赵伟	那一年，歪打正着到杭大	328
张西廷	杭大四年，我的快乐时光	336
王永海	回忆杭州大学70级俄语海军班	339
沈加红	“嵌名文”入馆记	353
徐涌金	毕业离校	369
余刚	时间开始了	371
魏志锋	致杭大青春诗两首	378

第一章：高考

高考第一天我迟到15分钟

—杭州大学化学系77级 王俐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40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大学梦。从懂事起，就没想过当大学生。小时候，最爱翻爸妈的相册。妈妈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倩影，对我来说，就像画册，喜欢看。但连羡慕的心都不曾有。因为我有一个资本家的爷爷；我的外公家是解放前塘栖三个家族之一的范家。我的档案中有在台湾的亲属，有在监狱的叔叔。我，是黑五类的后代。

可我就是爱看书。没理想，没想过将来干什么，甚至都没敢想过将来。可就是爱看书，什么书都看。旧小说、新小说，包油条的旧报纸，只要有字就行。家中几本《十万个为什么》看得能一下找到任何问题的那一页。甚至初中就开始生啃爸爸当年的高等数学书。

不难想象，小学初中我年年考第一。更不难想象，初中毕业，我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唯一的理由是——你祖辈父母上了那么多年学，现在应让工农子弟优先上学。我永远忘不了妈妈讨回理由后回家说，“爸妈对不起你”，母女抱头痛哭的那一幕。

我只想读书。14岁的我，离开爸妈在萧山义盛的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大学生的妈妈和海军炮校教官的爸爸流落到义盛，在供销社卖碗），到余杭崇贤公社中学上高中。我外婆的一个远亲在那儿当公社书记。萧山到余杭如今高速一小时，当年乘公交需辗转好久才能到。妈妈背着大包小包，送着满心欢喜的我去上学。

奔波两天，换车四次，终于在第二天的中午到了崇贤中学。那是学校吗？一个老庙改成的学校。老师办公室的阁楼上是无法锁门的女生宿舍。二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去厕所，要下楼穿过操场。

因为是周末，学校里只有一个值班老师。在他的指点下，妈妈帮我安置了行李，带我去三里地外的崇贤镇吃午饭。到了镇上，去了唯一的小吃店，吃了一碗馄饨。我一直以为，义盛就是最荒凉的小镇。

没承想，离杭州不远的崇贤会更萧条。最繁华的街上石板地上长着草。一路走去，街道两边路人奇怪地看着我们母女。

一直都在强颜欢笑的我，从镇上回学校的路上突然不说话了。妈妈也忍不住了，说：“我们不上学了，回家吧！”一句话，说得我忍了一路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痛哭一场之后，我倔强地说：我要上学。

不幸的我，在崇贤，遇上了一群落魄不得志的老师和一批善良热心的同学。让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平安快乐地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

高中毕业了，我选择了在崇贤下乡，因为我喜欢这儿，喜欢这儿的山和水，喜欢这儿的老师和同学。当上民办教师后，我喜欢这儿的学生和家长。这儿没人问我家庭出身；最好的同学的爸妈视我为他们的第四个女儿；早上起床推门，门外会有一把青菜或一条鱼。它们来自我猜得出或猜不出的学生；家访时，会有学生家长拉着我的手，心疼比她女儿大不了几岁却远离父母的小老师。

我可以在这被世人遗忘的小镇，看我喜欢的书。我也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有朝一日当上正式的公办教师，一辈子和学生们在一起，足矣！

上大学，我不敢想，但不等于不想。看着留城当工人我最亲近的表姐被推荐上了浙大，我当时从心底里一百个羡慕。我的叔叔在40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我曾经的感叹——我若能有表姐拥有的任何一样该有多好。

转眼到了1977年10月，报上说要恢复高考了，我竟然不觉得那跟我会有什么关系。可是，真的开始报名了，我们公社有上千人报名参加高考，那阵势太吓人了。大家满世界找复习资料，那真是要什么都没有的年代。话说回来，就是有资料也不知该从哪复习起啊！

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统考，因为考生实在太多了。浙江省有初试和复试。当年的复试在塘栖中学，我住到了离中学走路半个多小时的塘栖纱厂，同学姐姐的女工宿舍里。

记得第一天考语文，我算好了时间，提前了近一个小时到考场。一到考场，最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我忘带准考证了！我脑袋嗡的一

声，转身往回跑，跑回工厂，找到车间里上班的同学姐姐，拿到钥匙再跑回宿舍，拿到准考证时，离开考只有15分钟时间了。

奔回考场的路上，我拖着掉了搭襻的方口布鞋，在塘栖古镇的石板路上，廊檐底下，穿过一个又一个廊檐，跨过一座座数不清的桥，没命地跑着。我现在也想不清楚，当时是什么让自己明知没希望还继续不停地跑。

到考场时已开考15分钟了，监考老师说不能进了。当时的我脸色煞白，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这时，过来一位好像是负责的老师，挥挥手说，让她进吧！我连谢谢都来不及说就冲到了我的座位。40年了，这位老师她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

复试不难，但我还是不敢奢想我能上大学。因为还要政审哪！

下面的故事是我妈告诉我的。

余杭县还真派人路途遥遥去萧山义盛我父母的供销社政审了。可是下了长途车，发现钱包被偷，单位介绍信也一起被偷了。当时已是傍晚，回程的长途车当天是没了。走投无路时，好心的小旅馆女主人收留了没介绍信的他们。

晚上聊天，来人说了此行目的，担心明天人家不会让他们看档案，怎么回去交差。旅馆女主人一听来调查王俐爸妈，一口打包票，说老王夫妻是天底下最好的人，知书达理，热心助人。

来调查的人第二天回去了，也许就拿这当成调查结果交差了。真该感谢这好心的旅馆女主人，要不然我住过牛棚的爸爸档案中，不定会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上大学的内容。

然后，就该发榜了。所有人都在春节前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唯我没有。我似乎也没特别伤心，冥冥之中仍不觉得那神圣的大学是我可以够得着的。

春节后回学校继续上课，还是没有录取信。一周后，我已彻底失望了。日子回归正常，继续当我的老师。

突然有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批改着学生作业。一位同事举着杭州大学的牛皮信封，大呼小叫奔向我的办

公桌。在公社办公室躺了近一个月，差点被人遗忘的通知书，终于到了我的手上。

第一次高考轰轰烈烈的结束了。我们公社共有三人考上大学，三人考入中专。



1979年，在黄山巧遇邓小平夫妇。我的学生证上留下两人的珍贵签名。

[返回目录](#)

我的两次高考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方巍

我于 1975 年 7 月，宁波二中高中毕业，家里老大，还有一个小 3 岁的妹妹。按照宁波市的政策，我可以选留城工作。12 月 20 日，到宁波江北米厂当了一名工人，工种为砻机工，学徒期 2 年半。工厂规模不大，多数是老工人。有几个已超过了退休年龄，因为一直没有招新人，只能顶在岗位上。我们那批进工厂的有 7 人，学徒只有两个：米机工和砻机工，学徒期分别为两年和两年半，其他工种都叫“普工”。砻机工序是全厂质量控制的核心，3 层楼的一幢厂房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地方，有粗筛机、比重去石机、去稗机、吸尘机、去稻壳的砻机、谷糖风机、谷米分离筛等，全自动，由一人操作即可。我认真学，师傅也毫无保留地教，几个月后即可独立操作。76 年底，全厂评选出四位“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我是其中之一。

1977 年 10 月初，恢复高考的消息得到证实。母校宁波二中招回了部分 77 届高中毕业生及几名教工子女，集中进行复习。那时候的工厂，一人顶一个岗位，请假很难。因此，我没有去复习班，利用下班和工作中的空余时间学习。好在妈妈是二中教师，及时取到复习资料，使得学习进度和二中的高考复习班基本同步。我所在的宁波市粮食系统，报名参加高考的有 60 多人。考试分两次，先进行初试，淘汰一批。初试时间为 10 月底，考两门，语文和数学。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很紧张，而且大家基础都很差。我们上中学正值文革期间，学校很乱，真正有用的知识所学很少。初试时间很快到来，考试的地点在宁波一中，上午数学，下午语文。语文卷，作文题目是《十月》、《怀念》两选一，我选了后者。怀念谁呢？毛主席吧，写得还可以。古文，是荀子的“劝学”篇，译文、答题都做出来了。数学则不太理想，复习时间短，许多内容来不及看，题目倒不难，估计 60 多分吧。能不能进入复试，心里没底。几天后，复试名单公布，粮食系统 33 人，有我，电话通知到厂里，当时的心情一阵激动：30 多人没能进入，这淘汰率可不低啊。次日上午，到位于新江桥北面的粮食局，登记、填表。和我一样，将

要参加复试的同事们都喜气洋洋。局里负责高考的俞老师，是一位粮食局的女干部，说：“复试12月中下旬，具体等通知，时间很紧。除了语文、数学，报考理科的有物理、化学、政治；文科有历史、地理、政治。回去抓紧复习。”又说：“这次初试，有4人平均分80以上，考上有希望。”我心想，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人，谁啊？一看，我的名字在4人中排列第二，这下轮到我糊涂了，发呆了好几分钟，可能是把平均分60说成80了吧？但初试成绩在我们系统中位居前列，肯定无疑了。顿时信心大增，目标也随之改变，不是练练兵，而要全力以赴，争取考上。

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复试，物理、化学基本上还没看。大纲要求的“熟练掌握”只能是奢望，许多内容能看一遍就算不错。但边工作边学习，确实很困难。我的学徒期尚未满，平时徒弟要多干些活。年轻嘛，师傅已经50岁了。这段时间，师傅把大部分活都干了，我心里充满感激，又很过意不去。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一场揭批“四人帮”流毒的运动。粮食系统有些人被隔离审查，需要对他们进行看管。厂领导就特地安排我当看管人员。看管地点在宁波酒厂分厂，火车南站边，离家很近。每天的工作，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三班制，两人一班，环境很安静，正是学习的好地方。这工作一直做到78年6月。

12月下旬正式考试。又到宁波一中考场，开始了两天的高考。共4门，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和化学合并成一门。和初试不同，难度增加了，更要命的是有些题非常陌生，比如数学，一道几何题，三角形中某一点A，顶点过A到边的直线长为分母，A到边这段长为分子，证明三个分数之和为1。花了很长时间，还是做不出来。还有一道函数题和一道数列题也做不出。好在其他题不难，基本上答对。语文卷，作文题目“路”，就写了进工厂后成长的路程，感觉还行。古文“齐人攫金”，答题基本正确。考得最差的还是理化卷，其中有道物理题，两个电阻的并联电路图，画法有点特别，看不懂。这一大题没做。考完后，大家一起议论起来，理化卷普遍没考好。实际上，有些题还是很简单的。比如，填空题，某一碱金属元素，其电子结构和氫相似，（钾）。水相对空气是（光密）媒质，反之为（光疏）媒质。胃酸即

盐酸过多，要服胃舒平，成份为氢氧化铝，写出方程式…。都答对的人相当少。有复习时间太短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 10 年内乱，对教育的破坏太厉害了。

高考的分数没有公布，只通知参加体检的人。粮食系统 3 人，有我，首先录取的是宁波面粉厂刘少华，浙江农大。春节后 3 月份扩招，宁波酒厂的王凌被舟山水产学院录取。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妈妈到招生办查了一下，平均分数 52，算不错了。当时浙江医科大学分数线平均 48。我原先第一志愿浙江大学，后允许修改，则填无锡轻工学院。没有录取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有一个地主爷爷。国家正在拨乱反正，今后肯定需要大批人才，相信这类荒唐的政策终将会改变。决定继续参加 78 级的高考，力争考得好一些。

高考制度的恢复，受到了广泛关注。语文考完次日，仓桥菜市场工作人员，相互开玩笑打闹，其中一个说：“人家是齐人抢金子，你怎么抢人啊。”他们倒是把高考题活学活用了。社会风气也为之改变，各学校迅速抓起了教学质量，高中以高考为目标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共识，也从这时候开始逐渐形成。

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内容全面，数学、物理各有 4 册，化学 2 册，由浅入深，习题多，都有标准答案，伴随我几个月的学习、复习。但平时没有人讨论，也没有人辅导，单枪匹马自学，难免要走弯路。不懂地方不能及时消化，这是在职人员考生普遍遇到的问题。为此，宁波市组织了针对历届生的大型辅导课，地点在灵桥边上的大世界影院。主讲的有：十三中数学老师李明英，五中数学老师邵元忠，二中数学老师朱宝庭，十三中化学老师孙绍亮，二中政治老师张宏。三中物理老师记不得名字，讲课挺风趣。他说：学了物理，你打人都不想打了，因为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打人不占任何便宜。邵老师讲平面几何，深入浅出，全国数学竞赛题，被他分析起来似乎大家都会做。李老师讲函数，一道难题，居然有 4 种解题方法，让我们大开眼界。朱老师很谦虚：我水平不行，应该是没资格来的，讲得不好，请大家谅解。他上函数课，实际上讲的很好。还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数学课，听课的人特别多，有十几

个人穿拖鞋不让进。戴袖章的师傅铁面无私，哀求、说好话都没用。附近的几户居民见状，把家里鞋子都拿了出来，球鞋、布鞋、雨鞋、凉鞋，什么都有，小伙子们顾不上好看难看，穿上就往会场跑。

7月中旬，再次走进宁波一中，参加78级的高考。六门课：物理、数学、语文、政治、化学、英语，其中英语不记分。这是首次全国统一命题。我的感觉，数学、物理和上次相比，难易程度较为合理，几乎没有冷门题。有点难度的，如一道物理题，铁棒通过磁场从上面滑下，平时也见到过。没有做对是自己学的不够扎实。数学题中的对数方程，不难，也没做对。语文卷，有些填空是平时新闻中常见的，如“争端”、“准则”、“荣辱”等。作文则是把一篇文章压缩为短文。上述这些题都做得不错。古文，说的是母亲带小孩外出，小孩哭闹，母亲说回去后杀猪给你吃…。对古文理解有偏，答题不太好。化学卷比较容易些。最后5门课总分为358.5，基本上发挥出了水平。第一志愿填杭州大学化学系。粮食系统超过310分体检分数线的有3人，最终录取的只有我一个。那些没有录取的同事们，功夫也没白费，多数读了电视大学和业余大学，成了各单位的骨干。我妹是宁波二中应届生，同年考上了浙江中医学院，即现在的浙江中医药大学。

11月2日，我们一千多名新生走进杭州大学，入学报到。这是杭大历史上首次新生超过千人，达到这规模的全省仅两所大学。几天后，全校迎新会在大礼堂举行，王家扬校长讲话：“我们造1幢5层楼房，需要2至3年。前不久我去了日本，人家建10层楼房需多少时间吗？只要6个月。差距很大啊。”

一位老同学代表发言：“大学生活，不像诗歌一样浪漫，也没有舞蹈般的轻松。我们是来战斗的，不是来享受的！”

化学系迎新会上，系主任金松寿教授讲话：“我刚从北大回来。同我们相比，他们也没啥了不起。无非是魄力大一点嘛。同学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这些40年前的声音，犹在耳边。

（写于2018年11月21日；2019年2月15日修改。）

我的高考故事

—杭州大学历史系78级 张克夫

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五月底，分居两年的妻子，终于从广西南宁调回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工作。我当时在省燃化工业学校工作。学校重新给我一间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卫生间，放张床、写字台、加上大衣柜，一个方桌，满满当当的了。走廊(nā)上支一个煤炉，架一张小桌子放个小菜橱，油盐酱醋，锅碗瓢盆，早出晚归，一日三餐，其乐融融，开始过起了小日子。

由于小平同志1977年恢复高考的巨大影响，当时社会上求学气氛渐浓，许多同龄人都摩拳擦掌、跃跃一试准备当年的高考。我是1966年文革前杭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的高二学生，1968年赴黑龙江抚远下乡。1971年应征入伍到杭州警备区当兵。1975年复员发配到浙江省燃化工业学校工作。对于上大学，当然是我从小所憧憬的。我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从小就教育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希望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今后能有好的出路。高中进了杭一中，省重点。社会上说：进了杭州一、二、四中，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大学，大学梦实现了一半。但是文革中断了我的读书梦，一直心有不甘。77年高考时，我的几位中学同学，还有个发小张虹海，当年随父母下放到常山，好学敏思，只有初中文化，居然以金华地区文科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真是奇迹。说实话，读大学，我确实也有点心动，但是毕竟多年未碰数理化，重新再捡起来？心里没底，加上我爱人当时已有孕在身，学校里又正在酝酿分房子的事，所以我也根本无心顾及高考之事，只是想分个房子，安安稳稳生活。那个时候，在杭州小夫妻有个房子也是很令称羨之事了！

浙江燃化工业学校是个新组建的专科学校，校舍在文二街老省委团校和电子工业学校之间。老师是从全省各地石化煤炭系统抽调来的。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中青年教师。我记得当时学校有位徐中立老师，老杭大毕业生，50多岁，小小个子、头发稀疏、本分内向，为人热诚。

他是从长广煤矿子弟学校以照顾夫妻调到我校的。还有一位杭大数学系借来的洪老师、以及一些已经记不起名字教师们。他们一上班就一个劲儿的鼓励我报名高考，说你去试试嘛！杭一中的高二生的底子不错的。我们帮你复习，你一定可以考上！话到这个份上，有了信心，终于使我鼓起了勇气。那就试一试吧！遂报名参考。

我记得当年报名高考，要拿户口本，填表，还要交五角钱报名费。然后开始了紧张的复习。由于时间太紧，我高考复习采取了有保有放的策略，就是确保一些必得之分，放弃一些费时费力高难之分。比如外语，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语法复杂，单词均已忘记。好在78年高考外语不计分，放弃。另外，如数学里的三角函数，微积分等，我在高二还未学完，不甚了了，放弃。集中力量抓住必得之分。事后证明，这是事半功倍的明智之举。洪先生为我特别准备了二十几页的复习提纲。他跟我说，只要掌握了提纲的全部内容，可考70分以上。（神了，高考数学真的考了77分！）时值夏季，气候炎热。借来许多高考复习资料，同事又提供了许多参考书和试题集，成天做数学题，背历史、地理、政治题以及古典文学题等。临阵磨刀，不快也光，整天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

记得那年，杭州学军中学办了个高考复习班。同事中一位叫胡亚南的老师热心托她同学帮我报了名。我去听了几堂课，好家伙，整个教室人满为患，难以插足。可见当年社会上年轻人对高考的渴求，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听讲时专心致志，就像个小学生。此情此景，让我今生难以忘怀！在这里也见到几张熟脸，许多好像是下乡回城知青，年龄参差不齐。老师特别跟我们讲了高考复习的重点和要点，强调考试要注意阅卷，审题，千万不要犯忙中出错、粗心大意的毛病。点点滴滴，受益匪浅。后来发现，听课的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考友，后来也成了校友。高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脑子好像越来越乱，总是觉得这个没有复习到，那个好像漏掉了，拆东补西，首尾难顾……。

高考前几天，一件关键的事情不期而至：单位要分房子了！小道消息乱飞，传说分房名单没有我，顿时乱了方寸，哪有心思复习呀！老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没有房子孩子生下来住在哪里？怎么生活

啊？于是一边急着打报告，一边找关系。在这关键时刻，临考前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前往新来的王书记家中反映我的实际困难，请求领导解决。王书记非常热情，泡茶让座。王书记说：“这次分房，房源充裕，所有的教职员都能分到，而且你在我校工作两年，属于老职工了，已婚，夫妻都是杭州户口，属于应该分房对象，外面传来传去不要信，学校没有正式研究，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我松了口气，就提出想要三、四层的房子，王书记一口答应了。王书记还关心的问我：“听说你要参加今年高考？什么时候考啊？”我说明天，他听说后忙说：“哪你还不赶快回去？早点休息，准备明天考试！房子的事情你尽管放心！”石头落地，我千恩万谢的离别了他家。

夜空皎洁，月光明媚，回家的路上心情格外轻松。房子、娘子、儿子、我要做老子了。人生在世，夫复何求！标准小确幸！高考考不考无所谓了。回到家与老婆说起房子的事情，自然也是欢喜万分。一夜无事。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呼呼大睡，老婆就来推醒我说：“今天考试，快点起来！”我回答说：“不去了，这几天要分房子，要装修、还要搬家，我不考了！”扭头又睡过去了。听我这么一说，老婆急了。她说：“你快起来，考上考不上你也应该去试试。房子的事不在一、两天，你还交了五毛钱呢？到时不要后悔呀！”我一听，也是！翻身起床，洗漱早餐，准备停当，定了定神，迈步出门。只听到老婆还在身后交代：“好好考！你能行的！”好嘞！谁知道呢！此一去义无反顾，成败一举！

我的考点学军中学，离家不远。到得考场，只见男男女女、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许多人还在闭目背书，气氛凝重而紧张。铃声响起，我按准考证的考场入场，对号入座。举目四望，考生个个显得很紧张，惴惴不安的样子。此时，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一股自信的力量由然而生。我一定能行。考官宣布考试纪律规则后，铃声再次响起，考试正式开始。我拿起卷子、填写名字、准考证号。然后先阅卷，再审题，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气闲神定，徐徐展开…。考数学时，按既定方针，前面因式分解、几何、三角都轻松过去，一道解析几何题复习时做过也轻松拿下，有道题不会做干脆放弃。考历史时，重在完

整答题，尽可能面面俱到，宁滥勿缺。其余几门考也循此例。接连三天，共考六场，感觉不好不坏！忙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高考的任务！一身轻松，考不考的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且听老天安排！

接下来的日子，单位真给我分了一套四楼两室一厅一卫的房子，带个阳台。喜不自禁，接着忙着找人装修。那个年头装修简单省事，粉粉墙，漆漆地、厕所贴马赛克、厨房搭个煤气灶台，就完事了。择吉乔迁，忙忙碌碌。安顿停当，坐在新房，环顾四周，忘记了所有烦恼，怡然自得。全家人也都很开心，高考的事情也就忘到了九霄云外。

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缺一不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天买菜做饭总是免不了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买了煤饼，让店里送到我家楼下，再用根绳子吊个篮子几块几块地往四楼上搬运。突然听到有人喊叫我的名字，“张克夫！张克夫！”我探头出去，是徐中立老师。“哎！”我应了一声！他激动地告诉我！“你快下来，传达室有你的挂号信，快下来！”我顾不得搬煤饼了，立马冲下楼去。徐老师说：“快！快！快！信封是杭州大学的，会不会你考上大学了！”啊！真的吗？匆匆跑到传达室，徐老师也跟着过来了！果然是杭州大学的信封。我脑子一片空白，缓缓撕开信封，展开信纸：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张克夫同学，你被我校录取为历史系学生，请于某月某日前来报到。”哇噻！真的考上了！徐老师也十分激动！“好的！张克夫考上了！了不起！恭喜你！真是不容易！”我一面谢过徐老师，一面三步并两步冲回家中，告诉老婆好消息！两个激动了半天，她提醒我赶快去告知我父母，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说煤饼呢？她说：煤饼再说。我立马骑车飞快的奔向老爸家里。老爸老妈闻知后也大为高兴，笑得合不拢嘴！老爸说：你是我们张家第一个大学生！祖坟冒青烟了！值得庆祝一下！你的学费我包了！这是老爸给我的奖励啊！我永远铭记在心！

岁月荏苒，星移斗转，如今我已是奔七之人。几十年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坎坷、求学、工作、创业，毕路蓝缕，一路风雨。但是78年高考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实现了我的梦想。人生如梦，悲欢荣辱，均渐渐淡忘。唯有这一件事情，犹如昨日，难以忘怀，是以记之。

高考结束次日，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张德强

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前不久，在整理书柜抽屉时，从一本陈旧的笔记簿中掉下一张小小的纸片。我捡起一看，竟是一张准考证：薄薄的64开粉红色书写纸，正面印着“准考证”和“浙江省1977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字样，背面是“考生须知”；翻开来，写有科别、姓名、性别、报名单位和准考证号，盖在照片角上的图章是“绍兴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想不到这张准考证还夹在本子里。睹物忆旧，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我属于“老三届”。1966年6月，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高考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中央决定暂停高校招生工作，让大家全力以赴投身“文化大革命”。当时，好多同学都欢呼雀跃——不用埋头准备参加考试，可以轻松地玩了。而我却很有些失落感。

我是绍兴第二中学（今稽山中学）高三（1）班的优等生，各科成绩都很突出，考上大学不成问题。我尤其对数学物理颇感兴趣，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理工科系。另外，绘画也不错，想提前考美院试一试。

这一来可就耽搁了。但转面一想，反正是暂停，过些日子总会有机会的，慢慢地也就释然了。可谁知这一“暂停”，竟停了十年。

随后，我便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绍兴郊区农村插队，一去就是八年。掘田插秧、挑粪割稻，盛夏抢收抢种、冬天围垦海涂，样样农活都干过。凭我瘦弱的体质，实在难以胜任，每天挣的工分比妇女还低。

后来，公社领导见我文化水平高，能写又能画，就让我发挥特长，当代课教师，组织文艺宣传队。后来又派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其间一度借调至县文化馆搞过创作。

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县级报刊、《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不少短诗。1972年7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水田》影响较大，可以算是我的处女作，引起省内诗界的关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陆续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尽管我在农村表现不错，却总是轮不到我。有一次都已填了表，乡亲们纷纷传说我被推荐上大学了，结果却没去成——因为“政审”不过关（我大伯是右派），被某个公社干部趁机调包换了人。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的大学梦才重新点燃了希望。

记得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赶紧找出原先的中学课本重温起来（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高考复习资料）。熬夜苦读了一两个月，先是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初试选拔，通过后才发给我这份正式的准考证。

1977年12月15、16日两天，我赶到城里的绍兴一中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比我小七岁、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的大弟，和我一起参加了那次高考。他的数学基础差，我帮他恶补了几天，勉强应付。

至今我还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成语“高屋建瓴”，要求解释加点的“建”字，我答不上来，考完后立即查词典，才知是“倾倒”之意。作文题为《路》，我就结合自己艰苦求学、上山下乡的坎坷经历，并引用鲁迅、马克思有关人生之路的名言，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抒情散文，获得高分。

这张准考证上之所以填的是文科，是因为毕竟我下乡八年，学业早已荒废。只有写作不辍，又喜爱文学，因此报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已虚岁三十，与同为知识青年的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按有关规定年龄偏大者报考须证明有所特长，于是我还特地致信浙江省作家协会，请他们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我创作成就的公函，附于报名表中。

高考结束后，我从城里返回乡下。当天晚上，妻子即临产，次日凌晨在乡村卫生院为我生了个儿子，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果然，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3月8日一大早，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和母亲，吻了一下襁褓中的婴孩，记得临出门还放了几个炮仗以示庆祝。我用扁担挑

着箱子和被包，匆匆赶往火车站，谁知半途扁担折断，幸亏正巧有一辆三轮车路过，赶紧请其帮忙才顺利到站。

绿皮火车徐徐起动，我不禁思绪澎湃，热泪盈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根本没想到，时隔12年，居然又回到学生时代。12年前，我曾憧憬过大学生活，想象过大学校园，今天终于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到了杭州一下火车，便见到了前来迎接新生的杭州大学校车。我便很快到达中文系，办完报到手续，由老同学带我来到宿舍。6人一间高低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对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这一年，喜事连连，我大弟被绍兴师专录取；半年后，小弟也考上了绍兴师专。于是，在同一年里（1978年），我们兄弟三个都高高兴兴地离开家门上大学去了。憔悴的母亲倚在门框上满脸堆笑，却忍不住泪眼婆娑：“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

大弟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也来到杭州，现在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小弟毕业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一家民营企业的经理。

返回目录

四十年前的印象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也频

年过六十，越来越不敢对记忆的准确性打包票了。1977 年的高考，虽是改变我人生的重大经历，我也只剩印象，而非记忆了。既然不一定准确无误，还有絮叨的必要吗？有的。对于我，经四十年浪涛冲刷而留下的，即便不是原始的形态，也已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在我人生转折点上指点迷津劳心费力的师友亲人，可算是一份感恩或祭礼吧！

“我扳过手指了，你是两个中的一个。”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很沮丧。66 年小学四年级遭遇文化大革命。68 至 70 年上的初中。当了整整七年工人后，突然告诉我：“考试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让我拿什么去平等竞争呢？只有暗下决心，复习一年，明年再考。这个想法连父母都不知道。

一个大雨如注的傍晚，我下班回家，在一家水产店里躲雨，与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姚秀娟不期而遇。说起姚先生（不知何故，大家都称她先生，而非老师。这在文革中是很少见的），我对她并非全是好印象。她课上得很好。《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公开课，从学校、镇上一直上到县里。但人很傲，说话咄咄逼人。任命班干部她说了算，一点也不民主。最可恶的是，每每让我写好稿子，交给出身好的同学上台发言。我总觉得姚先生不待见我。这种少年时代的不悦感，使我很难亲近她。所以虽然我们骑车上下班会不时碰到，一般也只是打个招呼擦肩而过。

没想到那天姚先生主动发问了：“准备高考吗？”

“今年来不及了，我想明年考。”

“明年？今年不考，还有明年？下一届学生有老师辅导全天复习，你每天 8 小时上班，还有明年？再说，只会一年比一年难。”

这句话，犹如门外的倾盆大雨，把我浇得里外冰凉。

“嗯，但我基础太差，今年肯定考不上的。”

“考不上？谁说的！我扳过手指了，我的学生里就你和下一届的W某某两个，可以去考，而且一定考得上！”

这一句，犹如铁帚横扫乌云，让我眼前一亮。

但我还是自言自语：数学怎么办？历史地理都没学过呢。

“考中文系！中文系不学数学。历史地理政治？凡识字的，只要读懂了记住。你不认识字么？”

“哦？中文系不读数学的？！”

“你的语文我知道的，没问题。”

“可我从来没学过古文呀。”

“古文？你们工人阶级天天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不是古文？”

分手时，我像是对先生说，也像是对自己说：考，一定要考！

第二天我就以“同等学力”名义报了名。

第二年春天，接到录取通知即向先生报喜。先生告诉我，她就毕业于杭大中文系。有个好同学好朋友叫刘云泉，还在系里。

但我认识刘老师，大概已是三年级了，在刘老师的“词汇”课上。姚先生大约在1987年就病逝了，享年不到50岁。

有些人，彼此走近真不容易啊！当我听到“你是两个中的一个”时，突然明白，老师是记挂我，了解我，认可我，甚至是欣赏我的。而这种记挂了解认可欣赏或许一直在督促我考上大学，走到今天，走向明天？

“你读不读大学是小事，人家可是性命交关！”

报了名，就只有拼命了。

可是没有复习资料。姚先生借给我一本文革前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刻舟求剑》。二哥又托人从东北寄来了一些资料。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这年第四季度，我所在的丝厂提出：要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完成年产52吨白厂丝的目标，“把被四人帮造成

的损失夺回来”。可实际产量离目标还很远。于是，规定厂部办公室人员，除老弱病残，每天晚上6—10或11点加班，到车间顶岗劳动。

当时我是厂里财务科的工资员，负责结算发放近3000名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工资、退休金、夜班费及夜班粮票补贴等。工作量很大，也十分琐碎。晚上一加班，不仅疲劳而且无法参加有些中学的高考辅导。心里是十二分的不情愿，但年轻人没有理由不加班。

那些日子，我的复习时间是按小时安排的。9点一刻的工间操休息，我去食堂买好馒头。中午不仅省了排队买饭，还可乘办公室无人，或念念有词背诵，或在财务科的大铁柜上用粉笔演算数学题。

爸爸妈妈也全力以赴支持我。爸爸用复写纸描出各种空白地图。我上班一有空，便抽出一张偷偷摸摸默写山川河流地名物产等。妈妈每天用小磨磨豆浆，给我补充营养。到了11月初，姐姐要回娘家坐月子了。妈妈让我和姐姐一家对换着住。这样既方便照顾姐姐母子，我也有了安静的环境。一个人住在姐姐家的日子太好了。眼皮实在睁不开了，就定好闹钟，睡觉。两小时后闹醒，洗把冷水脸，继续看书。睡眠效果极佳，复习效率也高。

1977年秋天，揭批“四人帮”余毒的运动还在继续。我因为受父母告诫，从不参加派性斗争，属于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因此被抽到厂部揭批查小组帮忙，每天下午做现场审查记录。这样一来，上午就得把本职工作做完，下午记录，晚上再到车间加班。连轴转了几天，我有些吃不消了。回家报怨，这个记录员，弄得我开小差复习的时间都没了。

爸爸问明情况，非常严肃地说：“你读不读大学是小事；你若瞎写一气，人家可是性命交关的。你写错一个字，也许会叫人家吃官司的。”

我心想，哪会这么严重？爸爸给我讲了一件事。反右运动中，爸爸因为一手漂亮的铁笔钢板字，被抽到材料组刻写运动简报等。有一天，他正在誊写一份上报右派分子名单的材料，忽然听到名单中的一个人，正在隔壁会议室慷慨激昂地发言。爸爸说，当时他的手都抖了。

1977年，右派还未平反。爸爸说得很含蓄。但我听得出他对我参与审查工作的担忧。我当即表示，认真记录，不会害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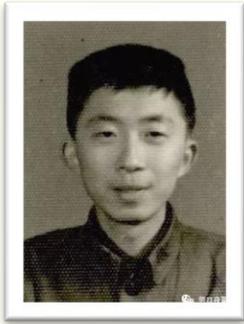
1977年秋冬，我就这么一边默默地忙碌，一边紧张地复习，一边慢慢地长大。

几个月后，当我将杭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交给父亲时，听他轻轻地说出“中文系啊，这可是右派预科哪！”这句话时，我已经不太吃惊了。

[返回目录](#)

40年前坎坷的高考之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夜，于人是热闹喧嚣的时刻，于我则是安静悠闲的时刻。夜里适合思考。于是在这里记下我一点一滴的思考足迹。这些足迹东游西走，散乱而无规律。虽说深浅不一，但至少还真诚实在。希望同道喜欢。

一年一度，又是高考。今年这个高考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 40 次高考。所以，这两天网络上都是 40 年前考生的回忆文章。现在看来，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十分幸运，赶上了好时机。其实我们这些 77 级学生老的老，少的少，经历都很坎坷，只是最终的结果很幸运而已。

我是 1970 年进入初中的。我记得很清楚，进初中时，校门口贴着“喜迎 70 年代第一春”的大标语。那年的 3 月，我们第一次学农劳动（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和学军训练（进行队列、刺杀操练）时，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听到田野里大喇叭播放的从太空传来的“东方红”音乐声，年幼的我们欣喜若狂。1973 年 2 月，我们初中毕业进入高中。一个月以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马上就传来准备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考部分大学生的消息，令我们这些高中生兴奋异常。要知道，当时大学实行的是从表现优秀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的制度，应届生需要到农村锻炼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被抽调读大学。在恢复高考的消息鼓舞下，我们都奋发读书，期望能够上大学。

但是，仅仅一年以后，“批林批孔（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开始了。这次运动表面上是“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以及邓小平的政策。在教育系统，就是反击右倾回潮。“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那时的风云人物。刚刚有点眉目的“恢复高考”马上就被否定了。

1975年1月，我们高中毕业了。因为我有深度近视（950°），超过了浙江省近视800°可以因病留城的标准，所以留在了城里。当时，所有的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身体确实不好的和独生子女可以留在城里。毕业前，学校团委书记曾经来动员我这个团支部书记，要我带头上山下乡。但是我告诉她，我近视950°，肯定病留，不能昧着良心去唱高调，欺骗同学。于是，她就只好动员另一个班的团支书带头上山下乡，后来因为参军他也没有去成。

不过，留城也有苦衷，工作不是那么好找。毕业以后，我在家里呆了一年半，除了烧饭，没别的事情可干。其间，为了消磨时光，我到台湾同胞那里学了半年日语，还到照相馆的暗房里学习冲印底片、照片。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母亲好不容易托人给我找到一个在袜厂打工的机会，当时叫“八角头”（每天收入8角钱，虽不多但已够吃饭）。但仅仅做了一个月就被人家辞了。于是又找人介绍到胡庆余堂制药厂（当时叫“杭州中药一厂”，现在的青春宝公司当时叫“杭州中药二厂”）做踩三轮车的苦工，把清洗干净的药瓶子从清洗车间拉到灌装车间，然后把灌装好的药拉进仓库。这回干得长了些，干了半年。直到今天，我走进胡庆余堂博物馆的时候，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场景。

1976年12月26日，我终于有了正式工作，到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支行报到。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杭州市人行湖墅支行学习银行业务。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时我在银行听到消息，激动非常。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打听大学的体检标准（怕深度近视眼进不了大学）。得知中文系之类文科只有矫正视力要求，没有裸眼视力要求后，我马上开始复习迎考。当时，因为决定恢复高考已经是10月份，12月份就要考试，复习时间所剩无几。我们当年只学过工业基础理论（简称“工基”，记得最清楚的是学习拖拉机柴油机的四冲程原理和8.75毫米电影放映机）和农业基础理论（简

称“农基”），根本就没有上过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课。急来抱佛脚，只好到新华书店买来当时的高中课本临时救急。我所在的银行领导力劝我不要去考，银行很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但我恳求说，十年难得一次机会，还希望让我试一试，试不成我一定安心工作，再也不考了。后来，我们一起进银行的另两个同学都升为行长，早就是厅级领导了，收入也十分可观。但是我一直不后悔，大学给我的财富是任何金钱、权位不能比拟的。

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是分省进行的，没有全国统考。浙江省分初试和复试进行。1977年12月25日是复试的日子。我终于昂首挺胸走进了杭州市第三中学的考场（有趣的是，39年后我儿子报考研究生，居然进了同一个考场，现在叫中策职高）。我记得很清楚，考试的那两天，天气非常晴朗。我顺利地完成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4门考试。当时外语教育不普及，农村基本没有，所以没有考外语。两天4门课就结束了。

按照当时的高考规定，填写志愿表在考试之前就进行了。每个学生只有3所学校3个系科可以填。根本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居然填了这么3个志愿：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第三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事后我才知道，前两个专业分别只在浙江招了两个学生。幸好，我的第三志愿没有落空。大概是1978年的春节前，我终于收到了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的通知（当时没有公布高考成绩，只有录取通知书）。很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录取通知书后来被我搞丢了！

在1978年3月杭州大学的开学典礼之后，我才知道，那些被政治系、历史系等录取的学生大多是填写中文志愿的，被强行分配录取到政治系、历史系后牢骚满腹。可见，至少我当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起码语文成绩不错。进了大学后，很多同学都到系里查自己的高考成绩。我却不以为然：大学都进来了，还查什么成绩？不就是那么回事了！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究竟考了多少分！

转眼间，已经将近40年过去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恍惚还在昨天。我记得我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都

引用到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我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的“建”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考试结束后翻《新华字典》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我记得高考历史地理卷子里有张地图，左边标明是太平洋，右边是大西洋，下面是墨西哥湾，要求回答这张地图上左右两条山脉是什么。恰好我在短暂的复习中知道这是美国，而且美国只有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这两条著名的山脉，所以答对了。

我记得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在上宁桥边的田塍小道里面。我记得很多很多。这些记忆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快乐，给我甜蜜，使我记得我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日子。

[返回目录](#)

可贵的一九七七：我的高考之路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黄永红

1977 年金秋，由于“文革”而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重新得以恢复。

作为 1977 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十分幸运，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与同班的老三届、新三届的师兄师姐们丰富的阅历相比，我的经历简直是一张白纸，简单又单纯，似乎没有什么可写。但回想起 40 年前参加高考的往事，还是想写些东西，也算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回顾。

1960 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解放前的初中生，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在部队的重点培养下，成为一名军事教员，从事了一辈子的军事教育工作。除因“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六年外，历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南京军事学院、浙江省军区教导大队军事教员。我从小与全家随着父亲从这个学校迁至那个学院，一直在部队院校生活，也算是与“学校”有着深深的缘分。

1967 年 9 月年满七岁的我进入南京市宇花小学上学。当时正值“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年龄大点的学生出去“串联”，我们小的则跟着看热闹。学校经常停课，教师被打成“臭老九”。我们的学习变得十分不正常，像“汉语拼音”这种基础课也被取消。1969 年，南京军事学院被撤销，我随着父亲调动，转到浙江嘉兴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子弟小学继续上学。后进入嘉兴第三中学，各读了一年半的初中和高中（当时学制是初中、高中各二年）。1977 年 1 月，因父亲再次调动工作到宁波镇海，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镇海中学完成的。像我这样从小学、初中、高中转学三地四校的学生估计也是少数吧！

我基本上是在“文革”的十年间读完了小学、中学。虽然学习很轻松，但文化课基础十分薄弱。中学期间不学物理，教“机电”（即农业机械等）。当物理老师讲到“黄、绿、红”三种电源导线时，全班哄堂大笑，好似在叫我的名字。历史、地理课也少有涉及，世界历

史干脆就没学过。印象深刻的是初中毕业考试简化为，语文、政治各交一篇文章了事。英语则是到任课老师面前通读一段课文。每年还要参加“学农”、“学工”活动。“学农”一般时间为两周，或者是带着铺盖吃住在农民家里，帮助干农活，与农民打成一片。或者去嘉兴三中的学农基地“余新农场”，帮助收割晚稻。记得有一年深秋，强冷空气来袭，我们男、女生分别居住在一个大房间。全体同学打地铺，在水泥地上铺些稻草，盖上自己的被子就这样入睡，冻得大家够呛。这样的条件是现在的学生想象不到的。“学工”是去嘉兴冶金机械厂，我跟随一位长辫子姐姐学开“车床”。由于“车床”转速很快，师傅怕出事，轻易不让我上机操作。得益于“学工”活动，我学会了如何看“图纸”，以至于工作后到工厂企业去检查“科技档案”，对其中的“蓝图”、“底图”也能看懂个大概，企业技术人员对我这个“文科生”也感到十分好奇。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除四旧”的年代，古今中外的名著和优秀文学作品大都被作为“毒草”付之一炬而与我无缘。因为年龄小，我也找不到什么好书，只能反复翻看《欧阳海之歌》、《红旗谱》、《毛主席语录》等红色书籍。小学高年级与初中阶段，经历了“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老师们又被学生写“大字报”批判，学好文化知识成了一句空话，真是如同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

直至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在镇海中学高二（3）班，由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许克用先生、语文老师张素娟先生等任课老师的认真负责，才算是正经地上课学习。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读书就算结束了。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是进工厂，时值镇海大搞建设，炼油厂、发电厂等企业都需要大量工人；第二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小五岁的弟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我家要有一个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也在这个决定我命运的时候，1977年的10月21日，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恢复高考了”。“文革”期间上大学，都是从工厂、

农村、部队中选拔推荐的，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对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讲，上大学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应该紧紧抓住。我与已经毕业两年的哥哥，报名参加高考。由于高考中断了十一年，报名人数众多，我们先参加宁波地区的初试。初试只考试语文和数学，我和哥哥顺利过关。接下来进入紧张的复习，迎接全省统考阶段。

当时镇海中学只举办理科复习班，我只能自己在家复习。因为是应届生，语文、政治还算马马虎虎，但历史、地理课在中学几乎没学，是个空白。于是，我就找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材，从头学起。时间紧，内容多，看多少算多少。

值得一提的两件事：一是我的地理知识在学校虽然学的少，但因为父亲是部队“军事地形学”教员，无论我们搬到那里，家里墙上一直张贴着大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是从小趴在墙上看着地图长大的，所以地理的基础知识还不错。当年高考时，历史、地理一张试卷，相比历史题，我的地理题目做得更好，全部填满。二是因为我的数学比较薄弱，父亲想方设法从海军镇海基地找到一位老乡。他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每逢星期日，把他请到我家，给我和哥哥辅导数学。“哈军工”的高材生，来给我们辅导数学，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能考上大学，离不开这位叔叔的精心辅导，让我终身难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老乡叔叔被落实政策，重新归队搞专业，调到“远望一号测量船”上工作）。

1977年12月15-16日，我在镇海中学参加了浙江省高考复试，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印象深刻的有二：一是语文的作文题《路》，自己写的是议论文，提出要走革命之路的论点，再进行剖析，对革命之路和反革命之路进行论述，最后验证得出：走革命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之路；二是史地试卷地理题中，有一张中东地区的地图，看到后心中窃喜，因为在复习过程中父亲提醒过，中东问题是当时国际上的热点与焦点，因此留心看了，所以答起题来十分顺畅。

接下来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小插曲。因为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普通话说说的还比较标准，自己又喜欢朗诵，音质也较好，

所以最早填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但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是需要面试的，当时宁波地区的考点在舟山，不知是那个环节出了差错，或是工作人员的失误，没有通知我，面试竟然把我给漏掉了，结果与播音行业失之交臂。之后填报志愿，感谢我的父亲，到底是教育工作者，见多识广，建议我将大学以梯队形式排列填报（那时还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分校。并且写上服从分配。

之后顺利通过体检与政审。考完以后，放松了，我就撒着欢儿地去找同学玩。毕竟年龄小，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没有过多的考虑。体会不到那些回乡务农的“老三届”和下乡知识青年要借机“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心情。

大约是1978年春节期间的吧，传来好消息，我已被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大红榜张贴在镇海县政府大门口。那年，我们镇海中学高二（3）班有两人考上大学本科，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班长邵国丰，他考进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加上后来扩招，我班又有两位同学考上大学专科，班主任许克用先生十分欣慰，说我们为班级和学校都争光了。值得高兴的是，我不仅在镇海中学榜上有名，还为曾经就读的嘉兴三中高二（2）班也添了彩，我与同班的马培民同学同时考入杭州大学。他进数学系，我进历史系。我们会合在杭州大学，又成为同校不同系的同学。说到这里，还要再提一下镇海中学，记得1977年镇海县参加高考复试的约有400人，镇海中学被录取的有45人左右，仅杭州大学就有15人。镇海中学确实是一所教学质量优异，师资队伍雄厚的好学校。现在的教学佳绩更是有目共睹。

1978年3月8日，我按期赴杭州大学报到，上大学时，我还不满18周岁，结识了一批年龄大、经历丰富的同学们，最大的金儒宗大哥已经31岁了。我有唯一的一个师妹徐水（比我小2个月），我俩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刘森林，也只比我们大几个月。那时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老师们尽心教，学生们专心学。我们读书都

非常用功，晚自习都要超过 11 时以后。身处杭州，就是星期天也很少去逛美丽的西湖，因为大家都深知学习的来之不易。

1977 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现如今，当年的那批大学生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精英与骨干。我的同学中也是名人众多，人才济济。有叱咤房地产界的老总们，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一批在高校从事历史学、博物馆学、法学的博导、教授，以及档案系统的专家和政府部门的领导等等。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嘉兴市档案局（馆），从事档案监督指导和宣传教育工作，现为副研究馆员。

1977 年恢复高考，使无数知识青年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对我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个巨大的变化。从小家看大家，牵涉到千千万万户人家。同时，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返回目录](#)

母亲的目光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近四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渐渐淡忘，但是，有些细节却依旧是那么清晰。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忆，而业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溶入了自己的血液，化为了自己的灵魂！这中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无疑是我母亲的目光！我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慢慢地长大，也在她的目光关切中逐渐地成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她目光伴随下的我的高考之路。

1958 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远在山西太原铁路局榆次火车站工作的父亲，因为有批评官僚主义的言论，被当作右倾的典型批判，尔后下放锻炼；再后来，大约是在 1962 年吧，父亲被剥夺公职和干部身份，打发回老家诸暨璜山中市村务农。当时，我母亲所在的单位——绍兴市总工会，也动员我母亲带我和妹妹，随同父亲一道去诸暨乡下。我母亲硬抗软磨，终于顶住了压力，使我们得以留在城中生活。同时她还力所能及给予孩子以当时最好的教育与培养。我读的幼儿园，是当时绍兴最好的鲁迅幼儿园；我读的小学，也是当时绍兴最好的北海中心小学；我读的初中，还是当时绍兴最好的绍兴一中。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印象里，母亲的目光，是坚毅的、倔强的。就是这种目光的关切之下，我少年的学习有了一个好的起点，为后来的高考打下最早的基础！

1971 年 2 月，我升入初中，成为绍兴一中初一（1）班的一员。初中两年，我学习上的潜能有较为充分的释放与施展。而绍兴一中的师资，即使在“文革”大浩劫中，也相对保持完整，像给我们讲授英语课的老师，就是邵力子的侄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日后成为越秀外国语学院创办者的邵鸿书先生。

“9.13”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的激情有所消退，教学秩序有所恢复。于是，我们至少得以正常上课。课堂上，尤其是考试中，我的学习优势获得了显现，成绩在班上总是能够名列前茅，与当时的班

长、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同学成一时瑜亮。每个学期末，将学期成绩单交给我母亲的时候，也就是我最开心的一刻。因为我这时看到母亲的目光，是充满着欣慰，洋溢着快乐。就是这样的目光，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懈怠，锲而不舍！

然而，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我学习的生涯也一样波诡云谲。1973年1月，我的初中学习生涯结束了，可本该继续进行的高中学习生涯却未能如期而至。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我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受打击、被边缘所致。父亲的情况固不待言，母亲也遇上了大麻烦。由于我外公一家多代为天主教教徒，我母亲一出生就受了洗礼。这样，她就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斗，而且罪名被定为“国际间谍”——可谓大得吓人。身处这样的家庭，我想读高中，不啻缘木求鱼！

我还记得，那年1月滴水成冰，特别寒冷，而我的心更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母亲在我离校那天对我说的话：“你的学校学习生活已经结束。以后，你只好自学了！”这时候，我所看到的母亲的目光，是那样的忧郁，还带着一丝深沉的愧疚。

尽管母亲说了我今后只能自学，但她没有放弃，还是希望我能够受高中阶段的教育。为此，她找了关系，把我送入绍兴农中，重读初二，以期待来年读上高中。但半年后，我深切感受到家庭经济上的拮据：我母亲是倒数第二级的23级干部，每月工资仅47元，加上活动工资与粮贴，也只有53元。这53元钱，既要补贴我父亲，又要供养她本人和我们兄妹俩人的生活与读书，还要赡养我外婆，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我决定不再读什么高中，而去做工挣钱补贴家用。我母亲一开始断然反对，但在我的坚持下，她只好作出让步，同意了我的决定。这时候，我读出母亲目光中的情感，那是黯然，那是无奈，更是苦涩。

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开始为生存而自我奋斗。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同样是我母亲伴随着我，鼓励着我。她在“文革”之前曾经担任过绍兴市总工会下辖的工人休养所所长。这一经历，让她得以认识不少人。她到处找熟人帮忙，托朋友关照。在她的努力下，从1973年8月到1977年10月，我先后干过多份工作：农村小建筑队杂工、

制药厂的运输工、啤酒厂的季节工、油脂香料厂的合同工、航运公司航班上的售票员；因此学会了酿造啤酒、锅炉司炉、炼制食油等多门技术工艺。

当然，中国是人情社会，别人帮了忙，我们得明理懂礼，予以报答。所以，逢年过节，我母亲总是眉头紧锁，为送礼之事发愁。亲戚赠送的红枣、月饼之类，我们自己从来不舍得享用，而是用作送礼。每逢此刻，母亲的目光，是焦虑的，是伤感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这人别无其他的兴趣，唯一癖好的，就是读书。打工 5 年，每有工余时间，我大部分都用来阅读。在文化的“严冬”之中，读书唯有随机性，逮住什么读什么，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系统性与规划性，而且不带任何功利性在里面，完全是一种爱好罢了。不过这么一来，书还真读了不少，像《爱的教育》、《缘缘堂随笔》、《安娜·卡列尼娜》、《雾·雨·电》、《沫若文集》、《水浒传》、《马凡陀山歌》、《杭州山水的来历》、《史记选》、《曹操集》等古今中外书籍都多少涉猎过。这个时候，我所看到母亲目光中所流露的，乃是一种信任，一种慰藉。就是在这样的目光关注下，我的文科知识才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与增长，才保证了在日后的高考中拥有了相对的文史知识优势！

1977 年 11 月，我终于结束了多年的临时工、合同工岁月，进入绍兴市中药厂，当上一名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有了一只相对稳定的饭碗。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国家也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我周围的朋友，有不少人报名考试，我自己跃跃欲试，也报名参加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1977 年的浙江省高考有预试这道程序，只考语文、数学二门。语文一科对我而言，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数学一科，因我没有读过高中，故一窍不通，只好交白卷出考场。在此情形下，我预试即被淘汰，乃是毫无悬念。好在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所以落榜对我来说，也谈不上是多大的失望。这个时候，我从母亲的目光里，看到的是理解，是鼓励。就是这样的目光，让我暗暗下定决心，不轻言放弃，来年再战，直至成功，实现自己上大学的夙愿！

我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依旧是数学。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1977年各省高考数学考卷，我绝大部分连题都看不懂，更遑论解题答卷了。我只好花笨功夫，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教材，但成效也近乎等于零。我母亲听同事董先生说，他有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朋友，因遭遇“文革”厄运，阴差阳错被发配到绍兴柯桥中学教书。母亲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不禁大喜过望，拜托董先生帮忙联系，让我和我好友孟勤国，跑去离城关镇20多里外的柯桥，找到这位老师，请求他点拨一二。见面之后，这位老师就拿出柯桥中学的高考数学模拟试卷，让我们答题，结果自然是令人汗颜——我一道也解不出来，吃大鸭蛋一个；孟勤国的情况稍好一点，答出一道半题（所以，后来他的高考数学成绩比我高近20分，过了当年浙江省文科360分的重点录取分数线，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毫无疑问，这次测试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我信心彻底崩盘！柯中这位老师看出了我的沮丧，一再安慰我：考文科，数学不是最关键的，还是把其他科目复习好，来补数学的亏空；同时，他也告诉我，在短短一两个月里要全面补习数学不现实。所以，在数学的复习上，就要有所选择，重点学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这些容易的内容，能抢下几分算几分。我母亲了解了这场柯中面试情况后，没有任何责怪，只是反复讲，不要泄气。这时候，母亲目光里所闪烁的，是宽容之光，更是鞭策之光。

幸运的是，1978年的高考有了重大的改革，不再搞什么初试了，而是一考定终身。考试的科目，也成了5门：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科目中，除了数学外，我对其他几门都是有信心的。而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我了！数学卷里其他的题目，我自然是付诸阙如，但是指数、对数，平面几何我都解答了出来；语文考得不甚理想，不过及格却不成什么问题；政治、历史、地理的卷子，则超乎我原来的想象，相当简单。到了8月份，高考成绩揭晓，我的考分，既无痛苦的失望，也没有意外的惊喜，就是正常的结果：数学28.8分，其他诸科成绩尚可，总分357.3分。这是超过我预期的分数。自己当然高兴，母亲同样开怀！这时候，母亲的目光中洋溢的是一份骄傲，一份振奋！

高考分数公布后，自己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缺乏充分的信心，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此时，觉得分数已足够。所以，就患得患失，变得焦虑起来。9月中旬，孟勤国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在祝贺朋友的同时，自己也不免着急，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发出，而自己这里，消息却依旧是杳如黄鹤，更让我情绪低落、寝食不安。我母亲见我这种丧魂落魄的样子，一再安慰我：能够上大学当然是最好。然而，即使落榜，毕竟已有工作，也不必太难受。不过，我心里明白，她心里其实比我更着急。这时候，她的目光中的神情，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复杂！

不过，落榜的悲剧毕竟没有发生。1978年10月2日的晚上，假期在厂里值班的师兄小何，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我家，带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目光里充满着的，乃是最深沉的自豪，洋溢着，乃是最美丽的幸福！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陆璇辉

我的高考已整整过去 41 年了，然而当年的那情那景至今历历在目，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我一共参加了两次高考。1977 年 9 月，那时我在浙江大学机械厂上班。一天下午，同车间的王师傅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我听后，立刻兴奋起来。其实，恢复高考的消息在 1973 年初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时就有传闻，当时我在杭一中（现在的杭高）读高一，也就是说以后读大学要高考录取，而不是采用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形式。当时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心心念念地期盼着一年后我们毕业时能参加高考，然后进大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73 年底的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又被第三次打倒，高考一事就此搁浅了。

1975 年初我高中毕业。由于我们家两位姐姐都已离开杭州，大姐去了临安的小三线工厂，二姐回老家无锡务农，按政策我自然就可以留在杭州了。但是毕业后的半年里，我无所事事。那时的国民经济相当低迷，工作不好找。后来只好去打临工。起先去了建筑工地做临时工，工作就是拌水泥浆、抬水泥和搬砖。由于干的是体力活儿，饭量特别大，一顿可以吃半斤米饭。收入每天 1.6 元，这在当时的临时工里面算高的。

1975 年底，街道通知我，说有一家无线电厂在招 8 角工，我立马放弃了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去了浙大附中的校办工厂——九二无线电厂，当八角头（即一天八角钱的临时工）。虽然工资没原来高，但是我从小爱好无线电。小学时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初中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从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一直到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高中时自己能组装黑白电视机了。所以，一听说是无线电厂就特别中意，第二天就去报到。工厂就在现在的曙光路上，工作了将近一年时间。我省吃俭用，攒够钱买了一只杭州牌手表。

1976年12月，我被招进了浙江省邮政车辆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浙江邮政车辆厂原来坐落在莫干山路的沈塘桥，隶属于浙江省邮政管理局，主要生产西湖牌摩托车。由于厂里进了一台插齿机（生产齿轮的机床），厂内没有人会用，就派我去浙江大学机械工厂学习插齿机的操作。我去浙大机械厂学习期间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3个月就能独立操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工厂内几乎没有高中生，所以我学历算高的。但是看到一位文革前的老大学毕业生的工程师在看外文书和资料时我就特别羡慕，期待将来我也一定能看懂外文资料。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1977年的高考，由于积压了从1966年至1977年10多年期间的考生，所以浙江的高考分为初考和统考两次进行。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初试考两门，数学和语文。由于高中毕业以后基本都在打临工，学业也荒废了。为了高考，只得抓紧时间复习。但是高考复习资料极其缺乏。由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突然，新华书店有关数学语文的书籍早已售罄。我不得不去借，借来的资料只能用一天就得还。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抄；来不及抄，母亲就帮着我一起抄，因为第二天要把复习资料还给别人。高考复习期间还要上班。我就把资料带到车间偷偷地看。我师傅看见了非常理解，睁只眼闭只眼，允许我上班时偷偷地复习。就这样匆匆忙忙复习了不到一个月就上考场。初考后，自认为考得不错。果然，初考不久后就有了结果，我们厂报名高考的5个人中有3个进入了复试。

复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5日-16日，考试科目5门，数学，物理化学（合在一起考），语文和政治。复试我感觉考的不错。不久就通知我去体检，身体一切良好。我就一边上班一边等通知。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厂有两位考生拿到了录取通知，一位是南京大学外语系，一位是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院），而我的录取通知一直没有来。我就通过关系去省招办打听。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文革期间的政治问题还留着尾巴，而且受两个“凡是”的影响。结果

我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那段时间，我十分苦闷，在厂里上班都抬不起头，碰到好朋友我也避开走，生怕别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录取。

1977年很快过去了。年底，我在浙大机械厂的实习期也结束了。我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班，开始了三班倒的工作。

时间来到1978年的5月，高考又开始报名了。是否报名参加高考，我们家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我母亲为代表，她认为我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作，以后大学毕业还要面临再次分配，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好的工作。另一派以我父亲为代表，说读大学是趋势，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分配之事不必现在考虑，事在人为嘛。其实考大学的最初想法是从小受我舅舅的影响。我舅舅是五十年代留学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后来在北京的中央编译局工作。我父亲从小就激励我长大后像舅舅那样好好读书。那时起，我就立志要读大学，所以我不想错过考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再次报名参加高考。

记得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高考复习也相当艰苦。由于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停课闹革命”，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当时有许多课程都没有系统学过，特别是物理与化学。物理学的是三机一电（拖拉机、发动机、抽水机，电动机），化学课没有教过有机化学。因此我不得不利用3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把没有学过的课程补上。

我新华书店排队买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7册，我每天下班回家后就开始看书做习题，错的习题就把它钩出来，过几天再做。实在不懂，就找一起复习的同学讨论，一直到搞懂为止。

时间很快到了6月。1978年的6月天气特别的闷热，气温徘徊在37-39摄氏度。那时家里根本没有空调，电扇也很少见。我插队在老家无锡的二姐，从微薄的工资中买来一家校办工厂生产的一台20厘米的小电扇，没有快慢档位，开起来像直升飞机，呼呼的响。每天下班回家，我就打着赤膊，在桌子边上放一桶井水。因为井水比较凉，用来降温，就这样坚持复习到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再继续去上班。

在考前二个星期，我弄到了两套高考模拟考卷，认认真真地按规定时间做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

1978 年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时间安排在 7 月 20 日，21 日，22 日三天。我的考场是在文三街的学军中学内，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选考）。由于文革时英语课没有好好教，我没有选。考完从考场出来，我的总体感觉不错。只是语文把握得不好，作文题是改写文章。这个题目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加上文革时期语文主要是学毛主席语录，基础不是很好。其他科目比较有把握和自信。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高考分数出来了，我的分数进了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不久，通知我们去体检。我们厂当初有 5 位考生，有 4 位考生接到了体检通知，体检也顺利通过。

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通知的难熬过程。9 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发出了。当我们厂两位考生接到录取通知时，而我没有接到时，我开始焦躁不安起来。我想，会不会又像 77 年那样？我 1977 年过了录取分数线，由于政审未过，没有被录取。这次总分过了第一批录取线，结果第二批录取通知都发了，我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同事都收到录取通知，而我还没有收到。我非常焦急。第二天我请假骑自行车去当时位于杭州众安桥的浙江省招生办公室咨询。接待我的是位和蔼可亲的 50 多岁的中年男人，别人介绍他是省招办副主任。我告诉他，我高考成绩是 360 分，已经上了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但是至今未有任何消息。他把我的情况记了下来，告诉我，这种情况相当多，让我回去等消息。果然大约 10 天后就收到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

那天下午我早班下班回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挂号信，我急不可耐地拆开信封，一看是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特别高兴，拿起篮球，跑到我家对面的杭十二中的篮球场去打球。碰到一起复习的同学就告诉他们。那种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只有经历过那种苦闷难熬的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是何等重要。

报到那天，我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杭州大学报到。当时杭州大学的学生宿舍很紧张，杭州市区的同学都被安排走读，还好我家离学校骑车只需 20 多分钟。几乎每个同学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写。入学时，我的同学中最大的是 1966 届高中毕业生，有些同学进校

的时候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们班最大的同学是 1946 年出生的，最小的是 1964 年出生的。我是班上年龄中等，入学时 21 岁。走进大学校门，虽然办公楼的墙壁上文革遗痕清晰可见，但是毕竟是恢复高考后的考生，给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

1978 年的秋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从本科毕业分配到杭州大学经济系工作，后又考到杭州大学物理系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去了德国和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一路走来，我无怨无悔。我庆幸自己当年的正确选择；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赶上了高考，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

（2019 年初夏于求是园）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伟白

我一九六九年从杭州轻工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衡器厂，学的造纸专业，做的是焊接工作。当时厂里只有一位三级技术的临时工，可想而知，我想要学好技术只有华山一条路：求助于书本，拜书本为师。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我费尽周折终于在中山公园边上的省科委图书室，找到了焊接入门之类俄文译本的书藉。这里的书只能当场看，也没有供人誊抄的桌椅。所以我只能凭自己的记忆，把记住的东西到厂后依样画葫芦地操作，发现不对有问题时，再到省科委去请教“师傅”。于是在工厂与省科委之间的往返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老天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的焊接技术已经不亚于那位三级工。

看到我喜欢钻研技术，厂领导让我去焊接技术顶级单位省安装公司接受培训，让一位高级技师传帮带了我三个月。从此我的电、气焊技术突飞猛进。厂里的主要设备是切削加工金属零部件的车床和刨床。车、刨床所用的刀具是需自己加工制作：把坚硬的钨刚刀头焊接在锻打好的刀巴上。这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的焊接作业。如果焊接时火焰大小、时间长短、焊药多少不能有机地结合掌握，就会出现车工刨工辛辛苦苦把乌钢刀头用砂轮磨出锋利的刀刃，还没加工几个，不是刀头氧化没焊牢固脱落，就是内部金相组织变异松脆无法切削。这让完不成工作量的工友叫苦连天。而掌握了技巧我的成功率几乎为百分之百，因此工友们都把此活交给我做。虽工作量大大增加，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我还成功地焊接了能起吊十吨重量的行车。按有关焊接条例规定，五级技工以上的老师傅才有资格作业。此举一时成为全厂的佳话，为同厂的技校同窗脸上争了光。

在工厂里，一切凭技术吃饭、讲话。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我已当上了由台称、地中衡、电镀、热处理等工段组成的一百四五十人的车间正职主任。有一天，从行政楼的四楼直至一楼

挂下来一条横幅，准确地应该叫直幅，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派的小绵羊、小爬虫”。第二天，夺取了厂领导班子权力的造反派就以此为由免去了我的职务。无官一身清，杂七杂八的事没有了。从技术层面来说，我现在拥有的技能足以对付厂里的需求，无须花功夫再作钻研；别人一天的焊接工作量我半天完成。加上工厂又处于半停工半停产的状态，于是我成了时间上的富翁。上班空余时间和人聊聊天，有时学唱革命样板戏，再就是常去医务室坐坐。医务室有一男一女两位医生，都是转业军人。男的原来是国民党军医投诚过来的，一看便知是有学问的人。此人对西医和中医的造诣都很深。我喜欢听他讲卫生保健知识，按如今的说法就是高大上的养生。临走时还在屁股上给我来了一针胎盘组织液，说这东西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与最小的同学相差一肖的大龄青年，混入青少年学弟学妹的队伍里没被人察觉，应该归功于这胎盘组织液。

这种日子过得也蛮爽快，但时间长了却让我感到乏味。闲着也是闲着，总得弄点事情做做。于是我回想起当年在科委图书室的场景。每当看到穿着褪了色的中山装的教授学者在全神贯注翻阅外文原版书籍时，总让我羡慕万分，心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懂外语，能看报、读外国原汁原味的小说那该多好。遗憾的是，那时我必须学习技艺站稳脚跟，后又因当上工段长、车间主任，不但白天杂务繁忙，而且晚上甚至星期天还得和职工一起加班加点。（在此还得说句题外话：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车间主任是没有职务工资的。）我豁出去拼命干，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而已。所以我还得感谢造反派把我从时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我有了圆梦的机会。

我初中学的是俄语，但知道学外语首选应该是英语。可惜周边没有精通英语的人，如今社会上多如牛毛的各种学习班那时还在娘胎里。然而学日语倒是有现成的老师：我的邻居陈老先生。他是台湾人，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夫人日本人。解放前携夫人来杭开办面粉厂，解放后不能返回留了下来，是看我长大的人。听说我想学日语，二老连声：“好，好，好！”当即收我为学生。教材是另一位邻居从箱底找出来的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日常用语的册本，汉字注音，没有

半点语法注释。学习的方式是单一的，老先生念一句，让我跟着念一句。他外出有事则由老夫人领读。每当我提及语法层面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单一不变的：“你只要坚持念下去，自然而然就能说日语了。”虽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满州国没有文化不懂语法但能讲日语的老太太大有人在。但是这种学习方式，对我来说如同吃药片不喝水一样难受。一年下来那本册子我背得滚瓜烂熟，语音语调基本成形，只是语法一窍不通。

幸运的是翌年1975年，杭州市科委开办科技日语班，由浙大俄语老师转行执教。由于工厂在郊区，信息闭塞，我是下半学期托人插班进去的。浙大老师语音语调不敢恭维，但他们触类旁通的语法，着实让我得益非浅。

好景不长，一年后因师资，市科委无法继续开班，这让刚刚念出兴趣的同学们感到失落。因此，有十来个同学希望我这个不是班长的班长组织自学小组。于是周末我们在市体委同学的工作室聚集学习。学习资料由我从日本小学课本中挑选后，刻钢板印发给大家。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了七七年高考恢复。

听说高考恢复了，大家很兴奋，都想参加考试，并一致达成高考方略：仅限于报考日语专业。因为无论报考哪门外语，都有门槛分。而且，当时社会上学习日语的人很少，所以竞争小，录取的概率高。其次，我们都是工厂工作多年的人。若考其他专业，分数一定考不过年轻的应届生。针对我们这种想法，那位浙大的启蒙老师给我们泼了盆冷水。在他看来，像北外、上外这种学校以培养实战第一线的翻译为主，以往录取的都是十八、九岁反应敏捷的小年青。而我们都是二十四、五岁且自学的人，一旦语音语调定型难以纠正，因此这些好大学是不会录取我们的。如果杭大、浙师大这类培养师资的大学开办日语专业，倒有可能录取我们。是年，我已经二十七岁，在厂里也混得不错。加上无论哪个家庭都会给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施加的那种压力越来越大，让我不得不与高考说再见。

上帝总是拿人的命运开玩笑。1978年6月，离高考仅一个月时间，杭大在报纸上刊登了日语专业招生广告。我心中快要熄灭的高考火焰

又重新被点燃。这火焰烧得我进退两难，放弃报考，意味着我这辈子与大学无缘。去考试，面前挡着时间短暂和复习资料还在天上飞的两座大山。看到我这么左右为难，厂部技术员浙大毕业的我的挚友，力挺我参加高考。他叫我用年假和加班调休加在一块去做一搏，复习资料由他负责寻找。没过几天，他给我拿来一本浙大为教师子女参加高考用的精编文科复习资料。他最后还教我留了后手：向厂部要求休假时一定得说是到外地去走走。这样，既使考不上也不会让我这个车间大主任丢面子。

等到一切各就各位，离考试已经只有十五天了。接下来我与时间展开了肉搏战。为了不受外界干扰，提高复习效率，白天我去小兄弟住处。那是木结构二楼十平方的小房间。抬头能看到屋顶盖着的瓦片，夏天特别热。那时大家都很穷没有电风扇，房间里只有一把大蒲扇（也有人叫它芭蕉扇）。也许是我把体内的能量全都贯注到记忆系统了，以致感觉系统无法开工。虽说汗流浹背，但已感觉不到热。十五天的复习期间的作息表是：吃完早饭就到那里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兼休息，下午他下班我回家。晚上在弄堂的电灯杆下摆张竹榻。先是坐着看，后是躺着看，一直看到眼皮闹罢工，一觉醒来天亮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把自己置于无任何杂念的时间真空箱里。虽说当时我的记忆力好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几乎达到过目不忘的境地，但是毕竟我是人而不是神。直至离第二天开考，世界历史地理资料还有一半等着我去翻阅。

高考的场地在郊区。为了万无一失，早早出门乘坐 13 路远程公交，足足提前一小时到达。只见人头攒动，考生们已经在考场的大门外等待进入教室。大门一开，铃声一响，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大门口立刻门可罗雀，十分宁静，看不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人”。中饭在周边的小店买碗汤面或馄饨赶紧了事，然后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稍作休息，下午继续战斗。

考完后的第二天，我赶忙回厂上班。一进车间，工友们围上来问我：“这么消瘦，这些日子你干什么去了？”我立即按挚友的既定方

针，说我去了乡下的亲戚家里玩，正好碰到在造房子，所以帮忙了。接着，每天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考试与录取通知的送达时间隔得很长，加上官小事情多，慢慢地让我淡忘了高考的事。有一天一位工友急冲冲地跑过来，说传达室里有我电话，是家里人打来的（平时我住在厂里周末回家）。这是我进厂后从未遇到过的事，心想肯定是家中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赶过去忐忑不安地拿起了听筒。打电话过来的是大姐，告诉我被录取了。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后我既没欢欣也没有雀跃，而是脑袋一片空白。清醒过来后，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向厂领导交待：人家器重培养我，我却招呼不打去考试，现在屁股掸掸要走人，我实在难以启口。

不知从哪里得知我考上大学，一位汪姓副厂长代表厂部到车间办公室找我谈话，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归纳起来为两点：一是肯定我的成绩，说我没辜负厂部的器重，把车间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又说现领导班子成员年纪都大了，需要像我这种年轻人去接班，希望我放弃就读。（后来当厂长的李竞初和副厂长张振华是我车间的工友）。二是如果我决意去念书，厂里也不会反对，但今年刚给我加上的一级工资必须留下，（计划经济年代，加薪是全国统一的。1978年的加薪是在十几年没有加薪的情况下，针对工矿企业中的优秀员工的。名额仅3%），给接替我的人。最后让我把和家人商量后的结果告诉他。

对厂部的意见，家人、亲朋好友分成了务实、务虚两派。一派完全赞同厂部的意见，还加以补充，说：你今年二十八岁了，你的同学都早已让父母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因此你也得赶紧找对象结婚，对家里有所交待。对立派认为：虽说这一级工资六块多钱并非小数目（那时的青菜萝卜只卖二、三分钱一斤，与现在的价格相差一百倍），在厂里留下来最多当个厂长。相反，上了大学，毕业后的前途那就宽广多了；再说男孩三十几岁成家也不算晚。就这样，双方谁都说不服谁，最后还是让我自己拿主意，免得以后怪别人。

我这个人的思想比较老派：我上有复数的姐姐下有复数的妹妹，无兄无弟。她们都已成家，考大学光宗耀祖只能我来做。再者，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对得起自己艰辛的付出。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反馈给汪副厂长的第二天，一把手的胡书记来找我。谈话是短暂、问答式的：“你决意去上大学了？”

“是的，我很想上大学。”

“好的，我知道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我觉得他生气了，而且应该生气。因为几乎全厂的人都说我是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很内疚，总觉得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好在没过几天，我就离开了工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进校后我发现工资单上还是四十一元多三级工的工资。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

我想起，他说因家境贫困只读了三年书，没文化常给工作带来的负面因素为此困惑。可想而知，他对知识的认知比我深刻得多。顺便说上一句，在工厂呆了这么多年，我从未给他送过礼物，反而是他把青岛衡器厂同行带来的啤酒、别人送给他的螃蟹等等送给了我。这与当今社会买官卖官简直是天壤之别的对照。他是我接触过的无数领导中文化程度最低而思想境界最高，且大、空、套话最少最朴实的人。

参加高考对应届生来说，是一件早上起来必须洗脸、刷牙一样程序式的事情，但是对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来说，那是会改变既定的人生轨迹的举措。就拿我来说，高考后，我人生旅途有了工厂、大学、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这四个驿站，以致造就了我具有那么一丁点工人的豪爽、知识分子的书香、政府官员的气场、企业经理的经济头脑这种四不像的性格混合体。

每当想起或被问到当年的高考时，我总会想：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留在厂里，我的人生轨迹又会怎样？参加高考是否值得？无疑，这是用大数据、云计算都无法解答的人生数学难题。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定律的功效，在小学、初中、技校唯我一人考上大学的同学聚会上，从他们看我的眼神，让我感到应该对改革开放的先驱者邓小平心存敬意。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我以前的工作单位，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建筑公司，在西溪河下开了家分部，专名经营建筑构件。有一次我去那里看一位同事，不经意看见了一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杭州大学中文系”。我心头略一惊，眼睛一亮，不由自主地走到大门边。只见里面芳草茵茵，野卉盛开，在阳光照耀下，煞是好看。我不敢进门，是不愿惊扰这学术圣地呢，还是因自卑而不敢触碰这高不可及的殿堂？现已回忆不清了。我只是隔着篱笆轻轻摘了一片草叶，放在衣兜里，默默地走了。

此前，我还当过搬运工人。在下城区运输一队，主要的工种就是拉大板车。这大板车就是专运载钢材的，有三四米长，用的是飞机或卡车的轮胎，能承受五吨以上的货物。杭州艮山门打铁关是金属仓库。钢管、钢筋、钢锭，要从半山的“杭钢”，运到金属仓库，从仓库运到南星桥、卖鱼桥，通过火车与轮船运往各地。装、运、卸，当时还是靠板车和人工。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苦力”。运上运下都是极其危险的，稍一不慎，就会被滚动的钢管压断手指、手臂。工友中，十之八九都是断指人。今天我伸出手来看看十个指头还在，还能够写写字，算是相当幸运了。当时，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车前草》（听说是一种中药），我们就是大板车前面的小草，千斤重量碾压过去，只要还没压死，就又顽强地挺立了起来。

初试

一九七七年初，听说可以高考了，我们这些差点被压死的小草，又开始抬起头来。

其时，我已离开运输队，在红旗建筑公司和下城区光辉印铁厂从事美工设计。当时，印铁厂希望我考美术学院，因为“对口”。

有一位在运输队和我同拉一辆板车的老兄叫任道斌，当时也开始复习迎考。道斌兄帮我干了许多电工活，我问何以为谢？他说，一刀稿纸即可。我在下城区报道组为浙报杭报写新闻稿，有稿纸可以领取。于是，我也就常常拿些稿纸“接济”他。数月后，北京喜讯传来，道斌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他说，你的稿纸让我抄录了很多学术资料，真正派上了用场。我祝贺他，越过本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同时，也有点愕然和惭愧。但细想，即使去考研，也必定是名落孙山。一个初中生，毕竟是不能够与道斌这老高三的优等生相提并论的。道斌后来在中国美院任教，是美术史的知名学者。多年后，我从浙大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当年的板车兄弟又站到了一条战线。

在印铁厂，我设计了许多糖果、饼干、茶叶罐，曾风靡一时。报考美术学院，也的确是情理之中的事。先是“初试”，交一件平时的“作品”即可。于是，我拿起自己比较得意的“金猴饼干”的画稿“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兴冲冲地到了浙江美院。初试老师打开画稿，端详了几分钟，又与其它考官耳语一番，便和蔼而干脆地说：“你的画和我们美院不对路，我们没法教你。”得，淘汰了。初试未捷身先“死”。

后来才知道，七七年考美院，几万人才录取一个啊。那年录取的个个都是“旷世英才”。

印铁厂的领导并没有因为我的失利而劝我退出高考，反而鼓励我再考，考什么都行，只要考上，每月工资照发。这当然是当时政策允许的，因为我的知青生涯加上务工，工龄已然“达标”。但对于厂方的大度，我是由衷感激的。于是，我向“杭大中文系”这个曾经的心灵家园进发，因为语言学也同样是我的爱好。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言论：文学是不必在大学里学的，但语言就不同。

路与鲨

一九七七年高考的作文题，是《路》。我一见题目就信心满满。刚刚在某刊物上见过一首诗：路，像一条忠实的录音带，录下了走路人的脚步和谈笑风生……循此思路，我演绎了一篇既有思想有不乏文采的散文。早早交了上去，见监考老师互相传看，颇有肯定的笑容。我十分放心地离开了教室。

但结果下来，是没有结果。七七年高考，仍要讲“成分”，因为我父亲并未“解放”，而不容置疑地将我划入了“另册”。

七八年高考政策有转，且两次高考相隔也不远。于是，我再次鼓起“剩勇”，发起了第二次攻坚。我从未上过一天的高中。当时，初中甚至没有化学课。为了补缺，我买来了所有高中的课本，死命地啃。数学不懂，就向同学的哥哥，杭大数学系的高材生蒋绍忠请教，硬是将立体几何等内容啃了下来。

慈母在炎热的气候里，每天两碗绿豆汤，端到我和一起复习的好友文星手里，让我们感觉干劲倍增。我和文星采取的是面对面答问或检验，这样随时纠错，记得还特别牢。后来学古典文献学，才知道这种办法古人早已在用，叫“校讎”。那个“讎”，就是两只鸟在互相叫。

七八年夏季的某一天，高考结束一个多月吧，忽然家门被一阵急切敲击。开门一看，是一位头发斑白的先生，头一句话就说：你被杭大中文系录取了！这位第一个来报喜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代文学教授徐朔方先生！

尘埃基本落定，我并没有放下厂里的工作。此时有一个我设计的百花糖果铁盒，因为订货单位要求高，需要我们去技术水平更好的厦门印铁厂制版。于是，王厂长就率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车上，让我惊异的是，王厂长有“一目十行”的本领。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他竟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四本全部读完！这让我理解他鼓动我高考的原因了：都是爱读书的人哪！

在厦门鼓浪屿，忙完了工作，该厂的师傅请我们吃可口的地方菜：菠萝炒牛肉片。后来，我们来到了蓝汪汪的海边。再后来，就有了这样一首诗：

《鹭岛》

1978 年高考结束赴厦门，在鼓浪屿海面游泳，遇一小鲨，同游一程。

鹭岛，我来了
但你只是想象中的仙禽
琴岛，我来了
但琴声早已在心中飞升
椰风习习，百卉芳菲而无名
骄阳熠熠，八角馥郁而轻盈
人啊那么美艳
水哦多么清冷
还看什么，还等什么
不如
一头扎进大海
胜过迷恋于画意诗情
让皮肤自己涂抹蓝色
让咸味渗透毛孔深层
19 世纪的楼宇渐渐远去
乐声已不辨西洋和南音
双臂划开的涟漪
是无限远去的笑纹
你是谁
为何时时触碰我的腰肢
好似在探究是否还聘婷
呵呵
这是鲨鱼的吻
我一转身便见到她凝视的眼神

大海中人与鲨的相遇
互相看到了善良与真诚
她的时时触碰让我惊奇
我的和颜悦色使她安心
我的每一个细胞活跃起来
借助海浪
和她的细胞交谈得很清纯

暮色西斜，我不能耽于
过远的游程
大洋深浩，鲨悠然游去
她有更美妙的远征
一年前的地球
鱼儿就已是大海的精灵
人
只是鱼的一部分忘却的基因
这浩瀚而深沉的偶遇
让我心存
一份永恒的情

这也是我上大学后，在同寝室的同学面前，朗诵的第一首诗。虽然上面已经是近年修改过的版本，但心绪、内容、情调完全是当时闻知高考录取后的真实写照。与小鲨的和谐相处，让我体会了一次“天人合一”的感觉，但的确是一次偶遇。

(2017年7月14日杭州)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王蓓

当时初中毕业，因是右派的女儿，不得上高中，自己只会哭，不知该咋办。还是我的爸爸鼓励我自学，一定不要放弃。

我跟广播自学英语，跟爸爸的右派朋友学音乐。找出学校课本自学。翻箱找出爸妈的医学书看，偷偷找邻居借禁书看。当时学习条件差，很难找到书看。那时为了看书，真的是千方百计的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几年，就有好心人推荐我去当小学的代课老师。我代的课程是音乐和小学戴帽初中班的英语课。后来，有了工农兵上大学。我因是独女，可进工厂。虽然代课老师工资比工人高，可我为了想上大学，辞掉了代课老师的工作，进厂当工人。当时的工人三班倒，右派家的居住条件差，白天睡不好觉，晚上要当夜班，人瘦的像根竹竿。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努力工作，只有工人才有机会上大学。

到了 1977 年，终于有机会考大学了。各种高考资料铺天盖地。我都不知道该考哪科？可我父母关心的却是右派的子女是否能考大学。以往的辛酸经历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不想我再次伤心。我妈妈甚至写信给当时的华国锋主席，请领导们放过我这个右派女儿，让这可怜的，好学的女孩子实现她的理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78 年的一天中午，对面楼房的小学老师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你的高考录取信到了！”我心里一阵激动，飞奔下楼，谢过这位老师后，捧着录取信往回走，思绪万纷……

从上幼儿园开始，我这右派女儿就受歧视。幼儿园开晚会，我担任报幕，是因我从小就能歌善舞。军区幼儿园的文艺老师受了批评，说怎能让我右派的女儿担任报幕，演主角？

上小学后，被杭州外国语学校选中，被上海舞蹈学校选中，都因我是右派子女不能去。我父亲为了让我有一技之长，带我去他的右派

朋友那里学小提琴。在那里，我遇见了几个小朋友，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右派或是右派边缘。

上中学后，我的数理化、语文、外语都是第一，却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入团。倒是校文宣队的老师来我家找我去参加。

我的童年，少年就是这样在右派子女的阴影下度过的。

此时，捧在手里的大学录取信有多重？自己知道，我的父母知道，那些父亲是右派或右派边缘的拉琴的朋友们知道。

[返回目录](#)

高考进行时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童国梁



我的高考虽然已经时隔四十年，但当时的那段岁月依然在眼前。缘由那场考试实在太难得，感受也很深切。那是在特殊的岁月，特殊的经历，烙下的特殊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景不但没有被忘却，反而日益加深。因为我把这次高考，视为人生的新起点，学习的

新开端。四十年来，这样的“高考”似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还在进行时。

我爱读书。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重点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德智体美劳全优，还担任班长，充满着学习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1974年在宁波一中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时期，大学招生大门紧闭着。当年以交白卷为英雄，“读书无用论”充斥社会，坊间流传“一根扁担两只桶，三角几何有啥用。”虽然我对读书情有独钟，而高考深造在当时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无奈，只得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做过车工、木工、泥工。因为年纪尚小，长得文弱，所以大伙儿们戏说“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过早荒废学业，实在可惜。

1975年秋，在班主任童莉君老师的推荐下，我到鄞县东吴中学任教。先到初中班二年，学校自办高中部后，又成为高中班首任班主任，教语文兼理化，也在初中部任历史、地理课。由于教学工作得心应手，多受赞誉。

1977年10月，就在文革结束后一年，传来了期盼已久的恢复高考的喜讯，便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很想在77年冬季高考中有所作为。但是好事多磨，节外生枝。因为当时规定，必须是正式农村户口才可以报考，而我的户籍还在城里，报考真象“鼻尖上的糖：看得见，吃不着”，郁闷极了。就这样，77年的高考机会，眼睁睁地看着溜掉了。那种惊喜又夹着焦虑、叹惜的心境，真是难以形容。

不得已，我提出报名支农。对此，家人有很多顾虑，并不支持。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搏拼一下，大不了“扎根农村一辈子，广阔天地炼红心”。

此时，东吴中学的同事、宁波一中的同学孙家裕，76年在宁波拉丝厂工作，77年考入浙江大学；还有一起任过教的黄大鸣同学，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留学美国，学成后又回母校任教），他们来信鼓励我积极报考，使我信心大增。听说我要走，东吴中学的领导和师生们纷纷挽留，此时此景，实在动情。这对于一个代课教师来说，真是莫大荣幸，也是高度肯定和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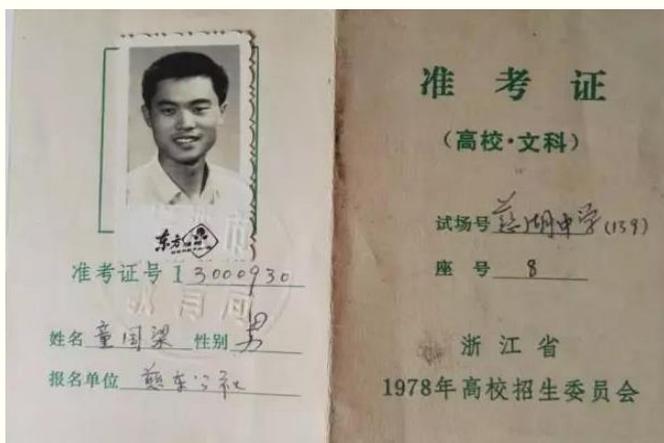
安康校长劝我说：代编教师到公立老师就一步之差，以后有机会好转正。尽管我内心也有这样想法，但继续学习的求知欲，驱使我去考一考。老师们都一一深情相送，记得林忠德老师赋诗有“三溪浦水深千尺，不及我送国梁情。”东吴中学就在鄞州（当时为鄞县）三溪浦下边，潺潺小溪从校门口的高耸茂盛的银杏树下流过。初、高中学生们都纷纷合影留念，还送来个人照片留作纪念，着实令我感动不已。

高中班学生陈剑平（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农科院院长），也特地写诗惜别，其中有两句“科学喻高山，你要敢登攀”，我一直作为激励和鞭策的警句。俞仁明与其弟俞光明以及他们父亲，特意为我饯行，情真意切，依依不舍。师生们送我到村口很远，姜振华老师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多多保重啊。”陈仁国老师还说：“莫道前程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些赠别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回想起来感到特别温暖、也特别亲切。

教师之间亲如一家，我与学生的年龄也就相差五六年，可以说是兄弟姐妹一样。当年的师生，至今仍有走动联络，友谊依然纯正，是

在那个难忘年代结下的珍贵友情。就在离校 27 年后的 2005 年，我作为老师也与学生们一起筹备同学会，三个班级一百五、六十位师生，竟有 123 位参加同学会，这激动的场面真是难以形容。

1978 年 5 月，按照“厂社挂钩”的“株洲经验”，我到宁波市江北区慈东公社山东大队插队落户。到那里报到之后，即开始备考。但



报考什么专业，又是费一番周折。此时普遍重理轻文，尤其是经过历次运动，都对文科退避三舍，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报考文科也是要有勇气的，且文科录取比例很少。我在学校虽

文理皆优，由于在东吴中学教学语文多一些，文科更擅长些，所以就决定考文科。

在宁波二中找到一些复习资料后，经过近二个月紧张复习，在 7 月 20、21、22 日三天高考。当年开始全国统一命题，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及英语六门。

我到插队的户籍所在地慈湖中学参加高考。临时在公社大礼堂里住宿。为驱蚊蝇，挂起一顶蚊帐，时值盛夏，赤日炎炎，礼堂边河流混浊，蚊蝇成群。因水土不服，又饮食不洁，竟然在高考的关键时刻发



起高烧来。真是波澜顿生，心急如焚呐！为了不再错过这次非常难得

的考试机会，于是咬紧牙关挺住，服了点药，用冷毛巾额头一敷就上考场。

语文考题有填充“盘桓”、“伫立”等词，此时高烧头热，也正云里雾里地“盘桓”、“伫立”着；还好作文是缩写，篇章结构的调遣幅度不是很大，就过关了。最后一天英语考试是不计分，仅作参考，也就坚持完成全部考试。在这样状态下，虽然出师不利，但最后还是考出总分 357.5 分的优异成绩。

我咨询宁波招生办主任汤菊生，他说有填报重点大学的竞争力了。黄大鸣同学已成功考入复旦大学，我便报考该校中文系和新闻系，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第一专业是中文系。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等待录取的时刻十分漫长。好不容易等到八、九月份，考生们录取通知书陆续寄来。尽管当时高考录取率仅有百分之几，真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是打听到有录取的考生喜讯。而我的录取信息却姗姗来迟，像是牛泥入海无消息。

在急切期待中，询问市高招办，得知已被杭大录取，但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于是写信给 77 年已经考进杭大数学系的蒋敏校友，他是我在鄞县中学高中备课会时结识的天童宝幢知青。可信被另一位叫张敏的校友收到，他帮我到杭大招生办查询，发现已经录取，还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虽不是我的同学“蒋敏”，我们也未曾见过面，但值得为我庆贺。



原来，录取通知书未邮寄到市区家里，而是寄到插队落户所在地慈东公社了。由于刚到插队不久就参加高考了，公社里一时都不知晓我的名字，于是录取信件被搁置了。当我到慈东公社去取信时，他们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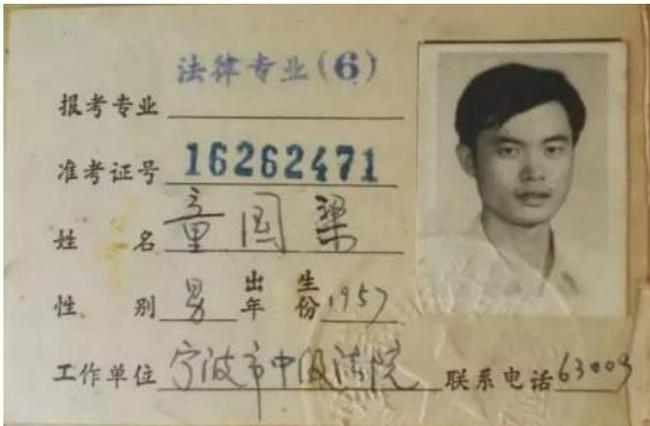
得知原来还是本公社插队知青，一下子高兴起来，说是中了“状元”，为公社争了面子，向我祝贺。该时已近中秋，我特意买了月饼，送给公社和队里社员，分享来之不易的喜悦。



1978年10月，到杭州大学报到，开始大学就学旅程。有幸在杭大中文系深造，在浓厚的人文氛围熏陶下，悟道释惑，获益良多。

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毕业包分配。高考似乎是“穿草鞋”与“穿皮鞋”划分身份的跳板。但我认为，高考不光是为有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注重精神成长，完善人格，会自学、治学，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拓展视野，升华境界。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法院工作，由于司法工作特性、时代要求加上个人爱好，仍然在持续不断参加“高考”。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我获浙大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学习方志学、史学、文化学等学科，还有“无字之书”。

多年审判实践历练，承办各类案件数千件，理论成果获全国性奖项，并入编《中国合同法》；期

间也从事全国法律业余大学的教育，荣获优秀教师称号；编纂宁波市志审判卷、宁波法院志、党史、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年鉴、浙江高院

审判志、浙江省通志审判卷等十余部。成果门类横跨法律审判、史志编纂、文化属类等。

四十年前的高考，是一次珍贵的精神洗礼，影响了整个人生。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当今世界，读书学习已是全方位、全时段，而非仅在人生某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始终在路上。而且，人生的高考，不止于考场，也不限于文字，是全方位的。

高考，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时。



（2018年10月5日）

[返回目录](#)

感谢再感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晚饭后，我在看杭州大学政治系 78 级毕业生祝毅先生赠送我他主编的《120 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 40 周年》一书。读着当年的同学们写的回忆高考的艰辛历程，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艰难的高考时刻，想到了生活的磨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能自己。自己的点滴遭遇不只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缩影，更是时代的符号和印记。

高中毕业三年后，我于 78 年 2 月 10 日分配去自来水厂作普工，单位性质是全民带集体，工资是 30 元外加 2 元自行车津贴。大约一个月后，工厂改成公司，车间升格成了水厂。我自幼酷爱读书，二上年级已手捧《星火燎原》和毛泽东著作甲种本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现在国家恢复可以考大学了，我可不能放弃这时代的恩赐！想想吧，从 1966 年到 1977 年连续 12 年没有高考的大机遇让我赶上了，我焉能不兴奋异常？！我马上边工作边全身心投入复习中去了。

我那时刚进工厂，领导让我们 150 个新工人锻炼锻炼，被派去挖马路埋水管，把生锈的水管通过几道工序如捅锈、上漆、晾干再埋入地下。白天工作很辛苦。承单位赵书记的美意，又让我当 10 个人小组的组长，还担任基干民兵副排长。但从宣布到去上大学的几个月时间里，民兵倒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活动。我们劳动时是一男一女二人配对，一个上午的工作量是两人拉半车土。我一人一上午拉满车两趟，工作量是别人的四倍。晚上还常在公司院内加班。复习则通常从晚上八点开始到半夜二点。第二天上午七点半，从西边的柳浪闻莺骑自行车，八点赶到城东的清泰门外的公司。到公司后，常常整个人还是浑浑噩噩，要工作两个小时后，人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是 1963 年进的小学。66 年 6 月文革开始时，正好小学三年级结束。这之后不上课了。每天，同学们在操场上玩，家里成份差的则被关在教室里。1970 年 2 月，我们进了位于玉皇山脚下的反修中学。每天，同学们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手拿小铁锤，把大石头打成 2-3 公

分左右大小的石头。每年，还或去萧山杭州齿轮箱厂学工，或去萧山钱江边的钱江农场学军学农。每次为期一个月。今天想想这学生的身份、这校名与每天的劳动，真有岁月沧桑之感和时代弄人的可笑可气可恨。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初高中学习只有初三的一年和高一。这段两年时间就是后来称之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回潮；初中三年是俄语，高中开始学习英语。74年高二时，社会就开始批林批孔，批资本主义思潮复辟。屈指算来在整个11年半的学生时代，小学六年半、初中三年和高中二年里，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五年。其中小学三年，初高中各一年。而且高考的史地也没学过，全凭晚上自学。当时也没有什么复习资料。父亲天天从四中拿来几张油印的材料。我记得有次下午去杭四中太礼堂里听复习课，人满为患。我一回头，发现后面的人听不到，居然都站在乒乓桌子上听课。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女生是我初中隔壁班的，是省军区子女，听说后来自杀了。当年的社会真是人人竞说高考，学子个个奋勇争先，千军万马争挤独木桥。这场景是如今的年轻人所意想不到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历史、是故事。对于我们77级和78级学生来说，则是近在眼前的场景，是人生挣扎，也是社会磨练。

由于工作和复习实在太辛苦，到五月上旬我就病倒了，去工厂的医务室看病。医务室两位女医生都姓张，而且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她们在听了我的工作和艰难的复习，特别是听说公司劳资科长还不同意我去高考后，反应都很激动。她们说，她们的小孩子正在考初中都很难，也很辛苦。也许是出于自己孩子的小学升初中的经历和母爱，也许是内心深处自发的古道热肠、正义感和想帮助年轻人，张医生马上打电话请科长来医务室。二位医生加一位护士，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说到科长同意我报考大学为止。我真的没有想到医生和护士会这么仗义出手相助，也没有想到解决报名难这个问题来得这么简单和戏剧性！这三位医生和护士是我今生今世的贵人和恩人！

当年五门考试，我的成绩是350多分。当时，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90分，理科310分，外语260分。全公司职工800多人，有8名工友报名参加高考，只有三人被录取：一个进了浙医大，而我则挂上了杭大的学生徽章，另外一个被录取浙师院杭州分校（今天的杭师大）但

他放弃了。后来，他当了水务集团的总经理。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领导先让我去宣传科帮忙，天天坐公交车去祥符桥水厂，在大墙上写一米见方的美术大字。后来，又分配我去当电工。整个大学四年里，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80年，还因胃出血在校医院住院二个月。

进大学翻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之路。我和祖国的千万学子一样，我们的命运与前途与共和国的命运前途同步共振！我和同学们一起抓住了并享受着制度改革的红利。当年的几十万学子由此彻底改变了各自的生活和命运。特别要指出的是，从那时起，这一制度改革让祖国在科技、军事、医疗、教育等各方面人才喷薄而出，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家的方方面面。

如今，我退休二年多了，内心深处仍在感谢当初单位的赵书记、高主任对我的信任；感谢二位张医生和一位护士的仗义执言；当然也感谢正义的力量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恢复了社会正常的秩序，和有可能引起社会阶层的良性循环、流动。现在的社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能力去选择去努力去奋斗，而不是一律去当工人、当知青、去兵团当农工，天南海北抛青春。

吃苦后方觉甜！年轻时吃的苦早已成为自己一辈子的精神财富。个人作用是渺小的，冥冥之中有股神奇的力量把个人和国家往正常的发展轨迹上拉。如果这机会晚五年晚十年来临呢？我想，我们当时的77、78级同学大都会错失这大好机遇，考不上大学，也做不成校友了。扪心自问，我们除了感激人生之路上的各位好心人之外，也深深庆幸遇上难得的好时机。我们中了时代的大奖，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们77和78学子亲眼目睹并积极投身参与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复兴的历史大潮，在推动了时代前进的大潮中奉献了各自的热情和力量。

我们见证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躬逢其盛，我们此生有幸！

感谢青少年时期遇上的所有的好人，感恩时代的恩赐！改革开放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条曲折但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大路。

返回目录

第二章：入校

入学通知书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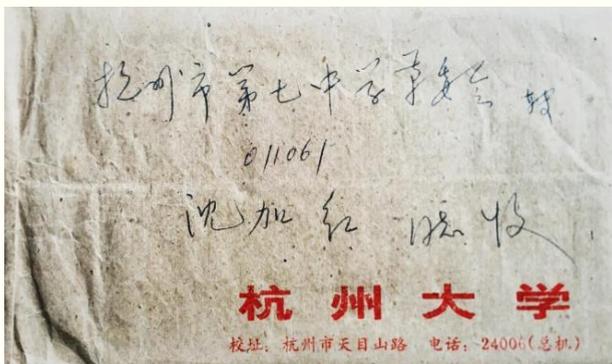
1977 年，这唯一在冬季举行的高考显得很匆忙，因为已经停止了 10 年的高校招生工作突然要恢复。没有考题，可以从民国的题库中取，没有印刷考卷的纸张可以动用印毛选的纸张，但是，没有管理制度就只能“摸着石过河”了。

录取的做派上，现在的人也许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那是在制度上的“摸着石过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要发至接受义务教育对象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手中。虽然该法没有“直接发到”的要求，但是从世界范围和历史长河来观察，主流的做法还是：“录取通知书”也好，“入学通知书”也好，都是学校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的书面协议，和第三者没有关系，除非学生在未成年时由监护人代理。

我接到这份“入学通知书”时已经过了 19 岁了。但是，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在学校和我之间，它就是“杭州市第七中学革委会”。

什么是“革委会”？《百度百科》说，“革委会”是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是文革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



织形式，当然也是各个组织中的权力代表。政权的“革委会”采取了由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和“工宣队”或者“农宣队”或者军代表（简称工农兵代表）“三结合”方式组成。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工农兵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所以，“杭州市第七中学革委会”就是杭州市第七中学的校领导班子。

为什么一个学生不能收到来自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要经过这个领导班子呢？因为这需要对学生和家庭进行“政治审查”（简称“政审”），看看是否能够让该学生去上该大学（当时主要是有一般学校/军事院校、一般专业/保密专业之分）。

当我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说明我“政审”已经被通过了。

据温元凯回忆：当时的高校招生16字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到了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温元凯提出了“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16个字，邓小平只改了（删了）四个字，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还说：“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

看来，只有2个月时间组织的这次冬季高考让基层组织既来不及去掉原来“学校复审”的惯性，也来不及落实删除“领导批准”这四个字。据说，半年后的78级还有被“政审”刷掉的学生。79年才有限放开对地富反坏右黑九类子女的限制，80年才正式不用填写“政审表”了。后来主要控制的是文革中的“三种人”了。

回首再看看这“新生入学须知”，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报到时还要户口关系、粮油关系、组织关系、粮票、油票、布票、《购货证注销证明》、介绍信……的时代。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新生入学须知

一、随带《入学通知书》和所在单位介绍信，按时报到。单位介绍信应包括：姓名、所任工作及职务、每月工资数、入学后是否带工资等内容。

二、自带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须经县、市或师以上组织转介）。

三、自带户口、粮油关系（粮食供应转移证上的“迁出供应日期”不得早于“签发日期”）。本省学员：户口在城镇的，应带足三月份的粮、油票；户口在农村的，应将分配口粮卖给国家，在粮食供应转移证上注明出售数，并将全部粮票带来。外省学员，应带足三月份的全国通用粮、油票。每个学员应将购货证注销证明带来学校。

四、报到时应交本人最近半身正面脱帽一寸照片三张。

五、带全日常生活用品：如被褥、衣服、餐具、雨具、蚊帐等。（因本校住房安排比较挤，请不要多带大件行李。）

体育专业学员运动服装自理，请作好经济上的准备（二十元左右），由学校代买，布票可免。

六、学员的书籍和文具用品由本人自理。带工资入学的学员，每学年需缴教材代管费十元（多还少补）。

七、报到路费：根据省财政局、省教育局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四日发的《关于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招生经费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录取在职学员的赴校路费（车船费按火车硬座和轮船最低一级舱位），一律由原工作单位负责计发、报销。录取非在职学员（包括在农村插队劳动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凡跨省的赴高等学校路费，根据财政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70）财财事字第87号通知的规定，由录取的所在县、市有关部门，统一发给本人火车硬座或轮船最低一级舱位的票价，途中伙食、旅馆费由本人自理；赴本省高等学校的车船费，由本人自理。个别确有困难的，由录取的所在县、市有关部门酌予补助。

杭 州 大 学

一九七八年 月 日

[返回目录](#)

新生入学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公元一九八二年，高考超过重点线。
体检过程挺惊险，贵人相助度难关。
人间自有真情在，心存感激填志愿。
先填北京林学院，再把宁杭院校填。
接到入学通知书，杭州大学喜结缘。
如愿以偿阖家欢，父子回乡慰祖先。
亲朋好友齐祝贺，老师同学皆贺勉。
专程金华百货店，选购皮箱二十元。
先办户口粮油证，再把团员关系转。
赴杭前夜思绪绵，辗转反侧难入眠。
凌晨起床吃早点，整装待发颇伤感。
老家生活廿二载，一旦离别成故园。
朝夕相处成习惯，从此全家团聚难。
母亲大姐亲自送，手持电筒把路赶。
一个小时八里地，到达唐村火车站。
五点三刻列车到，告别亲人泪盈眼。
七个小时抵杭州，出站就和校友见。
透过校车看窗外，街道景象很新鲜。
左转右拐十多里，天目山路才露脸。
首次来到大城市，感觉惊奇亦自然。
进入校门忙下车，眼前就是图书馆。
校园开阔绿化好，两边建筑有特点。
数学系友来帮忙，注册报到行李搬。
辗转来到十一幢，二楼宿舍已安排。
一间寝室住八人，高低铺位住上面。
相互介绍颇友好，从此同室住四年。

二号食堂比较远，排队买菜用瓷碗。
两位校友全程陪，夜游黄龙赏洞天。
雾里看花虽朦胧，曲径通幽妙庭院。
崭新一天如梦过，当晚沉睡美梦圆。

[返回目录](#)

第三章：学习

1 支冷凝管和 30 块大块肉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王耕

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上无机实验课，打破了一支冷凝管。感到很沮丧。没有马上报告指导老师。

当时还在走读，每天都骑车回家。

第二天上学路上，到中山中路上的科学实验器材商店买了一只冷凝管，花了近 5 元钱。把它带到实验室，放进自己的实验器材橱里。这才和指导老师包伟良说起。

包老师说，你不用自己买的。打破玻璃仪器告诉指导老师一下就可以了。

我那后悔呀！5 元钱可是半个多月的菜钱呢。可以吃 30 多块大块肉呢。

死要面子活受罪。

[返回目录](#)

食盐、丙酮、酒精灯和手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王耕

大二开始学有机课了。因为从小就爱玩汽油、玩火。这下看到实验室里有各种有机溶剂，有酒精灯，还有喷灯，很是喜欢。

那天做完实验，有些空余时间，突发奇想：食盐能不能溶解在丙酮里呢？找来一些氯化钠，放进烧杯里，倒了点丙酮，摇一摇，盐是盐，丙酮是丙酮。又再自作聪明：加加热呢？搬出酒精灯，点着，再罩上石棉网，把泡着氯化钠的丙酮烧到沸腾。盐并未丝毫溶解。正想凑上去仔细看看，只听“轰”一声，整个烧杯被火吞没。扶烧杯的手感到一紧，抽出来一看，汗毛被燎全无。所幸无大恙。

不过，通过这次实验，至少学到几点：1) 食盐不溶于丙酮；2) 丙酮沸点很低；3) 用酒精灯加热有机溶剂是有着火的危险；4) 下次再试应该带上防护手套；5) 要玩有机溶剂最好准备好灭火器。

[返回目录](#)

防患于未然（燃）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王耕

大学毕业论文是跟杨国梁老师做色谱。

课题是改性石墨化碳黑做色谱填充柱固定相。

实验过程中用到索氏抽提器来对石墨化碳黑表面进行清洗。洗涤溶剂是石油醚。

具体操作是把低沸点石油醚放在索氏抽提器的球型三颈瓶里，烧瓶底下用红外灯加热。石油醚加热沸腾。索氏抽提器上有冷暖管，冷却的石油醚滴入有滤纸筒盛着的石墨化碳黑担体储管。液面超过一定高度，虹吸管把所有的浸洗过石墨化碳黑的冷凝石油醚吸回底下的三颈瓶中。周而复始，一瓶石油醚可以把石墨化碳黑洗的很干净。冷凝管是用自来水接入的。连接的乳胶管就是套在入口处，没有额外加固。

那天是中午吃午餐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好像有预感可能会出事。预先把一个四氯化碳灭火器放在加热这装置的通风橱前地上。

也许是午饭时间化学楼用水量减少，水压增加，冷凝管入水乳胶管突然脱落。冷水喷到了加热着的石油醚三颈瓶上，三颈瓶一下受热不均匀破裂。瓶中石油醚撒到底下的红外灯上，红外灯爆裂，点燃了石油醚。只听“轰”的一声，整个通风橱一下被大火充盈。用到那时候描述英雄人物舍身相救的句子“说时迟，那时快”，我操起灭火器，拔掉安全栓，用力一捏手柄，雾状灭火液飞速喷出。左右一扫，大火登时熄灭。

当时，同学郭伟强就在贴隔壁色谱间午睡打盹。他一下子从座椅上跳起来，目睹了这有惊无险的一幕。

等到隔壁在大实验室里的汤福隆老师闻声赶来时，只有一点点烟雾和破碎的三颈瓶，以及露出钨丝支架的破红外灯似在诉说刚刚过去的惊险一幕。

这一次的事故，对我一直是个提醒：防患于未然（燃）不光是说的，也是要记着去做的。否则，我毕业论文可能就是去检讨怎么把新化学楼的新实验室给烧掉的了。能否拿到毕业证书也是有一个大问号了。

专业节奏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刚进数学系时，我一直头痛于数学分析这门课。高中时学习所形成的习惯太强大了，以至于对数学分析中涉及的极限理论始终受不了。所以除了拼命看参考书来帮助理解外，再无他途。

那时候很羡慕杨清这些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痛苦的脱胎换骨，终于在思维上跟上了专业的节奏。

就专业来说，我不是个好学生。所以除了第一个学期我在图书馆借过基本专业书外，其他借的基本是小说。很对不起那些费力费心教导我的数学系各位先生。

[返回目录](#)

买书杂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对于读书人来说，往往是既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藏书。大多数读书人都是生命不息，买书不止。所以，买书的历程基本与他们的人生轨迹吻合。我的大学时代已经远去，但现在只要找到当时所买的书，我记忆的闸门就会蓦然打开，往事就会一一浮现在眼前。

（一）“麦加圣地”朝圣

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读书的热情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当年，杭大本部校园内的一家新华书店仿佛是“麦加圣地”，我们经常要去朝拜。书店一到新书，从柜台到店门口就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上杭大的时候，中文系、生物系、政治系都在校本部之外。中文系校址在上宁桥，与马云就读的杭州师范学院一墙之隔，距校本部的路程按正常步速应该是在 20 分钟左右，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因为本来就爱逛书店，再加上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以前被禁的图书相继出版，学校图书馆隔三差五有新书。因此，同学们只要到学校借书，一般都会去书店。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在这家书店买过多部世界名著。像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林琴南曾译为《撒克逊英雄劫后纪略》）等世界名著都是从这家书店买到的。现在 80 后、90 后基本是在网络购书，或看电子书，书店排队买书的盛况似乎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次，我到图书馆借书后又去了书店。我发现那天的队伍特别长，从书店柜台排到书店门口，再蜿蜒延伸到校园马路上。我心中一喜，心想又进了好书了。一走近队伍，我看到了一位面善的老师也在

排队。我眼看他排到了柜台前，但忽然嘴里嘟囔了一下，扭头便走。为此我有点纳闷。等我排到柜台前一看，原来书店正在热卖的是一张印有阿诗玛半身像的年历。阿诗玛穿着彝族服装，背着竹篓，如满月一般的脸庞浮现出酒靥，笑意盈盈的大眼睛眺望高处，充满了憧憬，有一种青春、淳朴、纯净、自然的美。

后来，我将这位老师买书时的情景与同学们说了，大家都有点诧异。有一位当时也在队列中的同学说，这位老师一看到阿诗玛的年历就很排斥。现在想来，这大约与文革十年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与人性戕害有关。文革中一直批判封、资、修大毒草。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常被视之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许多人的审美感觉都出了问题。

（二）清泰街淘书

大学四年中，我的星期天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尽管学校离西湖很近，但我去游览的时候不多。我最向往、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去清泰街古旧书店淘书。

清泰街有两家古旧书店兼买中文书与外文书。当年，我在此买了不少日文书，出版年月大都是在昭和时代，有少数几本居然还是大正时代的。有一些布面精装的书因为辗转多处、堆放多年，往往已是灰头土脸。这类书买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清水把封面擦洗干净，真比洗衣服还要勤快。有一些书角带卷的我还专门在清泰街找地方请师傅用机器裁纸刀切齐。还有一次，我买回的一本书书脊破损，纸张也散落。于是，我找了一把锥子将书钻好孔，再用细麻绳穿好，看上去就像一本线装书，心里很有成就感。在清泰街古旧书店，我还淘到了平生收藏的第一本毛边书，——日本大正时期的戏剧家、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坪内逍遥的一本随笔集。其他如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史》、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文学》、奥野信太郎的《奥野信太郎随想集》、柳田谦十郎的《人生论》等书也都是在清泰街旧书店淘到的。更让我惊异的是，我在清泰街淘到的一本书在扉页上居然盖

着鲁迅的印章。此书是否确为鲁迅藏书，我未请专家去鉴定。但从书的出版年月及内容来说，那很有可能就是鲁迅的藏书。此外，当年的东西一般不会有假。如果是在今天，那十有八九是伪造的了。遗憾的是这本珍贵的书籍几次搬家已经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因为这条街道犹如我的精神家园，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大学毕业离开杭州后也去过多次，并有一次偶然听一位老杭州说起清泰街的故事。原来，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多位文化名人都在清泰街居住、求学、写作。清泰街从东到西，马坡巷是清代诗人龚自珍故居所在地；大学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与郁达夫的故居“风雨茅庐”所在地；城头巷是俞伯平居住地；佑圣观路是木心居住地。上溯到八百年前，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佑圣观路居住三十多年，后来成为宋光宗的儿子赵惇和宋宁宗的孙子赵扩也都出生在这里。

当年的清泰街很热闹，饭店、面店、烟纸店、杂货店和其他各色店家鳞次栉比。现在，清泰街已成为杭州旅游的一个地标，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因为许多店铺或是翻新、或是新建，行人也大多是游客，已不复有当年的市井气息。而我钟爱的几家旧书铺更是不见踪影，再要找到当年的感觉，可能要去东京的神保町了。

（三）西湖书店的“飞机头”

除了去清泰街古旧书店淘书，我还常到延安路上的西湖书店买书。记忆中，西湖书店应该是我入学第三年时开的。当时是杭州第二大书店。我觉得无论是从装潢风格、图书陈列格局，还是从图书品种等来说，都要比解放路那第一大书店要好。但就是服务不如人意。

我每次去西湖书店，几乎总是看到一个瘦高个、“飞机头”油光锃亮、估计苍蝇停在上面也要别断腿的小青年斜倚着柜台、抱着膀子，与一个身材高挑、神态妩媚的少妇眉飞色舞地聊天。而那位少妇也常常被他逗得花枝乱颤。这两位营业员此前曾在学校附近文二街的书店见到过。当时也是经常腻在一起，想不到西湖书店开张，他们又双双来此。当年的书店不是开架的，要看哪本书，需要营业员在书架上取。

但每当顾客让这“飞机头”取书，总是要叫好多遍后，他才懒洋洋地起身取书，然后把书往柜台上一甩。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外地来杭州的顾客实在不能忍受他恶劣的态度，就与他争执了起来。“飞机头”劈头盖脸地将一口对其冷嘲热讽的杭州话倾泻在他身上。那外地顾客老实巴脚，根本不是“飞机头”的对手。几分钟后，已是面红耳赤，说话结结巴巴。但突然间，如于无声处起惊雷，他憋着劲大吼一声：“你们营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话音刚落，只听“飞机头”一脸惊愕地高叫：“你是人民吗？我看你是就是一头猪，难道让我为猪服务啊！”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那外地顾客简直要气疯了，还好有人劝架，才没有发展成斗殴。由于我经常去这家书店，“飞机头”与我也认识了。他看到我还比较客气，有时还会打招呼：“大学生，你又来哒？今朝新书不少的。”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杭州。后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工作。因为杭州有不少同学，所以也常回去看看。有一年我到杭州，也许是出于怀旧吧，又专程去了这家书店。令人意外的是，那“飞机头”居然还在。他的头发仍是打理得一丝不苟，但已经有点灰白，不再发亮，背也有些佝偻了。再看他的面容，也少了蛮横之气，多了和悦之色。看来岁月不仅催人老、也催人善。他看到我时，愣了一下，但终究还是没有想起我来。他的那位女搭档没有见到，可能已经退休了。这次，我没有与“飞机头”打招呼，在书店里兜了一圈后，就悄悄地离开了。

返回目录

令人头痛的体育考试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大学四年，经历过的考试可谓多矣！不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是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的。在我经历的各种考试中，有的印象深刻，有的早已淡忘；有的令我自豪，有的让我感到尴尬，还有的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

说起来，令我自豪的，要数英语考试了。或许有人不信，想这些年来，你写篇论文总让人帮助翻译英文题名和摘要，怎么在大学时候你的英语考试，能让你感到自豪呢？其实，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在大学的英语成绩，没有低于 95 分的，而且我的交卷时间基本不超过半个小时。

在我经过的大学两年多次英语考试中，若不是因为老师不让我这么快交卷，我可能用不了半个小时。记得有一次，拿到试卷以后，我大概用了 20 分钟左右就完成了，就起身准备交卷。任课老师施老师发现后，就走到我的跟前，示意我先别交卷，让我等一会。她劝我别交卷，现在想来，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让我自己检查一遍，免得有错，影响成绩；二是太快交卷，怕影响到别的同学。后来，我坐在那儿歇了一会，十来分钟以后，交卷离开了教室。那次的考试成绩不是太理想，好像是 96 分。

我的英语成绩为什么比较好？现在想来，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对教材比较熟悉，文章差不多我都能背。那时候，我们用的是许国璋教授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一共六本。我们非英语专业学生，大学一二年级有英语课，一学期一本，也就是两年四本，到第四册结束。虽然如此，其实我后面的五、六册都自学了。另外，我还从图书馆借了不少英语读物，开始是中英文对照的，后来是英语原著或名著的缩写本。

记得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郑云山老师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课。下课了，我跟郑老师说起学外语的事，意思是我想学第二外语。郑老师很认真地说，你不要去学二外，把英语学好就行了，要把一门外语

真正学好是很难的。听了郑老师的话，当时还不太服气。大学毕业，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到底还是选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当然，没有学好，基本忘得差不多了。而英语又落得了这般田地，令人感慨万分啊！

大学期间，让我感到尴尬的考试，莫过于历史文献课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历史文献是必修课，是阅读第一手资料的不二途径。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仓修良先生和魏得良先生。两位老师的讲课风格截然不同。仓老师每次讲课，必定会先发一通感慨，有时就是牢骚话；而魏老师讲课，则是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总的来说，我对这门课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能在古代文化史研究里面混，与自己的古汉语水平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然而，在仓老师任教的那次考试中，我却出现了令人十分尴尬的一幕。这次考试，其中有一道试题，让我们写出十二生肖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在回答这道题时，十二生肖，硬是有一个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算了，我本来不写就完了，何必去弄巧成拙呢！当时，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竟然把狮子写上了，凑成了十二个！几天以后，仓老师来上课，讲到这次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专门讲到：有的同学竟然把狮子写进了十二生肖！他没有点名，可是，在下面的我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

再说体育考试。自从上小学起，我的体育成绩一直没有好过。尽管我一直到初中毕业，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但是，严格说来，我的体育成绩是不行的。上小学时，我一直是班长，还是学校的红小兵团团长。可是，一到学校运动会，我基本是不参加的，因为班上别的同学比我强。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有一次校运动会，班上本来安排了跑4×100米的四位同学。不知何故，到了检录处，有一位同学没有来，找不着。我是副班长，没有别人，只好自己上了。比赛开始后，我跑的是第二棒，大概跑了四五十米，摔了一跤。尽管我立即爬起来，坚持跑到了终点，可成绩一下子就下来了。虽然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怪我，但是我心里却是比较内疚。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体育考试成绩也是乏善可陈。毕业那年，班主任老师赵淡先生是搞体育的，篮球打得很好，身手矫健，投篮命中率极高，因而很喜欢看学校老师们的篮球比赛。然而，就我自己而言，也就是勉强及格而已。当时，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爬山。学校背后是一座山，叫凤凰山，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同学说，凤凰山下飞出金凤凰。我经常一大早起来，就到山上去朗读古文或者英文。吃过晚饭以后，我又自己一个人或约上几个同学一起去。当时的情景令人难忘。有一次，语文老师巫凌霄先生布置我们写作文，我的作文题目就是《爬山》。然而，爬山不是学校体育课的内容，于体育成绩无补，只是个人的爱好而已。

大学期间的体育课，我们上了一年。两个学期，从田径到体操，学了不少。可是，我基本上都没有学好。跑步来说，有短跑、中长跑。短跑勉强及格，中长跑就比较费劲。记得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就有1500米跑考试。我为了考试通过，差不多都早起来去锻炼，比一般同学可能要早起一点。然而，成绩还是提不上去。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是初冬时候，寝室的同学都还在梦乡，我轻手轻脚地起来了，穿上运动服，到学校操场去跑步了。让我稍感意外的是，操场上没有别人，倒是不远处的狗叫声，让我感到有几分害怕。也不管它，我跑了大概有五圈，就回寝室了。路过学校医院门口时，着实感到奇怪，怎么没有人？回到我们的宿舍楼，到厕所的灯光下，看了一下手表，原来才半夜两点半！

第二学期的体育课，我们就学体操了。体操是我体育诸项中成绩最差的。跳鞍马，我一上去，就坐到了鞍马上，试了多少遍，没有几次能顺利过关的。单杠稍好一些，无非是引体向上，次数少些，不一定能达到要求，好歹能做。双杠就不行了，技术性比较强。如果仅仅是双臂撑起来，还好一点。要是玩得花哨的，简直是望洋兴叹。每次看到与我个头相仿的吕华兴同学在双杠上运动自如、干净利落的表现，真是让人羡慕！不过，双杠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项目。最让我头痛、至今仍那么有一点心有余悸的，是鱼跃前滚翻。这个学期的体育考试，我就在这个项目上栽了跟斗，未能通过。

大学四年级下学期，也就是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有一天，班主任赵秀英老师来找我说：全根先，你有一门功课需要补考，否则会影响毕业。我当然知道是什么，该死的鱼跃前滚翻！从这天以后，我几乎做梦都在想这个鱼跃前滚翻。不过，想归想，做归做。那时候，我弟弟在杭州师范学院。他差我一年，体育成绩一直是优。我们每次回家，我都会让他在家指导我，怎么做鱼跃前滚翻。在家里，我们抱一些稻草之类的松软的东西，堆在地上，算是学校体育馆里的垫子了。我一遍一遍地做，我弟弟就在一边指导，有时给我示范。他会跟我说，我哪儿不对，让我重做，接着做。重做还是不行，他说还是不太对。但是，毕竟他不能替我去做，甚是无奈。

终于，到了补考的那一天。班上与我去参加体育补考的，好像还有曹永义同学。他是与我一个寝室的，补考的是投手榴弹。他之所以补考，是因为他入学时年龄小、个子小，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当时没有通过。等到快毕业补考时，他已长到一米七几。补考时，一下子就过了。剩下的就是孤独而有点可怜的我。高足有两米的周老师把我带到了学校体育馆，让我在做体操的垫子边上先活动一下，然后再做。做以前，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把这个鱼跃前滚翻的动作在脑子里过了。我以充满自信的神态，一个前跃，很快做了一遍。我望了周老师一眼，见他摇了摇头。我再做了一遍，又做了一遍。他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按规定，好像只能做三次，而我接连做了十来次。最后，周老师淡然地对我说：“不要再做了。及格！”

听到这句话，我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我不知道周老师为什么让我通过。也许他看到了我的努力，也许他知道我的其他成绩都不错，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和爱护，也许这几种因素都有……总之，我可以如愿拿到毕业证书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没有拿到毕业证，会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南大还会要我吗？真是不堪设想！

顺便说一下，周老师给我们上游泳课时，教我们蛙泳、仰泳。我虽然幼小就会游泳，但是，动作不标准，只会“狗跑”。每次进游泳

池，周老师一个同学一个同学地看。到我跟前，一上来，就把我的脑袋往下按，反复几次，没少喝水。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然是“狗跑”，没有学会蛙泳。

呜呼！愚笨如我辈，体育成绩最终能蒙混过关，不亦人生一大幸事乎！

然则，我不学蛙泳之脑袋入水，岂不是一种决不低头的心境乎？

岁月如梭，浮生若梦。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烦恼，人生无常，而又有常。走吧，走吧，透过尘雾，便见蓝天！

（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早晨）

[返回目录](#)

英语书里有一篇课文说了这个事情

—杭州大学外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大概是我大二时。有一天早上，在文二街政治系的校园里读英语，碰到留校不久的辅导员何冬梅老师。她怀抱出生才几个月的宝宝。宝宝在哭，她在哄。

我走近对她说：“何老师，你抱小毛头的位置不对。小毛头的头应该靠在你左胸而不是右胸。”

她很奇怪，看着我说：“你说什么？”

我就比划着说：“小毛头在娘胎里天天听妈妈的心跳。你把小毛头的头贴左胸抱着，他听到心跳会不哭的。”

何老师很惊讶地说：“史晋川，你才几岁呀？弄了好像蛮懂！”

我指着手中的英语书（好像是 English through Reading）告诉她，英语书里有一篇课文说了这个事情。

事过多年，我和何老师成了经济系的同事。她还有时提这个事，说我年纪轻轻，道儿蛮老。

[返回目录](#)

我的杭大课桌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宋宏亮

刚进杭大第一年，杭大外语系德语班有自己的专用小教室。每个人有自己专用课桌，课桌可以自己简单安装一把锁。桌盖下面是一个桌斗，就像一个小木箱。打开锁，掀开桌盖，木箱里面属于自己的世界。打开的桌盖用一个挂钩勾住，可以让它立起来，从而挡住其他人的视线。小小的个人世界，隐私得到保障。

多么奢侈的学习条件呀！省城的高中毕业生们是无法体会到的。我是很惊喜，很喜欢这样的学习环境。开自己的课桌抽屉，里面都是各种私人物件。放在寝室里感觉不安全的，统统锁在这里。证件钱包，父母奶奶妹妹给我的信件，小情人的小情书，等等不一。偶尔也会藏一包小零食。所有跟德语专业无关的，不愿别人看到的，都赫赫在目。四年杭大生活的记忆，都在这个小课桌抽屉里可以翻出。打开这个课桌，就打开了我的世界。

课桌的桌面是桦树原木的，质地挺硬，一看工艺就是精心制作的。论年代，它应该是大跃进时代的产品，可它绝不是粗制滥造的。桌子虽然有些年头，但绝不摇晃。桌面上是有些不平，坑坑洼洼的留着深浅不同的刻痕。有英文和德文字母组合，有看不懂的图案和标识。也许是用过这张桌子的同学们的情感发泄，或者是应付考试而留下的小花招。不知道，也许是闲得无聊乱刻的。

我上大学晚了，感觉自己已是老秧子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书本里的东西对我毫无吸引力，都是些浮云，转瞬即逝的浮云。

浸淫乱世十年，如今面壁反思：杭大给我机会，不愁吃喝，与世隔绝，自由地思考，安静地学习，整整四年。而这种机会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我的课桌在最后一排，而且贴窗。我坐在教室的角落，掀起课桌桌面做挡板，面对我自己小小世界，眼观鼻，鼻问心，心静如水。

专业课都在小教室。上自习课时，除了有约会才去大教室。一般情况，我不舍得离开我的小小世界。谁也无法理解，这张课桌就是我的世界了。它对我是多么的珍贵，而我是多么的珍惜它。

面壁我的世界太久，有时就呆住了。那就抬头看看窗外的景色。窗外新绿成荫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节，最喜欢了。

[返回目录](#)

分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大学一年级的第一次英语考试，我得了 97 分。我有点高兴。后来听说得 90 多分的同学很多，于是高兴里面原来带有的一点兴奋没有了。后来又听说，97 分是班上最高分，我又有有点高兴。但接着得知还有一个 97 分，而且据说另一个得 97 分的同学极有可能获得的是 97.5 分，我又有有点觉得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但无论情绪如何一波三折，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这个 97 分让我心情很好。虽然含金量我知道并不高，因为它好像不是什么严肃的期中考或者期末考，很有可能就是一次摸底考。

不过，让老师感觉自己有一个不错的底牌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这样的让人心情愉悦的分数居然后来就再也没有来光顾过我。我是有点郁闷的。

我后来还专门研究了班里几位经常得高分的同学的学习方法，认定他们在学习上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揣摩，认为已得真经。但等考试成绩一出来，发现还是差一口气！

这一口气可以耗尽你原本想储存留作他用的时间，可以破坏你原本能让心自由飞翔起来的好心情，可以让你有强烈的憋屈感！

然而，更令我沮丧的是，常常经过认真分析自己的试卷，找到了自己的薄弱环节之后，满心以为下一次考试一定会有所提高，一定会在分数上有所体现。可结果是，下一次考试不再考我已得到加强的那一薄弱环节了，改考新的语言要点了。结果，新的语言要点又成了我的新的薄弱环节了。

等到我似乎终于有点开窍的时候，我毕业了！

我被分数折磨了四年，奴役了四年！同时也被开导了四年！

[返回目录](#)

大一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开学典礼打头阵，新生汇聚大礼堂。
师生致辞颇励志，激情燃烧斗志昂。
组织参观图书馆，标志建筑印心房。
百万藏书超震撼，知识宝库堪敬仰。
学苑西二教学楼，政法数学系共享。
阶梯教室二一六，八二年级常驻防。
每个学期七门课，数学分析主角唱。
代数几何紧随后，语英政体轮番讲。
物理接替几何上，师资力量配备强。
难忘数分习题课，偶挂黑板没商量。
环境适应有快慢，学习方法须改良。
学科特点难把握，难题费解把神伤。
教室寝室加食堂，三点一线度时光。
期中测试紧发条，期末考试人心慌。
薛驹省长作报告，八千师生聚操场。
系校两级运动会，体育健儿成主将。
各类晚会多色彩，文娱骨干频亮相。
隆重纪念一二九，龙井登山凯歌扬。
清明时节凤凰山，子三烈士凭吊殇。
西湖划船搞活动，全班同学心花放。
中秋国庆接连到，一斤月饼谢校方。
元旦加餐一元钱，伙食水平便高涨。
年级评定助学金，高低多少有影响。
下课就餐人流涌，遗失瓷碗很正常。
洗澡理发洗衣服，日常生活都便当。
痴迷电影总自责，周围影院遍欣赏。

进城购书逛商店，十一路车常来往。
中学同学通信多，相互鼓励心欢畅。
寒暑假回家乡，走亲访友人气旺。
先去义乌访亲友，再回兰溪慰同窗。
高考三日在县城，三顾考点挺紧张。
农村联产承包后，抢收抢种格外忙。
责无旁贷充劳力，三天日晒变模样。
此起彼伏大串联，同学相聚喜洋洋。
师生之情难忘怀，拜访恩师诉衷肠。
全年费用太夸张，愧对全家拼命扛。

[返回目录](#)

大二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八月下旬诸事毕，返校计划先酝酿。
年级会议提前开，阶梯教室须换防。
定点东三历史楼，一二一室大课堂。
每个学期六门课，数学分析仍担纲。
徐师前方换角色，王师美琴成主讲。
哲学体育英语课，两个学期都要上。
英语教学有高招，成绩组班分四档。
抽象代数接数论，王师传国续担当。
物理常微分方程，先导后续渐明朗。
自修教室图书馆，学习劲头格外昂。
讲座如何学数学，谢师庭藩开良方。
江师金生谈方法，双师教诲勿相忘。
各类讲座贴广告，座无虚席受益广。
龚师浩然作报告，心理调适好鸡汤。
一靠知心朋友帮，二靠日记自助康。
学校班子作调整，陈立先生高风尚。
夏师越炯任书记，薛师艳庄任校长。
年级主任钱老师，升迁辞行颇感伤。
班委改选挺民主，班级事务大家帮。
品德评定分等级，优良中等亦正常。
文明礼貌月活动，做好自己便无妨。
百科竞赛刚完成，书法比赛又亮相。
登山竞赛初阳台，班级夺冠个人爽。
学校迎新越野赛，我系男女团体王。
七八两组贡献大，晚上聚餐论功赏。
数学文青写小说，莽汉传奇喜共享。

多位同学患疾病，关心爱护没商量。
不幸失去樊同学，班级追悼破天荒。
温水煮蛙渐适应，同学关系像同窗。
老师同学常通信，每日惦记开信箱。
南来北往同学来，游兴谈兴格外旺。
口琴笛子篆刻学，兴趣爱好需培养。
坚持晨跑冷水澡，身体素质渐增强。
千五长跑五分内，荣获校级一等奖。
体育成绩百廿分，大家听后齐鼓掌。
两年基础初夯实，后续学业有保障。

[返回目录](#)

大三(上)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杭大两载厚基础，师生同堂深学缘。
暑期未滿提前回，预先筹备谋攻坚。
同学殊途而同归，相逢一笑撒特产。
挚友带来印章石，触发篆刻创作念。
年级集聚二一八，陈师全德作动员。
八零年级考研热，发奋图强勇夺冠。
年级主任换新人，胡斌老师挑重担。
第五学期七门课，复变函数虚实辨。
数值分析重算法，点集拓扑学问难。
理论力学通数理，政治经济学多遍。
文学写作属选修，科技英语后插班。
专业基础必修课，攻坚克难有改观。
文学语言选修课，兴趣需要两者兼。
兴趣小组自愿报，读书报告形式鲜。
课内学习佳境来，课外活动乐趣添。
学部委员来讲学，冯康先生话计算。
班级小小演讲会，初次亮相顾脸面。
数学竞赛难度大，严峻考验难过关。
义务劳动定期排，化学楼前泥土搬。
第四食堂发月饼，中秋赏月西湖畔。
国庆卅五游艺会，八仙过海神通显。
学科游戏数理化，模拟法庭挺庄严。
百科知识中文系，历史谜语满宫殿。
经济外语办舞会，男女交谊舞翩跹。
西湖国庆烟火会，大型焰火难得见。
南面吴山翘首盼，北面宝石人满山。

一年一度运动会，数学外语联合办。
动员参加中长跑，决赛第五微贡献。
登山接力玉皇山，二班团体屈榜眼。
年级晚会庆元旦，推荐节目共联欢。
排练笛子四重奏，胡王沈徐同台演。
改选班委团支部，班级事务接力干。
寝室调整人员变，南北寝室对面换。
忽然时兴穿西装，人靠衣装马靠鞍。
同时流行练武术，公园练习进校园。
篆刻入门受欢迎，廿余印章堪高产。
受邀筹办同学会，前后忙碌十余天。
在杭同学广联络，回乡骑车再串联。
篆刻印章派用场，谜语抄写费时间。
正月初一聚诸中，吟诗庆贺前程宽。

[返回目录](#)

大三(下)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寒假回乡全家欢，物质精神加油站。
钱粮资源筹备足，兵马未动粮草先。
第六学期课程多，实变函数续复变。
数理方程概率论，政治经济学新篇。
俄语选修开个头，高等代数加强班。
旁听英语提高班，七门功课压力添。
改选班委团支部，班长重任落我肩。
年级小组成员换，新君向荣涌金担。
启动文明礼貌月，各课代表报名单。
选修课程落实易，学生会费收缴难。
党的知识学习组，安排事业我来谈。
数学外语文理配，筹备舞会把谊联。
组织百科知识赛，二班团体可夺冠。
负责篆刻兴趣组，千头万绪程序繁。
实变课间谈入党，书记鼓励申请填。
参加支部审批会，党员标准严把关。
入党宣誓来观摩，现场氛围很庄严。
组织班际足球赛，班费缺乏怎么办。
批发汽水筹班费，筹集资金做本钱。
浙杭华泉双负责，发动同学去摆摊。
五四前后忙推销，赚取班费十六元。
图书资料需保养，三楼晒书来回搬。
汤罗胡陈加两徐，观梅骑车赴超山。
组织考研报告会，多位学长经验传。
年级大会谈考研，王师斯雷做动员。
争取春假调课程，组织春游细安排。

两吴协调苏州游，京杭运河夜航船。
冒雨游览天堂景，分兵闯荡上海滩。
落实同学写游记，教室墙报引围观。
班组竞赛羽毛球，活动计划已周全。
遴选校级先进班，二班有幸稳当选。
计算机系新组建，三班划归成首届。
欢送三班挺留恋，年级合影留纪念。
数学书籍较枯燥，世界名著占时间。
风行金庸武侠书，夜以继日颇迷恋。
邀请同学访兰溪，水路三江赏景观。
诸葛高端两地游，灵栖芝堰山水艳。
谋划考研早准备，七月中旬返校园。
夏日炎热夜难眠，公寓楼顶宿露天。
大学三年如烟过，满怀希望第四年。

[返回目录](#)

大四(上)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暑期留校为备考，考研复习有成效。
理想教育培训班，参观军营留下眺。
第七学期六门课，泛函分析颇重要。
微分几何统计学，数学分析续学好。
管理科学很需要，英语学习再提高。
学校召开党代会，领导班子重新调。
党委书记薛师当，校长担子沈师挑。
改选班委团支部，华泉天文责任包。
年级小组再调整，徐吴冯配挺牢靠。
抽调新生辅导员，寝室成员再调拨。
庆祝首届教师节，尊师重教很骄傲。
陈师省身来讲学，师生聆听静悄悄。
师生篮球友谊赛，组织服务都管牢。
举办全系运动会，年级总分列前茅。
办理居民身份证，抄写校对常效劳。
杭大住房有改善，帮忙老师搬家俏。
筹备毕业留言册，未雨绸缪谋划早。
评选西湖新十景，杭州市民颇自豪。
兄长支援自行车，凤凰名牌需凭票。
偶尔提及过生日，寝室同庆头一遭。
业余党校第一期，全国首创舆论焦。
支部大会双十一，入党审议传喜报。
登山比赛龙井路，三年轮回雪花飘。
大雪纷飞校园封，党员带头把雪扫。
报考专业难确定，多方问询多请教。
一度考虑概率论，计量经济又感召。

留校过年为迎考，学习计划谋划巧。
概率论含常微分，复习内容安排妙。
数学分析有基础，王师点拨脑开窍。
计量经济需自学，参考教材到处找。
英语属于老大难，多做练习少浮漂。
大年三十搞聚餐，忙里偷闲春晚瞧。
春节前后校园静，教室寝室总推敲。
三人成众共勉励，三点一线相视笑。
为伊消得人憔悴，尽力而为遗憾少。
人生经历多感悟，生命之歌高处袅。

[返回目录](#)

大四(下)印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寒假留校特孤单，期待同学返校来。
三年半来情谊深，不拘小节玩笑开。
各地特产挺丰富，风味小吃受青睐。
欢声笑语溢寝室，光阴似箭颇感慨。
第八学期毕业季，扫尾课程未少排。
线性规划运筹学，应用课程有节拍。
基础计算机语言，实用技术较新派。
公共选修心理学，社会科学已选筛。
毕业设计分三组，自由组合无例外。
弹性力学有限元，理论实践相迭代。
数理统计概率论，应用研究是品牌。
流形上的微积分，侧重理论续系脉。
开学伊始遇研考，两天考试好心态。
英语统考当头炮，模棱两可真无奈。
数学分析马来跳，喜多忧少底气在。
政治经济学居中，复习充分轻松还。
压轴计量经济学，平时用功考时泰。
考研失利在英语，虽有遗憾亦豪迈。
家乡灯会无暇赏，杭州元宵灯谜猜。
拱墅公园练拳击，兴致来快去也快。
八将回归任组长，年级力量格外盖。
支部活动赴灵山，骑车出事人车摔。
十八骑士安无恙，灵山洞前把照晒。
李师燕杰来演讲，体育馆内人如海。
六千学生掌声响，群情激昂爽歪歪。
五一放假游绍兴，咸亨酒店留影帅。

游兴未尽去慈溪，三百征程空白。
首次实行夏时制，百日试行有利害。
嘉兴南湖首度访，党日活动搭平台。
参观革命纪念馆，烟雨楼前红船凯。
入党宣誓七一前，仪式庄严初心载。
倾力弹性力学组，杭氧调研项目带。
初次接触计算机，校内机房没少待。
数学模型有限元，小组协同程序改。
计算中心权威算，毕业设计好交差。
制作毕业留念册，多方筹资把单埋。
德语评定挺谨慎，毕业留言皆慷慨。
数学历史联合办，联欢晚会将不再。
组织拍摄毕业照，图书楼前未懈怠。
总结年级四年事，毕业典礼共抒怀。

[返回目录](#)

第四章：生活

大块肉和走油肉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王耕

上大学时，最爱吃的就是大块肉。一半肥来一半瘦，中间有肥还有瘦。

中午下课去食堂，很怕去晚了买不到大块肉。

遇到食堂大师傅高兴的时候，还能吃到走油肉。

同样是大块五花肉，走油肉让肥油有所收敛，瘦肉也更松软爽口。尤其那肉皮，从光溜溜的后生脸皮变成了有些皱巴巴的老太太脸。只是味道更有成熟的美。

组里的帅哥孟建华同学——据说他现在越来越像著名影星周润发、发哥——看在眼里，藏在心里，后来忍不住就给我取了外号“大块肉”。

可能，当年还有很多同学都应该有这美称，只是发二哥不在他们班里。

[返回目录](#)

三世同堂的大寝室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王耕

上大学时，杭大校园寝室不宽裕。我们杭州男同学得到了特殊照顾——走读。

每天风雨兼程的上课，吃午饭，吃晚饭，自习，回家。

从健康角度看，可能并非是坏事。

后来，学校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让 77，78，79 三个年级的杭州人住在 7 幢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当时一共有 20 多个人住在一起。熄灯后的信息交流很丰富。三个年级的流言蜚语把好奇心都淋漓尽致地带动了。

当然，学业上的互动也很得益。有个别年龄大的同学晚上呼噜很响，歌词诸如“老 X 打呼噜，震呀震天响。打了呼噜，吵醒了人”的小调就在寝室内外流传了。

到了那年闹选人民代表，寝室里有位同学去竞选。大家都齐心协力去支持。可惜，那民主的萌芽没有结出什么果实。经历倒是件有趣的事情。

[返回目录](#)

心猿意马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当年，我们班级教室在外语楼东南角的 2 楼。

有一段时间，在课间或者自修时，楼下正对着的教室里常会传来歌声。歌声嘹亮，夹带着富有节奏的桌子敲打声和笑声，搞得楼上本来就心不在焉学习的我更是心猿意马，便跑下楼去看个究竟。

原想呵斥几声。敲门一看，正在教歌的女生走过来，她是班长，红着小脸说，我们在学唱歌曲。打门的我也就“哦，哦”地走开了。

[返回目录](#)

住校生活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宋宏亮

我住了四年上铺。上铺的好处是干扰少，可以躲过宿舍人来人往。放下蚊帐成一统，你有了一点私密空间。写些保密的文字，日记情书之类的。如果你在下铺，那就很难保密。另外也可以看些离经叛道的书。如果在下铺，上铺的人一伸头，就看清你在看什么了。

我班男生少，还有回家住的，八张床位从来就住六个人。宿舍朝北，位置在球场边上，过球场对面就是体育馆。平日，体育系帅哥靓妹在球场进行各种体能训练。从窗口望出，一目了然。

下午课后，吃晚饭前，窗外几个球场挤得满满的。球场上龙腾虎跃，几十只篮球冲击地面，连成一片而没有节奏的彭彭彭，吃瓜群众看热闹的喧哗，女生捧场的尖叫。看着窗外的世界，忧郁的心情一扫而空。再冷酷的一颗心都会热起来。

冬天滋味不太好过。有一个寒假留校度过，宿舍就我一人。北风扫过操场，灌进窗里。我的床临窗，木头窗棂根本关不严。夜里，薄薄的玻璃被风吹得咣啷啷响，像是就要破裂了，也不敢从被子里露出头看。感觉屋里比屋外还要冷。睡觉必须用被子蒙头，所谓蒙头大睡，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半夜还会冻醒。

寒假大食堂关闭。有个教工食堂一直开到春节。春节那天，食堂大放送，可能是怕节后食堂关门你们没饭吃，也可能也是怕节后食品坏了吧。大年三十去食堂吃最后的晚餐，得到一大堆赠送的食物。

宿舍有电话吗？你想得美！道古桥校门有部电话。门房大爷接到学生家长打来的电话，根据电话中的指示，会跑去宿舍窗前大喊：几号宿舍几号房间某某，你妈叫你听电话！如果没有回应，如果正好你在上厕所，那就对不起了。小情人儿来电话？一概不给传达！

宿舍有水房，有厕所。水房没有门，哗啦啦水声昼夜不停；厕所的门挡不住味道。那种一通到底的旱厕，尿坑又浅，你自己的杰作都能把你自己熏倒，更别说前后的还有粪堆。如果你正在造尿，遇到冲

水，水流湍急而猛烈，遇到障碍，溅起浪花，你得及时抬高屁股，否则中彩分分钟的事。

热水想都别想。食堂门口有老虎灶，热水瓶排成长队，挨个打开水。好像我只有第一年，有排队打开水过。后来看中国女排赢了球，同学们一激动，把热水瓶都从窗户扔出去，听个爆破声发泄一下。热情发泄完了，从此就过没有开水的冰凉生活，洗冷水澡熬过两个冬天。

我那时喝什么？实在想不起来，反正就这样过来了。人到六十，常常口干舌燥，水瓶子到哪跟哪。想想当年整天不需要水喝。吃饭时喝点汤，就够一天进水了。当年生命力旺盛，身体自然产生汁液，只能这样理解了。

[返回目录](#)

谁扔雪团？

—杭州大学数学系 83 级 伊勇

1984 年初大雪，我住在八幢 207 室，屋顶是“人”字型，我铺位是上铺并靠窗口。

一天晚上熄灯后，我听到玻璃窗传来啪啪的声音，以为是谁向我宿舍扔雪团，于是喊道：谁扔雪团？不要扔了！我们要睡觉。

玻璃窗仍然啪啪响，我怎么也睡不着。火了，就骂人。骂了半天，没人理会。宿舍其他同学早已睡着。我骂着骂着也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出门一看，雪把大门给堵上了。管门师傅说，是屋顶的雪滑下来。此时我才明白，昨晚是屋顶滑下的雪落在窗户上，啪啪啪响。

姐姐好香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40 多年前在文二街读书，年级里有那么两三位大姐，各自身边常跟着一位傻傻的小男生。特别是晚饭后，大姐跟小男生散步，成了文二街的一道风景。

40 年后，同学聚会时问当时的一位小男生，当年跟着大姐散步是什么感觉？回答是：姐姐好香啊！

[返回目录](#)

暖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总在寒冬，总在雨夜，总在佳节，想起杭大岁月的点点暖情。

在杭大四年，有过几个第一。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异地过年；第一次在他乡过中秋节；第一次到海宁观潮；第一次上教堂。

大学第一年的寒假到了。由于十一月才报到，妈妈说就不要回家过年了，省点路费。已经忘了从杭州到福州的学生票是多少钱。却刻骨铭心地记得，八十年代，从杭州到福州，乘火车需要一天一夜。下车时，两只脚都肿了。

放假的校园冷冷清清。除了到教室听听录音，在学校周边购物，偶尔到武林门，延安路，黄龙洞、玉泉、植物园一带走走，剩下的时间都呆在寝室。

年三十的这天，杭州同学，寝室室友，陈建玲，突然出现在寝室门口，笑盈盈的。问她怎么今天到学校来了？她说特地来请我上她家过年去。我说不要。不要给你父母家人添麻烦。她说不会啊！哪里会！“去吧！去吧！！去吧!!!”拗不过她的热情，我便欣然同往……进了她家门，她父亲母亲都迎了出来，欢迎我。顿时消除了紧张感。吃饭了，桌上摆满了春节佳肴。印象最深的是切片白斩鸡！因为在家，鸡都是炖汤的。头一回吃白斩鸡！饭桌上，建玲的父母，哥哥，平易近人，可亲可敬，言语之间让人感到宾至如归。毫不拘谨！饭后，建玲还送我回校！时隔四十一年，每每想起这个年，心里充满感恩！感恩这样一个善良的室友！感恩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感恩这样一个终身难忘的年！

说说杭大的中秋节。记得中秋节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在中秋夜晚，就约了几人一起到三潭印月去赏月。记得到三潭印月是要乘船过去的。湖心亭人群熙熙攘攘，很是热闹！非常遗憾的是，至今不记得和谁一起去的。回校时，公交车已经停开了。记得我们是一路走回学校的。

海宁观潮很是激动人心！等待潮来的时间很无聊！可是当潮水由下而来时的刹那间，却令人难忘！只记得一条白龙由远而近地朝着人群的方向涌来。人们为了看清，都纷纷地向外探出身子。终于到面前了。一条白色的巨龙翻腾而至！潮水汹涌澎湃！潮水拍岸而起！卷起千层浪！就那一刻，永恒在记忆的卡片里！时至今日，回想起，还是那么地激动人心！

大约是大一大二，时逢圣诞节，和班里的同学去了教堂。但和谁去的，竟然一个都想不起来。后来，询问了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后，才知道，当年一同去的是承维琦和汪佳奇同学。那天大概是平安夜，教堂里，满满都是人。挤得水泄不通。记得我们是挤进去的。夹杂在人群里，透不过气来。感到棉袄一阵发热。当时教堂里奏响的是什么乐曲，至今不知道。教堂在哪里？叫什么？也不知道。但它在我心里是那么美！

杭大的岁月已走远，但杭大的记忆却永驻心间！

杭大情，暖一生！

[返回目录](#)

忆河东平房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85 年初，我接到通知，到学校房管科开会分房子。到那儿时，会议刚刚开始，王姓科长正在讲话。我看见外语系 77 级的朱尔萍也在，总共有 15、6 个人参加。这时才知道房子建在河东，是一排简易平房。

拿到房门钥匙后，就兴冲冲地赶去看刚分配的新居。河东离校园很近。骑自行车出东大门，沿西溪河北上几分钟，一个右转就到了文三街。

平房位于河东宿舍的北大门左侧，紧挨着马路。虽说是平房，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一排崭新的联体别墅。每套隔成前后两间，门朝北，前面一条不宽的走廊。这里原先是比较宽大的道路。现在建房了，人还是来往这里。路小了许多，骑车的人只能推着车走。隔着走廊是各家的厨房间。烧好什么菜端出来，在进到房间之前，大家都能看得见，闻得着。

很快，父母开始催促我办婚事。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家乡就上来十几号亲戚朋友，住在旅馆里等着喝喜酒。只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老爸一手策划的逼婚闹剧，热热闹闹地完成了。必须承认，乡下亲戚的办事能力超强。从装修房间，铺塑胶地板，买家具，电器，喜糖，到联系酒席及参加人员，几天就搞定。难怪中国的事，农村包围城市，即可。

婚假里，我自然是在平房接待来人。虽然那时没有手机，联系方式单一，但能知道哪些客人会来串门。

第二天上午，外办的同事，专家楼的工作人员，外籍老师来了。年轻的美国教授温蒂说：“蔡，你有彩电，冰箱，还要什么呢？”

下午 3、4 点，走廊上又传来熙攘讲话声音。我想，应该是一帮子行人。

“小蔡，恭喜，恭喜！我们是不请自来啊。”

一看，是薛艳庄校长，夏越炯书记和其他学校领导。校办人员也来了。好惊喜！众人站立在房里，参观了一番。

“不错，不错，比我们那时好很多了。你看看，还有独立厨房。咦，里面怎么有颗梧桐树？”

“校长，这颗树原来就长在厨房里。但是不影响烧饭，下雨也不漏水。分到房子，我们已经非常满意。非常感激了！”

确实是，学校为了让平房里的住户有个炊烟之处，顾不得什么市政规定，建造了这排违章建筑，把行人道加上梧桐树一块围成厨房。墙外行人只能在小小的通道挤过。只见头顶树枝树叶，不见树干，环保。树干在厨房里成为盆景，树枝则冲出房顶，为行人遮阳挡雨。奇景！

要说河东平房有什么缺点，我真的说不上来。只有一次感到不大方便。那次，请美国教授夫妇到平房吃饭。我突然想到，吃饭聊天至少2小时吧，他们都70来岁了，要上厕所怎么办？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整栋排屋也没有。平时我们没有感到如何不便，白天上厕所就到四栋教工宿舍，蹲坑，挺好使。晚上就用痰盂罐当便盆，白天去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倒掉，也不难。现在晚上让老教授夫人黑灯瞎火摸到四栋去蹲坑，别说味重，安全也是个问题。于是我建议夫人，不是有人送的礼物里有两个高脚痰盂罐吗？没有用过，教授夫人来开光。夫人说她会用吗？我说不会你可以示范，培训一下子不就行了呗！

当我告诉劳力斯夫妇家里没有卫生间的情况后，他说你考虑真周到，我确实尿频。我们改成午饭，来前先方便。这样，解了我的窘境。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整个河东教工宿舍全部拆除翻建。多年后，在文三街原来河东宿舍前，我看到那排曾经被关在厨房里的梧桐树，依然高大挺拔。凭记忆，我找到了我的那颗，因为它是斜长的。这不是我在上面钉的铁钉子吗？我没少钉钉，这是挂苍蝇拍子的。我围着它转了几圈。那时它已经有一人抱那么粗了，占据着厨房的不少地皮，烟熏火燎不为所动，堪称树坚强。我的酱油是放在它的左边小桌子上，对了，盐罐在这里。

河东平房给我的是母校的关怀。在那里生活，温馨和满足。幸福指数是以后和将来都达不到的。

[返回目录](#)

校园修表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1982 年初，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精神文明月活动。校团委紧跟形势，号召大家课余时间学雷锋做好事。一时，校园里各种志愿服务的项目繁多，有义务剃头，修理课桌椅子，校医院义诊等等。

我想起自己上大学以前曾经在杭州手表厂做过“8 角头”，就是赚 8 毛钱一天的临时工。因为是在装配车间做学徒，师傅是个陈姓退伍女兵，跟着她我慢慢地就学会了修理机械手表，并且特别喜欢旧式手表的复原修理技术。当时，本人任系学生会生活委员，想想是不是可以运用这点小技术在校园里服务于有需要的人呢？毕竟在电子表普及之前，机械手表还是属于比较贵重的个人财产，维修护理价格也不菲。

于是在校南大门入口处的众多广告牌子中又添上了一块，上面写着：原杭州手表厂职工，义务修理手表，递交手表处：X 幢 223 室，时间：下午 3:30 后。

团委特别为我安排一间宿舍房间用于接收，修理，储存手表的地点。很快 223 宿舍成了临时修理部，有时来客应接不暇。由于一般人都是匆匆看一下广告牌，很自然地把“原杭州手表厂师傅”的“原”字给忘了，所以认识我的人来了会说：“原来是你啊！”不认识的都会喊我“老师傅”。我也就懒得解释我也是学生。

同学们送来修理的手表大多是比较新的国产货，如“上海”，“西湖”，一般是走太快或者走太慢，或者时快时慢的小问题。操作上只要把表后背盖打开，卸下所有零件，浸入酒精之中，清洗，晾干，在钻石孔油槽里点上极少润滑油，再安装复原；微微地调整擒纵叉或者游丝轮，使时间差别逐渐缩小，达到精确；以不同的朝向摆放，观察几天即可。在绝大多数的活中，拆洗上油，装配还原，精确调整，比较简单，并不牵涉到一个“修”字。如果有人的新手表一点也不会

动，很大的可能是零件/螺丝脱落卡住了动件。原因是装配工没有拧紧螺丝，加上年轻人运动多，螺丝慢慢松落。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属于最容易的轻松活了。

手表里所谓的钻石其实是人造宝石，硅晶体，一般呈红色，相当坚硬，称为“红宝石”，并被机器按压在轴承两端的主板上，承受着运动不息的动件的磨损。同时，宝石孔有一圈储油槽，增加润滑效果。普通手表是17钻，要是给发条盒轮加二钻就是19钻，自动表要求25-30钻。所以，一般来说，钻石数量的多少决定手表的档次。而现在镶嵌在表壳上的钻石的作用是装饰功能大于实用价值。

教职工拿来修理的手表比学生的一般要高级一些。那时，人们把手表看作结婚的大件之一。据说，当年农民想买一只杭州手表厂生产的“西湖”牌日历手表，需要用一头猪来换。记得老师们送来修理的有一些进口表，自动表，带日历，夜光的，也有老掉牙，几乎是不摇不动，表面发黄的古董，旧式老表，不过很多还是家传的宝贝。一次，一个体育系老师送来一只老式的英纳格日历怀表，称这货的毛病是时快时慢。拆开仔细一看，发现这玩意比我年龄大多了，它的发条乏力，游丝疲软地摇摆。虽然所有零件都在工作，由于钻石孔被磨损，轴承间距变大，润滑油流失又加大了摩擦，所以当手表摆放的方向不同就会导致时快，和时慢的问题。

本来只要按通常的拆洗操作程序，调整间距，可以使问题得到相当的改善，把宝贝归还主人就算是完成了任务。但是此时偏偏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零件丢失，还是一个起连接拨指针日历，上发条作用的零件——拨时杆。损坏或者丢失零件是修理人的大忌，现在碰到了！面积不大的宿舍被彻底找个遍，趴在地上用吸铁石一寸一寸地移动，比鬼子探雷还小心。没有结果！它真是鬼使神差地不翼而飞了？怎么办？于是我跑了市区好几家知名的修表商店，询问这个零件是否有存货。结果令人沮丧。这种怀表的进口配件已经断货很久了。这时我想起了她。

她就是我的师傅，姓陈。听到我碰到了困难后，她便匆匆地赶来帮忙。这时她已经考上医大学习。她说，如果配不到那个零件，我们

可以自己做，并且已经带来了材料和量尺工具。我说我做过，只是以前是照样画葫芦，现在东西丢了，都不知道长啥样子，怎么做？师傅一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样品，也可以根据接触部件倒测出数据，做出来。是吗？一直还以为自己已经出师了，因为我会手工制作拨指针杆，这是“亨德利”手表行的出师考试项目，不过那是有样品照着做的。没有样品，即使锈断的原件，怎么做？我从来没有想过。呵呵，原来她还藏了一手！

她拿出了一枚缝麻袋的钢针，比牙签稍微粗些。这就是做那个丢失的零件的材料。针很硬，需要把它退火去钢性，于是将钢针在酒精火焰上烧至通红，搁置一旁慢慢冷却。物理结构改变，这样就容易加工锉磨了。我把针夹住，根据师傅用游标卡测出与拨杆接触零件的数据，在不到 3 厘米长的针杆上逐渐锉出方型，柱型和槽型。她则多次核实试测与其他部件的配合适度，及时调整。就这样师徒二人对坐，戴着放大眼罩，在台灯下，时而屏息细细地锉磨，时而轻轻地捶打，既有精度也有进度。此情景仿佛是回到了当年的装配车间。

车间里是年轻人的天下，有从文艺剧团退下来的和退伍军人。师傅就是当小兵出身。当年我第一次走进车间，还以为是进了部队医院。这些当过兵的人在军装外披着白大褂走来走去，颜值相当高。我和另一个“8 角头”没少背后议论她们。因怕别人听到我们谈论话题，我们给她们取了外号。那时，日本连续剧“阿信”风靡，那就取日本名字吧，四个字的。比如他喜欢的那位叫“熊猫幸子”，因为她脸圆可爱得像熊猫。而我的师傅是“麻瓷小娃”，这是根据她那张娃娃脸，在鼻翼两侧分布着点点的雀斑而命名的。

师傅家住在吴山脚下，而手表厂就在山上。对她来说，上下班就是上下山一次，颇为方便。有好一阵子，我改掉睡懒觉的习惯，早早地到城隍山上，为一睹“麻瓷小娃”信步拾阶而上的优雅姿态。她上来了，一缕朝阳洒在她微微出汗，红扑扑的雀斑脸上，煞是好看。“你也这么早啊！”她说。“是的，我来这里锻炼身体。”

“愣啥呀？可以进行下一个工序了，”师傅催促道。淬火，即把成品件烧红，忽然浸入冷水/油，使其增强钢硬度。装上一试，新做成

的拨指针杆往前拧可以上发条，拉出一档拨时针，再拉出一档可以拨日月。成功了！

学校组织的活动结束后，清数经营情况：共修理手表 100 只。由此我得了省里的一个奖。奖品是一支圆珠笔，瑶琳仙境一日游。这点事居然还上了“浙江日报”。有时我想，如果当时是有偿服务，我可能在物质上得到一些满足，但是不久就会厌倦。而精神上的满足可以使人长久愉悦。那些助人却不留姓名的人一定会更开心吧？有诗为证：

校园联袂铸针毫，
精工细作称灵巧。
西湖上海英纳格，
滴答人生争分秒。

[返回目录](#)

吃饭杂记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一）走油肉还在走

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刚刚结束。“走资派还在走”的口号仍广为人知。

有一天上午下课后，我急匆匆地往食堂走。这时候，只见一个七七级的老哥走在我前面。这位老哥的名字我已忘记了，但模样还记得。他身高 180 公分以上，头略扁，脸庞有些宽，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背有点躬，眼睛较小，还稍有些斜视。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兴高采烈，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那种楞头青。印象中，他除了军装以外没有穿过其它衣服。我估计他是个军干子弟。但是，当时爱穿军装的人挺多，所以也不能确认。后来我才偶然在同学中听说他是某司令的儿子。这一天，也许是为食堂香味所吸引，他迈着鸭子一样的步伐在我前面快速地走着。

进食堂后，他三步两步即趋至写着菜单的黑板前，然后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少顷，我看到他的脸上充满了沮丧的表情，端着饭碗的手也无力地垂下了。只听得他嘟囔了一句：“唉，走油肉还在走……”就摇着头背着手去排队了。我一看黑板，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走油肉菜底，一角八分”。估计因为菜肴没有花样翻新，这楞头青中饭的胃口不会很好，一个下午的心情都会比较恶劣。

（二）冲冠一怒为肉圆

还是七七级一位学兄的故事。这位学兄白净面皮，长相斯文，平时下巴喜欢向上抬着，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文静静的。他戴着一副秀朗架眼镜。记得，当时乔冠华、张春桥、江青，还有本年级一位长发飘

洒、充满激情、才气横溢的同学也都戴着这样的眼镜。这眼镜也许是当时时尚人士的标志，最起码有现在卡地亚的档次。

有一天中午，食堂买肉圆菜底的窗口队伍排得超长。肉圆菜底是本系食堂的传统名菜，几乎每天中饭、晚饭都有，又几乎每天都排着超长的队。要吃到这份本系的传统名菜，排半个小时的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排队时间太长，有些比较勤奋的同学还会利用这段时间看着菜票的背面念英文单词（后来同学们称之为“数饭票”）。这天中午，我也耐着性子排在队列中，那位学兄就排在我后面。大约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我们先后都排到了。我端着好不容易排到的肉圆菜底走向饭桌的时候，看着绿茵茵的青菜、红彤彤的肉圆，心里充满了喜悦，嘴里的唾液大量分泌。将菜碗放到餐桌上后，我仔细地审视了一下肉圆的大小、品相，然后郑重地咬了一小口，心满意足地享用起来。

我一边吃着，一边瞧了瞧和我一起过来在一张桌上就餐的斯文学兄。想不到，这一下让我看到了惨烈的一幕：因为等待太久，斯文学兄有点饥不可耐、馋不可待。只见他夹着肉圆就往嘴里送，但因为太急了，动作有点生猛，嘴巴的角度没有调整好，结果将肉圆硬生生地撞到了地下！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愤怒的丘吉尔！只见他恶狠狠地瞪着地上的肉圆，飞起一脚，将肉圆踢了出去！这一脚真是稳、准、狠，肯定超过了当今国家足球队的水平。只见肉圆先是飞起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欢快地落在地上，骨碌碌地朝食堂大门口滚了出去，一直滚到了大门外的草地上。没有这个跌落的肉圆，我还真不知道这位长相斯文的学兄有这么大的脾气！

（三）“美姿”原来是假动作

“美姿”是中文系一位食堂炊事员的绰号，其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属于我们年级专修班的蒋同学。专修班同学与我们同年入学，因为基本上为老三届的学生，年龄较大，所以读两年，毕业后获大专学历。蒋同学就是其中一位，当年他还与我同一个寝室。

该炊事员是个小个子，瓦刀脸，但脸上的络腮胡子剃得铁青，倒也显得短小精悍，充满阳刚之气。“美姿”盛饭的时候，常常笑容可掬，然后动作麻利地往碗里盛饭。别的炊事员盛饭一般是两下左右，第一下量比较大，第二下则酌情增减。而他端起饭碗，会抄起饭勺非常勤勉地向碗里盛饭，而且常常是连着五六下乃至七八下，姿势很花、很优美，让人感受良好。起初，他那优美的姿势和亲切的笑容让我们备觉温馨。但后来大家都发现，其实这小个子所盛的饭比任何一个炊事员的都要少，特别是拿到饭桌前端起来吃的时候更感觉少。也许这老哥盛饭的时候，通过“美姿”，将众多的饭粒都竖了起来，而一路颠簸后，由于饭粒倒下了，饭就显得少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当时我们基本都吃籼米饭。这类饭粘性不足，相互之间缺少凝聚力。要将饭粒竖起来，相对于现在我们吃的东北大米、宁夏大米、天津小站大米等粘性较足的米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时，我们吃鱼吃肉本来就少，肚子里没什么油水，这个“美姿”的家伙如此忽悠我们，实在有些可恶。知道“美姿”原来是假动作，以后同学们吃饭排队时，一看到他在掌勺，马上就会一哄而散。

（四）栗子烧鸡被盗吃

我原来是与本年级专修班的同学同住一个宿舍。两年后，专修班的同学们都毕业离校了，于是我就被整编到了另外一个正对楼梯的宿舍。该宿舍的同学来自一班、二班的多个小组，有点联合国的味道。

这联合国成员中，有睡在我上铺、先是爱看《小说月报》继而又爱看《小说选刊》的文曲星老杜；喜欢晚睡晚起、曾将在蚊帐中一对“正在搞关系的蚊子”一巴掌打死（这是他原话）的毛同学；爱打乒乓、忠厚老实、急公好义的马同学；诗人气质然而酷爱运动、曾在着急时将“放你的大狗屁”说成是“放你的狗大屁”的董同学；玉树临风、众星拱月、将“我跟你讲”说成是“我跟伊讲”的沈同学；眼睛高度近视、喜欢将超厚的英文书放在床头、学问高深的孔同学；还有一位就是热心公益活动、在班级、年级、系里都颇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当时头发浓密、首如飞蓬的陈同学。我们因为来自年级的四面八方，所以有点杂文化的特点，宿舍经常是闹轰轰的，人人兴高采烈，充满活力。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去了一次老家莫干山。当时，正是板栗成熟的时候。母亲知道吃对我的重要意义，在我返校的时候，专门烧了栗子烧鸡，装在一个搪瓷杯里让我带到了学校。我到校时，正好刚过午饭时间，本宿舍的几位兄弟已从食堂回来。因吃饭时间刚过，我想菜可能已经没有了，但饭一定还有。于是，就立马跑去食堂打饭。在打好饭后回宿舍的路上，我憧憬着栗子烧鸡的美味，心中无比快乐。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了宿舍，但揭开杯盖后却傻眼了。杯子已经底朝天，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些栗子的碎屑。我愣了一下才反映过来：栗子烧鸡已被盗吃！当即我就进行调查，问了几位正一本正经地看书的兄弟，大家都一脸无辜地说不知道，案子始终未破。当时宿舍里共有哪几位兄弟我现在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有一位兄弟肯定在，而且在我问谁吃了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有点诡异。我怀疑在“栗子烧鸡被盗吃”一案中，他是主谋。

（五）四两饭票忘了还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粮食还是定量供应。记得大学生每月的定量三十五斤，和中学生一样。为了多吃几口饭，同学们动足了脑筋。比如说，有些同学发现，如果四两饭票分两次使用，一次打二两饭，就比一次就打四两饭要多。尽管这为此要排两次队，但是为了多吃几口，还是有同学乐此不疲的。

话说有一天晚自修时间，我正在中文系阅览室看书。正看得投入的时候，有位本班的同学走到我跟前。但他看了我几眼后，就又离开了。过了一会，他又走到我跟前，而且脸上潮红，呼气急促，但一会儿又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有些纳闷，但上去追问又显得多事，想人家多看你两眼有咋地？于是就又专心致志地看书了。正又看得入迷的时候，只听到耳畔一声炸雷：“赵建中，你还欠我四两饭票吧？”

我抬头一看，只见他满脸通红，嘴巴也有点哆嗦。我一个激灵，猛然想到，他的确是我四两饭票的债权人，于是背上一阵热汗。我赶紧掏口袋，还好，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的饭票果然带在身上。于是，立刻从中抽出一张四两的，飞快地递给了他。

他接过饭票的时候，似乎长吁了一口气，一副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模样。至今，我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既感慨又内疚。感慨的是我们曾经历过物资如此匮乏的年代，四两饭票真的会对人的吃饭问题造成影响；内疚的是这位腼腆而善良的同学一定惦记着这四两饭票好多天了，但又一直不好意思提醒我；而我一时大意将此事忘了，让他心里一直有负担。这实在太不应该，因为这四两饭票在当年的确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返回目录

大皮鞋的故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我自上海一早赶到杭州，去参加杭州大学中文系 40 周年的同学会。一到同学会举办地点梅地亚宾馆，就有先我而至的老同学问：“咦，赵同学，怎么没有把你的大皮鞋穿来啊？”时隔四十年，居然还有同学对我的大皮鞋念念不忘，可见这双大皮鞋给人印象之深。

（一）大皮鞋的由来

1977 年，邓小平一声令下，自文革一开始即中止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当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自此，考大学也成了我们平时关心的一个话题。我所在的莫干山中学一位最与同学打成一片的老师，有一次上课时对我们说：“同学们啊，你们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这可是关系到你们将来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大事啊！”这就表明，在当时，穿皮鞋是成功者的标志，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1978 年，我果然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当年考上大学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尽管我平时不讲究穿着，但到了这当口，也觉得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应该穿一双皮鞋了。我很想买一双新皮鞋。但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而我家好像没有这闲钱；二是有店，而我家乡莫干山尽管风景优美，但商品经济却并不发达，商店里只有胶鞋，没有皮鞋。所以，要置办一双新皮鞋，并非易事。父亲也觉得该穿皮鞋去上大学，于是就决定将自用的皮鞋送给我一双，以解决我的急需。正巧我们鞋子的尺码也相同。

父亲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参加公安部队。转业后，就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后来又转到省公安厅直属莫干山分局工作。他们这一辈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组织特别忠诚，也很珍视组织上发给他的一切物品。每次会议所发的纪念品，包括笔记本、钢笔、各类证书等，他都一一

收藏。就是历次会议和活动所发的代表证他也收藏着。公安部门给干警们所发的服装也同样如此。家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不同年代、不同款式的多套警官制服。从颜色分，有蓝的、白的、草绿的、橄榄绿的制服；从用途分，有春秋的、冬季的制服。与此同时，父亲也收藏着多双警官皮鞋。其中有低帮皮鞋、也有高帮皮鞋。这些衣服和鞋子都保管、打理得非常之好，大多数与新的一样。

父亲的皮鞋仿造前苏联警官皮鞋的样式制作，用料都是上等小牛皮。擦油以后，再用干布一打磨，鞋面就会泛出油亮乌黑的光泽。这种光泽我只在金属物体上看到过；皮鞋头部分高高隆起，十分坚硬，就是一个成年人踩上去也绝对不会变形。平心而论，现在我在再大牌的奢侈品店，也难得看到如此精良的皮鞋。父亲将自己珍藏的皮鞋相赠，我自然高兴。但有点遗憾的是，我喜欢的是比较轻便的低帮皮鞋，而父亲给我的是一双沉甸甸的高帮皮鞋。这也许是因为高帮皮鞋比较重，在莫干山上穿着走山路不太方便，父亲平时不太穿，所以新鞋比较多吧。而父亲给我哥哥的却是一双低帮皮鞋，这让我很羡慕。

除了大皮靴外，父亲同时还送我一套白色的警官制服。这套白制服也很为同学们关注，并也有些小故事。比如本年级一位姓许、名字与元帅贺龙名字一模一样同学就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这样写道：一口正经的歪话，一身雪白的制服，一双乌亮的皮鞋，一个难得的人物。白制服还在大皮鞋之前。不过，写文章不能枝蔓太多，关于白制服的故事此处就按下不表了。

（二）军品的荣耀

在我们读大学的年代，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还不发达，也没有公务员、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这些概念。所有行当中，军人最体面、最威武，与旧时的“好铁不当钉，好男不当兵”完全是两码事。相信我的同龄人很多还会记得当年由复旦学生周惟波创作的《“炮兵司令”的儿子》这部话剧。该剧讲述一位处长为了给独生女儿选择一

个称心的女婿，竟误选了绰号叫“炮兵司令”的开水炉老工人的儿子，闹了一场笑话。这也说明当时的军干子弟特别吃香。

身处这个刚从“全国学解放军”过来的年代，同学们都以穿军装为荣。一套有四个兜的军装穿在身上，绝对有现在阿玛尼、杰尼亚的风光。而如果这套军装是五十年代的，肩上还留有缝制肩章的小孔，那更是帅呆了。这是当年的时尚。放到今天，那些过时的军装、警服也只有老农民爱穿。这有张艺谋的电影为证。军、警、宪、特本来就是一家，军品如此吃香，警品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我当时虽然穿着警服、警鞋，但凭心而论，这与炫耀的心态完全无关。说实话，我还是对当年流行的呢制中山装、三节头皮鞋更感兴趣。

这双皮鞋真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起初是在学校食堂做炊事员、满口杭州切口的几个小青年感兴趣，有好几次问我这双鞋子是否可以出让；后来，这鞋又被一个在校园路边摆摊的一位修鞋师傅看上了。有一次，因为皮鞋的后跟有些磨损，我到他的鞋摊上去砸一块铁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在皮鞋后跟上砸铁钉了，因为现在无论是人们的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地面都比较雅致，受不了这铁钉的蹂躏，但在当时的确很普遍，估计这位我们入校后不久就一直驻扎在中文系校园的修鞋师傅一天总会接到30笔以上的生意。他的模样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约摸50多岁，国字脸、红脸膛，花白头发，平头，络腮胡子剃得铁青，眼睛炯炯有神，堪称“堂堂一表”。不过，我经常看到的是他坐在修鞋摊上忙碌，几乎没有看到他站起来的样子。所以，是否“凛凛一躯”尚不太清楚。但就凭这“堂堂一表”，就足以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得一比。看到我来修鞋，他先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地招呼我在一条小板凳上坐下，然后就拿起我脱下的鞋子细细端详。他边看边赞叹，说：“好皮鞋！好皮鞋！”还说：“这鞋子商店里看不到的，是军用皮鞋吧？”我说：“是的是的，皮鞋质量还可以，就是穿在脚上有点重。”他说：“好皮鞋总是有点份量的。”然后就找出一副铁钉麻利地帮我钉好了。

自此以后，我每次上课路过他的鞋摊，他总是向我行注目礼；先是朝我微微一笑，然后再把目光移向我的脚下。有一天，鞋上的铁钉

又有些磨坏了，我又去找他。这次，他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将身子凑到我跟前，眼神暧昧地看着我。我正纳闷，只听得他说：“嗨，大学生，你这双鞋卖给我怎么样？”这让我有点意外。我想，时髦青年想买这鞋比较正常，一个年过半百的修鞋师傅要这双鞋干什么？当时，因为我压根没有出让的想法，所以也就没有就这个话题与他深入探讨。但自此以后，这师傅就惦记买这双大皮鞋了。每次看到我，他都会笑嘻嘻地问我：“大学生，想好了没有？”好像这皮鞋本来就是他的，我只是穿穿而已。后来我觉得老是被问实在觉得有点烦，上课的时候干脆就绕道走了。

（三）大皮鞋的困扰

这双众人瞩目、多人惦记的鞋子后来几乎成了我的 LOGO。在同学眼里，这给我带来了感到荣耀。其实不然，我感到的是困扰。

第一是扰民。当时，因为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同学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读书特别用功。有不少同学由于用脑过度，得了神经衰弱。这种毛病尽管不会死人，但缠上后也是十分痛苦的，主要是会严重影响睡眠，使得患者在漫漫长夜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能休养生息。我一旦晚自修结束走进宿舍走廊，由于皮鞋份量太重，又是夜深人静之时，往往声音很大，犹如空谷足音。这声音往往会打搅到那些正躺在床上数着小羊酝酿睡意的神经衰弱者。于是，有时次日早晨我走在校园小径上的时候，就会受到他们的愤怒声讨：“赵同学，昨晚我刚要睡着，又被你的大皮鞋吵醒了！”每当听到这些受害者的呐喊，我心里总是内疚不已。

第二是害己。当年，由于因晚自修太晚或本来就是夜猫子，加上大学气氛本来就比较宽松，有些同学会上课迟到。但迟到毕竟不好，所以这些同学就会在教室的后排座位悄悄地坐下，同学们不一定注意，老师也不一定发现。而我一旦迟到就麻烦了。当年我们中文系 78 届两个班一起上大课的教室是水泥地坪，大皮鞋踩上去的声音又特别响。老师已经开讲的时候，大皮鞋“笃笃笃”地一响，等于向教室的全体

师生宣告赵同学迟到。而且，大皮鞋发出的坚定有力的声音，听上去又很有示威的意味，可能会让老师和早到的同学不爽。而我并非有此意，而且真也没有必要得罪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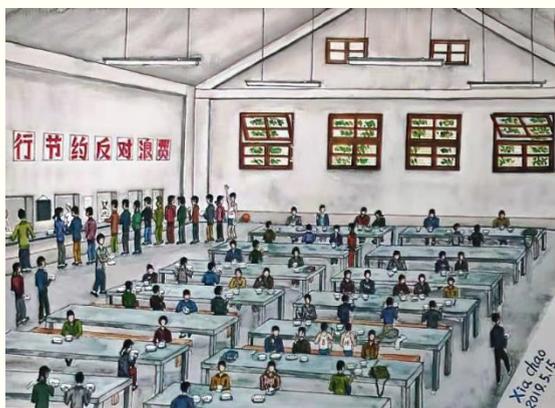
因为这双大皮鞋于人于己都有些弊端，于是，我就在一次父母亲来杭州看我的时候，请他们到解放路的百货商店去给我卖双皮鞋。该店皮鞋品种不多，我挑了一双款式还算时髦的猪皮鞋。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猪皮鞋了，但当年的皮鞋以猪皮制作的居多，而牛皮鞋则属于高端产品，比较小众。记得这双皮鞋的价格是15元左右，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当时我穿的时候觉得有点紧，心想穿上一段时间，皮总是会慢慢松弛下来的。想不到当年真还很少有伪劣产品，猪皮的质量很好。这双鞋任我怎样折腾，皮仍然很坚韧，脚在鞋子里一直受到严重束缚。特别是长途跋涉的时候，脚丫子更是酸胀难忍。半年后，我看这双鞋子实在有点像知识分子一样难以改造，就弃而不穿了。不过，通过这双鞋子，我倒也悟出了一些人生道理：第一，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款式好看与否不重要；表面风光是给别人看的，对自己没有丝毫的意义，于是做人就比较实在。第二，将受到来自有职权者的刁难称为“穿小鞋”的确很形象。穿小鞋是很难过的事情，先是要避免被穿上。如不幸被穿上了，也要赶快想办法脱掉。

旧鞋已弃，新鞋尚无。那怎么办呢？要再去买一双合适的，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属于计划外费用。无奈之下，我只好又把塞入床底的大皮鞋拿出来穿了。这就好像拿破仑进犯俄国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起用库图佐夫一样：前面的少壮派总司令屡战屡败，就只好再请这位独眼老将军出山了。

返回目录

夏超画老食堂引起的遐想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宋宏亮



饭桌是水泥板制成的，一张桌子两排凳子，可以坐八个人。没有明文规定，只是根据习惯法，女生集中坐靠里的桌子，男生集中在靠门的桌子，泾渭分明，不可越线。如果有哪一对爱到不行了，就躲在角落里相对进餐，默默享受两人世界。可是，这也无法避免遭人白眼。文革禁欲主义的时代刚刚过去，习惯的软力量你无法抗拒。

吃饭桌分男女，买饭排队却不分男女。如果你走了桃花运，你心中的女神正好排队在你前面，你可以斗胆搭话。搭话的内容和形式自定，结果如何，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夏超对桌面的记忆可能是对的，水泥板中有白色碎石镶嵌，磨平以后就是水磨石了，不过，记忆中桌面颇为粗糙，感觉冷酷，一点都不招人喜欢。

食堂的米饭，是在一层层大托盘里蒸熟的，就像一块大蛋糕，横竖切割成小块。如果你要四两，碗递进窗口，食堂阿姨切一块四两的米饭，放进你的碗里。

菜有几种供选择，价格应该从几分钱到两毛钱。两分钱买一块酱豆腐，也可以伴饭果腹了；两毛钱一个荤菜比较奢侈。记得最可我的口的菜，好像是蒸肉末鸡蛋，中间黄色蛋黄，四周白色蛋清，蛋清下面有一层肉末，酱油的香味扑鼻而来。回忆这道菜时，我不禁吞咽口水。

[返回目录](#)

我的“戏子”岁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走进大学校园，无异于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一个个欢呼雀跃，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

读书之余，同学们还成立了一个剧社。那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传统。

大约是 1964 年，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曾经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演出过话剧《青春之歌》。当时主演《青春之歌》的陈坚老师后来教我们现代文学，就多次讲起那个盛况。于是，不服气的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学生剧社。我作为一个朗诵爱好者，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剧社，成为中坚分子，开始了“戏子”岁月。我印象最深的有 4 部戏。

第一部是我对面寝室的黄海滨同学编剧、导演的独幕话剧《在酒楼上》。海滨出生于演员家庭，对戏剧有疯狂的爱好。他根据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改编了一个独幕话剧，让我来扮演主角吕纬甫。这是一个落魄文人，曾经有过辛亥革命的热情，后来却变得意志消沉。那是 1981 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校把我们这部戏作为重点推出。我们幸运地得到了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鲁迅诞辰专场文艺演出的机会。演出结束后，鲁迅曾经的学生、当时的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黄源还和我们合了影。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到今天我始终没找到。

因为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又非常喜欢戏剧，我把自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全部融入表演中，较好地展现了一个苦闷文人的心理状态。记得当时我们请浙江话剧团导演戈辉来对我们进行指导时，他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理解能力非常强，我只要说一遍，你们就能领会，不像有些演员，说五六遍还听不懂。你们欠缺的只是形体能力。

第二部戏也是黄海滨编剧和导演的，叫《黄蜂》，是一部荒诞色彩的独幕话剧。当年，荒诞派戏剧刚刚引入中国，如同时下的各种时髦玩意儿，十分热门。我们也邯郸学步，玩了一把荒诞。我扮演的是

一个被“文革”折腾成疯子的男孩的父亲，最后也被抑郁的气氛逼疯了。那种逼真的满台打滚的疯狂气氛令我的同学们瞠目结舌，直到现在同学聚会还有人说起当年的印象。

第三部是和历史系同学合作的《闪烁》。杭大历史系77级同学王旭烽（后来因小说《南方有嘉木》获得茅盾文学奖，现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郝海雁创作了剧本《闪烁》，找到我帮忙，希望帮助一起排演。我和剧社的同学们答应了下来，以中文系同学为主体，集合全校的话剧爱好者，排演了这部多幕话剧，参加了浙江省大学生戏剧节。我饰演其中的主角，一位老教授。因为作品的灰暗色彩，我们的戏没有得奖。但我却因此增长了见识，第一次体会了多幕话剧的滋味（前两部都是独幕话剧），并且和王旭烽、郝海雁以及导演、历史系78级同学刘为（毕业后曾经主持过央视一套《读书时间》节目）结为好友。

大学期间的最后一部话剧是《钱江怒潮》，黄海滨编剧、导演。这是根据解放前夕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烈士事迹改编的多幕话剧。我扮演主角于子三。很巧，我和于子三都是山东人，且都不像山东大汉，个子都比较矮小，也都戴眼镜。为了深刻了解于子三，我不仅去了万松岭上的于子三墓，还查找了关于于子三的史料，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这包关于于子三的资料一直保存在我的书橱里。在海滨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努力展现于子三矮小的外形下强大的内心世界，展现一个鲜活的学生领袖形象，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同。我记得，演出时是1981年底，我们即将毕业，演出的地点是距杭大东门不远的杭大大礼堂。连续两天的演出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我们还别出心裁，把大礼堂当作当时浙江大学的礼堂，让所有的演员从台下观众中上场，给观众强烈的身临其境感觉，引起了轰动。那种掌声雷动的热烈场面，令我热血沸腾，至今记忆犹新。

大学时期的“戏子”岁月给了我深化文学知识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艺术，尤其是舞台艺术。我曾经和我的同学说，我上舞台只是为了实际体味舞台的感受。没有舞台的实际感受，你就无法真正了解何为戏剧，你就只是纸上谈兵。

“戏子”岁月更让我从别样角度体味人生。人生有时候会需要发泄，需要浪漫，但是生活中未必处处能容你发泄，容你浪漫，而舞台就是一个能让你自由发泄和浪漫的地方。当你在舞台上展现一个与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你的时候，当你在舞台上呐喊、哭泣、狂笑的时候，当你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同响起如雷掌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到的酣畅淋漓的感受。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电影明星会那么留恋舞台。舞台使我的人生完美、丰富、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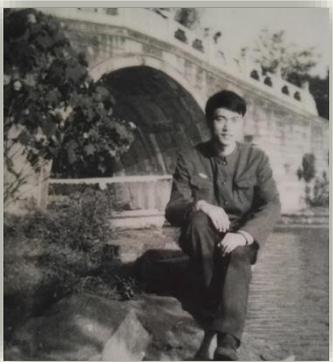
“戏子”岁月还给了我结交朋友的机会。正是因为演戏，我认识了中文系和全校很多好朋友，和他们成为至交。大学并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更是交友的场所。特殊的经历使 77 级和 78 级成为特殊的人群。过去没有，后来也不可能会有这样一批成分复杂、年龄悬殊的大学生。这些同学里藏龙卧虎，认识他们是我的幸运。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很多书本上、生活中学不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以为，对于我的人生，我的性格，最重要的是大学 4 年的时光。经过这 4 年之后，我的人生就确定了。而这 4 年中，舞台上的日子又是颇为重要的。所以，我要写下这段文字，以作为难以忘却的纪念。尽管离开大学我就离开了舞台，一直也没有再上舞台，但是对舞台的眷恋，对舞台的向往，依旧留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在远远地遥望着舞台。

返回目录

露天影院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童国梁



从 1978 年 10 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至 2018 年 10 月，已是整整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间，而对人生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时段，特别是经历文革、恢复高考后历尽艰难进入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说，更是弥足珍贵。非常庆幸能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接受大学正规教育，受到人文思想的熏陶，获取了精神营养，为以后的发展作了铺垫和拓展。所

所以要特别感谢先生们的谆谆教诲。

回顾大学生活，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且意味深长。例如在学校附近唯一一所露天电影院，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露天影院坐落在中文系北边，在原文二路现在叫文二街东侧，靠近西溪小路。沿西溪小路上有一家书店和饭店，西侧与原杭大政治系（后分为经济系和哲学系）相邻，对面是杭州外国语学校。所谓露天影院，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屋顶的，四周砖墙围着，里面有几百个座位，用一排排清一色的长条水泥板搭建而成。“银幕”是在水泥墙面涂上白色油漆，好比生产队在晒谷场树起一块幕布作为观看电影银幕。

这影院很简陋，与今天的影院、剧院、KTV 包厢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对从当年饱受文革折腾在苦难岁月获得重生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文化生活了。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不光物质十分匮乏，生活艰苦，当时最低的生活标准是八元，而且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更是一片荒漠凄凉。当时，主要的文化消费就是看电影。但是电影却少得可怜，一年中难得看几场。从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到假大空式电影，寥寥无几。且

剧情简单，生活概念化，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脸谱化，是完全扭曲的。正面人物总是“高大全”，电影拍摄公式化：“站在高坡上，英雄指出路，揪出老地主，演出就结束”；反面人物造型也是一眼便可辨识的表面化、脸谱化形象，既违背生活的常情，也不符艺术的真实。所以有人调侃“影片”是“行骗”。电影内容虚假，形式粗糙，观之淡而乏味。

就是经过筛选的一些进口电影也不象样，不“耐看”。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国产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闹闹，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祖国的传统文脉被割断，正常的对外交流受到阻隔。

1978年入学之时，正值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上转轨变形，思想观念上冲破禁锢，文化传承上破除藩篱。一些文革前摄制却被禁映的优秀电影纷纷重映，如《冰山上的来客》、《红楼梦》、《洪湖赤卫队》、《秘密图纸》等等；一些从国外新引进电影如《卡桑德拉大桥》、《尼罗河上的惨案》、《追捕》，也纷至沓来，令人惊奇，先睹为快。

尤其是国内反映现实题材，张扬人性，描写人情的好电影大量问世，强烈地震撼着心灵，自然也成了评论的热点和焦点。

《法庭内外》，给以法制的启蒙；由李仁堂主演的反映文革题材的《泪痕》，意味深长，给人以深深思考回味。由唐国强、刘晓庆主演的《小花》，在描写血腥惨烈战争场面的影片中带来了一丝人性的光亮和暖意。类似的反映严酷战争年代中全力救护摇篮中襁褓的《啊，摇篮》，也感人至深。还有《车轮滚滚》、《回民支队》、《吉鸿昌》等战争题材影片，都给人耳目一新。

《月亮湾的笑声》及《喜盈门》，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冒富大叔发家致富及农村新习俗的影片，看后感到很愉悦。而由牛得草主演戏剧片《七品芝麻官》，第一次在戏剧里用丑角扮演七品官员，形式十分新颖，剧情也有趣，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反映嵩山少林僧人生活的《少林寺》，是第一次描写僧人题材的电影，特别是由歌唱家郑绪岚配音的主题曲，非常动听，也非常难忘：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
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
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

每当那委婉动听优美的旋律响起，令人心驰神往。

由冷眉主演的《生活的颤音》，还有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有创新，留下深刻印象。而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以国共两党为背景的《庐山恋》，从题材、结构、主题以至于服饰，均带来了一股新风，内容上有突破，形式上也有创新，正如严冬过后，春天来临，百花吐艳，使人赏心悦目。

就在我们的中文系旁有这么一个影院，无疑是为莘莘学子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福音，犹如在饥渴的沙漠里送来了一泓清泉，沁人心脾。每当有好电影放映，同学们便奔走相告，晚饭后早早去排队购票。尤其在炎炎夏天，约上几个好友，一同去看电影，好像开个纳凉晚会，感到特别有意义。每星期总能看到一场电影，有的同学则看得更多，成了露天影院里的“特别观众”。

三十多年后，祖国面貌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物质生活上已从温饱到小康，精神文化生活也多元化、多样化。尤其是文化场馆、影院、剧院、夜总会比比皆是，场面日益豪华气派。各类电影、电视节目五彩缤纷，国产影片、好莱坞大片，竞相公映，文化生活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当年在文二街西溪边的那个“露天影院”，也早就被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宽广的马路所取代。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宁波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开始学习法律专业，后又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科，文凭由杭州大学已并入的浙江大学颁发。秉承杭大学风、个人爱好及工作需要，在毕业后又学习法律、方志、史学、文化等学科，延伸了专业并拓宽了学科，从事法律审判、史志编纂、文化构建等。

2008年7月，我抽调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后，每天上班从华星路万塘路交叉口的住地行进到在马塍路上的高院时，特意绕道经

过原来露天影院与后来改为工会干校的中文系原址，触景生情，当年情景依稀还在眼前。

露天影院，是一个窗口。通过它透射了当年求知、求索的热情，也观看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又是一部博大精深、浓缩了人文精神的教科书，折射出文化复兴的光亮。在激浊扬清的年代，重温祖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文明，给人以启迪和奋进。

在当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时，首先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才有文化自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是先从文化崛起。让人性的光辉、人文的光芒和法治的光亮，照亮前行的道路。

[返回目录](#)

苏沪游记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大三第二学期，班委团支部改选，我被选为班长，制订了班级活动计划，其中春游就是计划内的班级活动。春游活动计划分两条线路，苏州无锡游由我带队，绍兴游由冯华泉带队。以下日记内容记载了苏州游的情况。

1985年4月5日，经过前期联络同学、计划安排、买船票、租相机等认真筹备，下午4:15，我们一行十二人出发了。大家一路谈笑风生，在轮船码头上，见人流熙熙攘攘，看来去苏州春游的人不少。上了船，我觉得很新奇，置身于轮船中，而轮船停泊在京杭大运河中，这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一声汽笛，船身移动，轮船起航了。趁天色尚明，看看运河两岸的建筑物，也是饶有风味的。天渐渐暗了，我们开始打起牌来。后来，我和周志刚等同学谈起空天来，大家相互交流了许多往事，拉近了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旅途确实是交流思想的好机会，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4月6日，我们一夜未眠，一直到凌晨6:00，轮船到达终点站苏州。天不作美，细雨绵绵，行动很不方便。我们先去找吴伟文的同学吴根富，从人民路转入三元坊，找到了吴根富。于是，我们十人在那里吃了早饭，并定下来在那里住宿。接着，由吴根富带我们外出游览。先到怡园，但见曲径通幽，一草一木一石都错落有致，别具风韵，堪称园林佳作。出怡园，乘车去虎丘，拾级而上，一路行来一路景，但见游人如织，相机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说明虎丘确实吸引人，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人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接着，我们参观了工艺制作：牡丹、吴王、西施的雕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印象深刻。出虎丘，去西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类似杭州灵隐寺的建筑物，虽然西园比起灵隐寺来要逊色一些，但不失为一处佳境。出西园，去寒山寺，听了钟楼钟声，余音绕梁，令人沉思。午饭后，又到留园，在几处景观前合影留念。接着到北寺塔，在这里我看到了与杭州六和塔相

媲美的塔建筑，寺内布局精奇，令人赏心悦目。接着匆匆到拙政园，从东园到中园再到西园，也拍了不少照片。当我们赶到狮子林时，已经关门，只好抱憾而别。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苏州风景点的游览，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接着，为了联系第二天的列车，我和刘欢培一起随吴根富去火车站，但去无锡的车票很紧张，只好改变计划，大部分同学去上海游览，小部分同学去无锡游览。晚上，周志刚去苏州铁路师范学院过夜，并购买了4月7日早晨5:46的341次车票。我们在苏州铁路运输学校过夜。

4月7日凌晨三点，我醒了过来，起床去叫大家，发现大家都起床了。因大门不开，只好爬后门出去，真是可笑。大家兴致勃勃，乘上火车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上海。抵达时间为早晨7:00，出站后，我去办理转车签证手续，还算顺利。于是我和周志刚、罗红民、张光灿、倪岳舟、刘欢培、沈振暖等七位同学从天目东路转河南北路，乘66路车到江边码头，后乘65路车到延安东路外滩。上海真是花花世界，在这里，无论是具有异国情调的建筑物，还是停满巨轮的黄浦江，都给人以新鲜的感觉。我们在天桥上俯视黄浦江，留下了几个珍贵的镜头。接着信步而去，一路拍照，心情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我看到挂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会牌子的大厦，脑海里闪现出电影《陈毅市长》和《陈毅与刺客》里面的镜头，心里对革命前辈充满了景仰之情。进入黄埔公园，大家合了影，只见小型飞瀑泻下，水沫溅起，激起白色水花，令人眼花缭乱。黄埔公园虽小，但非常吸引人，我们在里面流连忘返，不愿离去。接着去豫园，进了豫园大商场，这里别具一格，街道不宽，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商店里灯光闪烁，商品琳琅满目，营业员热情服务。在书店前，我们巧遇胡志发、吴益昂，于是大家一起在人流中穿行，而人流在由商店围成的街道上缓缓行进，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豫园正安排着灯会，但我们没有进去，后来回想起来真后悔。我们从豫园出来，先乘71路车，再转57路车，从静安桥到动物园。上海动物园不愧为全国第一流的动物园，其中动物种类很多，如斑马、长颈鹿、河马、海狮、袋鼠、牦牛等动物都是杭州动物园所没有的。这里确实是动物世界，而游客也特别多。由于已

经多次游览杭州动物园，所以我们也就不多停留，就乘车回市区了。接着我们从南京西路开始步行，边走边欣赏，南京路真不愧是繁华地带，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们在新华电影院看了电影“肖尔布拉克”。接着又在南京东路步行，途径大上海电影院、风雷剧院、上海杂技院、国际饭店、华侨饭店，最后转入河南中路，再转入天目东路回到火车站，结束了上海游览。

4月8日，凌晨1:54，我们一行九人（另有吴伟文、胡根良等三位同学去无锡游览）乘361次列车回杭州，6:00抵达杭州，6:40到校。接着，我还了照相机，就去上课了。不过，听课效率极差，在课堂上哈欠连天。

事后，我们每人都写了游记，并在历史楼121大教室的后墙上办了一期墙板，吸引了许多同学来观看，他们看了以后还是比较羡慕我们的。总体来说，这次苏州无锡上海春游活动比较成功。此后，我再也没有这样深度接触苏州和上海。

[返回目录](#)

登山比赛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数学纪念一二九，登山比赛是传统。
大学期间赛四次，日记本里有内容。
首次比赛龙井路，盘山公路人流涌。
获得位次廿六名，龙井泉水润喉咙。
再度登山初阳台，起跑地点黄龙洞。
此番事先有准备，坚持训练路线同。
黄龙直道梧桐茂，白沙坡路竹林葱。
栖霞岭顶茶园绿，紫云洞下凉亭空。
华北饭店标牌亮，十字路口左边冲。
岳庙门前穿梭过，保持第一不放松。
葛岭入口竞相追，疲惫不堪力不从。
多位同学超越过，精疲力尽追不动。
台阶重叠高处去，古树参天护葛洪。
步步为营不停歇，气喘吁吁往前攻。
胜利在望目的地，奋力守护前期功。
个人成绩第六名，班级团体冠军荣。
三度登山接力赛，玉皇山路盘山通。
首尾相顾十一棒，数度第一呼声隆。
集体项目靠配合，紧要关头失误送。
班级团体屈亚军，无心游览玉皇宫。
四度登山龙井路，小雪飞扬似毛绒。
冒雪骑车到现场，事随境迁心意通。
长江后浪推前浪，八三二班又做东。
我班再度成榜眼，辞旧迎新斗志宏。
往事如烟挥不去，同窗情谊难朦胧。

注：

(1) 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登山比赛是数学系学生工作的传统项目。82 年级参加的第一次全系登山比赛时间为 198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地点在龙井路盘山公路上。我获得第 26 名。班级排名在日记没有记录。

(2) 第二次登山比赛时间为 198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地点为栖霞岭葛岭初阳台。我获得第六名，二班团体冠军。对于这次登山比赛，我比较重视，事先进行训练并做过预演。日记内容如下：198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清晨 5:30，我和汤树元外出越野跑。校外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早跑的人在马路上跑，发出有节奏的脚步声。空气清新，而晨风拂面，却又刺人肌骨。慢跑至黄龙洞，进入竹竿林立的山路，拾级而上，到半山腰，我们已气喘吁吁，浑身发热，腿微微发酸。漫步向前，到紫云洞，转而跑向初阳台，登上一级级台阶，到了山腰上的平路。抬头望西湖，但见东方一片红晕映得湖面一片绯红。可惜近视，看不真切，只见湖四周连缀着路灯，湖中三岛鼎立，而苏白两堤像彩带缚住似镜的湖面，别有一番景象。跑，见到台阶就飞登而上，至初阳台，见表已是 5:50，不能停留，自初阳台下，尽是台阶，啪啪的脚步声不停，随后就到了葛岭，再往下跑，转出葛岭牌门，便上了马路。这里倒幽静，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俩在跑，一阵阵脚步声推移着，不一会已到岳庙大门前：这里白天人流不绝，这时却冷冷清清。是啊，冷清的大清早，谁愿意从热被窝里出来呢？只有我们这些坚持长跑健身的人，才有这种热情。转眼间，已到转弯处，跑过去，再上坡；再跑，上台阶，劲头不小，腿的爆发力还大着呢。而汤树元停下了，这时离紫云洞只有二、三十个台阶了，也好，走上去，再过牛皋墓前，转而下坡到黄龙洞，就这样完成了不久将举行的一二九登山比赛的全程赛跑，历时 35 分钟。到那天，可能只用花 30 分钟就够了。登山比赛当天（198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日记：今天下午 2 时许，登山比赛开始。在通往黄龙洞的直道上，240 多名运动员蜂拥起跑，由于人多路窄，竟有好几位摔倒。我拨开人群，以适中的速度跑，到黄龙洞大门口，我已在 30 名之内，此时已微觉疲劳。经过大门口，径直沿小坡上山，跑到白沙泉边，我已赶上近十人，再往上跑到台阶转弯处，我已置身于前 20 名之列。此时已有许多人停下来走路了。确实，此时腿发酸，呼吸急促，口干舌燥，自我感觉并

不太好，但我还是相信平时的训练，相信自己的耐心，也想因此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因而脚不停步，一路慢跑，一路到紫云洞，此时前面只有近十位同学了。我在平地上保持一定的速度，又在紫云洞下坡路上发挥自己腿长的优势，一步三四个台阶，一下子赶上五六位同学，又在相对平坦的下坡路上飞奔起来，抢先好几位同学。当转入岳坟路时，我已经排在第二名。在马路上，我毫不放松脚步，奋起直追，终于在通过岳庙大门不远处超越第一名。这时，后面有三四位同学紧追不舍，不久，倪岳舟赶上我，并拉开一小段距离，同时另有两位八一级同学赶上我。此时，我估计一下自己的耐力，根据当时的自我感觉，又毫不放松地超越前面的同学，在五十米路程内保持第一名的微弱优势。然而不久，倪岳舟和八一级的两位同学又赶上我，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你追我赶，齐驱并进，各有先后，一直跑到葛岭入口处，接过工作人员发的一张红纸，转入门内，此时我名列第二。再跑了一段山坡路，便退居第四，此时的我，确已精疲力尽。而我也料定前面三位也并不好受，因而硬着头皮跟上去。跑过一段上坡路，便上台阶，前面两位八一级同学都已步行了，唯有倪岳舟慢跑了一会。过了一小亭子，几位导向服务人员呐喊助威，但我们几乎都提不出劲来。面对如此陡峭的台阶，我心里真有点担心。看看后面几十米处有几位同学边走边跑，而在我前面的三位同学已经拉开一段距离，我只有咬牙坚持。此时已经不是拼耐力的问题，而是拼毅力的问题。尽管此时又有两位同学超过我，但我还是不泄气，一直坚持一溜小跑，终于离目的地初阳台只有二、三十个台阶了，看来我只能获得第六名了。不料此时，三班的陈万军赶到我前面，仅领先两个台阶，眼看要退居第七名了，我又来了一点劲，咬牙追上去，赶到他前面。估计陈万军也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再追上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登顶初阳台，到达终点，获得第六名。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此时的我体力基本到达极限，腿发软，头发涨，眼睛无神，口渴得要命。只好在初阳台下面来回踱了几圈，然后要了一点温开水，润了润喉咙，感觉这口水特别甘甜，真是生命之水啊！我在初阳台上停留了近一个小时，回校后冲了冷水澡，洗了衣服裤子。由于二班荣获本次全系登山比赛团体冠军，所以晚饭后我参加了班级的庆祝登山比赛胜利联欢会。这次比赛的后遗症非常明显，腿酸脚痛了好多天才慢慢恢复。

(3) 第三次纪念一二九运动登山比赛情况日记也有记载：1984年12月9日（星期日）上午去玉皇山参加纪念一二九登山比赛。这次比赛采取接力赛的形式，共有十一棒。每班选派十一名代表，我班的代表依次为王凤春，赵莲香，陈寿清，徐涌金，倪岳舟，沈荣均，石钟贤，蒋成国，胡根良，王建国，朱浙杭。9:30 比赛开始，第一二棒我班女将领先，第三棒成为第三，第四棒保持第三，第五棒和第六棒各追上一位成为第一，第七棒保持第一，第八棒遥遥领先，到了第十一棒由于交接棒失误，被 83 级钱雷追上，最后我班屈居亚军，82（3）班第三。很有意思，亚军奖品是塑料玩具指南针。

(4) 第四次纪念一二九运动登山比赛地点仍然在龙井路，当天日记比较简单：1985年12月8日（星期日）早上起得早，赶早骑车去龙井路，天下小雪，九点半开始登山比赛，83（2）班荣获冠军，82（2）班屈居亚军，82（1）第三名。

返回目录

第五章：师长

今日难寻沈善洪

—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郭世佑

我对杭大与沈校长的了解，最先来自校科研处副处长（稍后改称文科处处长）郑云山教授的白描。郑君乃史学巨擘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也是把我推荐给沈公的引路人，比我年长20岁，浙江萧山人。他在1973年拜别陈先生，离沪返杭，仅比沈校长年小6岁。然对此公端肃



沈善洪（1931—2013）

有加，有仪如师，背后惟称“沈校长”，对其他校领导则直呼名讳。我曾为之不解，郑君毕竟在陈先生身边伺奉多年，穿梭于京沪宁杭，阅人无数，大可不必如此。当然，我也毫不怀疑他的质朴与正派，他还深藏傲骨，能让他如此敬重者实属寥寥。

我与郑君同住宝善桥的宿舍区，茶余饭后时常会面，漫步运河之滨，听他叙往事，评人物。谈得最多的除了陈先生，就是沈公。他说：沈校长既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的学者，也是一个懂教育、有胆识的校长。他有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底子，思维敏捷，看问题往往比旁人深刻。文革时期就曾为此付出代价，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在王阳明与黄宗羲思想、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他做校长是以削弱自己的研究为代价，既不谋私，也不为上。为了杭大的发展，他既能当面批评某个教师或系主任，也可以顶撞领导，宁愿辞职不干，也要尽力把杭大的事情办起来。唯唯诺诺就不是他的风格。他以学术立校，倡导学术研究，鼓励发表论著，切实呵护青年教师的成长。还大胆提拔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改良管理队伍。郑君的切身体会是，正是沈公主政的十年，杭大才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郑云山先生是治学严谨的史家，他的叙述没有什么泛泛而谈的价值评判，几乎都是事实描述。他还不止一次提到，沈校长深知学科建

设与提升师资水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与知名度的重要性，为全校的学科建设与硕士点、博士点的规划反复思考，呕心沥血，却不曾为自己的学科谋求博士点。配置研究经费与师资时，他不但没给自己所在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史方向开一点方便之门，反而有意回避或冷处理。哲学系的同事自然对他很有意见。他的回答是：“我做校长的，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搞特殊化，我能说服谁？学校将怎样办下去呢？”他没有子女，就把弟子当子女。但在不遗余力地提拔青年教师时，却把入室弟子排除在外。

每当听到这些养耳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天地之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杭大何其幸也！不知有多少研究阳明心学的读书人能如此知行合一。但我知道，像沈公这样连自家专业都不罩着一点的一校之长，在全国恐怕还找不出几个来。看来，校长这个位置真有些难为沈公和他的哲学同事了。他在用笨拙的方式诠释孔夫子的格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倘若仰望傍晚的天空，可知每颗星的亮度原来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有的明亮得神采飞扬。当月亮躲起来时，后者就在勉为其难地照射行人的前方。

郑君对沈校长的礼赞并非独此一家；旅德归来的楼下邻居严建强对沈公的推崇如出一辙；毕业之后留在校办的本科弟子陈健、劳俊华等也是异口同声；历史系的徐规、毛昭晰、金普森、仓修良、黄时鉴、孙达人等前辈对校长的印象也大致如此。我还发现，在渊源有自的历史系，无论是沈公的同辈与晚辈，还是比他年长者，都像郑云山教授一样，当面与背后皆称“沈校长”，很少有人背后直呼其名。不用说，就凭这一点，也能让我管住顽童心态，在沈公面前入乡随俗，先敬三分。

沈公病逝时，我在第一时间收到好几个讣告。时当全国博士论文答辩之高峰，也是我即将赴美的行前准备之际。我无法分身赶回再见仪容，遥望钱塘，辄藉手机短信，向沈公弟子、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发出十六字挽辞，聊寄哀思：

天目云吞，口碑犹在；
平湖月坠，柳浪何闻？

上联属于实描，下联以景拟人。孤山南侧的“平湖秋月”与对岸的“柳浪闻莺”，既是西子湖畔的两扇胜景，也是我昔日授课之余，骑着凤凰28留步观天之处。而“平湖”一词，寓意双关，既指湖面，亦对家籍嘉兴平湖的沈公以郡望称之，旨在彰显我的第二故乡武林的巨星坠失之殇。据说，拙辞被挂在吊唁大厅的醒目位置，颇受文史前辈之谬赞。也许是高明诸君一眼就看出了此联的实在与真诚，并无煽情。

杭州的师友以为我和沈校长交往密切，其实我与沈公之间就是简单的清水之交。我连买条烟、送束花的举动都没有过，小气得很。回首旅杭凡十载，面谈之缘不过区区三四次，电话与通信阙如，应该不算交往密切。不过，正是因为我也时常受益于沈公视青年教师若钱塘朝阳的主校意志，彼此之间并不陌生，倒是事实。

22年前，杭州大学正在申报近代史学科的博士点，承蒙郑云山教授力荐，我被作为“梯队人才”，引入“天堂”。如果按照今日高校先看学历的招聘标准，绝无调入之可能，遑论举家迁杭。因为我的学历浅，学位低，只有湖南师范学院历史学的本科与学士身份。即便是在当时，我的调入也不是毫无争议。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毕竟已有十余年了。

在校方讨论我的引进资格时，沈校长只说了两句话：“郭世佑在本科时代就发表过近代史的专业论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与英文版的作者，这在杭大的文科教师中还没几个；再说，湖南师范学院的文科在湖南是最好的。”经此一说，其他校领导不再插话。当时，沪、穗等地的史学前辈也在动员我调出湖南，但杭大的动作最快。

挤进“天堂”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还有历史系的老、小同事像盘问一样找我打听：你跟沈校长是什么关系？跟薛艳庄、郑造桓有什么关系？你在省里有什么人？问起这些来，他们都特别耐心，我也尽

力配合。这也难怪，英雄可以不问来路，学府却认出身，讲师门。由此亦可见当时调入杭大与杭州之难。

虽然在上海前辈丁日初先生看来，杭州只有一个西湖。但诚如广州前辈李时岳先生所言，杭州毕竟也是省会城市，而且人文荟萃。我对沈校长就不难心存一份知遇之恩。只因我不太喜欢主动打扰领导。他忙他的校长公务，我看我的资料，授我的课。好在关注青年教师就是他的职业喜好，可能仅次于嗜烟。这就决定了一校之长与插队后学之间并不疏远。前不久，曾见某系的老主任撰文坦言，沈校长比系主任更了解某些青年教师的潜质与动向。此话一点也不假。种种迹象表明，沈校长对我的关注就多于系领导的关注。

当时，沈公正在杭大创建人文学院。他想打破单科培养模式，把文史哲打通，招综合班，还让学士与硕士衔接，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本硕连读”。从招生到培养，并不同于平时的专业设置，近乎哈佛、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他发动校内相对优长的师资同台授课，培养“通才”，能出一个算一个。我有幸也在动员之列，主讲近代史。

“本硕连读”在今天已很流行，连“硕博连读”都来了。我不知道这与沈校长当年的奔走与尝试有无直接关系。但我知道，当年的沈校长就干得很辛苦。教育部管得太多，体制的瓶颈无法解决杭大综合班的硕士学位，连招3年之后就被迫停止。沈公的“通才”之梦功败垂成。不过，感谢沈校长创办的那三个年级的综合班，让我受益良多。不说别的，在我有限的教职生涯里，它的教学质量与整体素质堪称最优，师生之间的情感认同亦最盛。

德国哲学家F·W·尼采说：“所有高尚教育的课程表里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跳舞：用脚跳舞，用思想跳舞，用言语跳舞，不用说，还需用笔跳舞。”尼采所说的课堂跳舞的奥秘，恐怕不是我国多数校长、书记与教职者所能明白的。但我坚信杭州大学的校长沈善洪很懂，虽然他一路摸到黑也不过一个厅局级的校长，但他怀抱教育家的素养与品位，习习生风。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报告中说过一句恐怕只有货真价实的教育家能说出的原创之语：“教师教学生，如果只教

知识，不教方法，顶多能给学生一本词典，或者一本《辞海》，但没有发明和创造，那怎么行呢？”

就在那时，沈公看到了杭大的竞争需求，制订“青年教师博士化”的在职培养计划，雷厉风行。我就守不住自己的低学历，通过外语与专业的正规考试，成为这个计划的首批受益者。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以本科学历攻读本校博士学位，两年半之后提前申请毕业。沈公还挤出时间，出任我的答辩委员。有位师友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答辩细节：一位答辩委员在评论中，对我的批评特别严肃，说：“你的文章提到梁启超给老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你说《梁启超年谱长编》把其中的一段话删掉了，人家删掉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指出来？”当时，现场的气氛有点紧张，沈公却问他：“为什么不能指出来？”

【注释：包括被《梁启超年谱长编》删掉的那五百字在内，博士论文中的两万字发表在《历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5期，另一部分刊在《历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2期】。

博士答辩之后，杭大不愿转出档案与户口。我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的计划搁浅，改为补报本校的教授职称。按照学校的规定，40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职称，可以不占名额，但需要经过答辩程序。没想到，我的答辩程序既简单，又轻松。先是沈校长开场发问：“你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新在哪里？”此言貌似尖锐，单刀直入，这就是沈公的语言风格，实则给我一个面向全校学术精英的自我表达之机，其呵护青年教师的战略之高与策略之圆，我就不难心领神会。第二位评委挺年轻，问：“在表格中，《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文章与中文版的文章是不是同一篇？”他无异于提醒在场评委，我的有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采用，不太容易；第三位是头发花白的前辈，说：“认真看了郭先生的材料，听了你的答辩，我感觉到你的研究很深，请问你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以嘉勉后学取代提问。事后才有人告诉我，第二位提问者主攻比较教育学的副校长徐辉教授，第三位乃工于西方哲学史的哲学系主任陈村富教授。答辩之后的投票结果，是27名评委全票通过，校园竟以佳话传之。教务长说：在杭大的校史上，全票通过职称评定

者很少。毕竟文理各科的衡量标准不同，评委又多，彼此要达成共识，不太容易。外来的年轻教师更难。所以，特别值得祝贺。他们越是这样说，我就越能明白，这个全票通过的荣誉首先离不开沈校长的厚爱，我没有任何自傲的理由。

1998年是新浙大的重组之年，郑云山教授以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建议我提交一册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申报成果奖励。拙著由沈公提议，被评为一等奖，奖金多达一万元人民币，比浙江省人民政府给的一等学术奖金还多近一倍。成果评审以杭州大学的名义召集，授奖仪式辄在新浙大的旗帜之下开场，沈善洪先生的主任委员之身份不变。那时候，浙大的教授分等设岗方案还没开始，工资待遇甚低，对我这个支撑三代五口之家者而言，那个万元奖金倒是很值钱，很管用。授奖仪式开始之前，郑君找我说：“以往的授奖仪式可以不安排获奖代表发言，这次沈校长点名了，要你说几句。他说你的课讲得很好，还挺潇洒，连讲稿都不要。除了文字表达的能力很强，口头表达也很强。沈校长还说，自从把你引进杭大，除了去年的职称答辩，你还没有在别的公开场合露过面，很多人还不熟悉你。”我感到有点压力，说：“沈校长过奖了，那该讲些什么呢？”郑君曰：“沈校长要你说点获奖感想，再谈一下个人打算就行了。”我就遵循校长的建议，坦诚告白8分钟，还被录音和整理，刊于《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就在那个举世瞩目的杭州四校合并之季节，新浙大的教务处在20位左右的院士与900多名教授中遴选12位，组成新浙大五个校区（西溪、玉泉、华家池、湖滨、之江）的校园巡回演讲团。我被同事提名，名列其中，据说也与沈校长的首肯有关。

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一个好的校长却能影响一批好的教师与校风；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则不仅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还能持续地规范一批又一批好的教师和校长，尤为根本。至于好的教育体制从何而来，恐怕既不能靠等待和施舍，也难指望人云亦云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一大批像沈善洪先生那样的校长与教育家怀抱振兴家国的使命感，站着思考，大胆尝试，持续呼吁和突破，少说废话。

近20年来，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都谈大学精神，打校训牌，但很少能像沈善洪那样排除干扰，躬身实践本校的“求是”校训，一步一个脚印地打造淳朴向学的校风，托起学术的尊严。

大概因为历史学的务实与哲学的睿智之和具有某种天然的视角优势，沈公熟谙苏联模式对中国高校之害，从主校开始，就排除干扰，倡导学术立校与学术自由。他除了尽力保护在成长中受挫的青年教师与学生，还克服地方院校的资金困难，尽量选派略有实力的青年教师出洋深造，推进国际学术交流，走在全国高校之前列。当年，个别学子对我试图打破教科书体系的课堂讲授不太适应，告状到校长那里。沈公答曰：“郭世佑是我引进的，我了解他。他的治学严谨，不会随便说。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后来在我即将离杭时，两位前辈师长提起沈校长对我的信任与呵护，才让我知道的这个片段。就在拙著获奖不久，沈公托郑云山教授传话，约我到他的杭大新村寓所面谈。这是我俩之间唯一的单独面谈。我才知道，他和郑君一样，都认真审读过那本多达42万字的冗长拙著，对每一章的内容都很熟悉，令我感动。对话就从拙著的撰述开始，从近代到现代。他要我继续写下去，写出一本完整的近代史来；从历史到现实，他要我别管来自北京的学术杂音。这位老校长其实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师出身，竟以智者的清醒与果敢，卓见纷呈，时常抖出势不可挡的钱塘气象，其思想解放之程度，多少让我吃惊。对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的现象是当时我俩讨论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后生听他通报内幕，分析根源，洋洋洒洒，入木三分。此时此刻，他能让我想起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慕尼黑演讲所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那次谈话，我曾几次起身，表示告退，怕影响长者休息，他却总是说“不急，不急”，会谈持续达3个小时。

5年之后，我举家北移。即将离杭时，我在校园里碰上他。他已听说我要调走，说：“去也行，他们占有的学术资源太多了。到了以后，要保持联系，你把邮件寄给韩国研究所就行。”

包括我所熟知的郑云山教授在内，凡是在沈善洪校长身边工作过的杭大人，都不难感受其出乎其类的品行与主校能力，旁人还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不过，沈校长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人无完人。如果只顾称赞他的伟业与功绩，未免过于单调和油腻，还容易影响称赞本身的可信度，我还得设法说点别的。

就拿他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与提拔来说，此举属于其校长角色的亮点之一，很多口碑都在传诵着。愚意以为，若用多元的视角细察，不难发现，沈校长的进步空间其实还不小。比如，对于外来的青年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角色责任固然重要，住房安排与子女上学也是关键。毕竟初来乍到，近乎举目无亲。我还记得，我的住房通知单上写着“校长特批房”。但房产科给的房子是杭州市内小学学区很差的地段。我携小女到小学申请插班时，该校校长叫小女下学期再来，毫无协商的余地。女儿当即流泪，连喊“回湘潭去！”结果，小女就在杭州休学两个月。再如，沈校长把许多业务上相对看好的青年教师推向党政岗位，备受称道，我看未必。在我即将调离杭州时，还听金普森教授追述一个细节，让我差点冒汗：沈校长在筹备人文学院时，希望我做院长助理，要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多亏历史系某领导直言：“他干得了吗？”沈公才打消此念。话说回来，沈善洪先生以地方院校的校长之卑，干出许多连部属院校的校长也未必能做之事。他的主校理念与境界尤非多数同行可以企及，已经很不容易。他还是一手把我引进杭大的主人，是有恩于我的逝者，我在他身后扒寻他的不足，我都快要怀疑自己的人品了。但无论怎么挑刺，都无损于一代“校霸”的光辉，瑕不掩瑜矣。

（2015年7月9日完稿于沪上郁江巷，7月11日完稿于京畿牡丹园）

[返回目录](#)

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姜亮夫



姜亮夫先生
(1902-1995)

一九六三年，我曾对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及同学讲过一次治学经验。当时有许多话不敢说透，有些涩涩缩缩。近来又不断有人要我谈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无所成就，也沾了些“纯盗虚声”的时风。但那篇讲录发表后，也有些人向我发问，乃至追究，使我耿耿于怀者十八、九年。近三、五年来，又向青年们谈了一些较细致的治学方法等，自以为可供学习者的参考。

我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学习的人。但走了若干弯路、险路。现在的这个路子，是排除了一些歧路才慢慢确定下来的。我本来是个钝根人，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我现在就把这些经过，点滴记下。是自白？是与人互勉？都不去计较。但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看成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只是一个种瓜种豆的人，所生产的不过是瓜、豆而已。

我走人文科学的道路，是受了祖辈的影响。我的家是由老祖母管治的大家庭，父辈四兄弟，像个小朝廷，显然是个封建家庭。四叔父是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但并不改其做秀才之故习。父亲是京师大学堂读法律的维新人物，他的爱国热忱使我深受启发。但其思想仍以孔孟之道为基础。他们搞的基本上都是人文科学。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虽也读了些《地球韵言》、《小学韵语》、《格致教科书》等，但考大学时终被录入成都高师的国文部。这不能不说是初步定了人文科学的大方向，也可说是我求学的第一变。

考进了国文部，这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将是朝着人文科学的领域走去。然而，我还面临着具体的选择。当时的老师最令我钦佩的是林山腴与龚向农两先生。钻进这个艺苑后，我很用功，对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既学诗词，也学“小学”（文字声韵学），中间曾爱上了罗素的

数理逻辑。四年毕业后，随即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接着又被清华研究院所录取，作王国维先生的研究生。诗词我还是不舍得放弃。但王先生、梁任公先生都说我无诗情诗才，还是专攻文字声韵学为好，与林山腴先生的话全同。三个老师都如此，我怀着极端痛惜的心情，烧掉我的四百多首诗词小集子。这是我的一个了悟，悟到了学习是与性情相关的，现在叫生理优点相关合。从此，我决心回航走“小学”的路子，钻研文字声韵学。这是我求学的第二变，从而选定了具体目标。但随时还在返航，写了些诗歌、小说，也学着几位名家，搞使刀弄剑的随笔之属。

后来一个极巧的机会，我拜见了章太炎先生。先生切实指示我读史，“从杜佑通典入手”。我也觉察到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学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那时我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为了生计编书。先生也顺便告诫我要做一个向着真正的学术道路前进的人，又把“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这两句话提得很高，透彻地发挥了“甚深微妙”之义，而又贴紧到民族兴亡的上面来讲。这是合于父亲影响我的爱国思想的，使我座上发大冷汗，誓本先生之言做去。我同先生还谈到甲骨文字的研究问题，他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喻，劝导我不必事事亲尝，不一定要去搞甲骨文。总之，使我体会到“不要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这是我求学的第三变，这时我已写了不少文学书，编了不少教科书。

章先生以历史为基础的教导，给我以勇气和信心，但有时我又有些发脑热，狂想遍注二十四史。大家批评《宋史》最芜杂，于是我就想从《宋史》着手，把宋人文集尽量看过，作为每个人物的碑传材料。要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例为之注，抄了三百来种的宋人文集，同时也看了些宋、元、明人的笔记，觉得可贵材料很多，每天扣足两册，作了记号，分类剪贴，成为社会史料、经济史料两类。

在二、三两变当中，方向虽不十分坚定，但也有些有益的工作，譬如在王国维先生指导下，写了一部《诗骚联绵字考》，这是我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字学的写作示例，到现在虽然有些发展，而基调是未大变的。此后又曾写《文字朴识》，只不过加深一层，使文字、语音、字

义三者结合，王、章之学两者结合的结果，这个方法是可以再应用的。当时又参加了疑古学派，大写文章，这恰好成为后来搞古史学的张本。又如我的一部《屈原赋校注》，是在一种思师不已的情感之下写的，用自己的感情，来深体一个爱国诗人的心情，既忧国忧民，又不能有损于君威，有伤于民情。而我当时，也深深卷入了一场爱国运动中，这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下写成的。近卅多年，发觉其中感情的成分多了些，所以作了较大的改动。当时还写了一篇《夏殷民族考》，也是我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点滴表现。

后来因病遵医嘱出国，到了巴黎，于参观博物馆、图书馆中深觉故国文物是决不可毁灭的。于是每天去参观游览，看看国民图书馆藏的敦煌经卷，鲁敷尔、琪美、乾宜喜、拿破仑废王宫等处收藏的文物，发现他们研究各种文物，同法、德、英人整理我们的文物，其方法之精妙，途术之宽博，结论之精确，远非国人所能及，这使我这个走进大海已辨航向而无舟楫可渡的人知道有一苇可航。于是大量抄了他们的图表、说明，也摄制了些照片。我又时时与他们的学术界人士接触，多少也得些启发。我觉得我此后更有把握了，不像前三变那样多少有些彷徨乃至大为彷徨的情景。这可算是我的第四变。归国时带回来三千多幅照片。

这第四变，可以说是我研究工作方法的一个突破。突破了我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在治学上开始有裕然绰然、有“无适而不可”之感。思想有疑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所以我现在更体会到，把“方法论”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是有其必要的。我纵观先代的学术工作者，其成就的大小和深浅，往往决定于方法是否多方面的，是否灵活运用得纯熟。

我五十岁时，正是全国解放之秋，我虚心学习了许多新思想，新思想中尤其使我感到重要的是超逻辑的辩证唯物主义。看事物不仅要从那平面的现象来看，同时得全体来分析，正、反、侧来看，还得从它那变动不居、前后因果、来龙去脉来看。于是思想考虑更周全、更

细致，使一切事物都“莫得遁隐”。到这时，我明白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弄资料成了我正大大光明的事业之一。过去不敢多搞的工具书，也都成了我认真对待的科研内容。

总的说来，我在四十岁以后路向虽已大定，而“其道多方”是五十岁才坚定下来的。所以在五十岁以前写的稿子，都不满意，细细看来，大体是未曾做到辩证法之所要求。我体会，真要做到合乎辩证法，是难的。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廓的，凡此事物有关的科学，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个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风习、民风、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我更感觉我综合的能力，仍不够得很。联想到司马迁、班固的《史记》《汉书》两书，包括了一切学问；《说文》《尔雅》，也是天文、地理、音乐、博物无所不包。他们是如此宽博的学问。即以屈原而论，也是自宇宙生成之理，以迄地貌变迁之说，一一入他文中，又岂是那些空头诗人、词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我走入人文科学这个曲曲折折的道路，说到此大致也有个粗线条了，要细写还是多着的。现在我想再谈谈我的全部计划。此事在我第三变已大定了。但这些年代，始终是“心有余悸”，不敢畅言，至一九七一年，我在女儿为我编的一个著作目中，作了个自识，说我这一生“以中国古史为基”，大概已略略表示了一下。现在，我要无所顾虑地说一说我的心愿。

我从第三变的末期，把泛滥的历史学再推进一步，定为“中国古社会史”，到第四变以后，把全部工作，都配合这一主题来进行，而抽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一件可以总领一切的课题：《三代异同考》，这是我在三十岁时定下来的。在这部著作中，把自己研究古汉字、古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一齐引入。在有些地方，旧说解释不了，便又引进一些科学家所得古代社会情况，如图腾、氏族、各种崇拜、各种组

织、各式各样的制度，等等。于是觉得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就是二十多年来的心情。这心情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我的第二生命，连家庭我也经常不照顾，妻子笑我是个“酗酒汉”。我现在是八十岁了，到底我弄出了什么名堂呢？回想起来，不觉令人“黯然魂消”。也实在是一条辫子也梳不拢，不论哪样，也未完成，细细回想，我选择道路时，还有许多当时不曾考虑到的条件，这条件主要是我的缺点，譬如“我的记忆太差”，只知道自己是个钝根人，而不知其应补救之方；二是“目力”，自中学毕业时，已戴八百度眼镜；三是“脾气有些焦躁”，容易进，也容易退；四是“多少有些狂妄之习”。这些生性，都不是作史学研究的一块材料。

还有我始终只是个靠教书为生的人，买不起所需要的书，一切材料只好依靠一些可以借到书的机构，吃力非常，而且从来也不敢向保有材料的机构求书，因为大人先生与阔官，我是羞于去拜访的。近三十年来，又因职务及一些制度问题，科研工作连十分之一、二的时间都没有保证，浪费了十分之八、九的精力。若说我不敢浪费分秒时光，但我却每天在浪费百分之九十的时光。当然，我的努力还不够，只好讨得这分失败！

现在汲取我选路的经验，为未来的科研者提醒一下有此种种“拦路虎”，大概也不是无用的。

一、自己先认识一下个人的“天秉”，譬如体魄、性情、脾气、迟缓与急躁、记忆悟解能力、感情深浅、兴味所在；

二、认识环境、家庭、社会、亲友、邻里乃至经济条件可能发展的道路；

三、尤其要深知自己的缺点及对一切学科爱恶的情况，不要冲动。

然后，本着自己已有的较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将上面所述三事结合来考虑，作一个初步的定向。这是一种细磨工夫，不可焦躁，总得要在进大学后或有了相当基础，作一定的准备才能肯定。一旦肯定下来，就得坚持下去！

（选自《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猷致天下文明 其责皆在吾人 ——怀念姜亮夫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84 级研究生 王魁伟



姜亮夫先生（1902-1995）是一代国学大师，著作等身，享誉学林。1984年我考入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专业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姜先生是所长和令人尊敬的导师。我们在先生门下问学，从此走上了以学问为毕生追求的人生之路。

当时，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匮乏。为了培养好我们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姜先生亲自拟定培养方案，提出“课程设置主要是些必备的根柢之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通才”，“培养的最高要求：每个学生毕业有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限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种学术（分类）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为达此目的，先生多方延聘校内外专家学者，先后为我们开设了“广校勤学”（沈文倬先生）、“诗经研读”“中国古代历书”（刘操南先生）、“训诂学”“说文研究”（郭在贻先生）、“文献学”（雪克先生）、“庄子研读”（周启成先生）、“广韵”（张金泉先生）、“校勘略说”（蒋礼鸿先生）、“中国历史地理”（陈桥驿先生）、“中国古代官制史”（龚贤明先生）、“中国目录学史”（倪士毅先生）、“版本学”（魏隐儒先生）、“秦汉赋役制度”（钱剑夫先生）、“中国科技史”（王锦光先生）、“孔子与孟子”（董治安先生）、“谈谈艺术”（陶秋英先生）等。可谓名师云集，罕有其匹。三十年后，同门中人才辈出，有的已成为学界翘楚和领军人物，如刘跃进和张涌泉，前者为学部委员，后者为长江学者等。此可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灵。

记得在发榜前，我曾接到原杭大古籍所办公室的一个电话，大意是：当年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乐素先生曾委托杭大古籍所代招两个研究生。由于我基础课考的是“中国通史”，可能成绩还可以，因此杭大方面想推荐我去暨大而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对暨大一点也不了解，对陈乐素先生更是一无所知。于是，我当即表示不想去暨大，而希望能到杭大姜亮夫先生门下问学的愿望。

在杭大问学期间，一次我到先生府上拜访。谈话期间，先生知道我专业兴趣在古汉语方面。他说：“搞古汉语必须通方言，否则是搞不好的。”还把他早年著作《昭通方言疏证》（云南昭通是先生的家乡）的两册白文手抄稿本交给我，命我施加标点。我知道，这是先生在检查我的基本功，同时也是培养我学习和研究方言的一个有效途径。（该书初撰于1921年，后经过60多年的陆续增补、订正，至1986年定稿，于1988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手抄稿影印出版；2002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姜亮夫全集》第十六卷）。

毕业前夕，大家都在考虑去留的问题。杭州是天堂，谁不想留下？但限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又不得不做出各自的选择。姜先生曾问过我的打算，说如想留在杭州，他可以帮我联系出版单位。还说，如果将来想上高校工作，有出版单位工作经历，尤其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接触来往而积攒起来的人脉，对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有益的。先生所言极是。但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两地分居，家属工作调动安排及孩子上学等），我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东北——到辽宁大学工作，从而辜负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和一片好意！

毕业后，我曾多次利用外出开会或出差的机会，顺道或绕道到杭州。不为别的，只为去看望先生。记得有一次我到先生家，先生的女婿徐汉树老师拿出先生特意给我写的一幅题字：“辽海文物已成尘，葆抱先德崇宏新，猷致天下文明，其责皆在吾人。魁伟仁弟勛之！友生姜亮夫敬贻，八十六翁。”能意外得到先生的墨宝，我的心情难以言表。我想，这不是先生对我个人的期许，而是留给所有后学的。1991年春，我再次来到先生家。不过这一次时间有点晚，先生已准备就寝了。我这次到先生家还有个心愿，想和先生留个影（因次日早上就要离杭，也不知何时能再来看望先生）。当先生的女儿姜昆武老师知道后，便和姜先生商量。先生又重新穿上衣服，准备和我拍照。昆

武老师还特意请来她家的邻居——学兄俞忠鑫的爱人（据说在某媒体工作）来给先生和我拍照。这是我有生以来拍得最好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张照片。这一年先生虚岁九十。能与先生合影留念，我深感荣幸。同时，也为自己如此造次并影响先生休息而深感愧疚和不安。

翌年，我到江西庐山开会。会后，我又绕道杭州，去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因病已住进浙江医院。徐汉树老师陪我赶到医院。我看到骨瘦如柴的先生。据徐老师讲，先生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且已不识人。可当听说我来看望他时，先生竟然说出了我的名字。此情此景，再回想一年前与先生合影的时光，真是百感交集。1995年冬，先生驾鹤西行。闻讯后，我即赶赴杭州奔丧，与先生诀别。

2002年，二十四卷本《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担任编委并负责第十七卷中“诗骚联绵字考”的整理校订工作。《诗骚联绵字考》是姜先生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是先生的早期著作，其导师是王国维。我为能参与这一宏大学术工程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在“整理后记”中写道：“谨以此聊表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2012年，为纪念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浙江大学档案馆组编，徐汉树著《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我应约写了“师恩如海”四个字。

2013年，浙江大学古籍所编的《在浙之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册》成书，我写了“西溪问学忆师恩”一文。

2017年是姜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同门十余人相约赶到姜先生的家乡——云南昭通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在此期间，我曾三次到位于老城区的“姜亮夫故居”参访，获益良多。为准备此次纪念活动，我写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已先后发表在《昭通学院学报》上，分别是：“《诗骚联绵字考》成书始末”（2017年3期）和“姜亮夫先生与周传儒先生的交往轶事”（2017年6期），还有一篇“姜亮夫先生与东北大学”一文，《昭通学院学报》将另外择期发表。

每当想起姜先生题词中所言：“猷致天下文明，其责皆在吾人。”我常常心潮难平。我已退休多年，且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愿天假我以年，能在问学之路上不断有所进步以告慰先生。

怀念郭在贻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所 84 级研究生 王魁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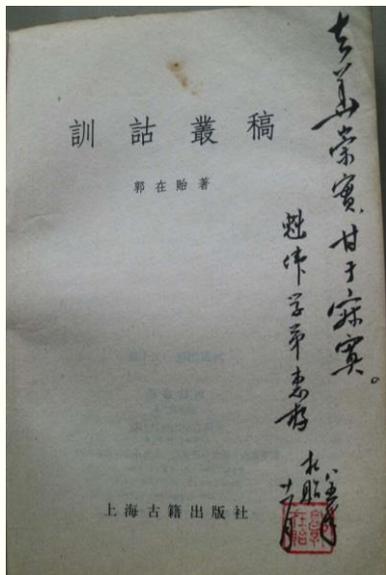
郭在贻先生（1939—1989）离开我们已近三十年了。先生逝世时年仅半百，英年早逝，是中国语言学、训诂学尤其是俗语词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先生曾用十年时间研究楚辞中的训诂问题，最终只写了万把字的论文，精雕细刻，字字珠玑。如今掩卷追思，令人向往不已。

我 1984 年考入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先生给我们上过两门课：“训诂学”和“《说文》研究”。记得一次我将两篇训诂方面的读书心得请先生过目。过了几天，稿子退给了我。只见两篇稿子上留下了先生的“朱批”，分别是“此条较好”和“此条可商”。“此条较好”者，后来经过修改，发表在 1985 年第 4 期《学术研究》上。这是我在杭大求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也成为我硕士学位论文《春秋滕制考》的缘起之作，应该说这与先生的认真指教是分不开的。陆宗达/王宁先生的《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训诂热”中的一部力作。一次先生知道我有这部书，于是向我借书。我除了感到荣幸外，也对先生这种求知若渴而不耻下问的精神愈加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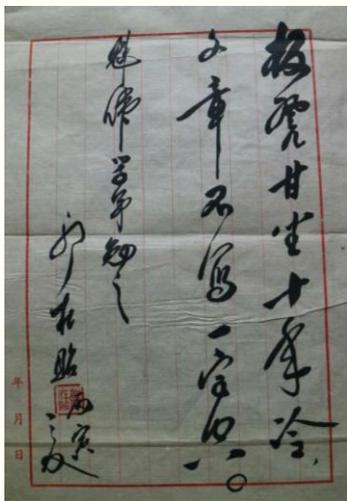
1985 年冬，先生因病住院。班长张涌泉安排我们轮流给先生送饭，即早晨先到先生家用保温桶带上师母做好的饭菜，然后送到浙江医院先生的病房。我看到在先生的病床枕旁有正读着的书。先生以特别用功著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四清”和“文革”时期，有一段时间，先生曾住在系资料室，废寝忘食，博览群书，为日后的精深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 年，先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

言学家奖，享誉学林，其代表作《楚辞解诂》和《唐代白话诗释词》等，即是其当年努力和用功的成果。

1985年先生的《训诂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是在沈阳古籍书店看到的，当即买了一本。适值暑假，开学后即带着书去拜访先生。先生在书的首页欣然题字：“去华崇实，甘于寂寞。魁伟学弟惠存”。先生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曾对“甘于寂寞”做过精确的阐释：“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所谓甘于寂寞，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没有这种精神，学问是很难做得成的。……甘于寂寞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能够自觉地拒绝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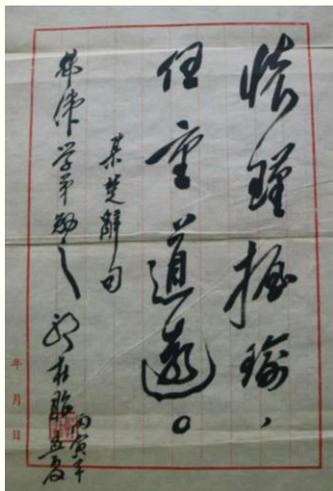


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这点尤难做到。”而先生做到了——先生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即是“去华崇实，甘于寂寞”的楷模！



1986年暑期，毕业在即，我到先生府上辞行，先生为我题字留念：“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和“怀瑾握瑜，任重道远。”在同门中我是年龄最大而学问最差者。承蒙先生不弃，仍给我很多鼓励。我辜负了先生的厚望，在学术上无所建树，对不起先生！毕业后我即来到辽宁大学中文系工作，当时我已三十八岁，从助教做起，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2008年退休。如今我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仍不敢忘记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

1987年初冬，我返校参加硕士论文答辩。论文指导是雪克先生，（我的论文能顺利通过答辩，与雪先生的悉心指导，百般呵护是分不开的。雪先生在我的论文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对此我铭记在心）记得郭在贻先生那天是抱病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的，先生身体不适，表明了肯定的态度后即先行离席了。对此，我深感愧疚。硕士学位论文《春秋媵制考》，后经整理以《媵制源流考》为题发表在1993年第1期《浙江学刊》上（拙文得以问世，还应感谢同门敦基君的鼎力相助）。



1989年1月10日，噩耗传来，郭在贻先生怀着“万分惆怅”与不舍，与世长辞。此距先生五十大寿仅差一天。

1994年，在班长的鼓励下，我在《古汉语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读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去华崇实，学风谨严’是郭先生对《文史》的评价，以此来衡量《论稿》也很恰切。《论稿》中有些文章是属于书评或学术综述的内容，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专家学者，如姜亮夫、蒋礼鸿及张相、江蓝生等，既充分肯定其学术成就和造诣，同时，也客观而中肯地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或失误，这种实事求是，不为贤者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更为令人敬佩的是郭先生还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一些失误。这些均表现出‘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的博大胸怀。”

先生遗风，山高水长。

2019年是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和逝世三十周年，同门已相约届时将一起到先生的故乡——山东邹平集结，共同祭奠和深切缅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怀念沈文倬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所 84 级研究生 王魁伟

沈文倬先生（1917—2009）早年曾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1947年，前国立编译馆在顾颉刚先生主持下开展经籍整理，先生以专治礼学被破格聘任为该馆副编审。解放后曾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任编目部副主任，《中国丛书综录》编辑组组长。1963年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工作，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当时我国唯一“先秦礼制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1994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首批暂不退休教授（终身教授）。沈先生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三礼学”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具有广泛的影响，顾颉刚先生称其为“当今治礼经之第一人”。

据倪士毅先生所编《中国目录学史》，“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是一部空前的丛书目录（该录所收丛书 2797种），它给我国七百多年来的丛书和一百八十年来的丛书目录作了一次总结。这是汇集全国四十一个图书馆所藏丛书的联合目录。也是我国目前丛书目录中最完备的一种。这部《中国丛书综录》，对科学研究工作者因目求书，节省搜采时间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是当前最好的一部丛书目录。”评价颇高，其实这也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而主持这一工作的正是沈文倬先生，其学术贡献善莫大焉。

1984年，我考入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沈先生给我们讲授“广校讎学”。据当年听课笔记，其内容既“广”且“深”。如讲“校勘学应注意哪些学问？”即胪列了“姓氏、年代、目录、版本、辑佚、辨伪、避讳、文字、音韵、训诂、古器物、考古、考据及官爵制度、历史编纂、沿革地理和经史笺注”等，所涉不可谓不广。沈先生强调“不博览不足以言学”、“读书要得法”、“读书方法：古顺着读，今逆着读”。先生结合古文献和古文字讲解某些古代礼制的来

龙去脉等，不可谓不深。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贡献在于断代，若不断代，则不能用作史料。”此说甚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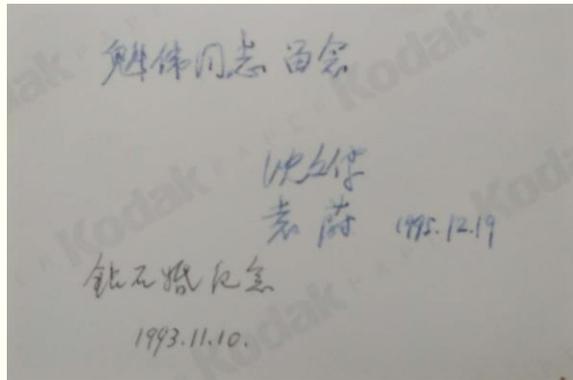
1986年毕业前夕，我到沈先生家辞行。先生题词留念：“孟子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赵岐注云：“学问所以求之，此语极精。盖谓能求放心，然后可以

学问。然则，维仁与礼，亦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魁伟王君，负笈虎林，执摯于昭通姜先生之门。时予亦在省学任教，得相切磋焉。于其北归也，举斯语以赠。一九八六年七月，梅雨兼旬，校书方竟一章，书此。松林下士沈文倬荃閤氏识。

其时，先生正在做（清）焦循《孟子正义》的校点工作。此书作为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已于1987年出版。先生谓“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对此，当年我并不能完全领会其精神；即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实也还是似懂非懂。此“放心章”出至《孟子·告子上》，原文为：“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译文：“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了那条正路而不走，丧失了那善良之心而不晓得去找，可悲得很呀！一个人，有鸡和狗走失了，便晓得去寻找，有善良之心丧失了，却不晓得去寻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罢了。’”这是对《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我一张他和师母的合照，其背面写有：



的较为权威和通俗的解释。这也是沈先生谆谆教诲“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的原因所在。

1995年12月，姜亮夫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即赴杭奔丧。在此期间，曾去拜访过沈先生。此次先生送

得此我深感荣幸！

2009年10月21日，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93岁。我因故未能赴沪奔丧，与先生告别而深以为憾！

[返回目录](#)

怀念倪士毅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所 84 级研究生 王魁伟

倪士毅先生（1919—2018）是宋史、浙江地方史和中国目录学史专家；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百岁世纪老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班，应姜亮夫先生聘请，倪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目录学史”课。先生谦和儒雅，仙风道骨，至今难忘。

所用教材《中国目录学史》是倪先生 1985 年编著。我注意到封面落款写着“暨南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而内页目录上方却又标明“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倪士毅编著”的字样，令人不解。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1984 年，我考研时报考的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但发榜前，古籍所方面千里迢迢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到暨南大学读研？由于当时我对暨大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暨大在广州），便婉拒了。事后得知，那年暨大历史系陈乐素先生曾委托杭大方面代招两名研究生。由于我基础课选考的是“中国通史”，可能成绩尚可，于是我就成为被推选的对象。

杭大和暨大到底有何渊源？此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近日友生马千里君见告：陈乐素先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在浙大和杭大工作过。“1942 年香港沦陷，（陈乐素）入贵州遵义，应聘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浙大流亡到遵义）“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 年改革学制，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辗转回到杭州，仍专心治史，继续编著《宋史艺文志考证》。打倒‘四人帮’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后调任广东暨南大学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此据百度网）由上述陈乐素先生的简历，可以看到杭大和暨大不寻常的校际关系，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杭大历史系的倪士毅先生所编《中国目录学史》教材，落款为“暨大历史系”的原因。

我在杭大读研期间，曾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投给了四川成都的《文史杂志》，刊登在该刊1987年第3期上（此文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但看不到作者的名字）。此文的撰写与听倪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课不无关系，所受启发和影响不言而喻。当然，这也与我此前的一次买书经历有关。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我曾在沈阳古旧书店买到过一部线装书《輶轩语》，是光绪四年秋七月敏德堂潘刊本，一函两册，售价8角。《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是姊妹篇，前者讲治学方法，后者讲治学门径。倪先生在其《中国目录学史》第十章近代目录学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輶轩语》的内容是教育学生立身处世（语行）、治学方法（语学）和科举时文的做法（语文）等，现在已没有参考价值，但《书目答问》一书，是回答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是指导读书的方法，虽然是为了应科举用的，但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其实，《輶轩语》中“语学”部分，即讲治学方法的内容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对于今天的文史研习者仍有借鉴意义。例如“注重根柢之学”，“为学忌分门户”及“厚今薄古，今胜于古”等，此即我写“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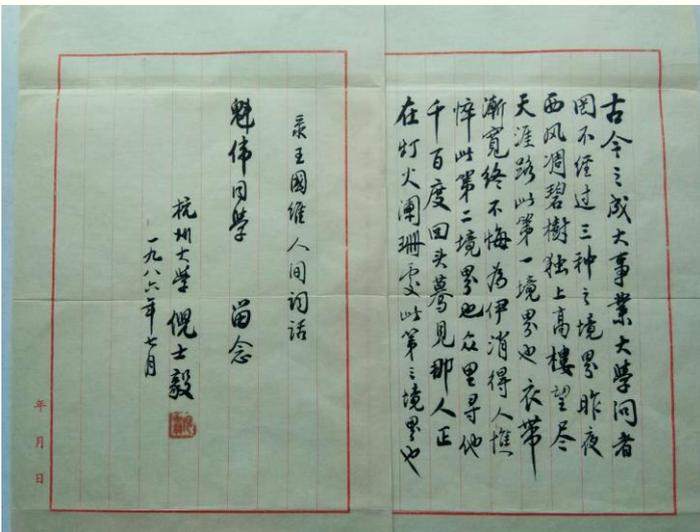
记得大约在1985年深秋时节，即《中国目录学史》结课后，倪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到位于宁波的“天一阁”参访。这是一次难忘的访学经历。“天一阁”是明代著名藏书楼，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共抄成七部，分七地收藏，所建藏书楼均仿自“天一阁”。建于沈阳故宫里的“文溯阁”即其一，惜今已书去楼空（书今藏甘肃兰州，是当年为战备之需而临时存放在兰州的。如今甘肃方面已不肯物归原主，还投巨资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在黄河北岸山上修建一座现代化的藏书楼，形制还是仿天一阁，而且已成为甘肃的“镇省之宝”）。



1986年毕业前夕，我请倪先生题字留念。先生写了王国维先生那段著名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

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录王国维人间词话魁伟同学留念杭州大学倪士毅一九八六年七月”，后钤有“倪士毅”篆文印章。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重读百岁老人饱含深情和厚望的墨宝，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89 年新年过后，我收到倪先生寄自杭州的贺卡：“魁伟同学：年片已收到，谢谢。您近来工作如何、不胜悬念。我已退休，但身体粗安，请勿念。祝您新春健康！倪士毅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此时倪先生已步入古稀之年，此后先生又活了三十年，2018 年以百岁高龄仙逝。仁者寿！

[返回目录](#)

读琦君散文 忆任铭善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63 级 金城濠

读台湾女作家琦君散文感到非常亲切。她写的故乡的风俗人情，人物风貌，甚至温州方言许多我都熟悉。她书里满怀深情写到她的恩师夏瞿禅师，她还写到之江大学另一位老师任心叔师。这两位先生，后来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我有幸成了他们的学生。

去年教师节前夕，温州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文章《老师几句话受用一辈子》就是怀念夏承焘先生的。

任心叔先生我们喊他任铭善老师。老师人称东方一流语言学家。他能开汉语史课，据说这课程全国只有北大复旦几个教授能开，他也能开这课程。当时，广西大学的李广田先生来杭州大学，他说北京大学是“地主”，杭州大学是“富农”。意思就是说我们中文系师资力量雄厚。不幸，1957 年任铭善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总算能上讲台了，但是，主要的专业课还不让他上。他给我们上的课是现代汉语拼音课。这课应该是中小学生的课。我们的同学普通话基础差，到了大学应该说是补课。大概右派分子废物利用，让他上课。记得他教我们儿歌：大公鸡，绿尾巴什么的。

高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古汉语。有一次，他拿了一段明朝冯梦龙《古今谭概》一段话古文让我们翻译现代汉语。有人送给孙之翰一方砚台，自称值三十千银子，并说：这块砚台，只要向上一呵气，它就自然流水。孙之翰说：一天呵一担水，只值三文钱，何须如此重价！

故事归故事，到了“文革”时期。这故事就变成了任先生借古喻今的罪行。大字报上写他自以为是宝贝，得不到重用。大字报的标题是：名善心不善的任铭善。现在看来，把能教古汉语史的大家，把他弄去教汉语拼音，是把宝贝砚台汲水用。文革时，他和夏先生等一起，变成牛鬼蛇神，都扫厕所去了。砚台连呵水都不让了。学生的厕所也是他们扫，打扫得非常干净。他们平时做学问也是这样认真的。

记得，有一次任先生出题考试我们。其中有一道题很自由的。随便你写什么只要言之成理。我写的是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谈“华”字

的读音。王安石写道：褒禅山亦谓之华山，慧空禅院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我就此写了“华”字有三种读音。篆书华和花的关系等等。老师给了我满分。我知道老师对独特见解的答案都是欣赏的。这次考试其它题目有答错的。老师给我满分是对我的鼓励。当时我想问老师，我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可惜很快，万恶的文革来了。谁也不敢去向反动学术权威问什么问题。“四人帮”粉碎后，我曾问王元骧老师任先生的消息。他告诉我先生已经去世。我为永远失去向任先生求教的机会歔歔。几十年来，我把这问题一直留在心中，不向任何行家求教。因为想起这个问题就会想起任老师。

琦君回忆任心叔铭善先生时写道：任老师一身傲骨，后忧愤而死。她还保留任先生的一幅墨梅，上面题了一首诗，此诗应是先生人格的写照。现抄录于此，仅表示对老师的怀念：

画梅如画松，貌同势不同。
爱此岁后骨，不受秦王封。

[返回目录](#)

夏承焘先生几句话受用一辈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63 级 金城濠

我是以夏承焘先生的学生为荣。其实，我只接触过他三次，在大学里我仅仅听过他的一次课。

少年时候，我喜欢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同苏联学生交笔友，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我也跟我姐姐大学里的老师学俄语。我有个远亲，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翻译过托尔斯泰的著作。我看他的译作，看他的文论。报考大学，我就想填报俄罗斯文学系。

后来，温州一中请来了夏承焘先生给我们学生作一次关于怎样治学的报告。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话忘了。惟有先生说的“读书、治学，案头（指桌子上）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这句话我记一辈子。这句话我体会一辈子，前半句是虚晃一枪，真知灼见在后半句。可惜前半句我做到了；后半句没做到。现在我家里没几本书，有的几本也在床底下躺着。五年前，我眼疾住院，正逢房屋拆迁。老婆问我，书怎么办。我想，眼睛不好，看什么书，处理掉算了。连我中学时翻译发表的一篇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那本杂志，也处理了。案头的书是少了；可惜的是，几十年来，书读的不多，胸无点墨不至于；但是，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没有做到老师说的，心头的书要多。

夏承焘先生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考大学的志愿。我报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有幸成了夏承焘先生的学生。先生一般不给大学生上课，只给年青老师和研究生上课。一次机会，先生开大课，我进去听了。印象最深的是八个字：“一丝不苟、不拘一格”。前四个字讲的是继承传统，后四个字讲的是开拓创新。当时我理解，这是讲吟诗作词的。岁月沧桑，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增加。我感到先生讲的这几个字不仅仅是诗作词的。后来我办报纸副刊、办报，“不苟不拘”成了指导我工作的方向标。现在想想，先生是教我做人的道理，做人也得不苟不拘。这是与夏先生第二次接触。

说来寒心，第三次接触夏先生，竟是在批斗会上。“文革”当中，先生是被第一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经常开会批斗他。我不忍心，碰到这些批斗会，我尽可能避开。拿个照相机游西湖，杭州的风景区我走遍了，连有个瀑布的地方我也去过。许多杭州人也不知道有个瀑布。可惜的是带我去的同学，英年早逝，瀑布在哪儿我也忘了。此外，我就是躲在寝室里下围棋。有一次，听说批斗会里要出示先生在“牛棚”（关“牛鬼蛇神”的地方）里写的两集诗词，《反戈集》、《挥鞭集》。这倒想去了听听，记住其中一集的卷头诗，是一首七律。回温州的时候，温州一中退休语文教师陈适先生还要我抄给他过。也是几十年过去了。只记住是吟落花的，尾联是：林花会得吟翁意，结束韶华舞一会。

我退休边儿，单位里没什么事了，凑巧电视台要我主持节目。去，还是不去？我想起先生的教诲。树林里的花马上就要谢了，它还是随风飘舞，潇潇洒洒，把最漂亮舞姿献给人间。先生的教诲鼓励我走上温州电视台百晓讲新闻的舞台，开创了温州电视方言节目。

返回目录

我的写作老师陈企霞

—杭州大学中文系 63 级 金城濠

陈企霞先生是我大学的写作老师。他没有什么长篇巨作，但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要记一笔的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反右运动”之前，有过一个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丁指的是以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女作家丁玲；陈指的是陈企霞。这个“集团”里还有冯雪峰、艾青等人。企霞是陈先生的笔名，从他的名字揣摩，又和丁玲女士一起，人们以为他是女的，其实他是堂堂正正男子汉。

先生上个世纪 30 年代与叶紫一起组织“无名文艺社”，《无名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叶紫的长篇小说《丰收》，使叶紫成为受到鲁迅重视的左翼作家。这至少也有他的好友陈企霞的一份编辑劳作在内。1942 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因为陈企霞在《解放日报》编发过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人要他检查交代。幸好当总编的博古出来说话，说稿子是他签发的，保住了陈企霞。五十年代“反右”中，陈企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5 年因怀疑一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匿名信是他写的，由追查“反革命”匿名信，又进而怀疑其历史。于是在 1955 年下半年将陈企霞隔离审查，囚禁九个月。解脱隔离后，陈内心激愤难平。他以嘲讽的口吻尖刻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话说得很偏激，这就是陈企霞。有人说他像一头公牛，毫不含糊地亮出他的犄角。

天真的陈企霞以为一切都雨过天晴了，还自责不该一度有那么大的委屈情绪。可是不到一年，他又成了右派分子。

反右结束后，他被下放到杭州。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还算开明，想让他到《东海》杂志社去。他考虑到自己右派的身份连党内文件都不能看，怎么编杂志呢？于是来到了这位副书记兼任校长的杭州大学。杭大的负责文科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是林淡秋，他原来是《人民日报》负责副刊的，因为编发过右派分子徐懋庸的言论，被调离报社来到杭州。陈来杭大当天，林淡秋就伸出手：这不是老陈吗？中文系系主任

是叶克，领导告诉他陈企霞要来。他说：陈企霞？好啊，这个人我知道，我是他的学生。写作教研室的主任是马骅，马先生解放前参加浙南地下党活动，解放后也受到不公正待遇。

陈企霞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的杭州生涯。他住在道古桥边一个三居室宿舍里。宿舍和杭大隔一条河，我们都把那里叫做河南宿舍。姜亮夫先生、夏承焘先生、孙席珍先生都住那里。听说，由于这些老先生住过，现在那里已作为名人旧居保护起来。

应该说直至文革发生之前，陈企霞先生的生活还是平静的。1964年秋他教我们写作课。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过李准的《不要走那条路》。李准是他住北京时的邻居。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教些什么我们忘了。他给我们批改过作文，也荡然无存。只记得他来上课往往是酒后，大概微醺时讲学发挥最好。一下课他就走，从来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和我们聊天。我们都称呼他“陈先生”。在中文系里，只有老教授被称为“先生”。一般的中青年教师叫老师。称他先生可见大家对他的尊敬。

文革开始了，首当其冲的被冲击的是林淡秋和夏承焘，那时有个所谓“林夏战役”。后来由于江青姚文元的“指示”，陈先生被当成重点。江青和陈企霞过去同在陶行知的一个组织里活动过。江青演过抗日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陈也客串过角色。江青演《大雷雨》里的卡捷琳娜，还送票给陈要他捧场。到延安后，已经成为毛夫人的她还曾在桃园宴请过陈先生和夫人郑重。正因为陈企霞知道江青那个时候的底细，所以文革中江青就置陈企霞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陈企霞就受到比一般“牛鬼蛇神”更为严厉的对待。一次，杭大造反派在健身房里召开批斗大叛徒大右派陈企霞大会，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来拍电影。在校的中文系同学都要去参加。记得，当时造反派问他，你是不是大叛徒。陈企霞回答：我不是叛徒。在当时，能敢于抵抗的人恐怕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造反派上来打他，眼镜打飞了，嘴边打出血。他还是坚决地说，我不是叛徒。陈企霞是硬汉子，文革以后，许多老师都这么说。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同学，是我低年级的同学，是复员军人来读中文系的。因为是低年级，都没有上过老先生的课，一点也没有师生情谊。有一天，那个同学对着一群“牛鬼蛇神”来个打人取乐，挨个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刮过去。轮到陈企霞时，陈严厉地一声：慢，我也许打不过你。你这样无缘无故地打人，我是要反

抗的，即使拼命我也会的。那同学说，毛主席的红卫兵不吃你这一套。陈说，你这样的红卫兵毛主席是不要的。那同学说，毛主席不要谁要。陈说，希姆莱要。希姆莱是希特勒手下的盖世太保的头目。在旁边的“牛鬼蛇神”们吓了一跳，怎么能和红卫兵顶嘴呢。同学问希姆莱是谁？陈说希姆莱是谁你不知道，你书读得太少。

对付造反派，陈企霞一直表现一个硬汉子的形象。还有一件事情，我只是听说，我同年级二班同学吴伯洪亲历其事。在先生去世二十年祭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刊登《文汇报》。我把它摘录如下：

我于1963年下半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第二年就在写作课中听陈先生的课。早就耳闻陈企霞先生大名，终于能亲聆教诲，何等欣慰！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一次，在例行“批斗”之前，造反派去陈先生的房间揪斗，想再榨一点材料方面的“油水”。陈先生的房间挂着一幅国画，画面上一只鸚鵡，左上角题写一句话：“汝好对人言，有话不与汝说。”我忘了画的作者是谁。这本是一幅有幽默色彩的小品，但在欲究其罪的造反派眼里，这幅画也成了陈先生的罪证：“鸚鵡影射谁？你有话不肯说，究竟要对谁说？”硬要陈先生“交代”。陈先生能说什么？也许他是不屑于说，始终一言不发。造反派由气愤转为暴怒，殴打了陈先生。我目睹这一幕，内心十分难受。但陈先生那种坚定从容的态度，我至今难忘。

我的同班同学叶九如也是非常敬仰陈先生的为人。他在省电大教授古典文学，业余花了好长时间收集材料写就《陈企霞在杭大》一文，发表在1979年的《江南》杂志上。他还特地寄我一份，我至今保留着。杭州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我们相聚杭州。他同我说，还要写杭大的另外两个“陈”姓右派分子，即《工作着是美丽的》作者陈学昭和浙江省前省长沙文汉夫人陈修良。陈修良原来是浙江师范学院（杭大前身）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后来也成了右派。我很赞赏他的写作计划。我说，写好个人就是从一个侧面写党的历史，是正史的重要补充。建议他扩充成《陈企霞传》，写的时候要站得高，从一个前人没有过的高度，审视中共党史。他说退休以后再写吧。可惜天不假年，话说后，他第二年去世了。

陈企霞先生在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平反调回北京。这个年轻时敢于和当权者毫不含糊地亮出犄角的牛，别人以为他总会说些什么。他说：“周扬同志已经认错了。他在四届文代会上当众讲的，你们都听见了的：‘陈企霞同志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他与我有不同意见，我就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我现在诚恳地向他赔礼道歉。’人家认错了，你不能得理不让人啊。”

何等豁达！这是一种胸怀。他晚年有人劝他：你的经历见证了我国文坛两代人的坎坷遭遇，应该写点东西留给后人。他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可写的？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尤其不愿意谈论个人的冤屈，他说过别总舔自己的伤口。但是，他对中国文坛上的三个人却念念不忘，几次说想为他们写点东西，替他们述说当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三个人是：王实味、丁玲、萧军。

这三个人死了，想写这三个人的人陈企霞先生也死了，想继续写陈企霞传的叶九如也死了。被写的人死了，写的人也死了，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

[返回目录](#)

往事如烟散不尽 岁月留痕总是情

—忆微分几何学大师白正国先生

—杭州大学数学系 83 级 伊勇

秋月朗朗，夜风徐徐，我坐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随着文字不断出现在屏幕上，我的思绪追随着手指的节奏，离开了我的身体，穿越牖户纱窗，跃过星空寂落，来到了西子湖畔、葛岭山下的那个绿树环绕，芳草萋萋的美丽校园—杭州大学，再现了三十二前那个艳阳冬日下午的情形。

那是 1987 年 1 月，学校根据当时的形势，开展“师生交谈”活动，要求每个系派至少一名老师到学生宿舍，与学生作现场交流。

那时我的寝室在 11 幢 3 楼。那些天，我们寝室的室友于 23:00 熄灯后，一阵瞎扯，猜想哪位老师会来我们寝室。说着说着，一个个就这样迷糊地睡着了。

几天后，我们接到通知，来我们寝室的是白正国先生及水乃翔副教授，时间是第二天的下午 13:30。这可把我们乐得合不拢嘴。白正国先生是微分几何学大师，虽然那时已经从数学系系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可仍然受到海内外数学界的敬仰。白正国先生能来我们寝室，实在是我们的莫大荣幸。我们这些平时不注重生活小节的理科男生，一致同意：在座谈会那天午饭后的 12:00 统一行动，把寝室收拾干净。每个人首先擦净自己的桌子，叠好被子，平整床铺。然后分工合作，打开水，洗杯子，扫地。我另有任务：贡献茶叶。等一切安排妥当，时间已过 13:00。我们就安静地坐在寝室里等待白正国先生和水老师的到来。

忽然，过道上传来一阵缓慢的脚步声，我们大家感觉到是白正国先生和水老师来了。我们几个赶紧走出寝室张望，果然是他们俩。白正国先生在水老师搀扶下，慢慢向我们寝室走来。等他们步入寝室时，我们所有同学起立拍手，热烈欢迎。白正国先生、水老师打算坐在硬凳子上。我们同学请白正国先生、水老师坐在进门左侧第一个下铺

（宋万祥同学的床铺）。白正国先生打量了我们寝室，说一个寝室住八个人，是挤了点。我们几个答复，比起住在八栋，住宿环境已经好了很多。

闲聊中，当水老师介绍白正国先生是入学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时，我一下子来了兴趣，问到：白教授、水老师，你们看过《流亡大学》吗？白正国先生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流亡大学》电影，这部电影只拍出了“流亡”，没有拍出“大学”。听完他说的话，不仅我们感到愕然，连水老师也感到惊讶，问白正国先生：《流亡大学》电影，怎么没有拍出“大学”？白正国先生说：我们在迁徙途中，仍然坚持学习。那时我们这些学生穿着战时军训的服装，腿上打着绑腿。学生可以搭乘火车，但只能坐在火车顶上。只要一歇停，我们就抓紧时间学习。我问：白教授，火车遇到隧道，不怕有人被隧道挤下车顶吗？白正国先生说：有人在车顶上望风，看见隧道就高喊，同学们就赶紧趴在火车顶上，安全穿越隧道。教师们都在车厢里。听完白正国先生的回忆，我们不禁加深了对这位前辈的敬意。

水老师问我们最关心什么？我们回答：我们最关心毕业分配去向。水老师向白正国先生说：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地理系有位学生，是东阳县人，不愿意回东阳县，想留在杭州。于是他通过关系，让东阳县人事局把档案退还给学校，说是东阳县没有学生分配名额。学校已经分配完毕，拿到退还的毕业生档案，又无法分配，问那个毕业生，他是否愿意去后勤处膳食科，做食堂管理。那个毕业生当然愿意，现在已是膳食科副科长，吃得满面红光，走路脸面朝天，远比白正国先生和水老师神气。我们只好捂着嘴巴笑。白正国先生却不乏忧心地说：乃翔，如果在文革，你的这番话语会被学生批斗，同学们千万不可外传。我们同学异口同声表示，绝不外传。

时间在愉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交谈结束时间到了，我们同学把白正国先生、水老师送到楼梯口，依依不舍地挥手向他们告别。白正国先生、水老师频频回头向我们同学致意。

同年6月末，我们毕业离开了母校杭大。1987年，正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走出书墨飘香的大学校园，扑入滚滚

的时代潮流，校园生活离我们渐行渐远。多少年过去了，虽不常想起，却也无法忘记学生时代的情景。有人说：“时间会消磨一切”。然而，有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从记忆的模糊印象一步步放映成脑海里的清晰场景。白正国先生与我们交谈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在水老师搀扶下白正国先生从时空隧道深处，再次走进我的心灵。2015年2月6日，我得知白正国先生于1月27日凌晨去世，心中十分悲痛，在微信朋友圈以《一代宗师 风华永芳》为题，转发悼念文章，以示悼念之情。

[返回目录](#)

往事难忘

——忆冯昭珩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授 许高渝

明天是敬爱的冯昭珩老师的忌日，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冯老师于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语组（即英语专业）。新中国成立后，浙大创办俄语组后，他立即跟随德梦铁教授学习俄语。不久，被派到北京俄专进修。回校后，主要从事俄语教学工作，曾兼任外语系多个教研室主任。文革后，出任系副主任、代系主任并担任浙江省外文学会、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1986年起任教授。冯老师对浙江省外语教育事业、杭大外语系和俄语专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骄人的成就，受到校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推崇。

冯老师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几十年过去了，他对我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他好学善思的形象至今历历在目。本文略叙几件我亲身经历或了解的往事，以表达对冯老师的无限怀念之情。

一次难忘的情景

1961年一天的下午，外语系为开展外语口语运动在252大教室召开了一次师生讲外语誓师大会。先由时任党总支书记徐晚华同志做动员报告。她用汉语讲，同时安排了英语和俄语老师各一位进行即席翻译。冯老师被选中担任俄语翻译。报告开始时，是徐书记讲几句，然后翻译。后来，她大概忘了讲话后应停一下，让两位翻译成外语，再由她继续讲，结果讲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这自然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当时坐在大教室的前排，暗暗地为冯老师担心。但他并没有为此犯难，而是从容不迫地把徐书记的大段讲话完整地翻译了出来。这次外语誓师大会上，冯老师所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至今让我敬佩万分。

一篇关键的发言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社会对俄语的需求急减。文革结束后，南方大部分学校的俄语教学处境依然十分艰难。杭大俄语专业从1975届毕业后，已有五年没有招生。每次向省里要求招生，均因毕业后难以分配而未同意。系里俄语教师或改教其他外语，或承担一些翻译任务。当时教育部为了调整全国俄语教育的布局，于1981年4月26日至5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高校俄语教育座谈会。有61所学校的代表与会。座谈会由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傅克同志主持，教育部周林副部长也到会讲话。这次会议确定了全国俄语教育今后的方针和任务，详细研究了高校俄语专业的调整和规划，着重讨论了高校俄语人才的培养工作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时任我系副主任的冯老师应邀出席此次座谈会。他在会上汇报了我们俄语专业自1949年8月就开始创办（当时还是在院系调整前的老浙大）的历史和现有的师资情况，并提出了一个具体恢复我系俄语专业招生的改革方案。他的讲话在与会各校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教育部有关领导也十分重视，使原本内定全国仅16所院校招收俄语专业的计划得以改变。会议之后，教育部于同年7月18日发出了《征求对高校俄语专业调整工作初步设想的意见》，提出拟在现有的57个专业点中确定26所继续开设俄语专业，我校亦名列其中。教育部召开的俄语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5月3日），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我校当选为该会首届理事单位，冯老师担任首届理事。冯老师回校后，我们大家都赞扬他在座谈会的发言，为我校俄语发展走出困境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举措

文革结束后不久，冯老师被任命为外语系系副主任，分管全系科研和青年教师培养以及研究生、外文学会等多项工作。

1981 年秋，外语系办根据冯老师的要求，由我担任他的秘书。次年 10 月，因我出国而改由其他老师兼任。当时外语系的教师队伍中，有一大批 1973-1979 年毕业留系任教的青年教师。他们因为受文革期间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急需继续提高学术水平。但由于教学工作需要，一时又无法派他们到外地进一步深造。而本系研究生招生名额极其有限。如何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成为系里一个棘手的问题。冯老师和系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通过边工作，边进修和系统读书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具体做法是先通过开座谈会，了解这一批青年教师的想法。我至今保存着他要求我起草的开座谈会通知的底稿。

座谈会在 1982 年 1 月 6 日举行。接到通知的沈长先、岑罗珠、李凤祥、应爱娜、柴小平、林志平、葛藤、沈永年等 14 位老师准时到 255 教室参加会议，并踊跃发言。在老师们发言后，冯老师等系领导讲了话，对他们提出了在职进修、系统读书的要求。座谈会结束不久，系主任鲍履平教授特地为英语青年教师举行了一个讲座，详细介绍了系统阅读英国语言和英美文学的书目，希望他们通过系统读书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之后，系里还调整了英语教研室的建制，为英语部分青年教师结合教学专向进修提高创造了条件。后来实践证明，当时在职进修、系统读书这一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句使我清醒的批评

1982 年 4 月，国家教委有两个赴南进修的名额给我们学校，年龄要求是 45 岁以下，外语要求是懂俄语。当时外语系和校内其他单位共有六名老师报名，经考试（听译和写作）选拔后，决定将我和外语系的陈纲老师的材料上报国家教委。接下来是老师写推荐书（用俄语书写）。我请冯老师和经济系的谢瑞淡教授担任推荐人（因我赴南进修国际经济法）。冯老师的一份俄语推荐信要我自己先起草，谢瑞淡教授的一份他也要我翻译。我当时已经改教英语多年，俄语有些生疏。我把两份俄语推荐书交给冯老师审查。他看了一遍，察觉推荐书中有几处俄语动词的时体用得不准确，就对我说：“许高渝啊，你时体用

得有错啊，要再下些功夫呐。”当时冯老师说话的语气虽然比较婉转，但我听出了话外之音。这是一句让我清醒的批评。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把这句话看成是冯老师对我的鞭策，对我的期许。对我而言，“下些功夫”这句金玉良言不仅仅需要用在俄语时体的用法上，还应包括做人做事的其他许许多多方面。

一声暖心的鼓励

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和哲学学院进修两年后，我于1984年10月回到外语系工作，除任教俄语外，还兼任外语系系副主任，分管科研、财务和俄、德、日、汉等教研室。在上任后的一次全系大会上，我对全系今后的科研工作的发展作了一个发言。大会结束后，刚走出252大教室的大门，冯老师从后面走上来对我说，“你今天的发言不错。”这句短短的鼓励像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使我感动万分。我知道，冯老师是一位对己对人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人。他讲的这句话，既是鼓励，更是期望。过了不久，他要我代他参加全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会议，并向理事会建议由我出任理事。他对我说，“你现在是系里负责人。你去担任理事参加会议更加合适”。冯老师不仅用言语，而且用具体的行动展现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待。

一本珍贵的赠书

1988年11月，冯老师送给我一本由他和顾惠生老师翻译的《书的故事》，扉页上有冯老师的亲笔题赠。冯老师翻译过许多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他赠我的这本《书的故事》实际上可称为一部俄国书籍史，其中介绍了许多俄罗斯古旧书刊和藏书家收藏的珍贵孤本，展示了俄国文坛以至政治、社会的广阔背景。正因为如此，没有对俄罗斯文化广博的知识是难以胜任这本书的翻译的。我从由吴道弘先生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前言中还得知，冯老师在翻译该书时即使“因病仍没有

放下译笔，坐在病床上垫着木板一字一句地翻译……”除了书的丰富内容和冯老师翻译该书所表现的认真态度和顽强毅力外，我之所以把冯老师和他夫人顾老师翻译的这本书视为珍贵的赠书，还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书，是懂得我的心的人。

回顾我 77 年的人生历程，最感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他们关心我、爱护我、引领我，培养我，严格要求我。遇到困难会帮助我，我做得不对会及时指正我。他们是我亲人之外的亲人。冯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2019 年 9 月 8 日）

[返回目录](#)

质朴的仁者——魏得良老师

—杭州大学历史系78级 黄朴民

在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上，总会遇上几个能够让自己离开时思念，见面时欣慰，成功共同分享，忧虑一起承担的好人。在他们的跟前，你可以谬托知己，可以全身心放松，可以展现自己的本色，可以暴露原先刻意地掩饰着的缺点。总之，完完全全恢复自己的自然本性，彻彻底底摆脱利害的缰绳束缚。有了这样的人做导师、做朋友，那你这一辈子就算有福，就不算白活。

对我来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魏得良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

初次见到魏老师，是在1978年11月初的历史系新生欢迎会上。当时他就给我和我的同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印象说白了，就是一个“土”字。我们无法想象，在大学里居然还有这样纯朴得像泥土的老师：黝黑的脸膛，花白的头发，携带一把市面上几乎绝迹的旧黄油布雨伞，身着灰白驳杂的中式对襟棉袄，活脱脱一位憨厚木讷的农民大伯形象，与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大学老师潇洒优雅的风仪真的一点也沾不上边。他的发言也和其他那些老师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动人心的鼓励，只是直截了当介绍了他承担的那门《历史文献》课的课程安排，以及学生应注意的事项，简朴实在，平易自然，就如同他本人的形象一样。

就这样，魏老师走进了我的生活，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从此增添了一重平凡而又有悠悠长回味的师生情谊。

魏老师主讲的是《历史文献》这门基础课。这门课的宗旨，是通过读重要历史文献篇章的阅读和理解，让历史系的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史料，培养起运用史料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能力。整个课程前后两个学年，是历史系学生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即进入中国历史宝库的一把开门的钥匙。

魏老师以他固有的质朴风格讲解这门课程。他讲得很认真，但丝毫不渲染，只用平直、朴素的语言顺序渐进、按部就班把一篇篇古文

献予以串讲疏通，帮助同学真正读懂课本上所载的文献内容，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增添阅读古代文献的兴趣，提高鉴别和运用史料研究历史的能力。由于魏老师授课从不追求轰动效果，从不横拉直扯掺入一些趣闻轶事，语言朴实无华，所以初听起来，颇有些平淡，甚至单调。然而时间长了，你就能咀嚼出它的深厚滋味，发现它的确蕴含着博大实用的学问，可以让你从中受益无穷，学业精进。我始终认为，自己今天能够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稍许的成绩，与魏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息息相关。

如果我与魏老师之间仅仅限于这样一层关系，那么就只能算作一般的师生，没有必要特别费笔墨追叙。魏老师之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乃在于他的品质、他的人格帮助我懂得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境界和做学者应有的操守。与知识相比，它们更让人受益无穷！

大学四年，我除了听魏老师讲授的《历史文献》课外，还曾选修过他开设的选修课：《左传选读》。可是在此期间，或许是我的腴腆内向，或许是我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我没有引起魏老师的太大注意。双方之间也就是一种普通的教与学的关系，谈不上亲切的私人情谊。我同魏老师的相知相交，关系出现质的飞跃，乃是在我考取历史系黎子耀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之后。从那时候开始，迄今十六七年，彼此间的心扉渐渐向对方打开，真正融入各自的生活。

这里，我既不想揣度自己留给魏老师的印象，也不愿妄测魏老师对我这个学生的具体感受，只希望把自己心目中的魏老师形象，浓缩成寥寥几笔，告诉我所有的朋友。

魏老师的宽厚在杭大历史系中是出了名的。外校的师生只要同魏老师有过接触，也一样会有深切的感受。与人为善，自甘吃亏是他生活的准则。我与魏老师交往近30年，彻夜长谈不计其数，可就是没有见过他在我面前臧否过他人。即便是在晋升教授一事上，系里有个别人玩些手法，想把他挤兑掉。他知道实情后也没有动气，更没有站出来斥责对方，而是主动替对方着想。认为名额有限，对方为了一己利益打击、贬低他人，虽不怎么道德，但亦可以谅解，不必计较，伤了和气。这可谓真正的“恕道”！

在书稿的署名、课题的承担、稿费的分配这一类敏感易起风波的问题上，魏老师的宽厚和谦让也是有口皆碑。他始终觉得，大家合作一次很不容易，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利益的分配而闹什么不愉快，所以他总是承担最艰巨的任务，负责最具体的工作，以自己的默默劳动和无私奉献，确保一些大型合作课题的最终成功，体现了一个忠厚长者的风度。

我曾因研究生毕业分配一事上遭遇不公对待而状告某主任。对于我这种年轻气盛的冲动行为，魏老师心里恐怕是不以为然的。然而，他却宽容地予以了理解，没有任何的指摘，一如既往接纳我，并耐心聆听我的抱怨和牢骚。这的确让我倍受感动。在魏老师待人接物中所体现的宽厚精神面前，我不禁为自己的冲动之举而多少感到脸红。

胸襟的广阔，性格的宽厚，使得魏老师在为人方面处处表现出真纯的质朴、至挚的诚恳。这一点上，我有极其深刻的亲身体会。自从我考取山大王仲荦先生的博士生后，我每次回绍兴探亲都取道杭州中转。每一次在杭州中转时，都选择魏老师家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和他的家人从来不以我的打扰为麻烦，而总是以最亲切，纯粹家庭成员式的态度欢迎我的前去，使我感受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般的放松和愉悦，无拘无束，潇洒自在。日子一长，几乎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我往往在不预先打招呼的情况下，扛着大包小包冲撞进去。魏老师在惊喜之余，安排我稍事休息。尔后我就和他确认是否在他那里吃饭，说明晚上要回他家里过夜。我提要求毫不迟疑，他满口应允也平易自然，彼此丝毫不讲客套。于是我便从他那里借得一辆自行车，在杭州城里疯跑，拜访师友，处理琐事。通常总要忙乎到晚上10时以后才回他家，就如同倦鸟返巢似的。魏老师每一次都是家中等着我。待我进门后，先送上一杯预先泡好的清茶让我解渴，然后递上烟卷与我叙说家常。一聊就到12点钟以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准备好可口丰盛的早餐。待我用毕后，再用自行车驮上我的大包小包送我赶路。这样的情景，几乎是每年来一个轮回。他从来不为之而有丝毫的厌烦，始终是做得那么亲切，那么自然。

魏老师的达观和坚忍同样令我肃然起敬。由于种种原因，魏老师的境遇并不太好。师母没有正式的工作，家庭也数遭不幸，可谓经历坎坷、忧患迭至。可他始终没有被人生的厄运所压倒，总是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忍战胜困苦，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正气。这种顽强是最可珍贵的，它使得魏老师能够以泰然达观的态度直面人生，能够以律己恕人的原则积极处世，能够以发愤勤奋的姿态投入工作，能够以宽容诚挚的品德赢得尊敬。在魏老师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所有传统美德。他是小人物，然而他的人格和情操足以成为每位读书人的楷模！

我与魏老师的交往，可以说已经不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而纯粹属于心灵的沟通、精神的慰藉。有这样的老师做自己的朋友，我感到自豪和幸福！

[返回目录](#)

一张试卷中的历史记忆

——黎子耀教授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1982 年，我很侥幸地考上了本科就读的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导师是黎子耀教授。

说“侥幸”，并非矫情，因为我入学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中国通史、历史文献等科目考出较高分，政治一门更取得了 76 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这门科目面前，当年的及格线也就 45 分。可是，外语是惊悚过关，不多不少 60 分。而专业课先秦史，只得 56 分。好在总分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录取。说句实在话，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 6 位校内外考生就不如我幸运了，2 个名额只用掉了 1 个，我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后来，我曾询问过子耀师，为什么他的给分手这么紧？子耀师答：于先秦史，我自己也就 60 多分的水平，给你 56 分已是很高的分数了。难怪乎，子耀师经常会给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数，20、30 分很正常，最低时曾打出过 8 分的成绩。要是换成在今天，子耀师是招不到学生的。可这就是当年老一辈学人的风格。

那一年，子耀师已是 78 岁高龄，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除老主任沈炼之教授之外最年长的一位老师。他的年龄，加上当时没有必须在教室里上课之类的硬性规定，所以我的硕士生专业课程都到先生家里上。刚开始时，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师兄周鹏飞老师也一道旁听，后来他回陕西上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子耀师对我讲：每周一次，我讲的内容你消化不了，两周上一次课稍稍从容些。于是，我就每半个月上先生家聆听教诲。

虽然上课的密度不高，可学习的压力却相当的大。子耀师的课是互动式的，我不但要带着耳朵用心地听，也要开动脑筋借助舌头专志地答。他在下课前会宣布下堂课将讲授的主题，并布置相关的课前准备要求。所以，偷懒是不成的，糊弄更是连门也没有。所以，下了课

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跑图书馆，老老实实为两个星期后的课程作准备。

记得有一次为对付夏代文化的课，我在学校图书馆整整泡了10天，竭泽而渔，将当时有关夏文化的专题研究论文通通翻看了一遍，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了提要，梳理线索、归纳观点、并加上读后心得。这样才在接下来的课上勉强过关。

子耀师最为推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是屡试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录在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点讲授与讨论的内容，连讲四次，几占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

我读《观堂集林》，更喜爱读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论》，曾问先生为何不讨论该文。子耀师答道：该文恢宏壮阔，气势磅礴，纲举目张。但是宏观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头头是道、义正辞严，但往往理大于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静安，也难以避免。该文有启示，但可商榷处亦不在少数。初学者宜从根本做起，夯实基础，尤其要端正学风，专志笃实，切忌好高骛远，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开大阖是学者晚年的事，至于初学者，倘若一开始就进入和效法，那便是误入歧途，缘木求鱼了。当时，先生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半吊子文人习性还是让我过早地告别了传统的治学之道，率性而为，写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实在是愧对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深感失望，斥我顽冥不化，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学期很快也就过去了。子耀师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课程也进入了尾声。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虽说是自由开放，但再自由、再开放，期末的考试这个程序还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师就按学校的规定，命题对我进行考试。

我很幸运地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年出的“先秦史专题研究”的考试题目。它没有印刷，而是在一张64开的小纸片上的手写稿。四道试题今谨抄录如下：

- 一、《国语·鲁语》载虞、夏、商、周吉礼，就中所言殷礼在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否？
- 二、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的王亥，结论如何？有何证据？
- 三、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土地转让情况如何？
- 四、试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来和现状。

我现在也忝居高校教师之列，也时不时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位老师的水平高下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多余的遐想。因为，老师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够得到反映的。讲课精彩、成果丰硕固然是水平，考试出题到位同样也是水平。子耀师的这张试题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细加体味，子耀师的四道题，把握了先秦史学习与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环节：第一，先秦史学习中内容重点的掌握问题；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领的掌握问题。

就先秦史学习的内容而言，夏文化探索，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礼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孔子云：“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故讨论殷礼，并进而认识西周礼乐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远，复原真相最为不易，从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谱系入手，则是最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工作，连殷商的历史都能复原，遑论其余？实可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演变的基础。把握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则整个社会形态的递嬗及其规律、影响亦能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子耀师的这份试题也同样渗透着他高明的治学理念。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预流”。众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难题，一是资料贫乏、文献遗阙；二是有限的文献

资料真伪混糅、年代界定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术界特别重视用地下考古发现新材料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换言之，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确确是无可动摇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确途径。

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1925年有明确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总论》）陈寅恪先生后来更简洁地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是一种把新出土或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服膺，被公认为一种高度科学的学术正流。

子耀师对文献熟悉的程度是惊人的。98岁辞世前，在双眼患白内障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义》、《老子密义》等多部学术专著，全凭记忆旁征博引各种传世文献。但是，他一样很关心和重视地下考古新发现，而且认为初学者尤其要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为起点，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为此，他不但在讲课过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强调，而且也在考试中有意识地予以倡导。四道试题，都包含了“二重证据法”方法论运用上的具体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的案例。这种良苦用心，是他对学生负责的生动体现。至今念及，犹为泫然。

30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回答这四道试题的，也不清楚子耀师当时是否满意我的答案，究竟给我这门课的考试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则我在1985年也就无法正常毕业了。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试题，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手中难得的子耀师遗墨。这张试题纸颜色已渐渐转黄，质地也越来越松脆。

可是我脑海中子耀师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情怀，他的境界，永远是我这个做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张小小的试卷，贮存着太多的历史记忆，让我睹物思人，无法自己！

[返回目录](#)

哲人夏基松

—杭州大学哲学系 88 级研究生 董绍林



夏基松教授，米寿（八十八）又四年了。夏先生 1925 年 5 月出生在杭州，他的老屋在现在的庆春路大学路。

在杭州小和山的青山翠谷里，见到夏先生。除了腿脚步伐有些迟缓之外，他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记忆力惊人、反应奇快，更重要的还是：胃口奇好。

（一）

夏基松 1943 年在杭州参加统考录取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当时全校学生也不

超过 500 人。

1945 抗战胜利后，政府对南京各大学的学生进行甄别，还要重新参加考试。后来，这批学生分别进入中央大学和安徽、上海、北京等地大学继续学习。夏先生因为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良好，得以继续留在中央大学学习，直至 1948 年毕业，留校政治系任教（后来并入南京大学）。从此一脚踏入哲学世界。

1952 年，苏联专家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夏基松先生以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的身份被选拔参加两年的研究班进修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要骨干。

反右时期，夏先生因为还是普通教师，倒也还没有受到冲击。但到文革，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北京第一张大字报后，南京的政治斗争激烈，大字报也铺天盖地。随着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的立即倒台，哲学系的夏基松也与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的一帮学术权威上了体育场主席台的批斗大会，随即被隔离，劳动（开始学会插秧割稻、放牛放羊、打扫厕所）。他做事认真，为了把厕所打扫得更干净，还回来

向化学系的夫人要来盐酸，清除一些污垢顽渍。他还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建设、参加安徽煤矿坑道挖掘、填湖造田等强劳力的劳动改造活动。

在文革近十年时间里，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地参加劳动，间隔才能回到家里一点时间。当时他觉得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误解总会过去，运动总会过去，所以他总是比较自觉地接受改造。正因为有这样乐观良好的心态，他从来没有产生自杀这样的念头。劳动后，每晚还能睡得很好。而同时，南京大学各系有不少老师受不住折磨而自杀的。当时夏基松的夫人沈老师也因为诊断为肝炎要传染，反而不让参与各项运动，躲过了一劫。

谈起文革期间对他抄过家、举过报、斗过人的一些同事、后辈，先生总是与人为善，淡然大度，宽厚待人，甚至在以后不同的职务、职称等重要关键点予以关照提携，不苛求责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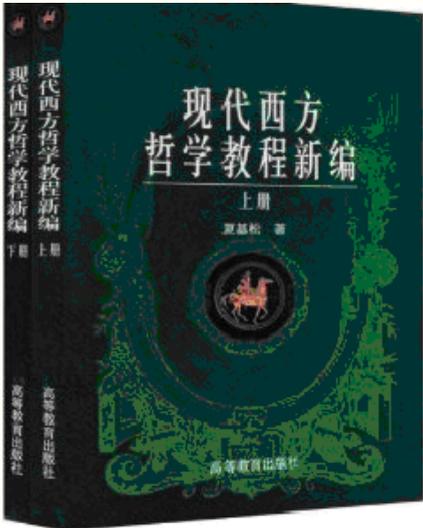
文革期间，西方哲学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得益于当时南大“英美文化研究中心”已购进的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书籍，夏基松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和研究。这些积累使得他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深入并结出硕果。

1977年他最早在《光明日报》发表十几篇系列文章，以连载的形式，系统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开始西方哲学在中国大陆的扫盲和普及工作。

1978年他又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两期全国高校现代西方哲学师资培训班，担当起培养国内中青年学者的重任。

1979年全国第一次现代西方哲学会议召开，他在会上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的专题报告。这次会后，标志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正常的轨道。

当时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的高校教材。



在现代西方流行的几十个哲学流派，近百位哲学家的学术思想，才得以在国内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之后又相继写作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当代西方哲学》等新教材，成为国内高等学校主要选用教材之一。夏先生的其他著作如《波普哲学述评》、《当代西方哲学述评》、《西方科学哲学》、《西方数学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都是引领学术之先，成为国内的最高研究水平。主编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曾经获得

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夏先生总结认为，1830 以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各自的分化，逐渐出现趋近、会通和合流，其分析纹路清晰、鞭辟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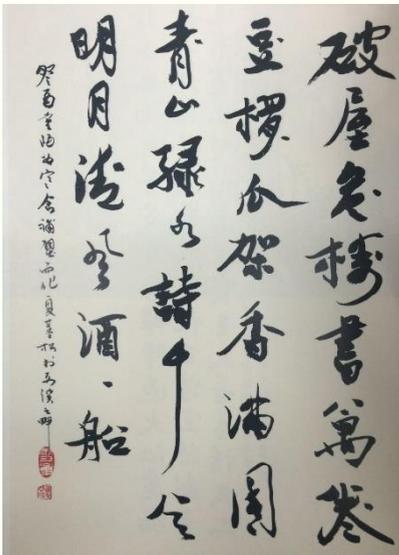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夏先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现代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并入选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成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兼华东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长等。

（三）

夏基松希望归根故里，回到杭州西子湖畔。时任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善洪则希望加强西方哲学的科学建设，双方一拍即合。南京大学依依不舍，但只能尊重这位老系主任的意见。1989 年他到杭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而当时原来在南大带的博士生也随后全部转“户口”到杭大。浙江省第一个哲学博士点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杭大增补起来了。

那时杭大教师住房条件普遍很差。夏先生在南京大学已是公寓楼房。但到了杭大，学校也有困难，就在河南宿舍（杭大新村）安排了一

个很老的两层小楼，他住一楼，恰有个小院子，可以种花养草。为此，他还自嘲书写了一诗：“破屋危楼书万卷，豆棚花架香满园。青山绿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虽居陋室，但风雅依旧。



杭大的教师和学生对夏先生的学问钦慕十分，因为当时夏基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江湖地位已然显赫，也担任了多年的国务院学位审评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也一如既往地淡泊，对学校、对系里从无过分的要求。

因为高校普遍使用他的教材，特别是考研究生、博士生，必然成为主要参考书目，夏基松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也很大。听过课的本科生不算，正式拜入门下的硕士、博士 50 多人，现在都已成为全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力量。到夏先生最后一个博士生出关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桃李芬芳，下自成蹊。

（四）

先生早年喜画，自己也偶尔操笔写意，颇有些功底。下图墙上的《骏马图》就是他的画作。奔马生动灵气，惟妙惟肖，颇有徐悲鸿画的意境。



因为国立中央大学的做派，夏先生的穿着比较讲究，出门总要收拾得体，整整齐齐，头发一丝不乱。晚年了，就多了个防寒的帽子。

夏先生有一子一女，现在都在美国东部的纽约、

新泽西。近年来，长途飞行总是有许多不便，他也再没有去享受那里的空气、房子、森林和天伦之乐。杭州城里住得久了，特别是夏天，



他们会常住城西的小和山里，因为那里有山、有树、有好空气。

2015年的重阳节，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还专程去小和山拜访看望了夏老师夫妇。

（五）

当年夏老师和沈老师先后留在南京大学任教。夏老师在政治系，沈老师在化学系，但同住一幢宿舍楼。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楼的夏基松和二楼沈斐凤就这样成为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对神仙眷侣。这些年来，好在有他夫人沈老师的精心照顾和一干弟子的关心，夏先生颐养天年，悠闲自然，还不时有新版著作面世。



2016年又恰逢他们结婚六十周年的钻石婚，一甲子的相知相守，夕阳黄昏，却是人生最美不过的风景。

哲人高寿，信之！

惊闻夏基松先生因病2018年2月9日于浙江医院病逝，享年93周

岁，不禁唏嘘，愿夏老先生一路向西，平安吉祥。

[返回目录](#)

闽人陈村富

—杭州大学哲学系 88 级研究生 董绍林

大学必有大师，大师必讲大道；所谓大学之道，无非如是。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州大学门口的杭大路还十分狭窄。公交车两车交汇都有些困难，但两边的行道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那时的世贸中心还是稻田，黄龙体育中心则是奶牛场。当时的杭大，有一大批老先生名冠中外，主要集中在古籍所、中文系、历史系、心理系、数学系、教育系、哲学系等等。在当年那批老“先生”背后，一部分当年的中年“先生”也开始出人头地，陈村富应是其中之一。

初识陈先生，是因为他课堂上的一口胡建发（福建话）让人难懂，总是让人要猜，然后再依据他的板书去确认。他拿着几张小卡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几堂课，堂后的消化则更要好几天。

（二）

后来才了解，他原来是福建龙岩人，就是如今那些遍布土楼成为旅游胜地的闽西山区。不可思议的是，他这么个山里人，竟然在 1955 年十八岁时考上了北大。更惊诧的是，祖上历代务农的陈家，五个儿子却在解放前后的十几年间，一个同济、二个北大、一个浙大、一个天大（天津大学），而且后来个个都成了教授、研究员。这陈家的祖坟，的确是烧着高香、冒着青烟了。

拿到北大通知书的时候，他正好在田里看水（农田插秧灌水）。喜悦之余，洗掉满脚的泥，匆匆上岸，开始整理藤箱，心却已奔向北京。

1960 年 7 月北京大学毕业后（那时候本科已调整为五年制），他又被推荐追随本校任华教授攻读希腊哲学研究生。任教授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解放前就任教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西洋出身的教授，

自然对外语的要求十分严格。陈先生回忆说，任教授随手拿了一本英文原著，翻开几页，让他读后现场翻译。好在前几年在北大本科英文班上积累的功底，任教授听了翻译后就当场录取了。

这样本科、硕士苦读九年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译丛》编辑部从事资料和编译工作。当时《哲学译丛》月刊英文编辑只有一人，大量的稿子根本来不及处理，必须增加英文翻译和编辑力量。每周要从几十种原版期刊中选题、翻译、核校、发稿，周而复始，压力很大。但极其锻炼能力，能够把握到当时世界最前沿的哲学研究进展。

工作初期，皇城根下的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即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各有后台的几派斗争激烈，学术研究基本停滞、刊物停办。不论学术权威，连普通人等也遭受冲击。

1970年起，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上千号人都被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季羨林在《牛棚杂记》中发明了“牛棚”一词来祭奠



陈村富与夫人邓仁菊的订婚照

干校）。陈村富一边参与打坯盖房，一边接受审查、学习改造，直到1972才结束干校集体返回北京。而在这期间，父亲去世不让回家，家庭异地不能探亲，整整四年半他与父母、夫人、儿子都没有团聚过。

即使回到了北京，但在当时文革后期的形势下，已无法进行研究。据他说，当时哲学所就一

下子走了十几个人。再加上长期夫妻两地分居，二个儿子尚幼，终于使他下决心在1975年底调回杭州大学任教。从政治漩涡中心回到相对安宁的江南，一方面全家团圆，另一方面重新归入研究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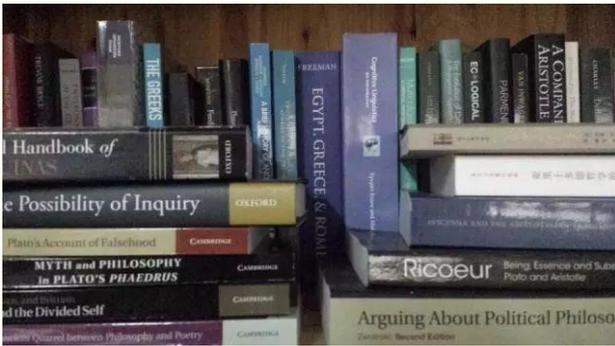
(三)

尽管在文革中失去了十年宝贵的研究时光，但一到江南温暖的境界里，陈先生厚积薄发，陆续在《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顶尖刊物发表一批学术论文。

我记得 1976-1986 他到杭大已工作了十年。60 年代的北大研究生毕业，国家级刊物的论文也有一把，但我们入学的时候，他只是个讲师，还没上副教授。除当时积累下来的职称欠账较多，名额较少之外，我隐隐觉得，可能也与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社科界主流对西方哲学的看法有关系。

但到 1986 年，他就被直接从讲师破格提拔成了教授，当时在杭大和浙江社科界也是属于轰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待兴，校园建设、学科建设、师资队伍都还刚刚起步不久，老一辈的确老去了，很多都已不能给本科生上课，中年一代的又大多没有能够接上，青黄不接。陈先生应该属于当时已经接上的一个。他后来几年又开始承担系主任职务，全面负责哲学系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

陈先生学外语的本事，令人叹服。原来在大学和工作的工具是英文，



后来从事英文翻译和编辑。“文革”初期，别人都去五湖四海大串联，他能避则避在北京各大图书馆边学德语，边读尼采、叔本华。到杭大后，又跟着严群教授（严复侄孙）学希腊

语和拉丁文。再后来，又因为要去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又从小学生开始，强化学习意大利语。有次去他家，见桌上、墙上、物件上，都贴上了意大利语单词，像极了图书馆资料室。

(四)

陈先生的学术道路主要是两条线路：

其一是古希腊哲学。代表作品是与汪子嵩等人合作历时 27 年的四卷五册《希腊哲学史》，420 万字，6518 页。每天读 20 页，都要读将近一年。他们这群“黄昏起飞的猫头鹰”终于在 2010 年 8 月第四卷出齐时到达了终点。这一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学者群体在全球完整研究古希腊哲学中“第二个跑完全程”。其中从第四卷起的两册则实际由陈先生担当牵头之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在《人民日报》发表“潜心钻研出精品——《希腊哲学史》出版的启示”文章。他认为这是“我国学者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扛鼎之作，学术质量堪与国外有关希腊哲学史的名著比肩”，“它为我国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并且在历来由西方学者统治的这一学术领域内为我国学者争到了一席之地”。

陈先生十分注重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语言学渊源和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研究古希腊哲学。他在《古希腊哲学为什么还值得我们学习?》（《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7 期）的最新文章中，他认为古希腊多达 20 个学派对智慧的不同创新追求，平等对话（dialogue）式话语系统造就了当时的哲学繁荣，并积淀于城邦政体和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求真、求是精神，这种理论思维和思维方式训练及语言表达方式，至今仍然是我们塑造理论研究良好氛围和提高全民素质的优质渊源。

其二是在杭大开创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这个研究完全是无中生有，而且当时的敏感背景下，研究宗教好像你就是搞宗教活动，需要较强的勇气。加上时任杭大校长沈善洪开明开通，大力支持。这样就慢慢地有一批学者、图书聚集起来，与海外的交流也通畅起来，逐步形成杭大文科的一个新亮点。陈先生结合基督教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实际，主持的《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宗教调查与研究》等课题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主编出版《宗教与文化》研究论丛系列，也开创了宗教文化研究的风气之先。

(五)

农民出身和从小劳作，练就他十分魁梧的体格。他身体底子极好。那时候温室效应还不明显，杭州的冬天又湿又冷，12月中旬就会下大雪。可是这位先生总是穿得比我们这些后生们还少很多。深秋时节，他竟然还是短袖、凉皮鞋，吓得我们自愧不如，又尊敬三分。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中年先生”，也变成了“老先生”，头发花白了好多。但他仍然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而且面色红润、中气十足，走路依然风风火火。

叔本华说过，人生如同一条用烧红的木炭铺成的跑道，中间有几处凉亭。每至一处，刚一歇脚，生命又逼使你离开凉亭，往前奔跑。在完成《古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全册的后记中，陈村富这样写道。我想，这恐怕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写照吧。

陈先生苦读、苦思、苦写，但他生活中却不是苦行僧。他的生活理念是求真求实，同时快乐生活。现在他还每年往返于杭州与北美孩子、孙辈之间，享受着他的天伦之乐。

阳光洒进陈先生在城西湿地附近的院子和客厅，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果树。他说，这棵树正好可以挡住刺眼的阳光，方便写字。

书桌在墙角，笔在桌上。

(2018年6月12日)

[返回目录](#)

我与杭州大学同行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云泉



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县，1936年农历5月13日生于杭州（1985年12月发放的第一代身份证改为7月1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是初一年的学生。我就读的学校是英国人冯玛利亚办的初级中学教会学校。解放后，校名更改为东辉女中。毕业前，我入了团。当时学校动员我们读杭州师范学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积极响应号召，1952年春被保送去了杭州师范学校。我读书时的杭师校址就是今天中国美院的校址。学校很大，环境优美，师资力量很强，设备也很齐全。我爱杭师，也爱专业，希望将来当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

五十年代，国家急需培养师资，而报考大学的生源不足。我记得从56年到59年，连续每年从应届的中专师范生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师范院校深造。我是春季班学生，提前半年毕业，于1954年9月入学，成为浙江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生时代做不少社会工作，曾担任第二届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努力追求这一目标。本科四年中，遇到最大的政治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但总的说，我们还是认真真听了不少课，踏踏实实读了不少书。授课的老师队伍也很强。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古典文学的有：夏承焘、胡士莹、盛静霞、刘操南、钱南阳；汉语言，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蒋礼鸿；文艺理论：蒋祖怡；逻辑：严群；外国文学：孙席珍；现代文学：张仲浦；写作：马骅；语文教学法：吕漠野。就是这些老师的辛勤教导，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8年，国家规定毕业生要参加一个月的下乡劳动锻

炼，于是我和班里的同学到兰溪县上华公社锻炼。我第一次到农村，大家都不怕吃苦，我也学会了插秧施肥，挑担车水等农活。1958年8月毕业。中文系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新建的杭州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三个月后，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性质为综合性大学。这样，我回到了母校的语言教研室。

1958年9月是杭州大学40年历史的开端，也是我39年教龄的开始，我与杭大同呼吸共命运。我的教书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1958年-1965年）千里有缘，定分（去声）“现汉”。因缘定分才叫缘分。读书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喜欢文学写作，对语言课不重视。课外，也从不看语言方面的参考书。课堂知识获得多少就是多少，成绩不好不坏，就只有4分（当时采用五级记分制）。记得有一年评三好生，就是因为语言课成绩没达到5分，因此评不上，我也没有失落感。造化弄人啊，系有关领导偏偏把一个不努力学语言的我分配去教语言。后来知道，内在的原因是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没得选择，一度苦闷。党小组会或教研室的民主生活会里不时有人提醒：你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巩固专业思想。我也努力用共产党员的要求去说服自己。不管怎么说，工作的责任感总是有的，硬着头皮做吧。嫁了以后再恋爱，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当时的语言教研室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主任是蒋礼鸿，副主任是王维贤。两位先生都很重视教学科研。对教研组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每星期有一个下午集体学习。青年教师轮流讲古文，老先生评点，或是青年教师作读书报告，或是讨论某位先生写的论文，这对青年教师很有帮助。我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也慢慢进步。

1963年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实行导师制。我的指导老师是任铭善先生。他指定我读《中国语法革新论丛》一书。语法革新讨论关系到现代语法体系的革命，该书让我鸟瞰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历史，了解了研究中存在的争论问题。这一讨论意义深远，一直影响到五六十年代。所以这本书让我走近了现代汉语。我读后，写了《“语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一文。教研组决定这篇文章参加中文系青年教师读书报告

会，效果颇好。想不到，这篇文章尘封了十七年才得以发表。不久，导师制被取消了。原因是，任先生是摘帽右派，不合适做导师。但我永远感谢任先生把我领进了现代汉语的大门。

这段时期，我还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刚到教研室，就派我去中学锻炼，任初一一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工作了一个学期。1959年暑期，中文系邀请语法学家朱德熙教授来杭大讲语法修辞。系里派袁芸同志和我任助教，做辅导工作。同年，又派我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担任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我还作为教育厅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当时杨秀峰部长主持会议，可见对教材建设的重视。会议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讲国内形势时，说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还是吃饭问题。但当时我对这句话的严重意义还认识不到，接着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我看到了现实。这次会议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安排代表参观十大建筑，即使尚未对外开放的军事博物馆也给予参观。北京之行，令我终身难忘。1960年以后，我开始讲授现代汉语课。先在外系，一年后回本系上课。教研组为提高教学质量有听课制度，对年青教师也起检查督促的作用。

1965年，我国援越抗美，接受三千越南留学生。杭州大学接受三百名留学生。我调入留学生办公室教对外汉语。这一年的工作算得上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白天上课、改作业或开会，晚上辅导到晚自修下课，回家还要备第二天上的课。平时要参加学生的活动，每周看电影，星期天上街等等，逢年过节都要陪伴。好在留办的教师都比较年轻，精力比较充沛，思想上把这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没有一个人懈怠的。从业务上说，教留学生不在于教学的深度，而在于教学的方法。譬如一个趋向动词“来”和“去”，要让学生懂，会用，都要想很多直观的方法去教。师生言语不通，我们采用的是直接教学法。知识的讲授不靠言传，但靠意会。慢慢地在他们掌握的词和句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再去学新的知识。由于共同的努力，一年下来，学生能作一般的交流。能听懂晚间新闻的广播。他们正准备进入大学读专业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大学停课了，

他们有的回国，有的去了别的国家。留办的教学任务也结束了。这一年，与越南留学生朝夕相处建立了较深的感情。虽然后来我们与学生的联系不多，但心系的感情没有断。2004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到中国，第一站到母校访问并看望老师。我班里有五个同学来。她们还能听懂，还能作简单的表达。我很欣慰。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蹉跎岁月，不进则退。这段时期是教学和科研的空白期。按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而我三十未立，四十还有惑。从年龄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无花无果。

1970年，留学生办公室并入中文系。当时我还在学校宣传部帮忙，等工作结束后，我才回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工作。当时，我国词典出版比较薄弱。譬如，毛里求斯送我们一部百科词典，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只回送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所以，国家要求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一部汉语大字典。1975年，教研组指派我参加《汉语大词典》的资料搜集工作。《汉语大辞典》由华东五省一市负责组织力量编写。我们曾在青岛八大关参加华东五省一市的词典编写会议。我和宁波师院薛恭穆同志共同起草浙江省的大会发言稿，并由我代表发言。1978年，中文系正式成立《汉语大辞典》编写组。语言组派童致和先生参加，我回教研室工作。

第三阶段（1976年-1996年12月退休）急起直追，倾情专业。教学科研，齐头并进。这二十年，关于教学，我除了讲授基础课“现代汉语”外，还开设了选修课“现代汉语词汇研究”。1988年后，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学位课程有：“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义学”。

此外我还参与教材、词典的编写。如教材《现代汉语》杭大中文系、杭大函授部编印。其中词汇部分由我编写，有八万字左右。《中学语文教学实用大全》（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我任“现代汉语”部分主编）。

我对搞科研有些想法。首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前在中文系曾有一种说法，科研是重工业，教学是轻工业。显然是重科研，轻教学，

这想法是有失偏颇的；但要重视科研还是对的。我对三本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的比较进行研究，不仅是要探讨不同语法体系的理论背景，也要比较不同语法体系的优缺点，这对提高课堂教学是有帮助的。编教材也如此，一本好的教材，理论的阐述和举例都该体现出编写者的研究水平。总之，教学和科研不矛盾。其次搞研究要扩大视野，注意邻近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边缘的地方就有空白，空白地带就可创新。

《语体的新手段》发表后，曾有人向我索取研究参考资料。其实没人授予我锦囊。我的资料来自文学杂志，看了很多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作品分析。在我理解了这种文体的特点后，我从语言的角度去寻找它表达的特点和规律。文学作品的叙述语言因文体不同，叙述的特点也会不同，问题是要去研究发掘，我想这就是创新。《语体的新手段》这篇论文也为较多人的关注（见张德明《建国四十年来语言风格述评》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4期；于根元《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年）。研究方法也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定，要在你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发现。譬如色彩词中为什么“青”会产生“黑”的意义，“橙”何时兼作形容词用，“洋红”是形/名结构，还是名/名结构……这后面都有故事。我们从词是社会文化略语这点去思考，必然会拓宽研究范围，会从社会文化的研究角度去探讨问题。至于研究的手段，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现在先进。那时，资料的信息不多，依靠图书馆。整理资料的手段是手工作坊式的，卡片一张张抄写，然后分类比较，量化统计。工作量很大，化了大量时间，还可能疏漏。而现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更多数字人文技术的运用，让你得到高级的智慧数据，保障你强有力的资源，你有充足的时间分析研究资料，提高研究的质量。这是现代学者的福气。总之，搞科研一定要追求成果效应，对学术研究要有推动作用。

七八十年代，学术繁荣，学术气氛浓厚，学术活动频繁。全国、华东、本省，纷纷成立学会。八十年代，我先后参加了浙江省语言学会、全国语言学会、华东修辞学会。曾担任浙江语言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所以也为学会做了一些学术推普交流的工作。在全国语法讨论会后，1986年暑假，省语言学会在莫干山，给中学教

师开办了语法修辞讲习班，我参加了讲课；1987年暑假，在浙江舟山沈家门主办了华东修辞学会第六期讲习班；1994年11月主办了杭州华东修辞学会第八届年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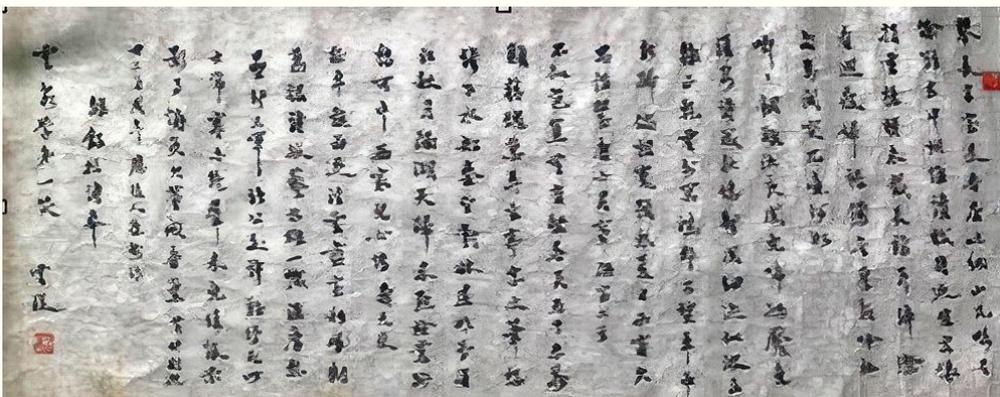
1981年，我们教研室授予现代汉语硕士点。王维贤、倪宝元两位教授1981年开始招生。我和卢曼云先生是第二梯队，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从1988年，到1996年，总共招了八届11名学生。现在他（她）们工作都很出色。二十多年来大多还保持联系。

我1978年12月晋升讲师；1986年5月晋升副教授；1992年12月晋升教授。1996年12月退休。因最后两位研究生尚未毕业，所以又延聘了两年。

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宣告成立，杭州大学四十年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虽然杭大不存在了，但中文系的毕业生依旧习惯地说，我是杭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也是，我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师。

附录：

1. 蒋礼鸿先生送我的横幅



蒋先生是我读本科的老师，也是我教研室的主任。他著作等身，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为人方正，尊重事实，他诲人不倦，提携后学。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和他的夫人盛静霞先生最后都捐献了遗体。他的小楷钱钟书先生誉为小家碧玉。看他的书法作品，让我们纪念他。

2. 我们杭大现代汉语教研室合影



前排右起，傅国通，倪宝元，王维贤，童志和，杨一冰，刘云泉。
后排右起，周晓康，任芝英，罗曼云，王顺刚。

3. 我和我的研究生



（原载 2019 年 9 月浙江社科微信公众号）

[返回目录](#)

感谢和想念吴洁敏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李纪定

吴洁敏老师，虽然只担任了外语系 78 级第一学期中现代汉语的课程（而且 78 级是在当年 11 月份入学，第一学期极其短暂），但是，即使如此，吴老师是我杭大四年学生生活中，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

第一，吴老师端庄、大方、漂亮，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美女老师。第二，备课充分，上课认真、热情，绘声绘色，极其吸引学生。第三，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第四，充满爱心，阳光普照。

尤其在这次聚会安排中，吴老师几次和我商量，要求我不要仅仅和吴老师一个人联系，而是同样要联系担任《欧洲文学史》的张绍儒老师和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祝老师。让我感受到了国内环境中少有的人文关怀和博爱胸怀。托吴老师的福，我有幸联系上了两位老师，作为外语系 78 级的一份子，向两位老师表达了深埋在自己心底几十年的真挚的感谢和深切的想念。根据吴老师的信息，两位老师都在之后的老师聚会中谈到了自己几十年前的学生来电道谢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们感谢老师，极其容易记住自己的专业老师，而非专业老师往往被我们轻易遗忘。我也一样。不过于我，每当回忆起为期四年的杭大学习生活，除了自己的专业老师，常常想到的就是吴洁敏老师。当然还有教授我们第二外语的瞿老师和担任日语专业和德语专业体育课的周老师。只是毕业之后没有了瞿老师和周老师的有关信息，至今尚未取得联系，更加没有任何当面道谢的机会。

这次聚会，从计划到实现，因为需要凑合各自的方便，延期了很长时间，期间也令人痛心失去了 78 级日语班长胡伟白同学。但是时隔四十年，只有一个学期缘分的师生之间，能有如此感动人心的再会，实在是打动我心。我想，这既是我们学生感恩之情的强烈，更是吴老师个人魅力和师德力量的真实反射。

[返回目录](#)

那年月，我们朝夕相处 ——与吴洁敏朱宏达为邻的记忆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19 年春季的一天，我得空登陆拥有近 500 名成员的“杭大人”微信群，仿佛阵阵“欢迎入群”的声浪扑面而来。赶紧查究，方知是德高望重的吴洁敏教授刚刚应邀入群。顿时我也想发欢迎信息，但看见年近 82 岁的吴老师忙着认真地一一回应，不忍让她太劳累，就放弃了。几天后再进群想问候吴老师时，大家正讨论别的话题，觉得不便搅扰。之后又有几次碰到类似情况，欲言又止。随着时日的流逝，我知道再按原计划表达初衷已不再合宜，于是产生了将心语诉诸于笔墨的念头。

说真的，吴老师的突然“出现”在我记忆蓄池中掀动起不小的涟漪。我翻箱倒柜找着了一张珍藏着的旧报纸——2014 年 5 月 9 日《钱江晚报》的人文版。在题为《吴洁敏朱宏达 节律之美》的访谈录文字上方，这对传奇伉俪的大幅彩照赫然醒目。朱老师正打着手势在绘声绘色地叙说，吴老师在边上满脸笑容地看着他。他们的容貌与四十多年前印刻在我大脑皮层中的形象依然那么相近，那么可亲。

记得那是 2014 年春天我返杭探亲的一个上午，当时年届 93 岁的老母亲招呼我去她卧室。此前几年中，医院已好几次让家属为她“签字”，她也早就坦然安排好各项后事，上天却让她一次次走出死荫的幽谷。尽管从头到脚多有病痛，老人家的头脑倒是异常清晰。应我所求，她在身体状况尚可时，常用微微颤抖的手记录下她的对四个子女

少儿时代及我们先父的回忆。据与母亲住在一起的二姐说，每次我还乡前的一段时日，老人家总是分外努力，有时甚至半夜起床，书写、重写、誊抄手稿，好让我回美国时能带去。

那天我以为母亲又要向我述说往事，便拿了作笔记的纸和笔，在她写字桌对面坐下。不想她首先将那份《钱江晚报》递过来，满脸笑意：“这是我给你保留着的。你看，我们住在16幢时的老邻居！”我赶紧接过报纸，快速浏览了其上的访谈录，心中不由漾起豪情，仿佛是自家人有了了不起的成就，我脸上也沾了光。届时我去国刚满29年，住在美利坚的岁月已超过生活在故乡的年头。发生在老家的很多事，其实我早已淡忘或不得而知了，但知儿莫如母，她知道我感念旧情。

几天之后，我重访了杭大新村——曾经的杭大道古桥河南宿舍。

杭大新村的现址为西溪路56号。那十来栋老宿舍楼被原先未曾有的围墙与周边的商业区隔开，宛如一个孤寂的院落。步入小区，但见枯藤爬墙，庭中杂草丛生，儿时的美好家园已是一副衰败景象：大部分住处空置，有些已被鉴定为危房，许多门窗钉了板。然而，那参天树木间寂寞伫立的熟悉楼宇，每每让我心底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亲切感。



原杭大河南宿舍16幢
笔者摄于2014年5月12日

驻足于16幢西单元南面，我抬头举目：三楼（最高层）扶梯东边便是我们和吴洁敏朱宏达老师一家合住之处，但那时没有阳台。与现今常用邻居之概念最大的差异，在于两家用同样的钥匙打开最后一道与外界隔开的门。步入那扇共用的家门，我们各有朝北的厨房加一个小间，另有朝南的一或二

大间。走廊的尽头便是唯一的厕所间。

当时我们两家十口人公用一个厕所，并分担打扫保洁、处理抽水马桶的故障、应对堵塞时脏水的漫溢。如此近距离朝夕相处，邻里之间闹矛盾几乎是常态，但我们却从没有为任何事发生过冲突，那段融洽相处让我们领略吴洁敏朱宏达夫妇的为人和美德。

这话还得从我家搬进 16 幢之缘由说起。

1958 年秋季，杭州大学首次开课前，我们六口之家从六和塔附近的秦望山（原之江大学及当时浙师院所在地）下来，搬入新建的杭大河南宿舍 14 幢 9 号。这套居室内有两大间加一小间并一厨一卫，外带一个阳台。我家居住在这一梯两户三层楼房中间单元的二楼。此单元六户中五户的家主均是我父亲在化学系的同事（例如住在我家楼下的金松寿先生，后来成为国内外催化研究的领军学者）。约十年后，他们也大都一起住进了牛棚。

1969 年 3 月，我的大姐和二姐北上黑龙江插队落户。在那儿还不到一年，她俩先后因染上急性甲型肝炎而病倒。当时父亲仍在牛棚，工资被冻结。我和哥哥因年少尚无法独立生活。在校医室工作的母亲为我姐姐们焦虑不已，却无法前去照顾或探望。幸而她许多好心的同事闻讯后竭力安慰并援助。他们有的送糖票，有的送白糖等营养品，好让母亲托运寄给远方的两个女儿，使她们慢慢得以恢复。

姐姐们去支边后，我家的住房宽敞了些。当时已有造反派强行“进住”情况类似的家庭。母亲担心会有蛮横之徒觊觎我家朝南带阳台的大房间，于是主动邀请她的一对同事抢先搬进来。这对年轻夫妇为人正直，其女儿出生不久，正愁无合适住处，这下恰好解除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之后在同一屋檐下的两家和谐共处、互相照顾，如同一家人。

我大姐虽然脱离了急性肝炎之利爪，但因元气大伤，又遭其它疾患搅扰。1972 年秋，她从东北病退回杭。那时我家在 14 幢的生活空间实在无法容纳五口人，父母因此向学校提出申请。房产科先让大姐在 10 幢胡玉堂先生（原历史系主任）家借住了一段时间。约在 1973 年上半年，又安排我家搬到 16 幢，与吴洁敏朱宏达老师一家为邻。



吴洁敏和朱宏达伉俪，摄于1974年

年轻美丽的吴老师生性开朗，热情洋溢，连首次见面的人都会被她的亲和力深深吸引。还记得她在述说所见所闻或绘声绘色地描述某个际遇时，嗓音清脆响亮并滔滔不绝，仿佛叮咚奔流的泉水。朱老师是位英俊高大的男子汉，却轻声慢语，温和沉稳。他们夫妻俩的三个儿子都很懂事、

很有教养。例如，其长子朱岩（比我小几岁，记得当时用其小名“铭铭”称呼他）1994年进入杭大化学系读研，现在已是浙大化学系的博导教授，同时还是一位参加过闻名世界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之运动健将。文武双全达到这般境界，让我和家人均欣喜赞叹并为他骄傲。

大约在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初，两家先后搬离16幢。四十多年过去，我们都已记不清具体日期，依据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估计我们作近邻约为两年半至三年。

两家人朝夕相处那段期间，我父亲仍处于十分落魄的境地。当时他的历史问题尚未“定性”，也无法从事他一向热衷的教学与科研。有一阵形势严峻，父亲以为自己即将被扫地出门，于是将多年积累的学术资料及参考书装入纸箱。在一个阴郁的日子，他心情沉重地把自己最为珍重之物托付给我哥哥，吩咐他在父亲身后卖掉或烧毁。

以年龄而论，吴朱两位老师比我父母年轻15-18岁。当时，他们是在新中国受高等教育、又红又专的人才，政治地位高高在上。在那抑善扬恶的氛围之中，有不少他们的同龄人以造反派自居，任意凌辱老教师，甚至打骂掳掠。吴朱老师自然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但他们对我们始终友善真诚，从来没有半点歧视。两家谁出差带回什么稀奇的东西，或烧了好菜都会送些给对方分享。很久以后我在《路加福音》中读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这句话，脑海中也曾闪过这两位老邻居和蔼的面容。

与吴朱两位老师为邻时，我本人也经历了此生寥寥数个关键转折点之一。1973年初从杭州向阳中学初中毕业后，我和少数毕业生被推荐到学军中学上高中。春节过后接到通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学军没有录取我。在那风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论成分是一名正言顺的。我对此虽已颇有体验，但因当时太想继续读书，感觉这一击十分沉重，却又万般无奈。初中班主任彭老师为我打抱不平，他和向阳中学党支部陈书记一起去找学军中学领导。不知怎的，学军后来竟让我占用5%“可教育子女”的名额进入应届高中班。这失而复得的机会，为我今天的美满奠定了根基。

《钱江晚报》在2014年新开了一个《文脉》专栏，报社选择采访的第一对教授夫妻就是我们的老邻居。直至读了那篇访谈录后我才知晓：吴洁敏朱宏达早在初中时代便是校友，后来终成眷属。两人不仅是情侣和夫妻，还是极有成就的合作伙伴。吴老师精通语言学，朱老师研究古典文学，曾合写过多部重要著作。比如，他俩早在1990年联名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翻译家传记《朱生豪传》，当年就获得中国图书奖，后来又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台播放。目前他俩都已八十多岁，却仍夜以继日地赶着完成他们的合作项目，难怪报纸文章用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初中同学，一生爱侣，两位教授羡煞旁人。”

挺有意思的是，就连《钱江晚报》的那位记者也注意到了这对夫妻相处的极为独到之处：他们几乎所有合作成果的署名、他们在任何公众场合出面或一切荣誉面前，总是吴洁敏在前朱宏达在后，包括晋升教授。这种以爱为根基的“反常现象”到哪儿都不多见。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更为稀罕，因此我对朱老师特别敬佩。在杭大新村里住过许多不同学科的大师，身后常有贤妻默默无闻地照顾支撑他们，但朱宏达老师本是一家之主，又才智出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资深专家，曾任老杭大的研究生部常务副主任（正处）和出版社总编辑。我记得他当年就是家务活的主力军，甘愿承担琐事，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好爸爸、好邻居。照他自己的话说：“人皆争先，己独取后，这是我的人生信条……我们和鸣，但和而不同，我是甘愿妇唱夫随的。”多么令人钦佩的舍己精神！

听说朱老师去年夏天因为赶一本专著校对，字小行密，累得病倒了。并且他现在与癌细胞共存，今年三月又动了次手术，可还在只争朝夕地与吴老师一起赶任务。闻悉此讯，我的心像被铅锤拽了似的下沉，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就是我所认识、所敬仰的朱宏达老师之崇高境界。

藉着吴洁敏老师入群而泛起的回忆，趁尚有老母亲、兄姐和吴朱两位老师帮助审稿，我试图将这些往事片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两家的后代。希望他们因此对前辈的经历多一分了解；更盼望他们懂得：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善、美能够长存。

（草于2019年7月16日；修改稿：2019年11月23日）

附录一：

今年七月中旬，我将此文的草稿发给吴洁敏老师，请她和朱宏达老师帮我纠正记忆及文字方面的错误，也请求他们提供旧照。

吴老师很快发来微信：“志红，看到您的大作，引起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想要加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我们为邻居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是我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时光。”几天后我就收到了由朱老师执笔的洋洋大篇，在此照原样刊出其中有关两家相邻的回忆部分。

《那年月，我们朝夕相处》读后 ——给戚志红的信

飞飞（志红原名飞如的昵称）小妹：这样称呼，你不介意吧！

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在我们的记忆里，你还是那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飞飞；你成绩出众，人见人夸；你埋头读书，无意打扮，非常朴素；尽管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在工作和事业上的突飞猛进……但在我们的眼里，却仍然把你定格在美丽朴素的“邻家小妹”印象上。也许有的时候留住记忆，就是留住美好吧。

你说得多么好啊！“将这些往事片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两家的后代。希望他们因此对前辈的经历多一分了解；更盼望他们懂得：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善、美方能够长存。”确是如此。

理工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看得多了。但第一次读到你的至情感人好文，还是让我们有些吃惊。在“杭大人”微信群里曾读过你怀念令尊的词，让我们久久动容；你记述我们两家40多年前亲密往还的片段故事，文采斐然，真切动人，引起我们许多美好的往事回忆。很难在你的文字里找到瑕疵。恰恰相反，修辞立其诚，在你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你的真诚，也不能不回想起你全家崇德向善的家风。

需要补充的是、你没有提到你家人的慷慨善举和诚意待人：你的哥哥姐姐和你跟你的父母一样的是多么好的人！尤其是你的母亲——陈医生，总是那样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虽然她脸上架着高度近视的眼镜。正如你文章里谈到的，当年我们同住在一门关进的小单元里；鸡犬相闻，举手投足，稍有动静，便互相得知，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得了的。有一次，我家老二晚上咳嗽，自家爹娘还没有引起重视，陈医生却听到了。第二天，她就配了止咳药水送来了，多么有心的善举，让我们感激莫名。

1975年的元宵节，陈医生给我们送了一大碗她亲手制作的宁波汤圆；出自老宁波之手的汤圆，是我们第一次品尝到那纯真、鲜美的好味道，40多年过去了，还是无法忘怀。虽然以后每年都吃元宵，味道都比不上你母亲做的汤圆好吃。记得当时，吴洁敏突然想到，要把这么好吃的汤圆分一部分给我们的老同学小洪老师夫妇。洪老师病了，正好借陈医师的汤圆能给他们带去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的好兆头，也可让他们洗刷细微琐事带来的不愉快。这事，当时让陈医生知道了，她马上说：这简单，我给你们再做一碗送去吧！一到他家，小洪夫妇俩已经忘了那天是元宵节。见我们到来都喜出望外。不但扭转了气氛，还享受到口福。见微可以知著，他们全家四口尝到了这难得的美味，能不感谢亲手制作汤圆的陈医生吗！就这样，我们两家人都分享到这难得的口福，增进了同事、同学间和家庭的融洽气氛。

记得当年你哥志民中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小工厂，抡铁锤、敲榔头，你妈非常心疼。但你哥憨厚乐观，经常找我家老二玩儿。我家老二当年还在上幼儿园，最得意的就是坐在志民哥膝上玩耍；有时晚上，你哥还用自行车带着他去郊区打猎。老二小宏在乡下外婆家待了4年，野得很；打猎回来，即使空手而归，也非常兴奋。

这些虽是记忆残片，却是当年以德为邻的一个典型。孔子所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尽管我们两家的出身背景、经历地位不同。但我们根本不把当时极左粗暴的分类放在心上，大不以为然；更不想以红五类自居。因为在我们的眼里，你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文质彬彬的君子如其名。你大姐路路（志坚）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勤勤恳恳，当年在杭州的一所中学任过教导主任吧？你妈妈更是一心装着他人具有仁心的医者。你们全家崇德向善的家风，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也铭刻在我家大人孩子的心里。

所以在1993年，我们大儿子朱岩结婚时，特邀你爸戚老师作主婚人；不只是我们儿子媳妇都是杭大分析化学的研究生，也不只是你爸是分析化学方面的权威，而是因为戚老师是众望所归、德高望重的前辈。记得在那次婚礼上，你爸还以一本刚出版的学术专著相赠，得到全场喝彩，把婚礼推向高潮；——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

谢谢你关照我的病情。今年7月1日，我在浙医第一医院作膀胱镜检查，复查结果是好的。如果天假以年，还有时间可以从容看看这越来越精彩的世界。

另外，我要说明：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你对我的褒扬，使我汗颜。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我低调人生的表现。求求你把我“三好”的帽子，摘了吧。

十多年前，我为长孙女朱睿编过一本小学作文集《吹着泡泡忆童年》。现在正在校对我为105岁岳父写的传记，有望出版，届时我们将拿着这本书去看望你的老母，祝她老人家长命百岁！

也向你全家致以诚挚的谢意和问候！

朱宏达（执笔）吴洁敏

2019年7月24日

附录二：

八月初，我把结合了两位老师反馈的修改稿发送过去请他们审阅，满以为最迟到月底便可搞定此事。但后来得知他俩正在赶多项任务——我敢打赌这群里没有已退休者还这么忙的——便决定耐心等到我十月中旬回杭再说。

十月二十九日，杭州在秋日阳光的沐浴下分外明媚爽朗。上午十点左右，吴老师和朱老师登门来访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仨，四十多年前的老邻居再度欢聚一堂。



吴洁敏朱宏达与笔者 98 岁的母亲
摄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

附录三：

【桃园忆故人·重访故居】

戚志红

庭荒草野污墙在，蔽日云杉青黛。
游子乡愁难解，寻履逾洋海。

楼空人去缘无改，镂骨相邻祥泰。
勘破红尘百态，贵异真诚爱。

（起草：2019 年 8 月 10 日；修改稿：11 月 21 日）

[返回目录](#)

悼念程贤政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左一为程贤政老师）

程贤政老师，1932 年出生，浙江文成县人。自幼刻苦读书，早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五十年代考入杭大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学生辅导员，年级支部书记，外语系总支书记，杭大党委委员。

程老师为人和蔼可亲，开朗热情。他睿智精明，处事坚守原则且客观灵活，多年来有效地引导外语系教师潜心教学、学生用功向学，尤其为文革后弥补青黄不接的外语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身为杭大最大系的外语系书记，程老师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从刚入学的新生，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无不对他认真、细致的工作方法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8 年以后，程老师受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折磨，几经住院治疗，状况虽时有改善，终不抵疾病所困，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凌晨 4 时 30 分在家离世，享年 86 岁。

我们敬爱的程老师一路走好，您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赋诗以悼：

【七绝·悼程贤政老师】

（平起 平水韵八庚）

章程自有张苍定，
如贤施教乃分明。
驰政庶民堪可照，
皆碑众口永留名。

（嵌名：程贤政）

[返回目录](#)

静水流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杭大虽已消失，然而记忆深植。打开记忆之门，大学的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从心田流淌出来。

记忆深处的小刘老师——刘忆岚，年轻，貌美，扎两条齐肩小辫，说话，走路，总一甩一甩的；眼睛大而明亮；皮肤白皙；俏皮、亲切、可爱。她教我们大一大二的听说课。语音语调标准。因为喜欢小刘老师，所以我课前课后特别用心、认真。

为了好好练口语，饭后，我总跟搭档蒋明明绕着校园散步，练习对话。从食堂出来，顺着林荫小路，然后右转，再从图书馆前面绕到图书馆右侧，经过校门口，从右侧直走，再次经过小树林。

空中不时地传来广播英语和歌曲。迎面而来的，有捧着书本朗读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无比亲切。有和我们一样，饭后散步，练习口语的。小树林里，摆着的简易课桌椅，总见用功的同学坐着，看书的看书，朗读的朗读，对话的对话，聊天的聊天。那情景真的太美了！

大一的那个寒假没回家。几乎每天到班上听灵格风。因为喜欢，所以重视。因为重视，所以提高的就快。当时一心一意的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这就是喜欢的力量！

一生中，还有一个让我常思念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童忠绥老师。记得一次班级春游，他陪我们一同去。中途飘起了毛毛细雨，且越来越密。我开始抱怨。童老师听了，说：“毛毛雨有什么不好呢？这才有诗意啊！”他这样看待下雨！好新鲜的说法哦。也怪，经他这么一说，后来心情就不再因毛毛雨而潮湿了，反倒觉得脚下生风。看来，一切的不快皆由心境而生。此后，见到下雨，我便会想起童老师，想起他的话，想起那唯一的一次有老师陪伴的大学春游。于是，雨在我生命中，不再作难！每当细雨蒙蒙，走在雨里的我，就想起童老师，想起杭大的春游。原来，雨可以这样富有诗意。我甚至喜欢起雨来，

尤其是毛毛雨。生活不再因雨而举步维艰。童老师的一句话，成了我一生中美好的追忆。童老师影响了我的审美观，人生观，让我学会了从不同的心态看问题。童老师，你一定不知道，你的一句话，叫我思念你一辈子。童老师，你一定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感激你！

还有一个不能忘怀的老师，就是教我们精读的劳逸君老师。除了兢兢业业地耕耘，她还如慈母般地关怀着我们。生活中的，班级里的一些疑难问题，总少不了她为我们排忧解难。2017年的78级外语系杭州聚会时，她来参加了。身穿桃红色衬衫，发型依旧，音容笑貌依旧！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安慰的呢？同学们十分高兴，纷纷与她同框留影。

最后想说说我们的欧洲文学史老师——张绍儒。他操着一口北方口音，上课幽默诙谐。有一次，他讲到欧也妮·葛朗台的吝啬时，模仿一个同学在食堂点饭票的样子，惟妙惟肖，令人难忘！

杭大在心里、在脑海里、在梦里！

[返回目录](#)

外教杰森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在杭大旅游系教英语的杰森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来杭大之前他已经退休多年。从他的申请材料上知道，他曾经有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学经历，后来做到洛杉矶地区中学校监 (superintendent)。来杭大工作时，他应该是上 70 了，然而身体看上去很精神。

一天杰森来外办找我，告诉我，他交了个女朋友，请我陪他一起去见一下女朋友和她的兄弟。我心里嘀咕：怎么那么快就有女朋友了呢？才来 2、3 个月。约会地点是黄龙宾馆。

宾馆离杭大不远，我们便步行过去。在服务台，杰森大步上前和一个年轻女工作人员交谈，向我介绍那是他的女朋友。看上去，她应该在 25 岁左右，身材高挑。她那天值班，显然不是我们要见和谈的主角。她用中文和我说，她哥哥想和杰森聊聊，请我做翻译，顺便也了解一下这个外教。顺着她指的方向，见一男子坐在大厅一处沙发椅上休息。他见我们走近便起身相迎，握手。我一瞧，此兄颜值不输妹妹，还高大。一番交谈，我才知道，哥哥来会面是准备把妹妹托付给这位 70 来岁的杰森了。此后无话，我也没有去关心他们俩的事。杰森半年多后完成教学，回美国了。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还有一张剪报，是他发表在洛杉矶商报上的游记散文。信中写到：

.....她已经到了洛杉矶，现在正在学习英语。感谢你所有的帮助。我平时经常给洛杉矶商报写东西，这期的游记出来了，我把它剪下来，请收.....。

剪报上写着：

我在中国杭州大学的教学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因为这座城市不但学术气氛浓厚，旅游资源也是独树一帜。同时私有经济也十分发达。

有一天我在外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一个叫武林广场的贸易市场逛逛。突然一个穿藏族人服的中年人拿着一条蛇一样的东西在我的眼前晃动，高声叫卖着。定睛一看，老天，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恶

心的玩意儿。我连忙问身边的杭大的陪同，他的名字叫蔡小平，那是什么商品。他问了商人，那人说是虎鞭，壮阳的。我问了价钱，那人说价格论尺寸，每寸 300 元。我问蔡有效果吗，蔡说真货应该有效果，但是西藏没有老虎，肯定是假的。我又问，有效果何以见得？蔡答，因为他父亲用过.....

看到这里，我晕了，这个杰森，我哪里这么说过嘛？再看下去，还好他手下留情，没有再瞎编成：后来蔡也试一下，效果不错！

我想，大概他后来自己回到自由市场向那个“藏人”买了那假货。因为他已年过 7 旬正在谈恋爱，不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返回目录

老专家楼 80 年代中期的人和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30 几年过去了，老专家楼还静静地站立在那儿。老专家楼，在新专家楼建成之前，是学校外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接待场所。由于当时在杭大教学、访学的教授学者，长期和临时的留学生，都居住在那儿。相信“杭大人”微信群里的许多人，各个系的领导、合作教师和学生，都去过这幢淡绿色的四层楼房，或联系工作，或学习，或参加会见校际谈判、欢迎和送行宴会。

1983 年毕业时，我留校在外事处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专家楼，联系接待事宜，同时午饭也搭在那里的餐厅吃。那里发生的一些事和人虽然属于点滴琐事，芸芸平常人，但是真人真事说来，或许同学们也愿意听听的。

上个月我去母校拜访，少不了也去看看这熟悉的楼房。它坐落在西溪路上，离学校正大门不到 500 米的距离。以前骑自行车从外办办公室过去只是几分钟的事，比去一些系办公室还近。不过专家楼有围墙和传达室，人员进出需要登记。

先说专家楼的一个管理负责人，他叫郑年。我和他有不少联系。这次回杭州之前，通过以前的同事打听他的情况，想与他一见，核实一下，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没能如愿。现在他应该是近 90 岁上下，而那时他 50 多，那里的年轻人都管他叫“郑伯”。不过人们偶尔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郑年狗。咦，他现在名字里的“狗”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郑伯在 50 年代初参军并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连长和他说，你把名字改一下吧，早上报名时每次都引起同志们嬉笑，不严肃啊。再说我在外面喊你名字，老百姓还以为我在说粗话，影响不好。不如把狗字去了怎么样？于是小郑从此就叫郑年。

大伙儿后来怎么知道改名的事呢？一天郑伯的农村发小们来专家楼看望他，在大门传达室登记。管门大伯一看，说，老乡，别骂人好

不好？我们这里只有郑年。他是我们的领导。这时郑伯听到嘈杂声音，踱步出来。

“哎，年狗，年狗！”“狗子啊！我们来看你来了。”

“是我，是我，快点让他们进来！”

郑伯朝管门人喊道。那么究竟他的真实大名是如何取的？是农村里的习俗把男孩子名字里加上动物，比较好养呢？还是由于他出生在狗年，容易叫？不得而知，无人去考查证实。包括校领导在内的人听说这事也一笑了之，继续喊他“老郑”。我们年轻人还是叫他“郑伯”。

郑年从朝鲜回来后，辗转来到了杭大工作。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右手的小指断了一大节，是个荣誉残疾军人。怎么没了小指头？大家只知道他是个侦察兵，除此他从来不提起另外事情。另外和他握手感觉怪怪的，像握着半只手。郑伯在专家楼几乎是无事不管，餐厅宴会事宜是他工作的重点。除了供应在住人员的 3 餐，校级和系级的宴请筵席则是不间断的。

郑伯的一个爱好是把筵席上没有吃完的菜肴集中起来，煮一下。第二天中午，就有了他说的“百味菜”了，绍兴酒一盅自得其乐。有时我也参加他的“百味菜”宴，发现原来所谓的百味其实是一味。

有一段时间，开始是一、二个外籍老师，后来好几个，向外办反映家里的东西丢失。由于每天做卫生的服务人员是好几个一块儿做，有男有女，一时较难揪出那个小偷。这事也惊动了学校保卫处，开会研究怎么破案。郑伯建议改成责任制，进入宿舍搞卫生要登记，以便锁定目标。不久小偷又出现了，专偷卫生巾。外教的女用产品是专门从国外带来，而且数量有限。不久小偷被锁定，原来是个临时工所为。虽然是破了案，但是她已经用掉了偷来的东西。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弥补。郑伯骑着车在城里寻找市场上有没有同类质量的用品。那时的国产女用产品，老外不用。到了 90 年代初，国内生产线才生产出和国际接轨的这类用品。也就有了一些人恶意抢注“姚明牌”卫生巾事件。现在怎么去救这个急呢？

郑伯想起女婿正在香港参加公司培训，于是去电信局给他发了一个传真。很快女婿就寄来一个包裹，总算解了大伙儿的燃眉之急。

抓两条腿的小偷对一个老兵只是小菜一碟，四条腿的小偷并不容易抓。

话说专家楼除了举行一些宴会，招待会，也有规模较小演出等聚会。其中，日本专家御宿良博的婚礼和之后的文艺演出颇具戏剧性。婚礼由薛艳庄校长作证婚人，参加的有省外办友好城市处的领导，从日本赶来的御宿姐姐和姐夫。新娘父母因不喜欢女儿嫁日本人，没有出席。参加的还有住在专家楼的外教和校外办成员。婚礼现场布置得十分简洁。长桌的一头坐着两个新人，从日本带来的穿和服男女木偶人，分别放在新郎新娘面前，大概表示他们是和服穿着，而实际上男的穿西装，女的穿红衣服。

婚礼顺利进行着，礼节性的祝贺后就到了客人们随意发言的环节。这时，美国专家劳力斯起身发言：“40年前的1945年，那会儿，我做梦都想不到会参加一个日本人的婚礼。那时，我帮助中国人打日本。我的轰炸机在海口上空被日本人击落，关押在海南岛三亚。我的梦是狠吃一块大奶酪，”他说。坐他旁边的夫人急忙拉他衣角，暗示他在这种场合不要乱说话。“不过时过境迁，美日是朋友了，中日成夫妻了，我祝贺你们！”

话音未落，另一个几天前才来的美籍老师也站起来。“现在美中也是朋友了，35年前我绝对想不到会到中国大学里教英文。我是韩战老兵，看，我丢了一个小手指。”

坐在不远的郑伯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读懂了他的肢体语言，起身上前一步，向杰森伸出了右手。经过翻译沟通后，两只大手，八个手指，紧紧地握住了。

婚礼到了文艺演出的环节。那天邀请了离校园很近的浙江昆剧团演员来献艺，演出拿手的昆剧“十五贯”中的折子戏“测字”。同时也请来浙艺校学生演出二胡独奏“二泉映月”。

伴奏声起，苏州知府况钟登着方步，粉墨登场，唱道：

这色子内中藏铅非寻常，定是那赌徒恶棍骗人勾当。

尤葫芦家无余粮，哪有钱抛落地上？
三五枚或可言讲，半贯钱绝难遗忘。

这时从另一边闪出个贼头鬼脑的娄阿鼠来。他勾身弯腰，鼻梁中心抹有一个白豆腐块，表明是个丑角，而细看鼻中画的竟然是一只耗子！由于做贼心虚，心神不定。他唱道：

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锣鼓声声，唱腔依依，喝彩阵阵，热热闹闹。演出场地是餐厅的一部分，紧挨着厨房。喧闹声还是惊动了厨房里的常住主户。有一只个头不小的老鼠不识时宜地窜到了演出厅。它忽然见到灯光后反而镇定下来，与假老鼠打了个照面，两只小眼睛狡黠而可怜，居然停止不动。人群惊呼，郑伯顺手抄起旁边一根棒子，冲上去，边打边骂。硕鼠受到惊吓钻回了厨房，郑伯紧追不舍也进去了。这是他的厨房还是它的领地？人们继续看戏，不管厨房里面的辩论。

郑伯心想，两条腿的小偷是不在话下，但是这四条腿的贼如何对付？因为可能不是单挑一啊。

郑伯追进厨房后发现里面漆黑一片。他马上开灯，敌人早已逃之夭夭了。我紧随他后，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他摇动所有有可能的藏匿之处，企图敲山震鼠。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使躲入地道的对手上当。看他有些沮丧，就像追不着淘气的捣蛋儿子似的。

我问：“有啥好办法逮着它？”

“可能是一窝或者几窝都说不定的。有了，我有法子了，可以把它们干净，彻底地消灭。”

“哦，快说来听听！”

“它在暗处打地道战，我们是干瞪眼。在厨房里给它下毒药又不安全。我看用笼子，放诱饵活捉它们！”

“妙！”

“不过我需要你全力支持。”

“没问题！”我坚决地说，攥紧手中的扫把。

“一言为定哦？”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逮几只耗子嘛？一言为定个头啊！”

“那好，我明天就回诸暨老家，拿几只好使的笼子回来用。”

出席了日籍专家御宿的婚礼之后不久，我参加了因病亡故的日本研修生的葬礼。他是日本一个大学副教授，到杭大跟随陈桥驿教授做研修生，他带着课题去浙江农村作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经济地理现况。历时近一个月时间后，坐火车从诸暨回杭州，到达专家楼时已经晚上时分。

凌晨 2、3 点时，我听到急促的打门和喊话声。是郑伯。

“日本研修生快不行了，大概是心脏病突发，赶快跟我去专家楼！”

“好，走。打急救中心了吗？”

“专家楼没有电梯。他住在 4 楼。今晚全是女的值班。我想和你把他抬下来，楼梯窄的话，看看你能不能把他背下来。争取时间，急救车来了后马上开始抢救。”

一听背人，我心里开始发毛。“救人超过救火呀，你怎么不到对面的河南教工宿舍叫几个年轻老师，而舍近求远到河东宿舍找我呢？”

“因为你是外办的，尽管你现在是在休假，我还是相信你啊！你就当是在平型关打扫战场抬鬼子，行不？”

两人拼命踏着自行车赶到了专家楼。这时，急救人员已经开始处理病情并把病人送医院抢救，但是回天无术。一个优秀的学者英年早逝了。年仅 36 岁。

一天又到了午饭时间，我一进餐厅就见郑伯微笑着示意我坐下。

“今天吃啥？”

“百味菜，素鸡青菜，还有加餐。这是绍兴加饭酒，你先喝起来，我去给你做个好菜，野味。”

“啥野味？”

“山鸟。”

说着，他进了厨房，啪啪，啪啪，剁巴剁巴起来。

我好奇，也进去瞅瞅。没有见过他亲自下厨的，一定是特色菜！

这时，里面炉火正旺，鸟肉已经沾上面粉和调料，开始一块一块放入大油锅。一阵油气升起，鸟在油里欢叫，沸腾，很快成金黄色块块，香气扑面袭来。

“我们乡下人叫这菜‘左宗鸟’，源于当年左宗棠将军在新疆喜爱吃的一道鸡，味道甜，酸，辣，外脆内嫩，后来被传为‘左宗鸡’或者‘宗棠鸡’。乡下人吃不起鸡，而这种鸟在我们诸暨却不少。用同样的佐料制作，就称为‘左宗鸟’。”

“哦，我试试。”

一咬，确实是脆，酥，嫩，甜，酸，辣，俱全。只是肉有点老，腿骨很硬。我那天胃口不错，喝着酒，吃了一大盆。擦擦嘴，谢过郑伯，推出自行车去上班。

刚骑到学校门口，碰到专家楼工作人员王毅。

“怎么样，老鼠肉好吃伐？”

“什么？不是山鸟吗？哎……呀，原来这就是干净彻底地消灭？”

“你没看到郑伯今天自带菜板菜刀，还有锅子？厨师们都不让他用厨房里的东西呢！”

一口酸水涌上喉咙。“上当了啦，我！”

“小蔡，没事，没事。我是为你好，专门给你治病嘛。”郑伯凑过来说着。

“今天吃了那么多，我会不会要中毒了？”

“是药三分毒，以毒功毒。我们农村里如果有哪家小孩经常尿床，大人们就去抓老鼠，炖汤喝。抓完了东家抓西家，几个疗程下来就好了。我看你尿频，这是第一次治，完了我去浙大、农大专家楼去抓，那里我都熟。”

“得了吧！杭州高校专家楼的老鼠都归我享用，我不得病才怪，我鸟床啦？我有啥病？”

“你有小毛病。比如记性太差，丢三拉四。本草纲目里有记载：鼠肉，微毒，固肾，强忆，明目功能。我问你，上个月你到复旦外办干啥去了？”

“联系工作啊！我还顺便给你们拉了一单生意呢。”

“是他们带领外教留学生来杭州旅游一周，到我们专家楼住宿，用餐和用车这事吗？”

“对了。你得感谢我，这个月奖金有了，请吃饭吧！”

“人家到了杭州火车站没人接。你把你妈的电话当我们专家楼的给他们了。他们打你妈电话，而她老人家却把电话挂了，没办法只能联系浙大。”

回家一问娘实情，才知道出乌龙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还把人家电话挂了！”

“他们先说出你的名字，找你，后来说要有 30 多人到我们家来住宿，让我联系车子去接。我一听这事太离谱，你不是经常说，要防备诈骗电话吗？我就把它给挂了。”

我怎么会把电话号码搞错了呢？把老娘的当专家楼的联系信息给人家。哎，我真有病！

复旦的人也有病，难道他们听不出这是老年人的声音，竟把她当成服务台的小姑娘了吗？当然也怪我娘的声音太年轻。

时光荏苒，30 多年一晃就过去了。郑伯现在应该是 90 岁上下，我也到了耳顺之年。这些年来，他的那副臭名昭著的“山鸟”药方对我是否有像他说的那么有效呢？因为我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兴高采烈地被“治病”了一次，谈不上疗程，即使有点疗效也应该是微乎其微的。虽然我并不那么相信吃啥补啥的说法和偏方、私方、土方，以及祖传秘方，我目前的状况多少有点说明。当年郑伯没有瞎胡来恶作剧。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按他的说法，“左宗鸟”强记忆，补肾，明目。

现在我能够记起小学同学的名字和他们的雅号，有的有几个；睡觉前一杯水，不起夜；年过 6 旬，不老花，不近视，这辈子和眼镜无缘。

如果能够再见到他，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握着他四个指头的手，说：“嘿！郑伯，您这狗子，服了！”

高手在民间。

【悟叶儿·忆专家楼】

松木场，西溪坊。
淡绿小楼房。

书中宝，林间鸟。
泉边聊。
兴教育，芳华竞娇。

(2019年7月14日于多伦多)

[返回目录](#)

第六章：同学

永远忘不了我的 6 组同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纪念恢复高考 40 年，对我们 77 级有无数的溢美之词，什么精英会聚啊，什么空前绝后啊，似乎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好多朋友都对我说，羡慕你们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同学，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运气，最终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至少也落个教授当当。可是，真实情况远不是这样的，在光环的背面，也有辛酸、痛苦、无奈。

这是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一班 6 组同学毕业时的合影。从我们



12 个人身上就可以看出 77 级毕业生的真实生活现状。

首先我要怀念我们逝去的大姐，前排左起第二位。她是浙江

嵊州人，1968 年高中毕业，1978 年进入杭大时已经 28 岁。她学识丰富，为人热情，是我们小组乃至系里公认的大姐之一，经常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弟弟、小妹妹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但是，她又和很多知识女性一样，性格比较封闭、内向，感情脆弱，加之是插队落户时结的婚，家庭也不那么和谐，所以她时常郁郁寡欢。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一个县档案馆成为小公务员，却对机关的氛围一直不那么适应。1984 年，机构改革开始，她那个县要选择一个中年

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女性作为副县长，选来选去居然把她给选上了。谁都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她却不这样认为。她先是极力推辞，既而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最后居然失踪了好几天。后来，人是找回来了，但是副县长是绝不肯当了，依旧当她的小公务员，而且更加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多年以后，她静静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服毒自杀了。很多人不理解她的行为，我却不以为然。我非常理解她，同情她。当时，如果给她分配到学校之类的地方，如果环境比较宽容，如果没有那种突然提拔的闹剧，她一定还会好好地活在我们中间。她是真诚地厌倦机关里尔虞我诈的环境，害怕官场上吹吹拍拍的作风。她曾经来到杭州，向我倾吐她的苦衷。但是，她终究没有适应环境，而被环境吞噬了。她的去世给我们所有同学极大的震动，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具有大度的包容性，鼓励和允许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存在；告诉我们不管如何艰难，活着就是美好的，要努力适应环境，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道路。几年前，我们小组同学一起到她坟头上看望她时，大家都唏嘘不已，并以此自勉。

然后，我要说说我们的大哥，第二排左起第三位。他是乐清人，1966年高中毕业，是我们中文系141位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大哥的学识是我最景仰的，他是我们同学中公认的唐宋文学专家。1982年毕业时，学校、系里竭力挽留他留校任教。但因为要回家尽孝，他选择了回到乐清。直到退休，除了短暂的几年之外，他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和工作在乐清，先后在广播站、档案馆、县府办、县委党校工作过。毕业时我就坚决反对他回家，劝他留校，因为他的唐宋文学研究造诣足以继承杭大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的强项。前几年，我还和他说，当年要是你留校了，如今肯定就是中国唐宋文学研究的领头人了，就是全国知名的教授了。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说，做一个孝子，孝敬母亲，做一个父亲，养育3个儿子，此生足矣。所以，我敬佩他，尽管中国少了一个研究唐宋文学的专家，但我遇到了足以作为我人生导师的大哥，也是幸运的。这位大哥不仅研究唐宋文学很有造诣，而且行事为人颇有李白遗风，豪放洒脱至极。每每于醉酒之后笔走龙蛇，写下漂亮的格律诗或词。不过，因为醉酒，往往字形歪斜，

下一行写在上一行之上，令我们看不明白。等酒醒了问他，他也是一脸茫然，答不出所以然来。于是，大家一笑了之。更为搞笑的是，到杭大报到后第一次体检，我和他一起进入 X 光室做透视。轮到他时，医生说：“你不要背朝我，转过身来！”他回答：“我哪里背朝你了？我不是胸脯朝你的啊！”医生一愣，才回过神来，原来此公内脏居然是倒置的！大约一年多后，他阑尾炎发作，我们送他上医院，诊断时我提醒医生他的内脏倒置，果然发现他的阑尾也和旁人相反，在左面！真是世间少有之奇人！

站在大哥左面的同学和大哥是一对唐宋文学专家，写得一手好词，俨然苏轼、稼轩再世。但是，他后来走上了仕途，从县政府秘书干起，一直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文化局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主任，算得上是他那个县的政坛老人了。几年前，他来杭州，和我彻夜长谈，深深地表示了对当年选择的后悔，悔不该走进官场，浑浑噩噩、拘拘束束当了 30 多年官，还不如当初留校，现在好歹也是个教授了，总比小官僚潇洒，也受人尊敬。不过人生没有后悔药，如今也就只有发发牢骚的份了。好在他的女儿完全继承了他的衣钵，也读了中文系，后来还考上公务员。我嘲笑他说：看看，又走你的老路了吧！

在大哥右面的是一个性格老实，脾气有些倔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得不错，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但因为性格不怎么合群，一直提拔不起来。在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年代，他想变变环境，辞职到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当副总经理。一次我出差，到公司去看他，发现这家公司母子家族经营，容不得外人，就劝他赶紧走。后来，果然如我所言，我的这位同学离开了公司。但因为中断了公务员资格，只好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非常不得志。

后排左起第一位的同学和前两位一样，毕业后都是在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尽管他后来当了办公室主任，但他实在厌倦文字工作，就想办法调去经贸委做外贸。在熟悉了外贸门路之后，他果断地以年满 30 年工龄提前退休，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自由自在当老板去了。几年前，为了核对我们小组同学的联络方法，我打电话到他单位，居然听说他已经退休了，非常愕然：他只比我大一岁，怎么退休了呢？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样可以更加自由，做自己的主。如此潇洒，令我佩服。

我们小组 12 人里只有一位在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那就是我们的小妹妹，前排右起第二位。考进大学时她才 16 岁，高中尚未毕业。当时是以“同等学力”名义报名的，是全系年纪最小的同学之一。现在她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也算事业有成。

当然，我们中间也有进了机关，混得不错的。我算一个，第二排左起第一个，从毕业到退休，一直从事文字综合和宣传工作。我常常这样介绍自己，既然进了中文系，以耍笔杆子为专业，当然就该从一而终，以爬格子为业。前排左起第一个女生和我一起进了省级机关。后排左起第二个到了市级机关。我们三个后来都是处级干部。前排右起第一个是我的下铺兄弟，已经成了厅长。后排左起第三个也是厅级领导。而后排右起第一个则当过广电集团总裁，权力不小哦！

不过，总起来说，我们这些在中国语言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几乎个个都有些性格，个个都不那么合群。混得差的不待说，即便混得好的，我也知道私下里仍有不少苦衷。所以，77 级的光环之下也有他们的痛苦、彷徨和无奈，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中文的，实在不怎么适合当官，要不怎么有“文人误国”一说呢！

我曾经在一篇博文里说到，世界上最纯洁、最真诚、最密切的关系，应该算同学之间的关系。大学 4 年，首先是成就了我的世界观，成就我的学识，其次就是认识了这些同学。这是大学生活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同学。

[返回目录](#)

忆珊梅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祝静波

当杭大同学浓情扑面而来时，珊梅，你那娇小玲珑的身影、甜美的笑容总在我面前浮现。你现在看到我们了吗？你听见我们的欢声笑语了吗？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回忆一幕幕浮现。

1981 年，杭州的夏天如往常般潮湿闷热。刚办完入学手续的我，匆匆赶往寝室，想快点看到将要生活四年的房间究竟怎样。刚到门口，看到一个长相娇小的女孩正在打扫卫生，正准备爬上扶梯去打扫自己的床位。她的床位被分在靠门口的上铺。

“你好！”我们俩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忽然感觉很温暖，好像碰到了姐妹。我的床位靠窗口的上铺，跟她的连在一块。我们俩一见如故地聊了起来。她的老家在奉化溪口。她家三姐妹。聊着聊着，我们感觉不孤单了，渐渐兴奋起来。这时，寝室陆陆续续进来新的同学，来自省内的不同城市。大家都热情友好，纷纷介绍自己。新奇中，开始了从未体验过的大学集体生活。

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是李凤祥老师。他神情严肃，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英语精读课第一节先让每个学生选一个英语名字。珊梅的名字叫 Linda。课上她很文静，不太讲话，但跟人熟了后她的话也很多。她不抛头露面，不去竞选班干部，不主动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安安静静的。可她脑袋挺聪明的，每次考试总有好成绩。我们考试前晚上，总喜欢在大教室占个位置复习。她却喜欢呆在寝室里看书。放假回来，大家都带些家乡特产。她带的是奉化芋艿头，挺香挺好吃的。

大学第一年，学习都很辛苦，口语、听力、写作所有课程都不轻松。许多人带着地方口音讲英语，笑话百出。班主任特别严厉，一看到他进来，我们都紧张极了。只要他的眼神往谁身上一扫，我们就知道该轮到谁背课文了。谁都不想出丑，原始乡音还是忍不住崩出来，大家哄堂大笑。珊梅的奉化口音也不轻松。当老师批评她时，她眼泪

汪汪的，含着却没流出来，一副邻家小妹委屈的可怜样。不过，她的口语很快就过关了。

过了低年级到大学三四年级时，大家都老油条起来，旷课、谈恋爱等等花头可多了。也有男生喜欢上了珊梅，可她好像挺冷静的。她觉得，毕业分配可能要回老家，在杭州谈恋爱不现实。毕业时，她果真被分配到老家外贸局。

毕业后，大家联系越来越少。那时只有电话，还没有微信，但同班同学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听说她后来调到宁波市一家外贸公司，业务做得很好，中间被公司派到加拿大驻了二年。回来后，受到公司一位为领导开车的小伙热烈追求而结婚了。俩口子后来离开公司自立门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就列入有钱人行列。我们都觉得她了不起。她总是走在同学们的前头，每次时代浪潮都让她赶上了。国内赚钱后，又成功移民到澳洲。女儿考上了悉尼大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2005年，我们81级同学会相聚在建德。我们通知她回国，她没参加，但聚会前她回来过一次。我们英语小班同学小聚了一下。她还是那么年轻优雅。

那次聚会后，她又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介绍国内红酒买家，问我能否联手做澳洲红酒进口。因当时出口行情好，我忙于出口业务没放在心上。

大概在2013年，我去澳大利亚，专门给她打电话。她留给我们的地址是墨尔本一个郊区。我打了好长时间都联系不上。那时，我走在墨尔本街上，还傻傻地想，我们会不会擦肩而过？我逛墨尔本市中心集市时，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看过去，说不定碰到她，给她一个惊喜。因为听她说过她在当地租了个摊位，也许能碰上。可是我们没有联系上。

时间在默默地过去。这期间，在国外的同学都单独回来，能联系上的就聚一下。我们也想起珊梅，总以为她忙着生意，没工夫跟我们联系。大家总觉得将来肯定能聚的，不急。不过也奇怪，我们建班级微信群时，没加上她微信。

可今年 10 月 19 日上午，同班姜同学在群里忽然发了个消息，让我们都震惊了：珊梅已去世好几年了。这消息是他 18 日在一聚会中得知的。我们都惊奇不已。她生的什么病？为什么不跟同学联系？虽然社会上有同学间报喜不报忧的说法，但我们班同学还是比较随便直爽的。这下大家赶紧找她家人，联系不上她丈夫，最后终于联系上她老家的姐姐。她姐姐说，她是病死，中间也曾回上海看病过。

震惊、惋惜、悲伤！生命无常，可惜珊梅连最后告别的话也没说一句。

亲爱的珊梅同学，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当人生以宽度为标准时，你的一生已经很完美了。愿来生我们有缘再做同学！

（2018 年 12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追忆王清燕：外语系的夜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15 年某晚，我收到一条微信语音，出于好奇，就接收。经对方介绍，原来是杭大外语系 78 届许剑蓉同学。当时她正在日本旅行，行走在嘈杂的街道上。一阵寒暄，她说急着联系我，是受王清燕之托。紧接着，我和王清燕在断联 33 年之后，又复联了。她发给我的第一条微信是：“我太想你了，一直在找你”。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还唱歌吗？”她抱怨：“嗓子被五尺讲台给‘毁了’”。她庆幸提前退休，得闲在加拿大探亲，并上传令郎身穿毕业服的相片。那晚，一



弯皎洁的月光似乎带我闪回杭大校园。

王清燕，优雅迷人的气质，清新动人，清澈如水的眼眸，传情达意，杭大校园的夜莺，声入人心。

杭大四年，我俩之所以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对

声乐的共同爱好。一次杭大汇演比赛，王清燕和我组合女生二重唱。王清燕唱高声部，我唱中声部。选唱的单曲是当年流行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和非洲民歌《咿呀亚欧莱欧》。为了给《咿呀亚欧莱欧》加中声部，我俩赶至杭州歌舞团，找到陈良森老师（我好友黄琦的声乐老师）。说明来由，陈老师在钢琴前坐定，三下五除二，就把和声搞定。我和王清燕很享受每次的排练，因为我们外语系有一支出色的乐队，其中有小提琴手陈雯和王蓓。正在我俩四处张罗演出服时，同届的两位女生推荐其白色连衣裙。演出当晚，就凭一袭仙气飘飘的白

色长裙，两个协调的声部和悠悠琴声，我俩的女生二重唱，获得二等奖。演出次日，谭斐同学略带诙谐地说：“胡雪梅，台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俩啊。”小提琴手王蓓表示：“我就喜欢给你们二重唱伴奏”。我俩女生二重唱的名声不胫而走。记得中文系开晚会，邀请王清燕和我去助兴。杭大招生简章背面印有我俩的剧照。



趁着女生二重唱的东风，外语系77级牵头组织《蓝色多瑙河》大合唱，气势磅礴，极具挑战。记得大合唱《欢乐颂》中有一段演绎比较难攻，为了节省集体

排练时间，领导决定让王清燕，我和两位男生单独完成并另找时间练习。在紧锣密鼓的全程排练过程中，我和王清燕形影不离，不亦乐乎。王清燕还是杭大文工团的台柱子，她的女声独唱，荣获校外比赛二等奖。她在《于无声处》话剧中的演技，惊艳四座。



杭大毕业 33 年之后，通过微信，王清燕每每送来节日祝福。而全民 K 歌平台，让我感觉她近在咫尺。2016 年 10 月 2 日，我被邀登录全民 K 歌之后，哼了一曲《真的好想你》，轻触设为公开，便发布至动态。顷刻间，我的鲜花信箱显示红点，即收到鲜花。心想唱得不咋地，立刻有粉丝，暗自高兴。一经查看，献花者是 heiyang。我每发布一首单曲，便收到 heiyang 的鲜花。我抽空回访该歌友，忽见一张照片，定睛一看，是王清燕。我恍然大悟，heiyang 就是王清燕。从此，我俩不期而遇在全民 K 歌平台上，同乐。某日，王清燕私微我 IL DIVO 演唱《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的视频，邀请我合唱。由于当时版本不同，和全民 K 歌的合唱限制，我们未能如愿以偿。我试着打圆场，来日方长。



最令我难忘的是 2016 年 5 月某日外语系 78 届五班的同学会。邓梅妮，罗子江，傲兰，和我纷纷从国外赶来参加这一盛会。聚会前一天，我试着邀请王清燕，她二话没说，决定来见我。一眼 33 年，我们有说不尽的同学情，唱不够的校园歌曲。

2016 年的同学会竟然是我俩毕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欢聚。2019 年 3 月 6 日，一则噩耗传来：“王清燕于二月十一日在埃及旅行途中突发大面积心梗去世”。邓梅妮同学恐我伤心，难以入眠，次日才把王清燕遭遇的详况转发给我。



王清燕，你承诺去一趟杭大资料室，试图找找当年二重唱剧照，可尚未着落，就不告而别。我俩的合唱《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尚未录成，你就撒手人寰。

读着孙淦钊同学在微信朋友圈的英文悼词，我以泪洗面。邓梅妮同学安慰道：“让我们在心里哀思王清燕吧。”

王清燕，41 年前，你清纯透亮的歌声扎在学校大礼堂舞台上，你 Guten Morgen 的余音留在杭大校园清晨小道上。即便你乘鹤仙游了，你还是杭大人！

(2019 年 3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老 鞠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我对英语好的人一直心怀敬佩。原因在于我的英语成绩实在太差了。

上大学后，英语是我们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公共课。当时，学校考虑到我们这代人英语基础差异很大，便实行了快慢班制。分班时，英语老师说了这个安排后，我的同学老鞠当即提了个问题。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这快班有多快，慢班有多慢，您是否介绍得再详细一些？”估计从来没人当面问过类似问题，我记得老师一下被问住了，一时想不出如何来具体描述快和慢的区别。我对快慢没兴趣，反正我的水平自然去慢班混。但是，对老鞠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竖起耳朵想听听老师怎么回答。结果有些让我失望。老师回答的有些含糊，总之是说，快班比慢班在进度上和教材上要求更高一些，具体选择由你们根据自己的水平自己决定。这不还是没回答快有多快，慢有多慢的问题吗？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这么深，是因为事后经过琢磨，我发现理科生喜欢刨根问底，习惯于用量化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的特征。而事实上，社会生活上的很多现象是无法进行数学量化的。那么，英语老师回答不了老鞠，也是正常的事。

老鞠后来去了快班。他是我们同学中学习目标非常清晰的一个人。他学数学，只是为了辅助他的哲学研究，通过数理逻辑的训练来提高他的哲学思考能力。果不其然，如今他已是哲学界中的佼佼者，中山大学的博导了。

[返回目录](#)

杭大那些楼的人

—杭州大学财金系 92 级 苏敏

一所大学，不只是那些楼，还有楼里的那些人。我的杭大岁月，就是因为那些在我生命里闪亮过的人，才显得如此难以忘怀。

四幢：小家伙

我叫她小家伙的那个女孩，叫我是大家伙。我们是杭大最新最好的学生宿舍“四幢”的同层舍友，她是我说起女生四幢来，唯一想提起的人。

杭州大学是省属重点，生源以浙江本省乃至杭州本市的学生为绝大多数。我们财金系九四国金一班的，大部分是喝奶茶吃羊肉长大的大西北孩子，一个个人高马大，看上去孔武有力。我们这帮，在校园里绝对是个异数，独自把谁扔人群里，尚不扎眼。一旦集体出现，哪怕三三两两，在当时的杭大校园里就会成为一景，很有回头率。一方水土一方人，生长环境天差地别，自然让我们这些居住在四幢 418 和 436 的国金班女生，和周遭小巧灵秀、软语温存的本地女生相貌气质互相衬托，显得很有区别。于是，在互相好奇、新鲜过后，偶尔也会因为差异，而产生女生之间的龃龉摩擦。其他宿舍的小女生背地里叫我们是“新疆班”的，这三个字用以表达某种对于异类的些微排斥和恐惧。

我和小家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相遇相熟的。第一次见她，是在她们新闻系系学生会主办的一次校际运动会通讯员培训会上。自我介绍环节，我的开场白刚一结束，引来了与会者的小小异动，大家暂时忘掉了会议的议题，纷纷转而围着我，开始了叽叽喳喳的提问，不出意外地还是那些内地人对新疆的好奇。譬如：“你们是不是上学都骑马呀？”譬如：“你们都随身带着小刀可以随时吃羊肉吗？”还譬如：“能不能教我们说两句新疆话呀？”凡此种种、诸如此类。正在我再次顶着压力，准备开始第一百零一遍地回答的时候，有个小姑娘从角

落里站起来，朗声说了句：“大家先不要急着让苏敏同学回答问题好吗？让人家自我介绍完毕，有别的问题欢迎课后到四幢交流！”被解围了的我，向她投去感谢的目光。我看到她眼睛里亮晶晶的。下课以后，果然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簇拥着我们俩走向四幢。在送我们回宿舍的路上，就顺便把记者招待会开完了。这一次，我开心地回答了所有关于新疆学生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尴尬。在宿舍门口和大家道别以后，我和小家伙默契地相视一笑，手拉手一起蹦蹦跳跳地就上楼了，引得宿管大妈在身后笑道：“小伢儿今朝噶欢喜格！”

就这样，我交上了在杭大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她身上的活泼洒脱，和我身上的特立独行，甫一相遇，就立刻成为吸引对方的东西。两个小姑娘迅速挣脱了自己族群意识的束缚，成为了彼此欣赏，愿意互相接近的人。我俩的宿舍隔半条走廊，在四幢四楼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下楼去食堂吃饭、打水，要路过她们宿舍；她下楼去上课、出南门，要路过我们宿舍。对这个古灵精怪的短发、大眼睛小姑娘，我总是脱口而出“小家伙”。她也从来不加辞让，通常当场回怼以“大家伙”。我们俩一大只，一小只，常常在西盥洗室的水房里，一边洗衣，一边斗嘴，渔樵问答，浑然天成，总是引得一众观者侧目。我们还互相在晚上装过鬼吓过对方。记得有一次，她跟我说起她家乡台州玉环海边的台风，说到她上高中时候有次遇台风天断电，爸爸妈妈出去抗洪了，丢她一个人在家被闪电鸣雷吓得哇哇哭的故事时候，她自己倒笑得前仰后合、飒爽英姿，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我不禁用刚学会的杭州话嘲笑她：“脑西搭牢”。她就举着满手的肥皂泡泡跳过来挠我：“你这个骑骆驼上学的家伙！”她银铃般的笑声，和我杠铃般的笑声一起交响回荡在水房里。除了我俩，谁也不懂那一刻的快乐是怎样永远刻在了两个小姑娘的心里，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里想起嘴角就漾起笑漪。

别看小家伙平日里嘻嘻哈哈疯疯癫癫，只有我知道她内心有几多细腻婉转、风花雪月。见过她哭、见过她笑，见过她闹，见过她跳，当你认为她粗线条时，她却冷不防给你一份细腻；当你正为她嘤嘤作态发愁时，她突然恢复了古灵精怪。时间长了，我习惯了她的方式，

渐渐能够分辨出并耐得住她的情绪逻辑了。有一次，她突然靠在我肩膀上对我说：“大家伙你知道吗，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的。我想为了他留在杭州……”，然后眼泪就出来了。我故意摆出一副嫌弃脸说她“神经病”，心里却心疼不已。这家伙若不是真的陷入了爱里，怎么会这副样子？

她高我一级。我们国金大专班快毕业时，她也正面临着毕业设计和实习。曾经一度，她和我都在纠结盘桓去留的问题。有段时间，大家都忙得心慌意乱，彼此很少见到对方。最后那个寒假前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有天深夜，杭城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宿舍即将熄灯时分，我们两个同时从外面披着一肩雪花、裹着一身寒气回来，在走廊里相遇了。大家同时眼睛放了光，她拽住我的袖子霸道地说：“你这件衣服我要了！”然后就不由分说脱掉了正在融化着亮晶晶的雪花的外套，和我互相交换了穿上，然后就带着对方的体温交错而过，各回宿舍，并无别话。

自兹别离，各奔前程，二十四年不相见了，大家伙小家伙都已经是老家伙。此时此刻，假若能够重逢，我却已不想再见到她，我怕见到她老了，我怕她看到我老了。她的灰色羊毛大衣现在还在我衣箱底，跟着我走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经历了三十功名尘与土。我的那件她穿上很酷的黑色棉服，不知是否还在？小家伙，你是否已经和那个让你决心留在杭州的良人修成正果？你是否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幸福？

十二幢：龙师傅



龙师傅并不姓龙，他姓楼，伙伴们都叫他阿龙，是我的吉他师傅，法律系的，来自上海。因为他的存在，我拥有了仅有的几次去杭大男生宿舍的机会，从此标志着整个杭大校园，除了男厕所之类，我可以对外宣称我的足迹已经遍布了杭大的各个角落。

杭大的四栋男生宿舍盘踞在校区北部，排列公整，格局普通，设施老旧。除了接近北门的大食堂，出门上文三、文二路逛街方便点，女生宿舍，特别是新盖的四幢，在软硬件上几乎完胜其上，谁让这里住的都是糙汉子呢。南方人普遍重女轻男，可见一斑。

龙师傅之所以成为我的师傅，因缘有二：其一，他女朋友是小家伙的同乡和前闺蜜，于是龙师傅也就成了小家伙的同乡和闺蜜；其二，只因为在人群里多看了一个吉他男孩一眼，我就一度执着地立誓学吉他。看到我到处找书买谱子，还把姐姐的一把红棉吉他千里迢迢从济南背到杭州的疯狂样子，小家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我引荐了她的假闺蜜假同乡龙师傅。而且从一开始，就开始向其妖魔化我，连恐吓带利诱地说，要是不把我们大家伙教出徒来，整个新疆班的男生都会来打他。

龙师傅就这么被吓到了，对他这个被人强行安利的半路出家型学徒，他无比认真地重新制作了给我的专门教程，用手写体抄写眷印，还制作了干净素雅的白色封皮，送给了他的这个有可能带来 double kill 的学生。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恭恭敬敬地通过小家伙，向我发出了上课邀请，为我进行古典吉他弹奏的启蒙。按照师傅的要求，头次课我没有带琴，用他的，他要先看看我适合他的哪一把琴。我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十二幢底下，仰望着男生宿舍楼窗前的万国旗一样的衣服被褥和臭鞋而不知所措。虽然按照学校宿舍管理规定，女生在白天可以自由出入男生宿舍，但是头一次来到男生宿舍的自己，哪里有勇气就那么走进去？我手脚不知道怎么摆，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就那么在楼下傻乎乎地站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心里直念阿弥陀佛：幸亏师傅告诉我头次上课可以不背琴来。要不然更是窘上加囿了。等我稍稍镇定，准备鼓起勇气踏上十二幢大门口的台阶时，迎面出来了笑容满面

的龙师傅，远远就招呼我。看到他笑靥轻绽，轻声慢语，我的脸腾地一下又重新红了起来。

那天，在十二幢一楼东龙师傅他们宿舍，我从初级指法和古典吉他必须学的五线谱开始，开始正经八百地上了龙师傅的真传课了。他一个音符一个乐句地给我教，语速就像慢放了的英语听力教材。这个大个子戴眼镜的文静男孩，神态、气质就像武馆里的黄飞鸿师傅。他的认真强烈地感染了我，我迅速找回了认真投入的感觉，觉得自己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对待师傅的那支琴和谱架上的自编教程。以至于忘记了师傅宿舍的其他男生都跟我们打了什么趣，师傅又怎么回应他们的。忘了看男生宿舍里乱到地老天荒的样子，忘了听走廊里男生们呼朋引伴去打球、去洗澡的喧嚣。整个眼睛里只有师傅的手抄琴谱，为了企图把师傅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觉得自己耳朵都竖疼了。以至于忘掉了时间，直到龙师傅说，天不早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我才注意到，两个小时之前的落霞满天，已经完全变成了天黑黑了。我赧颜告别，油然地给师傅鞠了一躬，把他吓了一跳。后来，我被小傢伙揶揄，说龙师傅抗议她说，不要拿新疆班吓唬我，人家苏敏一点也不野蛮，人很温柔很有礼貌的。

尽管跟龙师傅学琴，我是吃的小家伙的人情霸王餐，不但没有付学费，甚至连饭都没有请过一顿。反倒是有次周末上课，刚好赶上饭点，还是师傅买来饭，招呼我吃。龙师傅从来没有马虎过我的课，以至于我就算想偷懒，也常常不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接下来，我甚至没有因为任何事而落过一堂课。连有次正上课停电了，师傅并没有停下来，把我带到了十二幢的天台，就着路灯光看着我练完了当天的所有指法，方才下课。就这样，我在大半个学期里，把师傅编的教程里的指法和练习曲都练完了。以至于以后的岁月里，已经扔掉吉他很久的我，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致爱丽丝》和《秋日絮语》两首曲子的和弦。我已经可以背着我的那把旧木棉，泰然自若地出入十二幢了。我练琴的声音也不再令十二幢一楼的走廊里呕哑嘲哳难为听了。

暑假就要到了，我的课终于告一段落。我已经忘记了当初是为了什么非要学吉他。我只知道自己从龙师傅那里学到的不是古典吉他演

奏技巧，而是什么叫为人诚挚、恳切和认真。龙师傅也要回上海看女朋友了。他常常自嘲自己和女朋友是黑夜里相错而过的小船。当初他为了女朋友从上海考到了杭州。可老天作弄，他女朋友偏偏又从杭州考到了上海。于是他俩常常上演戏剧性的一幕：一到假期，两人都为了对方而留在对方的城市里。两个人都盼着似乎遥遥无期的毕业，好迎来终于的靠拢归航。

转年二年级秋天开学，我从小家伙那里听到一个坏消息：龙师傅因严重的过敏性紫癜，暂时休学回上海住院治疗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一疼，但也隐隐有一丝快慰。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师傅这下和他的女朋友终于可以离得很近了。

[返回目录](#)

第七章：校园

杭大那些楼

—杭州大学财金系 92 级 苏敏

我的母校叫做杭州大学，小名叫做杭大，偶尔会被人叫做抗大。



自我毕业之后，杭大以进入“211”行列之身，被高校大鳄浙江大学吞并。我是她倒数第二届学生。我

见过她最后的辉煌和倔强。

我所有读书时代的记忆，都和杭大校园里的那些楼有关。

东一：初遇

东一教学楼，位于学校教学区的东南角。一进校门，沿着铺满樟和梧桐树荫的东侧甬道不到 20 米，在浓荫遮蔽下的一座黄墙青瓦、有着民国建筑风格的五层教学楼，就是它了。这是我们财金系的主教学楼。这也是让我对母校产生先入为主印象的地方，是我求学旅程的第一站。我无法不记得和它的初遇。

在八月末一个秋风得意马蹄疾的上午，妈妈把爸爸和我，还有我那小山一样的行李，从沙湾站送上火车，即将东南而去。年少的我如同就要脱缰撒欢的驴，忙不迭地刨蹄雀跃，简直志得意满。突然就不知抽了哪根筋，我对妈妈来了一句：“太好了！我终于能离开家了，

以后我再也不用回来了。”自己都觉得言辞有某种挑衅的意味。正值更年期的妈妈，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这个叛逆期显得特别长的二闺女口出狂言，没有理睬我。正要开启旅程而兴奋异常的我，故意不看妈妈的表情。多年以后我才承认，表面张狂其实心虚的自己，并不是没有看到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妈妈眼眶里满含的泪水。

平生第一次远出家门的我和爸爸跨越中国版图从东到西的万里河山，在各种火车、汽车上颠簸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个湿热的清晨，来到了杭州天目山路和西溪路相交处的这座校园。我那从家出发起就在一路减少的飞扬跋扈，在踏进了校园的那一刻已经完全变成了怯生生。我不承认我怂了，但我的脚踏进这个陌生城市的那一刻，心理确乎经历了一次断崖式跌落。我开始意识到把我像老猫衔小猫一样带到了杭州的爸爸，帮我马不停蹄奔波找人办入学手续的爸爸，在把他这不省心的二闺女安置好以后，是要离开的，是要留下我一个人踏上归家的路程的。我记不清这个宠爱老二有时到没有原则的爸爸，临别时跟我叮嘱了什么话没有，只记得自己在看着爸爸的背影，从学校大门口影壁后消失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和对未知的恐惧。一个人站在东一门口那棵大樟树下，我尿性地掉下了眼泪。

东一，就这样见证了我人生中的灰暗一刻。在爸爸背着他的小挎包头也不回地走了以后，我那多得令接待新生老师咋舌的行李被托运到了学校。系里一个个体子小小、头发花白的女老师推了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和我一起把行李安置到一楼的一间储藏室。我已经记不得她的面庞，可我记得那个小小的身躯，奋力地推着几乎要压扁轮胎的行李往前走的样子，像极了我的妈妈。

西二：魔法教室

杭州大学的前身是和大名鼎鼎的浙大同宗同族的求是育英书院。她虽然后来发展成综合学科类院校，但以文史政专业起家，拥有众多文、经相关的专业，颇具文科院校的气质。杭大的法律学院和心理系，在我入学的时候已经是院系翘楚，据说学术能力在当时的国内高

校园里算是拥有姓名的。也许是这两个学科拥有某种相近的气质，他们共同拥有了一座西二教学楼。



西二和现在已经变成逸夫楼的东二，对称排列在校园主干道和中心绿地两侧，青砖黑瓦，样貌老旧、气质森严。

建筑风格在校园里所有的教学楼里，算是有些特别的，倒也和他的专业蛮搭，弥漫着一种古怪的气息。如果不是正值上课和自习时分，每次走进它，只是听到教室里日光灯镇流器发出的嘶嘶声，都会让人感觉到似乎有古老的幽灵，盘踞在它那长而幽深的走廊、老旧的教室、逼仄的楼梯，说不准在哪个深夜就从黑板后面游荡出来，在幽幽的花园深处，与晚归的你相遇。

学校里有的是更宽敞、更新的教学楼，可是学校的社团活动偏偏喜欢在西二组织。那时的我每次去参加社团活动时，都不得不麻着胆子跑到西二。由于年代久远，教室的门牌已经失轶，或者模糊，一般情况下想要找到某次活动的举办地，是需要从走进楼门就开始在心里默数的。沿着它那漫长、幽暗的东西大走廊，在法律系一楼的有着宏大气象的大阶梯教室中间，一间一间的找寻，如同进入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算是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也能被它的森冷之气完虐。

但是西二的这一切皮相，都还不足以对我的灵魂进行攻击、渗透和摧毁。真正让我灵魂出窍的，还是在这里出没的人。法律系和心理

学系的地盘中间，由一道曲里拐弯的室外回廊相通。对，我没记错，就是在这里，在那条回廊的某一段路上，我曾经有一次在不同的地点遇到过同一个男生。对，同一个。不，我没看错，也不是我对他有感，实在只是因为他那让人过目不忘的样子，特征实在太过明显。以至于多年以后看到《魔戒》和《千与千寻》时，脑海中电光石火地出现了西二遇到的那个男生，我觉得他分明就是咕噜和无脸男的合体。最神奇的是，后来我总在西二遇见他。他如同会瞬移法术的精灵，前几分钟才出现在我去找大教室的路上，后几分钟就已经出现在西二二楼的走廊尽头。那些让人魂飞魄散的诡异相遇，我至今无法用科学解释。以至于我渐渐笃信，这世界，一定有平行世界，而我，一定有特异功能，能够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事物。

西四：朗曼辞典



杭大在在杭高校里算是个小家碧玉，这是我在对比了浙大大姐头，杭大周边的其他高校以后，得出的结论。她的坐落气质也符合这个特征，前有西溪河，后依文三路，左揽松木场，右邻黄龙洞，温婉可人，宜室宜家。杭大从育英书院时代开始，就静若处子地在这样依山傍水

的杭城一角，不张不扬存在了将近百年。但是古老却不是杭大的标签，年轻才是。

杭大校园里显得最年轻的教学楼就是西四了。豆蔻梢头二月初嫌幼，浓妆淡抹总相宜嫌老，西四就是一个如菡萏初发的娉婷女子，既有风貌，又有韵致。其实西四的建筑也并不年轻。她之所以能在一群如老者般沧桑肃穆的老教学楼里显出特别的韵致来，是因为她的颜值和她的气质。在葱茏的中央植物园西侧的她，粉黄和明灰相间的外墙，映衬着宝蓝色的顶，真的是绝尘出众。而且她的教室很多都拥有宽阔的玻璃，采光很好。春有阳光明媚，夏有晚照斜阳。西四是外语系的主场，这里出入的软妹子的密度，是校园里别的角落的好几倍。它的公共教室里是学校里除图书馆外，男生们自习最喜欢去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欢去蹭课的教学楼。

想在江南灵秀地、温柔馥郁乡的杭大外语系教室里蹭堂公共课，或者是上一次自习，需要的不光是君子好逑的执着，还需要厚脸皮。我曾经因为自己的座位被人抢去，而在西四三楼某一个教室里，将对手遗忘在桌上的一本占座用的朗曼英文词典，气咻咻地扔到了讲台抽屉里。后来我曾经屡次去悄悄侦查，那本砖头一样的朗曼自此就一直呆在了那里，似乎主人已经将它完全抛弃和遗忘，从来没有来寻找过它，而我也从此再没有见过词典的主人。直到那学期的期末，最后一次去西四那间教室。忿而藏书的心情已经完全平复的我，悄悄地将字典取出，擦拭干净，郑重其事地放在了那个曾经发生过刀光剑影抢位战的课桌上，期待它的主人能够原谅我。时隔多年以后，仍然惦记那本朗曼辞典有没有和它的主人重聚，仍然赧颜于年少的暴躁和促狭。兄弟，你的朗曼我还给你了。

西一：辛德勒的名单



西一是旅游学院的教学楼，和东一隔花坛和东西干道相对，共同拱卫这学校南校门。在腻了东一的时候，我常常会就近跑到西一，因为这里的教室新而且干净，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它坐拥西南的轩敞视野。杭大南面而立，所以头排的西一能够看到一望二三里之外葳蕤葱郁的宝石山、黄龙洞。记得刚入学那会，我常常会在想家的时候，一口气跑到西一的楼顶去看窗外不远处的山岚蕴秀、雾霭云霓，还有炊烟袅袅的西溪人家。在江南不多的晴朗日子里，甚至还可以看到陈经纶体育学校大操场上的茵茵绿草，引着我春天去放风筝，夏天去骑单车。

我所在的班是委培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镀金修文凭的带薪上学。大一那一年，因为孤独，因为好胜心切，我是班上唯一一个考英语四级的，成为了大家侧目的对象。然而因为基础差，学习非常艰苦，一本书一本书地啃模拟题，还是进展堪忧，常常觉得屁股后面有一把火，烧着自己。我最常去复习的地方就是西一，因为那里常常有老师给免费辅导听力。第一个寒假来临之前，没有复习充分的我仓促上阵。考

试那天是杭州的冰碴天十二月，屋里屋外一样寒冷刺骨，我从冰窟一样的西一回到宿舍，四处静悄悄的，大家全都出去过星期天了。我望着空荡荡的宿舍，觉得筋疲力尽，百无聊赖。我想逃离这种令我恐惧的孤独感，逃也似地离开宿舍，无精打采地在校园里转了半天，不知怎么就信步又回到西一的考场人去楼空的教室，找个角落，坐了下来。习惯性地打开随身听的电台，耳朵里一下就灌满了《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帕尔曼小提琴的弓弦，如同泣诉在了我心尖尖上。我突然悲从中来，拽掉耳机，头埋在臂弯里，放声痛哭，好像要把积攒了一个学期的孤独、委屈和焦虑，全部化成嚎啕，释放出来。

从那以后，我每次想家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会跑到西一，找个没人的教室角落坐下来，或哭或不哭。等自己重新整理好心情的時候，常常是落霞满天，或者是雾雨蒙蒙。西一听过一个游子最脆弱的哭泣，也看见过她擦干眼泪自我救赎，挺起腰杆重新出发的样子。西一如果有灵，一定也会知道那个曾经在角落里的懵懂女孩，因为成长，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北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如果要评选杭大的各个角落中我去的最少，可印象却最深的地方，排除男生宿舍，那就非北园莫属了。所谓北园，就是主校区北面隔条马路的一片院落。这一片小小的域外飞地，是属于杭大生物系的领地，遍布郁郁葱葱的植物。其实，它就是一个园子。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学期的一门专业课在北园上过。这是一件比较莫名其妙而又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这门专业课，这个到处长满青青爬藤、离离碧草，在我眼里如同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生物楼院子，在我的杭大生涯里，基本是没有机缘造访的。这略显神秘的校区中，一草一木，一石一瓦，总是能强烈地激发出我甚浓的玩心。每次北园有课，我都感觉像要去郊游一样的欣喜。一般在北院的课都是在下午。如果没有雨下，午睡起来散步过去，甚妙。杭州难得一见的阳光慵懒地照在这片闹中取静的优雅之地。这里是老校区，没有超过三层的楼，那些大庑顶、黑屋檐、木门楣，透着一股无法言说的人生况味，在饱经风雨沧桑之后，散发着厚重敦实的气息。如同一位隐者，将自己的前世今生都淡出，沉默地面对眼前这些学子们，不愿讲述，无需诉说。只有园子西北角落里苍苍衰草间，那一块有竺可桢校长名字的简朴石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从主校区到北园的路上，要横跨一小段热闹的文三路。从学校北门一出来，就能立刻感受到迥异于南门天目山路的风格。在这条窄窄的文三路上，集中了几乎杭城一半的电脑公司。那个年代，互联网才刚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只有少数文三路上的IT业翘楚们，才刚刚能借助很慢很慢的猫，登陆互联网的世界。有一学期的寒假，我没有回家，来到文三路找了一家电脑店打工。每天早上，我打那一家家门头走过，此起彼伏的都是Windows系统启动的乐音。现在想来，没准哪一台电脑后面就有当年的马云，正酝酿着梦想，开始自己的一天，也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一天。想必这些风云变幻，在文三一隅洗练沉默着的北园，把一切都见证在眼里，刻画在心头了吧。

离开杭大二十四年了，又是两轮甲子。我做梦重回她的怀抱，场景也永远是教室，足见这些散布于校园主干上的教学楼对我影响深远。

[返回目录](#)

难忘的文二街杭大政治系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郭占恒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在部队参加了 1977 年秋季恢复的大学考试，有幸成为百万高考大军的一员，有幸考入位于杭州文二街的杭大政治系，由此开始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大学生活。四年寒窗，不仅学到了经久耐用的知识，结下了弥足珍贵的师生情谊，还找到了一位心仪合适的女生。

一、狭小而简陋的杭大政治系校园

1978 年 3 月 6 日上午，经过漫长的 4 个多月的初考、统考、录取、准备和长途奔行，我从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县的海军航空兵一师，来到了杭州西子湖畔文二街上一处不显眼的院落，门牌是 128 号，单位是杭州大学政治系。她就是我的大学母校，严格意义上说，是母校的分部。

那时候，杭州大学本部坐落在天目山路上，对面的杭大路通往距此不远的松木场居民区和黄龙洞等景点。杭州大学历史悠久，与浙江大学同根同源，前身分别是创建于 1897 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尔后分分合合，各自都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还记得当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北有北大，南有杭大”。

由于“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杭大校园一下子容纳不了 958 名新生，只好把政治系、中文系、生物系等安置在校外附近，称之为分部。我们政治系开学初有 124 名新生，后来又很快加招了一个 20 人的走读班，成为学校的大系。我实际上是在文二街杭大政治系分部读完四年大学的，对文二街的钟情与留恋远胜过本部及杭大路一带。

那一天，当我沐浴着初春的阳光，迎着和风，肩背军用棉被，腰挎军用书包，手里拎着不大的提包走进杭大政治系时，全然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校园竟是那样的狭小和简陋。

杭大政治系校园的前身是建造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浙江省财贸干校，估计占地面积也就十来亩。四周由简易的砖头水泥墙围起，似曾刷过的白灰早已暗淡。校门是两垛略显外凸的水泥柱，一边挂着白底黑字的“杭州大学政治系”牌子，有无大门似不明显，旁边有个小边门。看门并兼管信件收发的叫童师傅，年约六旬，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热情健谈，曾在杭州邮政局工作过，是我们每天进出校门几乎都能看到的长者。

走入校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棵不大不小的雪松，周围种植了一圈低矮的冬青树，路边还种植了一排不大不小的青松，另有几棵有些年头的樟树散落在校园。雪松和青松后面是一幢两层高的教学楼，一楼有几间小教室，二楼有一间大教室、一个阅览室和几间老师的办公室。每次上大课的时候，全年级 144 名同学集中在二楼的大教室里，坐在扶手椅上，边听边做笔记。小教室则主要用于上外语课、选修课和自习课。大教室里有一台系里唯一的电视机，但平时只有新闻联播、重大体育赛事才让我们看。周末好一些，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和不回家的杭州同学，早早占据有利位置，欣赏诸如《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也为现场直播的女排比赛和乒乓球比赛摇旗呐喊。

教学楼的右侧是一幢两层高的男生宿舍楼。我住在一楼。宿舍里摆放三组上下铺的木床，我住在下铺，赵永法同学在我上面。在老政治系时，同寝室的还有陈广建、景跃进、谭庆华、程晓峰等。后来分到经济系时，又与陈洪檀、吴敏一、徐俊等同学同住过。那时候，我们宿舍没有卫生间，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同学们洗漱、上厕所都要跑到楼东头朝北的一间公共洗漱室，几排水槽，四面透风，装几个水喷头供夏季冲凉。冬天洗澡则要跑到杭大本部去。

教学楼的左侧有个小操场，四周种植了几株白玉兰。每当春天来临，先花后叶，亭亭玉立，暗香迷人。操场既是通往食堂和女生宿舍的过道，也是同学们上体育课的地方。由于场地狭小，只设置了 1 个篮球框和半个排球场。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每天下午坚持锻炼，或打半场篮球，或打半场排球，玩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有位马姓同

学，入学后废寝忘食，患了夜不能寐的失眠症，时有深夜起来跑到操场拍球投篮，自己折腾自己的经历，一时成为笑谈。

广场的左侧有两排筒子楼，前排为老师宿舍，吴雪娣、何冬梅等一些年轻老师住在那里，常常带着呀呀学语的小孩进进出出。后排是女生宿舍，因不便常去，没有更多印象。

女生宿舍后面是学生食堂，也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就像一处空荡的厂房，光线暗淡，缺桌少凳。同学们大多买好饭菜回宿舍吃，或一边走一边吃，回到宿舍也就差不多吃好洗碗了。那时候，食堂最好的饭菜就是大肉菜底，一角五分一份。一块烧得油光发亮、肥瘦相间、连皮带肉的红烧肉，加上些许绿油油的青菜底，是当时我们舌尖上最好的美味。吃上一份，一天的学习都充满了力量。可惜当时要凭肉票供应，去晚了还没有。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为祖国，为母校，也为自己而奋斗。

二、像久旱逢甘霖一样拼命读书

我刚进校时，系里尚有两届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又有 1978 级、1979 级等新生入校，使小小的校园一直处于饱和甚至有些拥挤的状态。在这些同学中，我们 1977 级的学生无疑是一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群体。

作为因“文革”中断高考十年后的首批大学生，职业五花八门，年龄相差悬殊，水平参差不齐。从职业上看，有来自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复退军人、在校教师、插队知青的大男大女，也有来自应届高中毕业的学弟学妹。从年龄上看，有 1946 年出生的，也有 1961 年出生的，相差竟达 15 岁。不少同学已婚嫁生子，有的甚至有了三四个孩子。记得一位林姓同学有四个儿子，形成“儿子读小学、父亲上大学”的奇景。从水平上看，有的一直从事教师工作，语文、外语基础非常好；有的则是来自工农兵，知识早已荒芜多年，外语只能从 A、B、C 学起。同学之间的水平甚至是先生与学生的差别。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面对知识的渴望，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拼命读书，异常勤奋，是现在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清晨，大家天不亮就起床，睁开眼睛就开始背英语单词。几乎每个同学都备有英语单词卡片，就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从早念到晚，无论是走在路上，排队打饭，等候看电视看电影，还是同学集会约会等，都离不开背单词。有位赵姓同学，没有一点英语基础，整天背外语，词典都快背下来了。后来，他去了奥地利，成为一名华裔领袖。而我的语言功能极差，功夫虽下了不少，每次外语考试通常也只有75分，只好留在国内发展。

白天，除上课外，大家都泡在阅览室或跑到学校本部图书馆借书看书。冬天的时候，教室比外面还冷，大家就搬起扶手椅，来到校园朝南的墙角下，穿着厚厚的棉衣，沐浴着冬日的暖阳，闷头看书。夜晚来临，虽说学校要求9点钟熄灯休息，阅览室也早早关了门，可同学们或在昏暗的路灯下，或拿着手电筒躲在蚊帐里看书。数年如一日的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使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大一结束时就戴上了150度的近视眼镜，成为我们老郭家第一个戴上眼镜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老师们比我们还辛苦。许多老师刚从五七干校或闲杂岗位归队，大部分老师没有职称，有的甚至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老师名分。虽说校园里不时看见一个叫严群的精瘦矮小老人，据说是严复先生的侄孙，是系里唯一的哲学教授，擅长古希腊哲学。可惜老教授年事已高，没给我们上过课。在任课老师中，拥有最高职称的像教我们《资本论》原著的谢瑞淡老师，当时也只是个副教授，而教我们哲学的薛克诚老师——后来当过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当时还只是个讲师。然而，老师们淡泊名利，夜以继日地辛勤耕耘，没有教材就动手编写，来不及印刷就油印，来不及油印就口述。记得谢瑞淡、王荣、丁之江等老师编过《资本论解说》讲义；蒋自强等老师编过《经济学说史》讲义；王荣、吴梦娇等老师编过《政治经济学》及名词解释讲义；王学启、杨树标等老师编过《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讲义；李普国等老师编过《中国经济思想史》讲义；余式厚等老师编过《形式逻辑》和

《趣味逻辑》等讲义。后来这些讲义大多成为公开出版的教材，老师们也都一个个晋升为教授。

三、政治系裂变为经济系和哲学系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打开僵化的头脑和封闭的国门，一切在发生变化，一切又似曾不变；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又感到迷茫。大学更是这样。

作为杭大政治系的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改革开放的思想激荡，似乎是我们的本能。记得年龄稍长一点的同学，热心参加学生会民主选举活动，积极组建竞选班子，走班串系发表演说。而有的同学热心组织法律、逻辑、世界语等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虽外语不好，还是应邀参加了世界语兴趣小组，后来学了半天也没什么用。有的同学热心创办一份名为《思考》的杂志，不过只出了四期，就被定性为“非法学生刊物”停刊了。还有的同学热心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组织的讨论，讨论一封署名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提出的“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引起全国6万多人热议，其中张旭昆同学撰写的文章被《中国青年》杂志看重，还应邀赴北京修改稿子，文字变铅字，出名又赚钱，着实令人羡慕。

有段时间，社会上风靡的交谊舞也传到校园。一些爱好者就利用食堂空地，找来一台四喇叭的收录机和磁带，三三两两你教我学，但响应者不多，总体上也没成什么气候。而有的同学醉心于冲洗照片，买几包显影粉、定影粉和几张相纸之类的，找间空房弄成暗室，洗印出来的照片还真有点专业水平。其中，赵杭生、宋培勤、陈广建等同学都是高手。有的同学组织大家排练大合唱《长征组歌》，记得指挥是高年级同学、海军现役军人李彪，领唱的有杨爱琴、田路等，我是滥竽充数混在其中。当然，大多数同学喜欢的文娱活动，就是花一毛多钱，来到只有一墙之隔的文二街露天电影院看电影，记得当年许多刚解禁的《红楼梦》、《阿诗玛》、《大浪淘沙》、《青春之歌》、

《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大卫科波菲尔》、《流浪者》、《望乡》等都看过。也有的男同学为了省钱，趴在宿舍二楼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偷看”，自嘲是看“包厢”电影。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大三开始，杭州大学取消政治系，分设经济系和哲学系。分系的时候，学校还算开明，完全由同学们自愿选择。我虽说从小喜欢哲学，但考虑到未来中国更需要“经邦济世”的经济学，就选择了经济系。大概许多同学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政治系144名同学中分到经济系的有87人，分到哲学系的有57人。

分好系，门口的牌子总要换一换。班主任吴雪娣老师知道我在部队宣传科写过美术字，就叫我来写。我也比较听话，没有客气推辞，

就利用周末两边略微凸柱上，找来漆，分别写美术字：“杭
济系”、
学哲
学果
果说，
我们
级同
学既
是系
的终
结



在校门口起的水泥排笔和黑上宋体美州大学经“杭州大系”。如这批1977杭大政治者，又是

杭大经济系和哲学系的创立者的话，而我摘下老系牌、书写新系牌的经历，也算是记载了那一历史性时刻。

真到分系的时候，同学们还是依依不舍。

1980年9月10日上午，杭大政治系1977级同学汇集在教学楼的雪松旁，按班级拍下了一张张集体照。其中，我们一班40位同学的集体照上，写下一行醒目而意味深长的文字：“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全系 25 个学生党员还特意组织到照相馆，拍下了一张“中共杭大政治系七七届支部合影”的照片。实际上，同学们在政治系结下的情谊，早已融化在记

忆里，从来就没有淡忘过，一直到现在，到永远。

四、简朴寂寞而浪漫多彩的校园生活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简朴寂寞的，也是浪漫和丰富多彩的。那四年，我见证了同学们由相识到相知的过程，见证了杭大政治系的嬗变成长，也见证了杭州文二街的变迁。

那时候的文二街，还只是一条短短的柏油马路，宽不过两车道，长不过数百米。而通往学校本部的沿河小路还是条砂石路。每当车辆碾过，尘土飞扬。小街上，挨挨挤挤的都是学校。除了我所在的杭大政治系外，记得周边还有杭州师范学校、省市团校、杭州商学院、杭大中文系、杭州外国语学校、海洋二所等等。街上有一家露天电影院，无论放什么电影，总有附近的学生来看，既看电影也约佳人。

在露天电影场东面拐角上，有一家商店，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或随便转转看看，或随手买点学习生活用品。尤其是过年过节，食堂利用伙食结余加餐时，我常与周克非、郑祥福、赵坚等几个男同学拿着茶缸子来到小店，或打二两烧酒或打半斤黄酒过过瘾。

当时文二街的西面全是稻田、菜地和桑基鱼塘。每天清晨或傍晚，我们走在绿草盈盈的田埂上，或背外语单词，或准备考试要点，或闲聊散步，或聆听虫鸣蛙叫，以缓解紧张的学习压力。

那时候的同学都很勤劳简朴，相互帮衬。困难同学可申请补助。补助分三档：最低每月不足 10 元，最高不过 18 元。当时，我已当兵多年，每月津贴费可拿到 20 多元，还有军衣用品可发，俨然成为班里的“大款”。平时，男生大多穿蓝灰色衣服，稍讲究一点的，也只是带条假领；女生大多梳着麻花辫，穿着碎花上衣和百褶裙，整天素面朝天的，也挺好看。

我们还在校园里种菜，每个小组分一小块地。我是农家子弟，从小会种菜，就到卖鱼桥市场买来菜秧，带领小组同学种下，然后精心浇灌施肥，蔬菜长得绿油油，卖给食堂赚点小组费。

周末或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分组搞一些郊游活动。记得我们小组同学曾泛舟西湖，在曲院风荷搞烧烤；也暴走过十里琅琅，然后到“楼外楼”里搓一顿。

当然，那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毕业前夕找到了一位心仪合适的女生。她是杭州人，身高 1 米 66，体型微胖，面色红润，梳着两条粗壮的发辫；虽貌不出众，穿着朴素，但掩饰不住青春的活力，是系里的女子排球和篮球队队员，还拿过学校运动会女子铅球第 1 名；虽不善言辞，但为人谦和热情，常常是未曾开言口先笑。她一直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一度还代理过班长，经常给同学们发发饭菜票、检查寝室卫生和组织一些文体活动，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

那时候，学校是不允许同学谈恋爱的，而我和她的事系里老师没有干涉，同学们也是赞许的。记得毕业前夕，董君舒同学在我的《学友录》上题字：“军人的敏捷与学者的眼光使你得到了一个高尚的女性，它还会使你得到更多的东西。”学生会主席王东祥题字：“事业和幸福是可以并存的，但必须要有柔和它们的艺术。”还有一位已看不清落款印章的同学写道：“人们在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是得到两种东西：事业和爱情。许多人为此追求了一生，而你在四年大学中成功获得了这两者。”

我们在中文系的求学日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跃

一来二去，这曾经在杭大中文系学习的岁月都过去了近四十年。你若说它如梦如幻如丝如云，怎么形容也不过分。那份眷恋之情在心底深处，有时浓厚得象一曲醇酿，始终不能释去，连自己也为之吃惊。

一、我们的校园

我们当时的校园，更确切地说是中文系的校园，坐落在杭州城北上宁桥的西溪河畔。西溪河应该是个不错的名字，但当时怎么看却略嫌寂寞：河道杂草丛生，河的一边是七十年代的数幢灰白水泥建筑楼，有居民居住，一座简陋的小桥供人跨河而过；另一边则由柏油路铺就一条细道，照例也无自行车道和行人走道。二辆公交车勉强相交通过时，总是扬起一片黄色的尘土。但西溪河畔又夹有一片可贵的绿色和清荫，众多高大的绿树和枝叶在轻风摇曳中，倒映在有些干枯的水面中，掠起一汪水鸟，为清谧的地块增添了些许情趣。

当我踏进校园的时候，则被惊喜、惊奇和惊异的不同情绪所包围并起伏不已。校园是西溪马路对面的一处寂静场所。门口方形门柱上“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个鲜红的大字醒目地把人带进一个绿树环抱的小天地。也无路牌和号码，里面约有不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有二幢五十年代建造的大屋顶飞檐翘角的行政楼和教学宿舍楼。前者在校园的进口处不远，后者呈 L 字形由校园左角触底一字排开。校园的后摆是一丛稻田和荒芜的绿草，开有一扇小门。有时关着，可通往隔壁很有些喧闹的杭州外语学校。



（图为现存的原中文系行政楼）

刚入学的我们被安排在宿舍楼的一二层。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没怎么进行粉刷，走廊上略嫌黑暗和肮脏。由于刚成为大学生的兴奋，也没顾及太多不适。我当时被安排在二楼厕所对面的一间宿舍，有高低铺同仁六人。因为新奇，便在这不大的校园自得地神游一圈，看到我们宿舍楼外的平地上，还时有鸡鸭齐鸣。原来校园内有居民杂居，个别教师和外单位的人窝居于此。人们进进出出，走廊上堆放许多杂物，狼藉一片。



（图为现存的原中文系学生宿舍楼）

我忽然为这校园与我想象的一丝距离而百感交集。这儿没有想象中的廓大，没有无尽的教学楼排列成序和运动场、图书馆交错成行。这儿莅临在校本部之外。只是作为大家庭分支的遥远一角，它让我们在四年的求学之中，为进入百米外的校核心奔波来回。比如，上体育课、校图书馆借书、在校剧场开会或看为数不多的电影、在校书店购书等等。当时在外同样比邻一角还有附近的政治系和生物系，算是让我们感到同盟的可贵和共享凄凉带来的快乐。

我们上课的教室先在宿舍楼的一层。由于教室不够大，也由于我们一百多的学子总数庞大，只能将人数分为三个班，并在三个教室进行交叉上课。这种浪费教学精力和时间的做法，不久得到了改变。我们三个班被编成二个大班，并将已有的图书室改为大教室上课。却还是嫌过分拥挤不便，继而升级到校园内的大礼堂去上大课。说是大礼堂，顶多可被看作是一个大仓库。我总是被它那单薄粗糙的外表和空间所震撼。一百四十多张右侧有一块可以放置本子的椅子，像海洋中的碎礁一样，星罗密布齐聚在礼堂中。礼堂没有吊顶，有无数根房梁从空中赤裸裸地横跨而过。地面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其它原因，

没有铺上水泥，只是极其生态式的泥坪，散发出一阵轻微的潮气。礼堂后部有一大截空地，可以让人翩翩起舞，只是不太平整，很有些夹脚。

然而，也就是在这校园大礼堂和其它简陋的图书室、操场、食堂等的包围中，由远及近，由近及深，最终把我们四年的校园生活捆扎得严严实实，甜甜蜜蜜。

2011年，当我们阔别多年，同学聚会专门来到这个已归还省总工会干校、曾经让我们惊喜、惊奇和惊异的校园时，寻访到那河畔、宿舍、教室和大礼堂；往事涌怀，历历在目，一再感叹岁月的流逝和对校园的无限感慨和亲近。



（图为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三十年纪念日在原中文系行政楼前全体合影）

二、我们的爱情

那时，我们是年龄跨度很大的一班同窗，既有刚从中学还没有读完便招考进来的少年，也有儿女已成行的父亲母亲，还有血脉旺盛身体诸多发育完成的纠纠青年，都到了向往爱情，期望收获爱情、追求爱情的大好时光。一进学校，先被不成文的规定通过各种渠道告知，除了已经成婚的以外，不再提倡新生的男女恋爱。于是第一感觉，这比刽子手还更无人情更残忍的做法，将把四年的学子们对爱情的任何尝试，做成空中楼阁，纸上画饼。在不可阻挡的生理要求的冲动之下，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谈过恋爱的人，已成婚没有机会见到老婆的人，便开始反抗，用各种方式冲击对于封闭男女感情的障碍和堤坝。

我细数起来，大约有这样三种方式。

一是结过婚的个别老三届同窗，以暗示或直截了当的引诱，渲泄对男女感情的美好冲动。几乎每个宿舍之内都有一个结了婚拖儿带女的老三届同学。我所在的宿舍也不例外，他叫吴晓，被我们一致称为大哥。他为人极好，富有才华，上学时已有二个孩子。在我们对面宿舍，也有一个成婚的姓周的老三届大哥。周同学常故意对未婚的同窗大声宣扬获得老婆的幸福。于是，常常在夜半，我们能听到对面宿舍中，在一帮童男子的要求下，周同学津津有味地叙述闺房秘事，招致爱情没有任何经验的室友激动不已，笑声嘘声不时传出门外。

二是也有少数胆大同学开始偷吃禁果，不惮任何束缚开始男女交往。他们私下开始约会，在教室中眉目传情，在校园中玩失踪，闲暇赴外偷着游山玩水，包括我们班中最终有幸产生了而后走在一起的几对夫妻同学。

三是陈世美式忘恩负义的故事出现，丰富了当时爱情多样化形式。在学校中先是出现了徐广元事件。政治系的徐同学因欲将农村已成婚有孩的妻子在上大学后予以抛弃，被报刊上揭秘后，让当时充满道德情怀的社会对校园骄子进行了强烈谴责。于是，徐同学被勒令退学，凄然回乡，算是为民女伸张正义。二十年以后，当我偶然在徐老家县城碰到徐同学时，其将我归为短暂校友，并黯然问我认识其否，我只是哑然。他说自己就是当时全校轰动一时臭名远扬的徐同学。我被眼前这个面目苍然、在一个社会角落冷落谋生男人的意外出现震惊，喉咙有些哽咽。

有趣而让人发噱的是在学校求学期间，个别人在校园中成就婚姻。会敲一手伶俐快板的余同学，因入学前为县剧团演员且年龄偏大，学校学习期间特许得以成婚。于是，新娘来校走访新郎，完成新婚之夜。我们大喜过望。记得临时新房就布置在大礼堂一侧房间，设施十分简陋自不必说。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出钱，纷纷送些薄礼和新婚嫁妆。我所在小组送的是一只搪瓷脸盆。同学们大呼小叫目送，作为庆贺。第

二日蜜月的早上，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那礼堂出口，似欲从余同学的脸上找到焕然一新的重生感觉，调侃的笑声时时从四处响起。

三、我们的讲台

荣幸的是，当时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学校的精英。中文系曾是个实力雄厚，出过不少名师的院系。比如，夏承焘先生是闻名全国的词学泰斗，蒋礼鸿、王驾吾、徐步奎先生等在国内学术成就斐然，文革前就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些先生除夏先生不在校之外，先后都为我们亲自上课，且谦和温婉、风度翩翩，让人充满崇敬之心。王驾吾老先生上课为我校正名说，中文系是浙大文理学院的班底，无论是历史沿革，还是人文实力，都不在他校之后。教职人员如蔡良骥、郭在贻、吴熊和，陆坚、蔡义江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对学生视如家人和孩子般的平和亲密，则让我们获取知识之余，在人格上与学习能力上也受益非浅。

教学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长歌善吟的刘操南老师，那时约已有五十开外年纪，矮小生动，富有戏剧性变化，其对古典诗词的痴迷和入情无与伦比。记得第一次在上其《楚辞》课时，其先自陶醉，二眼低迷，口中说到动情处，便仰其颈部，用极古怪的唱腔开始拖腔吟颂《楚辞》中的帝高扬之苗裔的诗句，我们这些在文革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一下掉进了雾里云里，弯着腰笑成一片。刘先生逢诗必唱，丝毫不嫌犹豫。另一姓刘的老师教现代文学，天生一个瘦高的身躯和满身激动的夸张个性，说话时快速如机枪扫射急不可挡，在上现代文学名家沙汀的三十年代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时，分析其中小说主角邢么吵吵，表情激越，叽叽喳喳，手舞足蹈，同学干脆把他本人叫为邢么吵吵，笑成一团。教古典文学的邵老师，字迹清秀，能在黑板上书出极漂亮的板书，只是让学生大量摘抄他板书上的教学内容，让我们有些烦闷。教写作的汤老师，因住在校园内，在我们眼里是个爱妻模范，常看到他在教学闲暇，带着美丽的老婆在晚餐后悠闲散步，十分幸福。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徐步奎，曾著有古典戏曲名著《牡丹亭》、《长生殿》的专注，是全国知名的戏曲研究大家。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和内容以一古杂剧为题，专门论及老夫少妻在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当我将其提纲交给他时，他曾含蓄邀我西溪河边小坐。我们一起漫步，他边走边聊建议我稍作内容调整，将老夫少妻之题变一新题目，而我不知老师也有老夫少妻的难堪经历和劝说的良苦用意，则顽固不化，一再坚持提纲不变。待我将毕业论文最终交付老师定稿时，老师则无比宽容地对论文最终作出良好评价，让我至今对自己的不识时务充满愧疚，对他的正直善良和可贵人品无比钦敬。

四、我们的学业

在文革后第一批考试入学的我们，对学业的勤奋和用心，也是史无前例。入学之后，除了白天认真完成各类授课之外，校园内课余的教室始终人满为患。无数的同学，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都匍匐在课桌之上，仔细阅读各种书籍、课余资料和学术文本。除了饭堂吃饭，无不放弃休息和假日。晚上，教室皆灯火通明，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在教室迟迟不肯离去的难忘经历。

那时，我们最激动兴奋的还有二件事：

一是购书。新华书店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时，中文系同学常倾巢而出选购，怎么都不辞辛劳。杭大的新华书店，文二街的新华书店，更是大家热衷而不弃不离的亲密场所。当半夜排队和多次往返购得书籍时，大家引吭高歌，兴高采烈，以为一生的幸事。并把购得的书籍像宝贝一样珍藏在自己的书箱里，那怕同窗室友也决不肯轻易出借。

二是听讲座。记不清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哪一年，先是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名导岑范来中文系讲课。在那个大而无当的大礼堂中，岑导坐在一个小桌旁，风度倜傥，语言叙述极度幽默俏皮，把我们全系的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随着他的谈笑风生，大家此起彼伏，忽而低笑，忽而大笑，忽而短笑，忽而长笑，完成了一次我们最不能忘情的文化讲座。而后在学校的剧场中，我们又聆听到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报告。全系百多号人早早到了现场等待。曹禺先生像活佛一般的圆

胖身材，慈眉善目的笑脸，还有一口极其纯真的京腔，都让我们无比倾倒。他的再婚妻子京剧名伶李玉茹优雅地陪伴他身边，随时为他润嗓倒水，让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暗地里奔涌着实心实意的美好祝福。我们多次为曹禺先生精彩论述所沉醉，也为我们能当场目睹二位电影和戏剧大师的个人魅力和风采而折服并荣幸，报告结束后久久不忍离去。

除了学业，课余的生活虽单一也无不孕育着生机和活力。系的校园隔壁紧贴的是一个新迁来的国家海洋二所，大兴土木完成新建筑不久，却对我们这些学生十分友好。因为是穿军服的军人，所里经常在其新操场上由部队放映电影。看电影是我们从来的最大爱好。有电影的夜晚，常常有力冲击我们在教室中的学习关注度。在吃过晚饭后，很多人就溜进所里去看免费的电影，所里的门卫则宽容地将我们放入。

下午四时以后，则通常是同学体育运动时段。多以打排球为主，校园中会不时响起排球的抛起声和吆喝声。我在这里学会了排球的发球、传球和技能，并强身健体。

同学中创办了业余社团，取名“扬帆诗社”的社团，一时搞得风风火火。不少后来我们中有些名气的诗人就是出道于此。记得还有我们一位杨同学，对新闻业务情有独钟，创办了油印小报“星期一晨报”，一时也让我们大快朵颐。热衷戏剧表演和广播朗诵诗文的陈同学吴同学等则用极佳的礼堂演出和朗诵，为我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丰富内容，让我至今难忘。

（2019年6月12日）

[返回目录](#)

第八章：荟萃

我的杭大情缘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我在杭州大学（以下简称杭大）接受了四年本科教育和两年半研究生教育，是杭大的铁杆校友。杭大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大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一直都想为杭大写点文字，也曾经在杭大数学系 82 级毕业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同学会上写过一点文字，但总觉得不足以充分表达我个人对母校杭大的真情实感。所以，近日来我一直在酝酿以“我的杭大情缘”为标题，写一篇文章，以表达我对杭大的怀念之情和感恩之情。

1982 年 7 月，我考入杭大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开始了我的杭大情缘。1986 年 7 月，我从杭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计量学院基础部数学教研室任教。1995 年 9 月，我考取杭大数学与信息科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研究生，开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又续上了我的杭大情缘。1998 年 2 月，我如期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并顺利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非常高兴地获得了杭大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理学硕士学位证书，成为杭大最后一批硕士毕业研究生，厚实了我的杭大情缘。其实，当时正在酝酿四校合并，我属于在职研究生，学制有弹性，完全可以延长至少一年学制，这样就可以获得新浙大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理学硕士学位证书，但是我觉得还是该实事求是，不想也没有这样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准备趁热打铁攻读杭大教育学或管理学博士学位，终因学校领导没有同意而未果，就这样定格了我此生的杭大情缘。

为什么杭大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如此之重？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在杭大接受六年半的高等教育？为什么我始终以杭大校友为荣？原以为这三个问题不难回答，但到了真正动笔之时，却发现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确实不太容易。这也就是我迟迟没有动笔写写杭大的主要原因。这次静下心来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简要谈一谈我的杭大情缘和杭大对我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一、杭大之美令我心醉

从新生报到至毕业合影，从学业生涯到校友聚会，一个不变的地点就是杭大正大门至图书馆、东西两排教学楼之间的校园景观带，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杭大之窗”。这是杭大之美的精华所在。之所以称其为“杭大之窗”，是因为这里集建筑、庭院、园林、花园、公园和植物园于一体，融杭大的内在美与外在美于一体；既集中展现了一种独具杭大特色的校园建筑之美、校园环境之美、校园景观之美，又呈现出杭大校园昼夜之美与晴雨之美、风霜之美与雪雨之美、春夏之美与秋冬之美，是杭大之所以为杭大的标志性校园景观。作为杭大学子，有幸置身其中，自然百看不厌，确实令我心醉。

二、杭大之大令我心安

杭大之大在于办学空间之大、办学规模之大、办学胸怀之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拥有 600 多亩的校园面积和 6000 多名在校学生的大学，已经足够大了。尤其是当时杭大的办学目标和办学实力，也展现出宏大的办学胸怀，足以振奋人心。置身于校园之中，时刻感受到杭大之大和自己之小，确实能够令我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三、杭大之全令我心仪

杭大之全在于学科门类齐全、办学层次齐全、办学设施齐全。想当年，杭大是全国学科门类最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是国内较早同时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也是办学设施十分齐全的大学，具有浓厚的“民主，和谐，大气，开放”的办学氛围，能够很好地满足莘莘学子的学习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确实令我心仪不已。

四、杭大之博令我心服

杭大之博在于图书馆藏之博、教师知识渊博、办学视野广博。杭大图书馆是杭大的地标，其外形呈倒丁字型，蕴含着博与专的关系，其馆藏之丰富，令我叹为观止。杭大师资力量雄厚，各学科名师荟萃，其知识之渊博，令我敬仰不已。杭大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胸怀全球的办学视野，成就了堪称一流的办学水平，确实令我心悦诚服。

五、杭大之专令我心静

杭大之专在于学科之专、图书之专、教师之专。杭大的综合性建立在学科之专、图书之专、教师之专的基础之上。杭大的每一个学科和专业在国内都有其独特的地位，每一个系的资料室都有其专业性很强的图书资料，每一个系都有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杭大数学系就是杭大之专的典型代表，足以令我静下心来学习和研究。

六、杭大之魂慰我心灵

杭大之魂来源于悠久的办学历史、厚重的办学传统、卓越的办学精神。杭大的前身是清末创办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其办学历史、办学传统、办学精神的深刻内涵已经集中体现在“求是育英”校训之中。可以说，“求是育英”是杭大办学之魂的根本体现，始终在无形之中抚慰着所有杭大校友之心灵。

七、杭大之情扣我心弦

杭大之情在于母校之情、师生之情、同学之情。母校之情是全方位的，蕴含在校园文化、校园建筑、校园环境、校园设施、校园故事之中。师生之情是很深厚的，贯穿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引导、激发的人才培养过程之中。同学之情是很难忘的，凝结在教室、食堂、

宿舍、图书馆、运动场、校外活动场所的学习生活记忆之中。若问我的杭大之情有多深？只要一听到“杭州大学”四个字，我就会下意识地心头一颤，可谓杭大之情扣我心弦。

八、杭大之恩沐我心田

杭大之恩在于知识传授之恩、能力培养之恩、素质教育之恩，说到底是对我的再造之恩。试想一下，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一个不知大学、学科、专业为何物的年轻人，经过数学专业四年本科教育和计算数学专业两年半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能够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有用之才，这不就是再造之恩吗？！可以说，经过杭大六年半的培养教育，我的身心都已经被打上了深刻的杭大印记，所以，杭大之恩将永沐我的心田！

（2018年5月12日）

[返回目录](#)

永远的杭大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吴晓

公元 1982 年，跨入新年的杭城，连日阴晦，天光昏昏，雾霭沉沉，欲雨欲雪。1 月中旬，正是学期最后的一周，而对于 1977 级大学生，却是修业四载，面临毕业分配即将离校的最后时刻。阴郁的天空即是心情。20 日，在校的最后一、二天。在原省总工会干校二楼学生宿舍里，杭大中文系 77 级的百余同学，忙着作最后的道别，相互在对方的同学录里作诗、题词。是日晚，听闻五组的吕子尚将是第一个离校，回他的家乡永康工作。同学们便纷纷聚到他所住的 205 宿舍，为他送行。

这是一个难眠之夜！我步入 205 房间，也已 11 点许。仍有不少同学坐在下铺的床沿上。分别时刻，每位同学都有风萧萧的悲壮感。我转身从门口到窗口，又从窗口到门口反复走了一遍，然后举起桌上酒杯：

“从门到窗，从窗到门，这短短的 8 步，吾等走了 4 年！他日即便有幸再来走这 8 步，夫复何时？”众人泪下，举杯一饮而尽！

是的，我们 77 级学子，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可看作母校杭州大学新生后的长子。在此毕业离校之日，所能想到的，只是何时回母校之怀抱重聚首，何时能回来看望母校；谁会去想，10 余年后，母校居然校破楼空，河山易主，不复存在？！

杭州大学，我永远的梦！

（一）梦起花果山：十年蹉跎十年期待

这个梦始于六十年代的花果山下。这花果山即是金华一中，位于金华与龙游之间的一处偏僻荒坡之上，浙赣线在附近穿越而过。金华一中，当时全省高考四连冠，入一中就是入大学。我 1964 年 9 月入学，到 1966 年 5 月，这一年半时间，是我们学知识，长心智的最宝贵的黄

金时间，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老三届”的唯一机会。这之后，戴上红袖套，冲上福州到北京的长途列车，在北京睡地铺，带回一身虱一身臭虫……步行长征，从金华到井冈山，每天走 100 多里，有时甚至一天 150 里。走到后来，那已经不是走，是用肿胀的脚在一寸一寸地挪，边挪边哭！好不容易到了接待站，顾不得吃一口饭，倒头便睡！……串联，游行，串联，这样闹腾了一年多，大学是停招了，同学们作鸟兽散，回乡的回乡，入伍的入伍。1968 年 3 月，花果山下，我送同班几位好友入伍，同学握住我手：

“诗人，你怎么办？”

“我想读大学。”我轻轻地，又是十分坚定地说。

“你肯定想读文科。读哪所大学？杭大吧，杭大中文系名气可大了！”

“我想……应该是吧！”

运动接二连三，大学梦的确是个梦，只能搁置了。后来得以进工厂，从学徒工做起，每月拿十几块钱。10 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住两个人，房里两张硬板床，一张小长桌公用，两个小方凳。我把小方凳侧翻着坐，床板当桌子，写起诗来。投稿的对象是《金华日报》、《浙江日报》等，时有发表。我的工厂是搞拖拉机汽车修配的，写的诗歌都是身边的事，还颇具生活气息。1971 年末，为纪念某一个讲话 30 周年，省里搞征文。我整理出几十首诗歌，寄给了金华地区文化局，再由地区统一交省里。后来省里的《纪念征文》刊出了我的几首诗。1973 年春的一天，我在厂里上班，传达室的老师傅交给我一个邮件，大小像一本书，从北京寄来的。我诧异，北京可没有我的亲朋哦。拆开来，却是一本英文杂志。英语我在高中学过 1 年多，到那时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封面的刊物名称我读懂了，叫《中国文学》。我急急地翻呀翻，在中间发现几页分行排列的，那肯定是诗了，题目下看到我的汉语拼音名字。这才知道一首百行长诗被译成英文发表了。这首诗的题目叫《农机修理车间放歌》，估计是从省里的征文专刊中选去的。此诗虽受那个年代放歌风的影响，但写出了一线工人的风采，纯真而激情充溢，今天读来仍能引起对当年工厂生活的美好记忆。

之所以较详细复述工厂的写诗经历，却是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时序到了1977年，这年夏，我接到省作协的通知，参加省作协在莫干山举办的诗歌创作研讨会。那是八月下旬吧，在芦花荡，剑池边，我遇到了同样也来参加诗歌研讨会的杭大中文系的两位老师：蔡良骥，余荇。也就在那几天，广播电台播出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我当即找到蔡、余两位老师，急切地说：“蔡老师，余老师，我就考杭州大学，做你们的学生！”两位老师也非常高兴：“好的，欢迎欢迎，我们在杭大见！”

这是1977年夏。从67年高中毕业算起，整整10个年头过去了，大学梦几乎早已抛在了岁月的远方！而此时此刻，云开日出，柳暗花明，那梦又在向我招手，老天重新投给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不二的回答：考，抓紧备考！

回到厂里，第一件事就是找书，找高中的教科书。当年只读过不到两年的高中，高三的书本来就缺，赶快去借呀！好在我的工厂离母校金华一中不远，我立马骑上自行车奔向花果山！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一个个地找，一个个地借，顺便还请教一些问题。书，基本上搞到了，那就争分夺秒地看。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已经九月了，离初考还有2个来月。粗粗看第一遍，重点难点看第二遍第三遍。要紧的是高三的函数，当年没有学过。那就自学，集中力量攻关（后来数学卷最后一道函数题大多数人做不出，我做出来了）！由于紧张忙累，后半夜睡觉背上冒虚汗！11月上旬是初考，淘汰了大部分人；12月复考，自我感觉不差，回厂上班等待消息。

等啊等，1月下旬，录取通知书终于等到了！是杭州大学的，我被梦寐以求的杭大中文系录取了！我感谢命运的垂顾。离开高中，投身社会与工厂，已然10余载。期间，一遍遍做过与以往同学在一起读书的梦，梦想校园生涯。梦醒思绪难抑，要读大学却几乎无望！如今杭大中文系把我录取了，且是我一心想读的大学，我感到分外满足！后来，母校金华一中的老师告诉我，我是以金华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录取的。入学后，遇到蔡老师余老师，说在第一批录取名单里就有我了。

（二）圆梦杭城，在母校楼顶看到最辉煌日落

杭大，深深向往的学子奔你来了！

报到是在春节后的3月7日。在城站下了车，接新生的大卡车把我们接到杭大校园。进校门时，“杭州大学”四个劲健拙朴的大字一闪而过，就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办理好相关手续，被告知中文系设在校区以外的省总工会干校。随之，便有上届的工农兵学员，热情地用双轮车给我拉行李。出了校东门，沿着西溪河往北，走了10多分钟。工会干校到了，我的中文系到了，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77级，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历史也给了我们责任与使命！77级的同学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这份光荣与责任，自豪、自尊、更是自强！

77级的到来，系里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可敬可亲的师长，77级永远记住你们！

工会干校，四番寒来暑往，四载朝朝暮暮，走的每一步路，说的每一句话，仿佛如在眼前如在耳边！清晨，一大早起来，忙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匆匆去做操，匆匆吃早饭，匆匆去大礼堂上课……大礼堂，冬寒夏热的大礼堂，夏日如蒸还能忍受，冬日的寒冷记忆却是无比深刻！单薄的裤子，坐在那冰冷板凳上，半天暖不起来！有同学拿来洁白泡沫板做坐垫。他们放弃了，我就捡过来，坐在上面暖和多了。感谢你，温暖的泡沫板！

犹记得入学后不久，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诗社。我对德强说：诗社名称就叫《扬帆》吧！我们要扬出西湖，扬出钱塘江，扬出东海，扬向世界！

犹记得同学们买书的热情，当听说书店有什么新书到了。哗，一大早就去排队！

犹记得文二街的露天电影场！越剧电影《红楼梦》、《碧玉簪》，看了好几遍还看。看得泪流满面，只好悄悄地抹（男人流泪不好意思啊）！

犹记得在行政楼前，守着一个14吋黑白电视机，争睹中国女排横扫千军的气概与风采！

更记得我们的寝室，我的同室：刘建国，黄顺刚，卫军英，张跃，赖明和，曹必英。我们7人同居一屋近4载，情同手足。建国的爽朗，顺刚的幽默，军英的机敏，张跃的率真，明和的耿直，必英的质朴，洋溢在那狭小的空间，挥洒在无限的岁月！（补充：我们的第十组除了同室的7位，还有吴雪景、计伟强、陈智为、孔伟英、徐伟慧。雪景的豪放，伟强的严谨，智为的柔婉，伟英的贤淑，伟慧的聪颖，印象深刻。此外，常参加我组活动的还有徐艰奋、毕玲蕾等，被称为“编外组员”！）

大家的情感交流，更多的集中在每天熄灯后的卧谈会，谈学习，谈见闻，也谈女同学！给女生打分，取代号……，会有女生“装饰了你的梦”！其中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豆蔻年华，情窦初开，恋爱是迟早的事。开始不知怎么得知，小跃有一个一同下乡插队的女生叫小英子的，考上了杭师专。卧谈会上我们集体审问，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小跃当然不可能爽快承认的，半推半就。接着全寝室集体作案（小跃除外）上演了这样一出戏：我们给小英子写封信，就以小跃的口气，说买了电影票，请她于哪月哪日去看电影。好不好？好！敢不敢写？敢！敢不敢寄？你敢写我就敢寄！于是，第一位就拿出了信纸，第二位就动笔写信，第三位拿出信封，第四位拿出邮票，封好，贴上！谁去丢邮筒里？小卫：我去！过一会问他，真的扔进去了吗？扔了！会不扔吗？到了此时，大家才真的有点慌了：小英子来了怎么办啊？

到了那天，小英子真的来了，轻轻地敲门。开门一看，来人高挑的身材，穿一身那时也算靓丽的冬装，脸红扑扑的，几分兴奋几分羞涩！可这时候，根本没有小跃的人影，早躲避到哪儿去也不知道！

怎么办？只有我出马了，我是年长的大哥啊！我把小英子带出了工会干校。那是个冬日的早上，西溪河边，寒霜未化，水面冰凌晶莹，岸上乌桕殷红。我跟她谈人生，谈情感，谈知己的不易得。我说你与小跃虽非青梅竹马，却是少年相识，患难与共，这份情感来之不易，应该珍惜，应该呵护。小英子默默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这些话，聪慧善良的她都听进去了。在西溪河边这样走了两个来回，也就只好让她先回学校了。

以后，小跃和小英子怎么交往我们就知道了，反正后来他们结成连理了！那次玩笑性质的举动，推动了他们内心情感的升华，应该说是肯定的。多年后我对小跃说，你可欠我一杯喜酒哦！

是哦，那是爱的岁月，但那时候大家却不太敢谈爱。大家把更多的爱给了自己的专业：爱文学，爱诗歌，爱语言文字，爱学术底蕴深厚的中文系，爱自己的大学，为作为杭大的学子而骄傲！

中文系办学虽然设在与学校本部有数百米的工会干校，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与学校有丝毫的心理距离。其实有许多课，许多活动都是在本部进行的。例如体育课，例如运动会，例如图书馆借书等等等等。我与德强也曾在本部为中文系二年级的同学作诗歌创作讲座。我们也常会到学校大门口，以舒同书写的“杭州大学”几个大字为背景拍照……

野马分鬃……手挥琵琶……白鹤晾翅……，我的体育课，选修了《24 式简化太极拳》。体育课就在东门进去的篮球场里上的。从工会干校出来，到校东门，就沿着西溪河走。那年月，干校到上宁桥是公路，上宁桥往校东门这段，还只是泥路，一边是菜地麦地，一边就是朴实无华的西溪河。我们一年到头在河边走，或去上课，或傍晚散步，看它水流无声，花开次第，且连接着学校本部，自然对它特别喜爱。

那是一个秋日的傍晚吧，我们在校本部看到了非常醉人的日落！我，杨甘霖，还有另外 1 人，是自亮？余刚？我们几个散步进了学校北区，但见一座在建的大楼已经结顶，脚手架还没有拆除。我们几人便猫着腰钻进脚手架，顺着毛糙的楼梯，一层层地爬上了楼顶！抬头一看，天高地阔！原来这楼顶已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了！往西望去，一片农田，农田之间，片片树林，林外是山，山外更是山。但见太阳西斜，辉光蒙蒙。

在这个高处，与天似乎更近了，与地也是更近了。登高望远，古来如此，其中因由，我觉得并非只是为了一展眼界。在高处，你获得的是别样的思索。因为只有在高处，你才可以反观自身，反观来路和去路。一个人当你寓居城市行走街巷时，你实际是被搁置的。在高处，

你才能找回生命的一些本真的东西，终极的东西。如子昂的幽州台之独，文正的岳阳楼之忧。

我望着远山的轮廓，山与天的交际线，那里有着无限的深意。回望脚下，暮霭浮动，开始布置夜色。内心浮起许多念头。毕业临近，去向何方，不免几分惆怅与茫然。我们几人看着想着，相对无言。

这时，渐渐西沉的太阳接近山峦，那光芒也由炽白变为火红，碰到云头，便激射出无数道更为亮丽的光芒！我意识到一个壮美的时刻到来了！太阳要落山了！我们静静地凝眸而视。天光不断变幻，西天布满了云霞，原来这些云团、云朵、云层，都是为了迎接太阳落山而存在！云朵使得夕阳的光芒更加绽放如花，云团使夕光更为雍容饱满，云层使夕光分出深红、橘红、暗红的无比丰富的层次！在它们的映衬下，太阳的弧线无比优美！西天更加绚丽辉煌！宇宙似乎在演绎一场光与色的壮剧！而视野所及的树林，田野中低矮的山岗也被镀上了层层光晕，向着这颗伟大的宇宙之心致意！我们被震慑了，沉醉其中，几近忘我。

与云霞的作用不同，山的存在，则是为了使落日返璞归真。在山的吸引中，夕光收敛了！这场演出很快就要过去了，太阳谢幕了！太阳的坠落不同于日食——那是缓慢的雕刻；而太阳的落山，则是一种跃动，就像是婴儿的诞出，完成在瞬间，消失在虚无！于是黑夜真的降临了！亮星分别点缀，排列天幕……

这是我在母校高楼上见到的辉煌落日，是在母校土地上经历的一次黄昏乐章！它虽不是发生在观落日的胜地瀚海大漠，名山大川，它的撼人心魄，却无与伦比！这是偶遇，也是机缘！

在我看来，日月经天，原本寻常，唯圆月与落日最为醉心。这次经历，催我写就了《致黄昏》一诗，发表于《人民文学》，并被多个选本选用。容我抄录几行：

你富丽辉煌，竟可与黎明竞胜
你温存丰盈，万物倾慕你的风韵
站在历史的交接处

你是属于白天还是夜晚？
你是一剧的终了，还是又一曲的开端？
你是画册的封面，还是书后的跋文？

母校楼顶上看到的落日是美的。可是那个傍晚，谁又能想到，我们的母校，在她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居然已步入黄昏，即将告别她深爱的大地和群山？！

[返回目录](#)

我的大学时代

—杭州大学中文系57级 孙崇涛

一、去省城读大学

1957年9月初，是我告别18周岁，告别亲人，头一回远离家乡，去省城读大学的日子。新的人生旅途从此起步，延续家乡戏缘半多世纪的他乡戏缘生涯也从此开启。



从家乡瑞安县城到浙江省城杭州，现在自驾车跑快速公路，半天足够；坐飞机，不消个把小时，而在那时，最快也得经过一天一宿的旅途奔波：清晨县城出发，先坐一白天长途汽车，到达半途的金华县。然后，在那儿转坐夜间火车去杭州，次日凌晨抵达。

接送校车没到，需等很久时间，待上班钟点才能开来。在久等的时间里，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守着自己脚下一路用扁担挑来的两头行李。这是贫困父母和四门亲长辈给我凑起来的大学四年生活的全部家当。里头有母亲缝改的旧棉衣、被褥，家里匀出来的洗漱用具，姑妈、姨妈给我购制的衣裤鞋袜等等。行李中唯一显贵的器具，当数大舅妈送我的那只带锁扣的牛皮箱，半新不旧，光照下泛着金黄色的亮光，令“物主”我倍增“身价”。

好不容易等到了校车，接站老同学帮我们新生一起搬上行李。车子驶过市中心中山路、官巷口、解放路，路过西子湖畔的湖滨路、六公园，至昭庆寺，向北拐进保俶路，经松木场、道古桥，开进没有大门的校园。一路饱览杭州闹市繁华和西湖湖光山色，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人间天堂”，眼前铺展出新的人生画页，真有说不尽的心旷神怡。

在校园，我四处看到铺天盖地的“反右”大字报，上头的一些人名还被打上红叉叉，触目惊心，感到“天堂”也不是宁静和充满温情的世界，它照样也有棒喝和杀气。

报到注册后，我领到了学生证与校徽。我马上别上校徽。有了这份大学生“图腾”，我顿感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到校不久，我去照相馆给自己拍了一张半身照，留作纪念，还寄回一张给家里，好让父母看看当了大学生的儿子是副什么德性。

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别小看照片胸口一角显露的校徽与自来水笔，在全国40多万名考生中，仅有10万8千名能别上这枚代表当时最高学历的标牌；自来水笔是携带者文化级别的重要代号，其形象含量，可比现今“奔驰”、“宝马”车牌，还不知要贵重、体面多少。说什么，我也得让它“显摆”出来。

二、室友

报到第二天，同房室友陆续到齐。两位来自我家乡邻县平阳：原平阳第一中学专职团干部叶永锡，属“调干生”，带薪读书；另一位是平阳第二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张志政。把我和他俩安排一室，我想可能是校方出于照顾同乡的考虑。一位是江苏南通某中学毕业的陆坚。再一位是原籍绍兴，现居杭州，杭州一中毕业的王继阳。最后来的是上海五四中学毕业生钱苗灿。他来得最晚，跟大家熟得最快。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发觉我们六人性格各异，甚至还有个性反差。比如，叶永锡的老到与张志政的天真，陆坚的沉稳与王继阳的单纯，钱苗灿的活泼与我的内敛。叶永锡一到，房间床铺、用品、书籍，很快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看得出是个善过独立生活的能手。睡在他上铺的张志政，空时会坐在床铺上把弄他少时积攒的火花、图片、邮票一类小玩艺儿，像个没有玩够的大男孩。陆坚生活、做事一丝不苟，就连衣装、头发、眼镜都比别人整洁许多。王继阳少言寡语，听他讲话，必需侧耳倾听，方可明其大略。平时房间内谈笑声最多的要数钱苗灿，每天他都会给大家带来许多趣闻和快乐。后来知道，大家对我的评价

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我平日不爱说话，开会发言也总要留在最后，来个“出奇制胜，语出惊人”。我的“小器晚成”，或许早有定数。

一年来，大家同处一室，十分融洽，从不发生任何矛盾摩擦，甚至连回争执也不曾见过。大概那年代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本来就比较单纯，想的只是如何读好书。后来，渐渐你争我斗起来，甚至彼此伤害，弄得人人自危。这都是政治运动制造“阶级斗争”的结果。——两学期后重新分班之后的情形就是如此。

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同室六人一起去学校不远处的“黄龙洞”游玩。末了，在景点门口合影留念。

三、打麻雀

1958年开春，“大跃进”成为时代主旋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大炼钢铁”、“大办农业”、“超英赶美”、“争创水稻亩产20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越喊越响，形势热火朝天。

全国各处，人人写作“大跃进”民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豪迈诗句，成为一代经典。在“大”的口号下，是搞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堪称登峰造极。一时间，工厂、田头、学校、机关，土堆的“小高炉”四处林立，炉火红遍神州大地。人人翻箱倒笼、砸锅挖铁，给小高炉提供炼钢原料。各地“上卫星”捷报频传，处处报道“我为祖国献宝钢”喜讯。

更可乐的事，是参加“全民打麻雀”运动。1958年4月20日，星期天，全校师生摸黑起一大早，集中校操场。大家手持赶麻雀的竹竿，带着“响器”——有锣鼓的带锣鼓，没锣鼓的带脸盆。一些中外闻名的老教授，也举着竹竿，抱着脸盆，带着出征前的满脸豪情，排进队伍。整个校操场成了竹竿的山林、脸盆的海洋，蔚为壮观。假如让一

位不明就里的老外见到这个场景，保证他会惊叹：“哟，中国人好伟大，好幽默呵！”

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开赴事先部署好的“阵地”。6时，警报声响，锣声、鼓声、脸盆敲击声、呐喊声四起，竹竿随之挥舞，满布晨空，声势浩大无比。

我们班级所在“战地”，热闹了好一阵子。大家的手也敲疼挥软了，嗓子喊哑了，也不见一只麻雀踪影，感到很沮丧。于是，就坐地闲聊起来。有同学还打趣说：“春眠不觉晓嘛，这么早，人家麻雀还在睡觉呢。”

半天的“战斗”结果，一无所获。午间，大家“偃旗息鼓”，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学校。事后，学校发布“战绩”报道，据统计，全校师生共捕麻雀数：3只。

四、农村调研

1960年11月10日和17日，我与同学徐志行两次出行，到附近农村调研绍兴目连戏。

第一回去离湖塘村大约二三十里地的柯桥公社秋湖管理区秋湖生产队，在那儿找到业余演过目连戏的两位农民：陈仁友（时年71岁）和陈阿根（时年51岁）。对我俩到来，两位先是惊吓，继而释然，进而高兴。惊吓是误把我们当作是来“清算”他们演过“鬼戏”罪行的干部。当听说我俩是专来向他们“请教”的大学生，是他们演目连戏的“知音”，他们就兴高采烈起来，滔滔不绝地告诉了我们以下这些情形。

1949年后，庙会不再红火，演目连戏被认作是封建迷信活动。演过三回后，再也不演了。目连戏在世艺人，现只剩下五六人。除他两人务农外，其他几位在各地做工。一位叫陈新友，外号“流利”（音），是目连戏的最后“班长”，即业余艺人召集人，现年60多，在绍兴城里干修配自行车。新友的两个儿子长寿和长林，也曾随父亲

一起演过目连戏，现在柯桥铁工厂做工。另有一位也叫“阿根”的，在城里某化肥厂做工。

绍兴目连戏脚色行当，有所谓“十三先生五武场”之说。“十三先生”指十三个主要前场脚色行当，即：四花脸、四白脸、四小旦和老旦；“五武场”指五个专门担任武打的脚色，目连戏班里叫“跌打”。这跟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旌阳戏子搬演绍兴目连戏“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讲法正好相符，只是没有明人的规模。目连戏大门类脚色中，再细分行当，如“四花脸”，即分为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小花脸四种行当。

陈仁友说，他是唱花脸的，花脸门类中的各种行当都能演。他没有专门跟人学过戏，目连戏是因小时候经常划船去看，看多了就会了。26岁开始登台。陈阿根是他带出的徒弟，由于年龄较轻，看得少，只会二花脸。陈新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在化肥厂做工的阿根，全是“武场”。还说，到他们这个年代，130多出的目连戏已没法唱全，顶多也只能唱其中70多出。看来绍兴目连戏的衰落和逐渐失传，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

我们请陈仁友唱一唱目连戏的曲子。他唱了一段《下山》，说这是目连戏的“基本调”。曲调听起来很单调。可怪的是，每一唱句都带“南无弥陀”的句尾，就像唱佛经。我想，绍兴目连戏所唱的“调腔”，是新昌高腔，这句尾添加上去的“南无弥陀”，当是后场“帮腔”，是高腔演唱的常用句式。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没把这最接近绍兴目连戏原生形态的唱调及时记录下来，真是遗憾。

第二回，我俩去了绍兴目连戏另一个流行中心地阮社。主要目的是按照老艺人提供的线索，想到那儿寻找目连戏的舞台脚本和镌刻有全部目连戏120多出出目的戏台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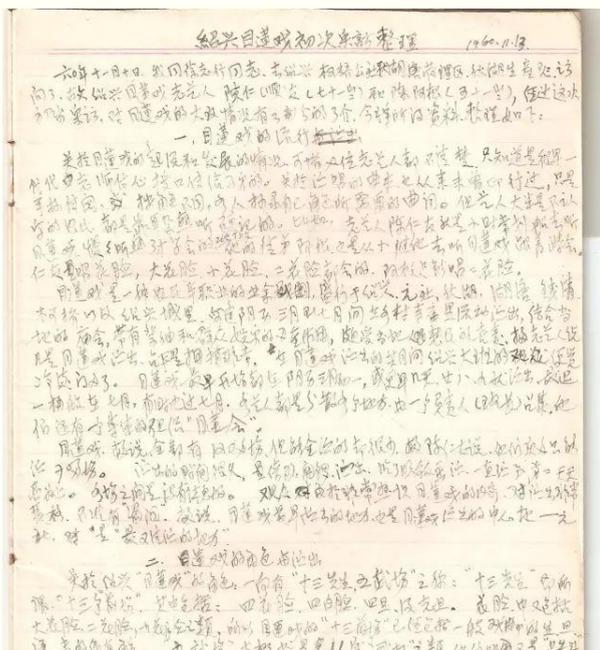
阮社陆友法老先生，原是中学教员，识文断字，晓得目连戏价值，曾借用当地艺人演出脚本，精心抄写了一部。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当时最接近舞台脚本原貌的绍兴目连戏全抄本。

当我们找到陆老先生时，他说：“你们来晚了，半年前我已把它卖给旧货摊了。”不知是事实，还是不愿出示的借口，抑或别有隐情

——在反封建迷信，反厚古薄今，张口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年代，读书人个个活得颤颤兢兢。陆老先生拿不出“鬼戏”抄本的任何理由，都可以谅解。但愿“陆抄本”依然存世，并有重见天日、公之于众的机会。1958年收入《浙江省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内部资料，第76-79集，油印本，计8本108出）的绍兴《救母记》，还不算是十分齐全的本子。至于1962年收入同书“绍剧”第8集的铅印本（112出），则是“大班”绍剧本子，该另当别论。

在傍晚回来的路上，我俩经过阮社“前庙”，很侥幸地找到砌嵌在庙台中砖屏下方的一块长方青石板，上头刻有目连戏的全部出目。原来这块戏台石碑不是大家传说的早在两三年前已经损坏，而是还相当完整的被保留。粗略地数了数，确实120多出。久经岁月了，文字有点模糊，加之天黑没有照明，看不清。这是我俩这天出去最重要的收获，打算另择时间，再过来誊录。

外出调查回来后，我都根据记忆做了笔录，现仍保留。笔录的日期，分别是1960年11月13日和17日。在国家极度困难、社会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一个贫困大学生，连像样的纸笔也买不起，写字墨水是用几分钱买的蓝粉冲泡而成。这份笔画粗疏、字迹模糊褪色，现在很难辨认的笔录，是那年代的见证。见到它，会把我的思绪带回那个艰难的岁月——



很难辨认的绍兴目连戏调查笔录是那艰难岁月的见证

跌撞撞，不敢说最早、也该说很早就闯进这个“学术领域”，心里常常会偷着乐。

我的调查笔记，内容整理为四大块：一、目连戏的流行；二、目连戏的角色与演出；三、目连戏的遗迹；四、采访补充材料。现在看来，真是粗浅和幼稚。

30多年后，研究宗教戏剧被海内外学术界人士抬到吓人的地位，目连戏研究成了趋之若鹜的热闹命题。每当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很不起眼的大学生，为了交差学校“科研”任务，懵懵懂懂，跌

五、追梦盖叫天

大学期间，我把每月助学金，扣除伙食费，节省下来的2.5元人民币余额，积攒起来，用来去剧场购票看戏。还要利用寒暑假回不了家的机会，参加省市戏曲调演观摩活动。一切都出于兴趣，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功利目标。

买票看戏最多的，是去东坡剧场看浙江京剧团演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京”演员队伍整齐，流派纷呈。各行当都有好角儿。尤其生角，人才济济，拥有宋宝罗（高派）、赵麟童（麒派）、陈大濩（余派）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不同流派老生。其中宋、赵两位，是京剧界的常青树，艺术长途跨越七八十年。看他俩演出，贯穿了我数十年的看戏经历。

我经常光顾的，还有浙江昆苏剧团。那时的“浙昆”，还是《十五贯》风靡全国年代的周传瑛、王传淞等“传”辈演员当家；“世”字辈演员，“小荷初露尖尖角”，也登台主演一些折子。在“东坡”，我曾看过汪世瑜、沈世华这对“金童玉女”合演的《游园惊梦》。现在，汪是红遍南北中外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导演；沈是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教授，长年对于昆曲艺术的坚守，铸就了他俩的今日成就。

从大二暑假开始，我挤进省市戏曲调演观摩队伍，给这些临时组合的活动组织帮忙干点杂活，不仅看戏可以免费，而且还可以跟参演剧组一起开会、座谈。当时官方组织的戏曲活动，比今天开放，只要你愿意、主动参加，一般都不会把你拒之门外，对大学生尤其如此。

浙江最顶尖的戏曲艺术家，莫过于时任省剧协主席、名声如雷贯耳的“江南活武松”盖叫天。能亲眼看上盖叫天的戏，是我与父亲的多年梦想。

我到杭州时，盖叫天已年逾古稀，看他演出的机会已经非常难得。我记得我至少看过三回盖叫天的晚年演出。头两回都在杭州“胜利剧院”，都是省市观摩调演的最后示范演出场次。其中一回看《十字坡》（武松打店），一回看《一箭仇》。最后一回，是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好像是纪念盖叫天从事舞台艺术65周年大会的一个观摩节目，演的也是《十字坡》，记得时间是我大学即将毕业的1961年上半年。三回观摩演出，“盖派”艺术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用两个字来概括：简练。

已经步入生命最后路段的盖叫天，他的艺术境界，可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尽管这时候他已经老迈，身手不再敏捷，许多武生高难动作被他省去；甚至动作迟缓，“走边”缓慢，“抢背”减省，“鹰展翅”一类“盖派”独有身段英姿无法重展。但是“盖派”的“武戏文唱”精髓，被晚年盖叫天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干净利索，没有半点多余。他的站姿角度、亮相表情、身段造型、台步分寸，都是那么恰到好处，叫人看了舒服。三场演出，盖叫天素面朝天，脸上不添任何油彩化妆。服饰简朴，甚至

可以说是相当的“寒碜”。真正精妙的艺术境界就是这样：从最初的稚嫩、简单，积累成博大精深，最后总要回归到简约、纯净。

“盖派”的特色绝活，没有被盖叫天删弃殆尽。《打店》中，武松那把银光闪闪的匕首，照孙二娘头顶狠狠扎去，擦过她的头皮，重重地剁在台板上摇晃的惊险场面，盖叫天演来还是那么纯熟、到位。

《一箭仇》中，史文恭繁复得令人炫目的髯口功，盖叫天没有任何折扣。还有水袖的飘逸，襟袍的利索，台步的稳健，云手的美姿，眼神的传神等等，无不显示“盖派”反复提炼的真功。看盖叫天演的戏，真如赏读一首凝练而含义隽永的诗。

看了盖叫天的演出，意犹未尽，我就找来盖叫天的口述——何慢、龚义江记录整理的《粉墨春秋》单行本（1958年初版）仔细看了一遍。我感到，盖叫天真真是个有头脑、善观察、好琢磨的艺术家。这本以记录、总结盖叫天舞台表演生活与体会的书稿，不是艺人从艺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处处包含艺术真谛的戏曲理论精粹。它包涵着盖叫天从艺五六十年来处理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体验与表现、真与假、内与外、多与少、动与静、冷与热等等方面的深切感受和理解，是一本充满着深刻哲理的艺术总结。它不仅使我更加懂得“盖派”艺术经验的可贵，也使我从中学到不少艺术道理，并且受用终生。

近20年后（1978），我到北京参加“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首届研究生答辩复试。答辩会上，导师张庚先生给我出了一史、一论两道试题，要我当场口头作答。“史”的题目是：在宋元南戏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负心戏”？试述其原因与理由。这道题目难不倒长年阅读与思考古典戏曲作品的我。“论”的题目是：以一出舞台剧为例，具体分析与说明戏曲的艺术表现和实际生活的关系与区别。这问题来得突然，我平日又不曾思考，迷乱之中，省城观摩盖叫天及阅读《粉墨春秋》的经历，帮了我大忙。我便以盖派《武松打虎》为例，头头是道地说明了常人醉酒与英雄武松醉酒、打虎格斗生活原态与戏曲艺术呈现方式的关系及其异同。张庚老师听后频频点头，我心想，这回考试有戏了。这是冤死了的盖叫天对我的庇佑，说是“善报”也可以。

六、回乡

1960年暑假，我决计回乡一趟，去探望分别已经三年未见的父母和弟妹。心想一年过后，自己不知要走到哪里，说不好还会去离家更远的地方。

温、杭之间，区区几百里，居然三年不回家。这在每学期打着“飞的”随意往返的今天大学生听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对当时贫困大学生来说，却是很平常也较普遍的事。往返二三十元的路费，接近一个贫困家庭的一月生活费用。没闲钱的家庭花不起，花得起的也非所有家庭舍得。再说学校吃饭不花钱。全国只有北京、上海、杭州三地粮食不定量，学校食堂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不能去定量很紧缺的家里蹭饭，这些更是贫困学生假期不回家的理由。

这时，我开始对研究戏曲发生兴趣，课余系统地研读了许多元明杂剧，并按夏承焘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一一做了读书札记。在回乡的旅途中，我还随身带着校图书馆借来的郑振铎主编的头两集《世界文库》，因为上头转载了当时罕见的戏曲刊本文献《西游记》多本杂剧、明富春堂本《白兔记》以及《刘知远诸宫调》等，供自己空时研读。又想到回乡机会难得，我要趁此机会到家乡瑞安和“出戏子”的

邻县平阳调查一下地方戏。8月16日，临行之前，我特地去校办公室开了这份介绍信——

温州市去往家乡瑞安城还有40公里地，以前都走水路，乘坐温瑞塘河小汽轮往返。现在开通了长途汽车，但车票很不好买。正好那天有趟金华开往瑞安的长



校办给我开了调查家乡地方戏的介绍信

途汽车经过温州车站，一些旅客中途下车，可以临时补票，我挤进补了一张票。

空位少，补票的多，许多后来者只好提着行李，在车里随便找个空隙站着。本来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车内旅客你推我挤，吵吵嚷嚷，怨声四起。这个喊道：“啊呀，别挤了，我快被你压扁了！”那个叫着：“哎哟，你踩到我脚了，疼死人了！”说的都是带浓重乡音的“瑞安普通话”——在外头呆久了的回乡客，感觉自己还在他乡，忘了该说家乡话。一位青年用瑞安话笑骂道：“侬妳（妈的），大家都是瑞安人，还打什么官腔？”全车人顿地醒悟过来，一阵哄笑，于是纷纷地让起了座位。

乡情可以贯通血脉，消弭怨怼，增添友善与谦让。回乡的感觉真好。

离瑞城近了，隆山塔显现在眼前，越来越近。在外呆了三年，感觉中隆山好像变小、变低了。很奇怪，少时随父亲登隆山赶庙会怎么会是那样高不可攀。这是见识增长、“眼界”变大了的缘故。

下了车，我用扁担挑着行李，选择那条狭小的瑞城“东小街”往家走。远远望见母亲正端着一盘泔水，去对面阴沟倾倒。家境依然很糟，母亲还是那样辛劳操持家务，心里顿时涌起一阵酸楚。

父母和两个留在家中的小弟弟，见我回家，都面露喜色。毕竟三年不见，毕竟我是“荣归故里”的大学生，而且变得壮实，这使全家人感到快乐和荣耀。邻舍也纷纷过来寒暄、道喜，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积攒每月半斤定量配给的糕饼票，买了杭州糕饼，分给众人。小弟弟高兴得不得了。在粮食定量不够填肚皮的年代，能品尝到糕饼，简直是一种奢侈。

我见家中粮食如此紧缺，父母天天为粮食定量不够，供养不起全家发愁。我不可久待，在家只呆了没几天，拜访了几个没上大学的要好同学，看望了几位中学老师，就提早匆匆返回杭州。调查家乡地方戏的计划没有时间实现。那份学校介绍信，永远留在了我身边。

我对戏曲的爱好与钻研成果，包含着父母的爱心与劳心的灌溉。19年后（1979），研究戏曲成了我的“专业”。我在守候母亲临终的

病榻前头，历时三月，在后来补做的温、瑞、平三地田野调查及父亲平时记录的资料基础上，写成了长文《温州地方戏概观》。这就是后来（2005）收入我的台版文集《戏曲十论》中的《温州地方戏概论》，作为我对已经逝去的父母的永久纪念。

七、告别“杭大”

大学最后学期，中文系状况发生较大转变。

反思前7个学期，频繁搞运动，师生长期在外劳动锻炼，教学严重缩水，上课时间统计不足3个学期。主科“中国文学”，即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课，有头没尾。“中国文学史”课根本没上。更滑稽的是，在停课搞“教改”期间，“教改”小组提出用《毛泽东选集》作“古汉语”基本教材。理由是，《毛选》是“活学活用”古汉语的典范，不去研究典范，怎能使教学“古为今用”？于是发动大家去“挖掘”《毛选》引用的古文词句，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冒天下之大不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类成语、名句，就成了新编“古汉语”教材的常用句例。老教授们见了苦笑不得，但迫于形势，也只得说“这办法不错”。

为了弥补缺失，中文系来个矫枉过正，最末学期恶补专业课程。在古代文学方面，开了一门查漏补缺的功课：古典文学研究专题。杭大中文系，尤其古典文学教师队伍的实力整齐，堪称全国高校一流。旧浙大文学院的教授大部还在，他们从先秦至近代文学，可以排出一连串的名师讲席。大四的这门“专题”课，由王焕镛讲先秦散文，夏承焘讲唐宋诗词，胡士莹讲小说，徐朔方讲戏曲，蒋祖怡讲古代文学批评，代表了当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其中仅徐朔方为中年讲师，正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此外还有不久前刚离校的陆维钊（魏晋文学）、钱南扬（南戏）等老教授和正处“茁壮成长”的青年助教蔡义江（唐诗）、吴熊和（宋词）等，加上系主任姜亮夫教授（楚辞、敦煌文学等），可谓门道齐全，名师充沛。

这门课的学生课程代表仍由我担任。我课余接触最多的是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夏承焘教授，参加由他主持的教授、学生、领导“三结合”集体备课活动，领受了不少课堂之外的教益。

分配之前，人人写决心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些党团干部还表示要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国家形势仍不乐观，各地都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大家对于去向，心理上都堆积着阴影。

分配方案迟迟没有消息。

等啊等，一直等到9月上旬，新学期已经开学，中文系新生也已报到，我们毕业生需搬离居住了四年的学生宿舍腾给新生。大家只好将个人行李打包，集中堆放在系办公室，自己随便找个办公室甚至教室空地打铺睡觉。大学结局如此凄凉，对比入学时的那番兴奋与期待，感到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伤感和失意。

一天，系里突然通知，全体中文系毕业生集中校礼堂，宣布分配方案，并且决定当日即要离校。

礼堂鸦雀无声。大家个个竖起耳朵，细心捕捉几秒钟内决定的个人去向信息。当我听到我回家乡温州地区的宣布，虽然还不明白具体地方、单位、职务，我在失意中却感到一丝的幸运。不管怎么说，我也比那些将要远离家乡的许多同学要幸运得多。

当日傍晚，我们坐进驶离省城的火车车厢。一起去温州地区报到的毕业生占了半节车厢，上海的，江苏的，安徽的，福建的，浙江各地的，温州各县的全有。浩浩荡荡，声势空前。在这之前，很少有杭大学生尤其外省市的学生分配温州的，这是精简、下放大潮的惠赐。大家带着说不清的各种滋味，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去迎接莫知的未来。

火车汽笛呜呜响起。

告别了，亲爱的母校。

告别了，尊敬的师长。

告别了，曾经笑语喁喁，絮言叨叨，甚或怒目灼灼的同窗好友们。

告别了，校园草木，古杭名胜，西湖风光，古旧书铺，快乐剧场……

列车慢慢驶离“城站”。“城站”是我四年前迎来大学生活的起点，又是我如今告别大学生活的终点。我的人生之旅，在这儿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圈。

四年轮回，照样的旅途，照样的行囊，照样的衣装。还有没机会穿过的衣衫的照样的旧摺，统统携带回家乡。行囊中多出的有：箱中几本专业图书，一些讲义，散杂笔记簿册和叠叠纸片，还有压在箱底的这张陪伴我今后50多年的毕业师生留影。



杭州大学中文系57级毕业照，本人，四排左一

[返回目录](#)

回望我的大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说完我的高考，当然要说我的大学。

1978 年 3 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我走进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杭州大学是一所非常棒的综合性大学。

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王驾吾老先生，1900 年出生，我国著名的先秦文学专家，从 1936 年开始就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我们进校时他已经 78 岁高龄，还经常拄着拐杖，沿着西溪河，颤颤巍巍走着来中文系上班。看着鹤发童颜的老先生，我们肃然起敬，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大师教导感到自豪。在我们毕业的当年年底，王老先生过世了。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老人家在我们毕业时给我们题写的留言：“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这句话成为指引我此后 30 多年人生的座右铭，其中深刻的哲理令我受用无穷。

当年在高等教育界有这样的说法，中文系“北有北大，南有杭大”。可见杭大中文系实力之雄厚。那时候我们中文系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教授，比如古典文学方面有夏承焘、徐步奎、蔡义江、吴熊和，古汉语方面有姜亮夫、蒋礼鸿，外国文学方面有汪飞白等等，除了夏承焘教授在北京之外，其他的教授都为我们这些本科生授过课，比之现今的学生，不知要幸运多少倍。据说现在本科生很难听到著名教授授课的。

除了中文系，杭州大学的数学系也非同寻常：白正国、王斯雷都是中国数学界响当当的人物。政治系（后来分为哲学系、经济系）的严群教授（大哲学家严复侄孙）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杭大的心理学系更因为校长陈立先生而名声远扬。1996 年 9 月，杭州大学通过了国家教委“211 工程”主管部门预评审，正式进入了国家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的 100 所高校行列。

当时的杭大中文系并不在学校本部之内，而在和学校一路之隔的上宁桥后面的田塍小路（现在叫保俶北路）上。我们 77 级和后来的 78、

79级三届同学都在那里学习、生活了4年。79级毕业后，那里成了浙江省总工会干校，现在是浙江省职业培训学校。因为是分部，管理就比学校本部要松散些。教室就在寝室对面，往往有同学早晨从床上跳起来，穿着拖鞋直接冲进教室上课，方便得很。晚上看电视也很自由。学校本部是逢周六、周日晚上才有电视看。而我们中文系的电视机就放在我对面的寝室保管。我们想看就拿出去看，想看什么频道就什么频道（不过当初也就中央和浙江两个频道）。学校本部的同学过来都十分羡慕我们分部的自由生活。这种生活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些以文学为专业的散漫学生。大家在那个小小天地里如鱼得水，自由自在，茁壮成长。至今，我依然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后来我所工作的浙江省检察院距离当年的中文系只有一箭之遥。当时接送上下班的班车每天都从当年我们经常光顾的文二路露天电影场旧址经过。闲暇时也会走进当年的中文系校园，对着住了4年的宿舍楼发呆。此时，一种人是物非的苍凉就涌上心头。40年，也算得沧桑了。世事变迁，只是我们还没有磨灭当初的希望。尽管未必管用，但是我们还在努力。仅此就已经足够了。

[返回目录](#)

郑小明校长口述史

—杭州大学化学系 59 级 郑小明

一、困难时期的老杭大

1960 年，刚刚二年级开学的时候，开始动员我们开荒，生产自救。学校里的开荒对象就是草地，把所有的草地全部掘光。学校里面很漂亮的草地，一天之内，全部都挖光了。挖了草地就来种菜，我们把学校里这些现在是草坪的地方都掘掉。好漂亮的草，一锄头一锄头三五除二都翻掉了。

种菜我们种得也不错，但是困难时期就是困难时期。今天种下去菜苗好好的，草一根都没有的，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芯子了，全部被虫子吃掉了。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最后只有一种菜是虫不吃的，种得非常好，叫做甜菜。现在跟生菜有点差不多的，以前是喂猪的，长得又快，虫又不吃。其他菜都种不好，到最后，甜菜种好以后，卷心菜也长好了，其他菜就没种好过。

这里自己种菜了，那里困难时期也开始了。食堂里东西就越来越少，慢慢就发现有人生浮肿病了。因为我是动得比较多的，出力也比较多，那么浮肿也比较厉害，到后来就没力气了，叫“黄胖”，脚上就是一揪一个汪塘（一按一个坑）。像我们吃不饱，实在是吃不饱。

后来浮肿病重的挑去做试验。挑去以后分四个组，一个组叫参照组，一个组吃糠的，一个组吃麸皮的，一个组吃螺旋藻的。螺旋藻说起来，每天给他们一小包一小包的。一个小组大概十个人左右。我是参照组，人家羡慕死了，我们吃肉罐头。四个人一个肉罐头，我竟然困难时期吃到一个肉罐头！大概参照一个礼拜吧，看看各组什么反应，当然吃肉的最好。所以这个时候生活上也蛮有趣的，肉罐头吃了回来，然后再吃糠咽菜。

二、60年代的学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63年底，从四清工作队回校以后，整个杭大发展到学术上是先进的、各方面发展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大家都很有信心，攀登科学高峰。当时，我回来工作安排很有趣。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三，跟当时化学系副系主任马福泰老师，搞多相研究与催化动力学这个课题，准备筹备催化动力专业，筹建专业实验室，参加基础实验指导工作；礼拜四到礼拜六，跟金松涛先生研究均相催化动力学。那时很累，很忙，什么空都没有，但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跟的老师越多，学得越多。

金松涛教授指导我的本科论文，内容其实跟198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研究成果非常相近。当年化学获奖者莱恩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化学家。他得奖的内容是超分子化学，超分子的“灵魂”叫分子识别，分子识别的几个要点，跟我在63年本科毕业论文几个结论几乎完全一样。所以1963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突破了。所以金先生蛮可惜的。他当时如果学术环境好一点，那发展前途是不得了的，得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

杭大开的实验课正规化后，一面建设实验室一面教。当时的仪器多得不得了。大概国家也拨了很大一笔钱给杭大，因为浙江省当时重点还是扶持杭大。正好我们一批年轻教师留下来，建设实验室，所以动手的机会多得不得了。差不多当时的仪器都是国产的，外面封锁得厉害，什么仪器中国都已经研究出来，折光仪、旋光仪、光谱仪，都是我们国产的。质量是不好，一天到晚坏，但坏也有好处，因为我什么都不怕，坏了就修，修的过程就把仪器的原理都搞清楚。

三、211评估与百年校庆

211最大的作用就是学科建设。一是你学科自己的家底摸清了，方向搞清；二是省政府跟国家投资，投资给杭大是1.5个亿。学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博士点增立，大规模的增立。原来我们13或者14个博士点，到合并之前，快要评审了。我们有把握再拿到的博士点

大概还有 30 个。所以这个就是 211 建设给我们学校带来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迎接 211 评估，也是全国高校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校园建设。我们花了大概个把月时间，整个校园整理得焕然一新；地上是一尘不染，寝室是规规矩矩。教委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能量都是无穷的。那段时间的杭大，人人都有校徽，那是不用说了，仪表都很整齐，寝室的室容室貌，都非常好，地上没有一粒烟蒂头。

但是，越紧张越会出事情。那天教委省教育厅来检查，查到第七宿舍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忍不住了，他大概抽了支烟，看到他们快来了，赶快烟蒂头一丢，正好丢到检查组的头上！我们吓了一跳！这种都是小插曲，也影响不到我们整体。

百年校庆前后的这段时间一直到 1998 年合并，整个学校情绪非常高，发展也很快。校庆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这是对学校的一个检阅，也是建立学校荣誉感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这个荣誉感。杭大搞校庆的时候，国外大学校长来了 23 位，有日本的，有澳洲的，有美国的，有加拿大的，有南美的，当然也有俄罗斯的，英国的，法国的，都有。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外宾来，省外办来人帮我们接待，说省里一般外事活动也没这么大规模。外宾送礼，很多礼物都是那个时候他们送给学校的，后来全部放在档案馆。现在很多礼物都还在，当时确实就是盛极一时。这个过程，同学的认同感也高，老师的认同感、归属感都有。

【编者注】

作者为杭州大学 1959 级化学系本科生。原杭州大学校长。曾获省劳模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科学大会奖、多项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2005 年，获“浙江省特级专家”称号。

[返回目录](#)

西子湖畔的种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周黎明

我上杭大的时候，实足年龄还不到 16 岁，接触过的艺术作品仅限于八部样板戏外加那几部十年不变的打仗电影。记得第一次翻开《红楼梦》是在一二年级，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仅仅看到一帮娘儿们在有一搭没一搭闲聊，完全不知道该书伟大在何处。

毫不夸张地说，刚进杭大时，我的文艺欣赏能力是零，或者接近零。

细想起来，我的专业是英语。但我对语言学兴趣不浓，可能无意中把文学鉴赏当成了目的，英语成了协助我的工具。

记得大三或大四有一次大课，老师节选了杨宪益/戴乃迪译本的《红楼梦》，好像是黛玉进贾府那段，首次让我从外语的角度领略到母语之美。这种双语习惯保持了多年，直接帮助了我后来的英语写作生涯以及双语双文化跨越。好多年后啃《离骚》啃不动，我依然借助杨戴那充满古韵的英译本。

在相当程度上，我对文学及艺术的喜好，是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影响。我中学期间没有课外书，课本里能算文学的，只有契柯夫的《变色龙》以及鲁迅的几个短篇。但我那几位杭州同学，显然家里偷藏了禁书，文革期间没有被彻底销毁。他们谈论起雨果、托尔斯泰、司汤达时，我就像是误入偶像见面会的小粉丝，满脸艳羡。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钱晓霞、应亚平、关颖等同学。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积累，让我这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小弟受益良多。我还记得跟关颖一起看印度影片《流浪者》以及上下集法国片《悲惨世界》后他的反应。钱晓霞不仅有学霸的成绩，还有学霸该有但不常有的霸气。那是一种偏艺术家的性格，像是艺术作品里的人，能把犀利的洞察和幽默的表达融合在即兴的金句里。小时候父母给我树立的都是死读书的榜样。她让我意识到，知识可以是活生生的，充满快乐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大学里的同学很可能比老师更重要。若论传授知识，现在的途径异常丰富，只要愿意探究，什么知识都能获得。但是，同学所提供的，是那种无法下载、无法推送、无法单向传播的互动体验。有时，同宿舍的室友借了一本什么书，或者同班同学在课堂上提及一部什么作品，你就会被刺激，想要一探究竟，看看能否尽快找到这本书。免得他们闲聊时，自己像一个傻瓜似的插不上嘴。

整个 80 年代，我们都表现出久旱遇甘霖的求知欲。那时还没有选择困难症，也没考虑知识的系统性。反正外语系楼里那家小书店有什么书，图书馆里有什么书，全部拿下。我记得大二那年，我的图书卡上一共借了大约 200 本书，颇有知识打卡的意味。

比较系统学习的，是中文系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好像是午饭后第一堂课。午后的阳光照进来，让我昏昏欲睡。我常常是在强睁眼的刹那，听到张老师那滔滔宏论。后来我自己登上讲坛，尤其是午后那堂课，见到有学生打盹，我便不会不悦。因为我知道，血液流进胃里，加上阳光照射，那种力量是老师的口才无法抗衡的。学生打盹并不表示他不感兴趣，至少我是真心喜欢张老师的课。说实在，他传授的知识我通过书本或其他方式都能得到。重要的是，他让我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又慢慢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化。到我广州读研时，外教 Maria Jaschok 从英国大使馆借来 13 集 BBC 纪录片《文明的轨迹》。我无意中被同学和老师从一个江南小镇的小屁孩，一步步踏上文学——文艺——文化——文明的美的旅程。

说起美的旅程，大四时有了一门美学选修课，我忘了老师的名字，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泽厚和朱光潜的名字。后来我阅读了朱光潜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找到了文艺欣赏的一根理论支柱。

我读杭大时，外语系系主任鲍屺平先生是全系最资深的老教授。印象中，我只听过他一次课，是大课。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通过闭路电视。所以，都没有机会跟教授在同一个空间。那次他讲的是济慈的诗歌《希腊古瓮颂》，讲得很深，大大超过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对于英国三大浪漫派诗人，我那时的喜欢更像是规定动作，并非发自内心。那时最有感的是华兹华斯和丁尼生，还模仿他们写英文诗，完

全是拙劣的学生习作。但阴差阳错学会了写英语韵诗的能力，可以糊弄那些四级六级的小朋友。翻译《甄嬛传》里几首小诗和台词，用的就是当年的雕虫小技。

据钱晓霞回忆，她、我、应亚平三个人某天游览西湖，模仿华兹华斯，要成立所谓的“湖畔派”。钱晓霞还写了一首英文的藏头诗，每行的第一个单词首字母串起来，就是 Lakeside 这个词。虽然从校园到西湖，中间隔着保俶山。即便从学校图书馆（据说曾是杭城最高楼）也无法望见，但西湖代表着超越著名景点的某种文化境界。

对我影响很深的莎士比亚戏剧，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课外阅读了一部分朱生豪的译本。我曾试图用中英对照的方式去啃原文，发现还是太难，但朱译本的文采让我惊为天人。一册看下来，笔记就抄了一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莎翁全集，是 1978 年出版的。但一直到 1984 年，我才有机会购得，保存至今。

文学艺术的欣赏对于多数人，是一个嗜好，一种修养。我一开始也未曾想到那会成为我的饭碗，我的追求。当我兜兜转转，从商学、硅谷绕了一大圈，开始大量写作电影、戏剧等评论时，这才发现，小时候在天目山路那个校园里听到的、读到的、被熏陶到的，都是帮我成长的养料。

返回目录

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钱晓霞

1977 年我参加高考时，那份纠结至今难忘。我想过要当医生、作家、记者，就是没有想过要选择英语作为自己的专业。我在高中时英语并不是强项，虽然常和好朋友一起偷听美国之音的“九百句”。最终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我的一个梦（每每说起这个梦，身旁的朋友多是撇嘴表示怀疑，但这是真的），在梦里我随一个代表团到了一个国家，一下飞机我居然啥也听不懂，啥也不会说，一着急就醒来了。醒来后的决定就是准备报考英语专业，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个翻译，走遍天下。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的高考之路非常曲折。第一次参加体检和口试后，被告知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第二次又差一点与大学失之交臂。后来听说，是杭州大学英语系参加招生的老师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了我的档案。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可尽管如此，在杭州大学的岁月，成为我难忘的经历。尤为难忘的是，我在同学中交了不少心有灵犀的好朋友，如我的同班同学周黎明、关颖、应亚平等。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历史等，交流阅读心得。大学本科时，印象最深的课程就是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我在高中时，就读了大量的欧洲文学名著译本。到了大学，又开始啃英语原著。但通过张老师的课，我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似的阅读才有了比较明晰的构架。

英语专业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但这个精彩世界大都还是间接地通过文字、绘画、映像所展示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教书生涯。这期间，虽去过澳大利亚、美国和奥地利学习或工作，然而，一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真的很穷，二是因为学习和工作压力使得自己无暇顾及其它。除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几乎没有外出旅游过。可从此心里有了一个情结，很想哪天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潇洒走一趟。

这个情结直到退休后才得以慢慢地解开。退休前，要应付生存问题：教课、搞研究、评职称、养家、陪伴孩子。退休后，这些负担就全卸下了。早年的愿景开始萌动：去看世界。星转斗移，现在的中国与 30、40 年前大不相同了。国人出国旅游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身体健康，又没有养家的负担，就可以说走就走。掐指数来，从 2010 年至今，我已经走过了 20 来个国家，多数是在欧洲。这里又要提到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对我产生的影响，以及当年的同学不断提供给我的知识补养，如关颖对美术和音乐作品的见解、周黎明对戏剧和影视作品的评论，应亚平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造诣。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刻意去看一看曾经读过的作品里描写过的场景，去印证电影里、绘画中和戏剧里出现的景致或典故。

我大都是跟团旅游。其实，自由行和团队游分不出所谓优劣，因人而异吧。有人喜欢到一个国家自己慢慢游，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而我更喜欢“按图索骥”，先列出一个清单，去哪里？想看什么？再去寻找合适的行程。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有机会和条件出境旅游时，大都已过知天命之年。若要看世界，余生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体验异国风情了。现在选择旅游产品就像超市选货一样，可以在某个旅游平台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一般，一个国家会有十几甚至几十条不同的行程。我在决定去哪儿之前，都要做一番功课的。会阅读相关的书籍，会看 BBC 或 National Geography 制作的英文纪录片，会去阅读别人的游记，会写攻略。选择行程时，景点是第一考虑要素，价格是第二位的。

我很幸运，几乎每次出游都有情趣相投的好友相伴，尤其是 79 级的几位学妹。她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不错的建树。现在退休了或快退休了，都希望用“行走世界”来丰富和着色自己的“晚年”。因为大家来自同一个专业，兴趣爱好又比较相近，因而在旅途中常会就某个国家的文学、建筑、历史、宗教、艺术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曾听说过一句嘲笑中国游客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忘掉。但这绝不是我们。我们的出游体验不仅非常欢愉，而且知晓丰富，行万里路犹如读万卷书。

我们赶上国家的开放时期已近而立之年，为了谋求事业和照顾家庭历经辛劳浮沉，直到退休后才看到海阔天空。虽已年过花甲，但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哥本哈根的卡隆堡宫又称为哈姆雷特城堡。相传当年莎士比亚就是以卡隆堡宫为背景写下了不朽的悲剧《哈姆雷特》。

[返回目录](#)

杭大四年（1959-1963）学习生活追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59 级 许高渝

从 1959 年 9 月进入母校外语系俄语专业学习，至今已整整 60 年了。但岁月的流逝，并未使往日旧事从记忆中全然消失。四年大学生活中的不少经历仍常常会浮现于脑海之中。

一、第七志愿进杭大

我是在杭州第四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的。进入高三年级时，学校提出分文理班，这在当时杭城各中学中尚属首创。但初步报名后，老师发现自愿读文科的学生过少，无法成班。于是动员了一些同学进文科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就只能选择文科专业了。在文科各课程中，我相对喜欢的是俄语。三个学年和毕业总成绩均为优秀。于是，我将俄语以及与俄语相近波兰、捷克语专业列为主要志愿。前六个志愿是省外学校，为北外、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上外、华师大。第七志愿是杭大俄语专业。

8 月的一天，吃完晚饭，我到杭四中去探望留住在学校的华侨同学。远远望去，看到他们许多人正好坐在校门口乘凉。还没等走近，就听到我班的林汉官同学朝着我使劲地叫喊：“许高渝！许高渝！，你考上了！”我赶忙跑过去，“汉官，真的吗？，考进了哪所学校？”没等汉官同学回答，坐在一旁的其他同学已经七嘴八舌地向我说起了他们得到的可靠消息。他们告诉我，我录取在杭大外语系俄语专业，和我一起考进俄语专业的还有倪杰、李敏和倪冠群同学……原来，我来得太巧了。就在那天上午，学校派人到市教育局去抄来了四中录取在各高校的全部考生名单。华侨同学因一直住在校内，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得知了录取情况。听到考上杭大的好消息，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家向父母报告，因为多少年来他们一直盼望我成为一名大学生。

几天之后，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家。亲友和邻居们知道后，都为我考上大学而感到高兴。

好不容易等到九月学校规定报到的第一天。一清早，我带着一个大旅行袋和棉被、蚊帐等用品乘公交车到了杭大。那时，公交车设有道古桥站，站点位于现在的西溪路的杭大新村附近。下车后，经过一座用竹排搭建的桥，再往前走一大段砂石路，就到了校门口。那时候，学校两旁空荡荡的，没有其他单位，也没有围墙（砖墙是后来在 60 年代初建成的），而是用竹子编成的高高的篱笆作为替代。

校门内已经有各系的老同学在迎接新生。一位俄语四年级的同学把我领到第一宿舍一楼 139 寝室。寝室朝南，室内有 4 张木制的双层床。每个床位上已经写上了新生的名字，我的床位在靠窗的西侧。室内门口处有一个多格壁柜，可放用品。大的物件摆不下的话，要放在自己的床底下。床位前是两排单人书桌，整个房间显得很挤。我们俄语新生男同学都住在附近的寝室。和我同寝室的同学后来陆续到达，他们分别来自东阳、义乌、桐乡、德清、宁波和上海。同专业的女同学们住在第五宿舍。一个学期后，我们男同学迁到第六宿舍，先住在一楼，后搬到二楼。女同学后来也搬到了第六宿舍，住在三楼。那时寝室安排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即住朝南寝室的同学和住朝北寝室的同学会定期（一学期或一年）对调。

二、入学后的第一课——植物园劳动

我们外语系一年级新生开学后，并没有马上开始上专业课，而是安排到玉泉的杭州植物园参加为期两周的劳动（9 月 11 日—22 日）。当时学校的教学计划规定，每学期都要安排一个月的劳动；其中，两周是集中劳动，另外两周时间的劳动分散进行。外语系之所以将集中劳动的时间放在开学初，可能是考虑到外语学习在初学阶段需要连续进行的缘故。

杭州植物园始建于 1956 年，到 1959 年仍有不少区域需要建设。我们外语系一年级俄、英语专业 120 位同学每天早餐后，排队步行到

植物园工区，听候安排具体的劳动项目：有的负责整地，有的挑土，有的扛大石块。我和班级部分同学好几天是承担铲草皮的工作。另外一些同学负责将铲起的草皮挑（抬）到另外一个指定的区域，由专人铺设。铲草皮的劳动强度不小，因为使用的是普通铲子，只能半蹲或坐在地上铲。有时是一个人铲，另外一个人坐在对面将铲起的草皮剥卷起来。加上铲草皮时，不能过多损伤草皮的根系，又不能带上过多的泥土，要十分细致。大家通过劳动不但锻炼了体力，而且培养了互助合作的精神。对新同学来说，通过劳动中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使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所以，大家感到颇有收获。

三、课程·老师·教室

第一学年时，我们全年级有 60 位同学，因为外语教学需要大量实践，所以主要的专业课（精读、泛读、会话、翻译等）都是分三个小班上课的，每个小班 20 人。二年级之后，整个年级人数因各种原因逐年减少，主要的专业课仍然分三个小班进行教学。

担任一年级精读课的三个小班老师分别是杨永华、顾惠生和翟燕芳老师。杨老师在四年级时再次担任我所在的 1 班的精读课教学。二年级精读课老师分别是叶志洪、顾惠生和许上居老师。叶志洪老师三年级时仍任教我所在的 1 班的精读课。教 2、3 班精读课的分别是郑锦棠和许上居老师。到四年级时，教 2、3 班精读课的分别是郑锦棠和冯昭屿老师。顾惠生老师除教小班的精读课外，还教过我们基础语法课和泛读课。张绍儒老师是我们全年级的翻译课和三年级语法课老师。施毓楣老师和邱国倩老师也教过泛读课和会话课。蒋忠全老师是四年级俄语教学法的老师。第二外国语是选修课，由英语专业的钱斌枢老师授课。一年级我们开设了现代汉语课，由中文系的祝鸿熹老师和傅国通老师轮流任教，是大班课。政治课在四个年级都有，也是大班课，三年级上哲学、四年级是政治经济学，由楼修智、陈烈、傅菊如等老

师任教。体育课在一、二年级开设，男、女生分别授课。教过我们体育课的有方载震、陈诗颖、张永生老师等。

给我们上课的各位老师都非常尽心尽责，认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教专业课的老师因为教我们的课时较多，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与我们同学关系更为密切。他们讲课耐心，批改作业细致，对学习相对困难同学总是以鼓励为主，平时也关心大家政治上的成长。有集体劳动时，老师们也常一起参加。叶老师还多次带我们同学游览市内风景区，参观展览会，为大家摄影。

我们年级在四年学习中，没有外籍老师给我们上课是一大遗憾。因为原来主教俄语的德梦铁教授 1960 年后改教德语，唯一的一位苏侨老师在 1960 年后回国。

课堂教学无论是小班课，还是大班课，一般安排在外语楼进行。外语楼位于学校东区，介于地理楼和旧称文史楼之间。外语楼、地理楼和文史楼这三幢楼是学校最早建成（1956—1957 年兴建）的教学大楼，比西区的老化学楼和物理楼要早两三年竣工。外语楼和地理楼、文史楼之间各有一排南北向的建筑物相接，所以三幢楼之间可以走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外语楼的第三层由政治系专用。一、二两层属外语系。第二层是办公用房，有行政办公室、总支办公室、俄语教研室、英语教研室、公共外语教研室、资料室、电教室等。大楼东头的 252 大教室也属外语系使用，所有的大会和讲座都在那里举行。一层走廊南北的小教室则是外语系的上课教室。我们有时也在连接外语楼和文史楼的楼房里上课。合班上大课时还使用位于外语楼西端的 132 和 235 两个阶梯教室。由于学生多，教室少，没有年级和班级专用教室。每个学期的课程表都会标明上课的教室。不过教室都在外语楼内或在附近，所以即使上课要临时调换教室也不会发生问题。

四、初上讲台：在平湖培训小学俄语教师

1960 年 6 月初，我们一年级下学期的教学工作还没有结束，系领导突然召集我们和二年级的部分同学开会，说是省委和省教科所下达

了一个任务，要我们到省内各专区培训小学俄语教师。我年级同学中，除参加俄语广播教学的沈念驹、李同安、俞汝中三位同学，参加教改编写教材的少数同学以及在磁带厂工作的何烈华同学外，都下到专区参与这项培训工作。有的去金华、宁波地区；有的去浙南的丽水、瑞安、仙居和泰顺。我和同级的蔡同麟、邹正敏以及二年级的裘美翔被分配去平湖任教。我们四人与去湖州工作的蔡群、傅朝霞以及领队许上居老师先一起到湖州，然后于当天下午转车去平湖文教局报到。和局长见面后，由平湖师范俞明达老师陪同，到平湖师范安顿下来。俞老师是平湖师范的优秀老师，在5月份的时候参加过全国文教群英会。小学俄语教师平湖培训点由他负责管理。指导我们俄语教学培训工作的嘉兴中学的冯达华老师。他早年也毕业于杭大的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的俄语专业，是我们的学长。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四人很快进入角色，根据教学大纲编出了培训教材，之后又经过试教，然后开始培训工作。

我们培训的对象是平湖、海宁和昌化的小学老师。他们中除个别外人外，都没有接触过俄语。但他们使命感强，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异常刻苦。我们四人分成两组，分别教两个小班，既要备课、授课、辅导，还要编练习、批改作业，可以说忙得半点空余时间都没有。但大家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看到学生们每天的进步，从不会念、不会写俄语到会念会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很快两个多月过去了，同学们期末考试的成绩不错，合格率很高。俞老师和冯老师也极为满意。在八月下旬离别时，同学们纷纷邀请我们合影，或赠照留念。

这次培训活动虽然是教学计划外的任务，突然布置下来，使原来确定的课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对我们实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日后教学能力的培养，以及语音和语法基本知识的掌握，大有好处。毕竟，自己学和教别人学是不一样的。

五、“一条龙教学”法的试行

从平湖回到杭州，仅休息了几天，就开始了二年级（1960—1961学年）的学习。当时，学校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省委决定，杭大和省委党校合并。省里一直有将杭大办成全省社会科学中心的打算，和党校合并就是这个思路的具体化。

为适应这个变化，同时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外语系提出“把以毛主席著作作为纲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外语专业课的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的教学原则。在此思路的指导下，专业教学内容基本上须与政治基础理论课的内容相一致。实际上，专业课成了政治课的俄文版。在这一学年的好几个月中，我们学习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党的总路线”、“列宁主义万岁”等专题。和教学内容变化相应的是教学方法的改变。系里将党校理论教学的方法移植到了我们低年级的教学之中，提出了“一条龙教学”法。

“一条龙教学”以单元专题教学为主线，分预习、启发报告、鸣放讨论、大量实践、语言总结五个阶段。预习时，由学生先自学授课内容；启发报告先由政治理论课老师提出本专题教学的目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大致归纳，然后由外语老师把政治理论课老师的启发报告译成俄语，用俄语向同学讲解；鸣放讨论时，学生要对老师提出的问题拟定发言提纲，开展小组讨论，大量实践包括翻译、写作、问答、听写等，对所学材料加以巩固；语言总结是为下一个单元做准备，与下一个单元的预习结合起来。由于单元专题教学内容均为政论题材，体裁单一。每个专题都有长篇文章需要阅读。从语言的角度看，文章里生词多而长、长句多，学生要在规定时间读完都感到困难，更不要说消化和熟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时只有个别成绩好的同学可发些言，许多同学不是照文章读几句话充数，就是沉默不语，随后的大量实践也无法有效进行。学生感到不堪重负，教师也因为要花大量时间备课、翻译材料而苦不堪言。几个月下来，教学效果很差。“一条龙教学”法无法持续试行下去。

六、一夜球场变菜地

1959年9月我们进校时，大家吃饭不限量，可以随便自己到饭桶打。国庆十周年时，全校举办大会餐，有700桌。我记得，我们班的饭桌是安排在操场上。但到了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加剧。下半年时，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原本自由打饭也早已改为自己淘米蒸饭。国家也要求学校“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活”。为了加强食堂管理，我校将原来的大食堂一分为九，外语系食堂是其中之一。我们系的总支副书记渠玉九同志经常下食堂检查了解，和炊事员一起想办法，把主副食搞得花样多一些。仅面食就有十多种。推出了“四天食谱”，有19样菜，做到餐餐不重复。1962年5月，外语系食堂和中文系食堂合并，全校有学生食堂4个，教职工食堂3个。学校为解决副食供应，除了自办畜牧场外，还和舟山水产局签订了合作协议。

60年10月10日那天下午，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到大礼堂听省委林乎加书记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林书记向大家介绍了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强调了党中央前不久提出的“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同时号召全校师生迅速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开垦荒地，大种蔬菜。由于会议开始得较迟，等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下來。许多系的同学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扛起锄头奔向校内荒地，垦荒种菜去了。我们所住的第六宿舍前面是个小球场，学校里也把它规划为菜地。我们年级分到一长条地，就在当晚挑灯夜战，把地翻了一遍，把其中的砖瓦石块一一挑出，并将菜秧种上。第二天一早，大家从楼上窗口望下去，原来的球场已经变成了菜地。

种上菜后，施肥的肥源是个大问题。因为班级多，就近的粪池一下子就见了底。有一天，轮到我们小组施肥，粪池里的粪水已经很浅，无法用粪勺将粪水掏上来。情急之下，一位同学上楼把自己的小脸盆拿了下來代替粪勺，总算解决了问题。

据当时的《杭州大学报》报道，从1960年10月到12月，全校共开垦各种菜地305亩，实际参加蔬菜生产的达5778人；其中，学生

4858人，教工920人，占学校总人数的94%。收获各种蔬菜11万余斤。部分食堂已经做到蔬菜基本自给。

七、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

1961年2月，学校开始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提高、充实”八字方针，对系科和学校规模进行调整。1960年进校的大部分春季班学生提前结业，俄语等4个函授专业停办。11月，省委决定杭大和党校分办。

从10月开始，学校组织全校员工学习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草拟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这项工作条例指出了前一阶段高校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数量发展过快；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老教师的团结合作，在很多学校被忽视；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课程的不适当的大合大改等等。条例认为，这一切导致了一些高等学校一部分课程教学质量下降，特别是一部分基础课程教学质量降低。

条例中规定的“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应起主导作用”等一系列要求很快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学校教学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大环境的改变，为我们三四年级的专业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大学学习的最后两年（1961年下半年到1963年）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两年。

那两年的俄语教学秩序稳定，学术气氛浓厚，系里不时邀请校外专家来讲学。上海外国语学院胡孟浩老师和南京大学的陆丰老师都曾为我们作过学术报告。我们专业的冯昭屿老师也作了如何利用工具书的讲演。胡孟浩老师刚从苏联获俄罗斯语言学副博士学位归国。他除了向我们做俄语动词的体的学术报告外，也向我们介绍了他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对博士答辩的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生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陆丰老师翻译过许多俄语作品，他和冯昭屿老师的报告也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那一时期，教师们更加勤于教学，同学们也专心于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为晚自修抢座位的现象。开始是晚饭后，后来提前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一些同学等候在阶梯教室前，等在教室里上课一结束，就跑进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图书馆的阅览室和每个阶梯教室都坐得满满的，因为那里学习环境安静。

那两年的俄语课程设置更为齐全，精读课独领风骚的局面得到了改变。教材内容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精读课的教材里，反映中国现实政治的政论文显著减少，文学原著（片断）大大增加。我们既读过普希金的《驿站长》和他的诗作、克雷洛夫的寓言、屠格涅夫的《前夜》，也学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我们是苏维埃人》等作品。还有像《茹尔宾一家》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也编入了教材。

总之，通过三、四年级的学习，不但弥补了前两个年级时学业上的一些损失，而且为我们掌握俄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系里十分重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的开展，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当时系里定期放映俄语原版电影，还放映过由冯老师、郑老师和杨老师用俄语配音的新闻纪录片。系里专门建立了俄语广播站，为每个学生寝室安装了扬声器。年级办起了墙报，张贴在我们所住的第六宿舍二楼到三楼的楼梯旁的墙壁上。墙报内容丰富，文章是同学所写或摘录，不定期出刊。开展各种俄语竞赛也是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

班级的文娱体育活动多样。周末自办交谊舞会。每逢节日（元旦、十月革命节等）都会举行全专业的俄语晚会。我班在全系晚会上演出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俄语）、女声小组唱等节目受到广泛赞扬。在体育竞赛方面，我们班级的球队表现出色，男女选手在全系运动会上屡创佳绩。

八、总结和思想汇报

在校的四年中，每学年的总结是必不可少的。总结的内容涉及德、智、体三个方面。以 1961-1962 学年的总结为例，系里要求每位同学回顾一年来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是否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否了解勤俭办校的方针，自己表现如何？师生关系如何？同学间关系如何？学习进取性和学习态度怎样？劳动态度是否端正？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有否问题？是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等等。

另外，我们这些要求入团的同学还常向团支部写思想汇报，汇报一段时间内的思想状况。如我在 1962 年 2 月 15 日向团支部的汇报里，首先回忆上学期自己的不足，包括工作、学习有忽冷忽热的现象，学习和工作不够踏实，依靠团组织和依靠群众不够等三个问题。然后表示在新学期中要从学好哲学课，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树立发奋读书的思想做起；学习上要进一步发挥潜力，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制订课外阅读计划；经常找团员同志谈心，靠拢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出更大热情，完成任何任务都要有始有终，细致深入。

九、毕业和工作分配

1963 年的 6 月，随着最后一场精读课的毕业考试的结束，我们四年的学习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和我同一小班的王炎林同学考完后，一走出举行精读课考试的 252 大教室，就高喊“Ура (乌拉)”，表示对大学学习圆满结束的欢呼。

7 月下旬，系里安排了与毕业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拍毕业照，包括全年级毕业照、小组照和全校毕业集体照；征询分配意见，写毕业鉴定，组织毕业教育等。

拍摄全校毕业照时的场面十分壮观。根据有关资料，当年的毕业生为 1140 人。记得，那天拍照是在下午四时左右。每系的毕业生由系领导带队。我系带队的是系总支书记徐晔华同志。拍照时，整队、按

男女和个子高矮分列、站到规定的位置、开拍等各个环节进行得十分紧凑、有序。这张毕业照现保存在学校档案馆。

毕业教育，包括学习反修文件和“老三篇”、参观公安展览会、听省委宣传部盛华副部长报告、小组讨论等。

8月下旬的一天，系里召集全体应届毕业生在252大教室开会，宣布分配方案。系领导程贤政同志先是宣读派遣到杭州市之外的地市县工作的同学名单，再宣布在杭州市中学任教的三位同学的名字，最后是分配到省属单位的九位同学的名单，其中两位同学分配到省级机关，四位同学分配到其他高校任教，我和其他两位同学留在本系工作。我原先预计自己可能会到某个中学当老师，因为我既不是党团员，也不是班干部，思想上有那方面的准备。所以，在宣布留校任教的名单时，听到其中有自己的名字，既高兴，也惊讶。同时，心中也默默地十分感谢外语系党政领导和俄语教研组各位老师对自己四年来政治和业务表现的认可。

母校的恩、老师的爱、同学的情伴随我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我终生不会忘记这恩、这爱、这情！也不能忘记！

[返回目录](#)

那一年，歪打正着到杭大 —谨以此文纪念曾经辉煌的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赵伟

(一)

那年在西北一所高校待烦了，想换个地儿。试着给浙大经济管理学院写了封信，寄了份简历。不久接到姚先国教授来电，称他们刚弄到国际贸易专业，正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学术人才，非常欢迎我来。

不久，趁着去上海华师大开会的机会，从无锡转车到了杭州，在玉泉校区老浙大二号楼找到了先国兄。那年，他刚组建从经济管理学院分出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学院，任常务副院长。院长何人不甚了了。此前未曾见过，但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恰逢午餐时间，姚先国教授弄了两份盒饭，我们边吃边聊。谈了我的调动和我妻子的工作安排，女儿转学等事宜。

顺道去了读研同门李学兄家。李学兄在杭州商学院任教。那年，他出国访学，夫人在高校做人事工作，兼带孩子。听了我的调动意向，颇为热心，说浙大牌子大门槛高，办事拖沓，不一定行，不妨试试杭大。实际上，直到那年，我对杭大一点也不了解，因为我任教的高校系国家教委直属，平时打交道的多为门当户对的教委直属院校。杭大系省属院校，自然很少去关注。印象中，李师兄当年毕业去杭州前聚餐时，曾说过杭大经济系比浙大要强些。于是，听从了李师兄夫人的话，临走留下一份简历和两本书，托其找人送杭大经济系领导。

回兰州后不到一个月，收到落款为杭州大学经济系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开门见山自我介绍是同一母校经济系七九级的，代表杭大经济系欢迎我加盟，落款金祥荣。我曾随七七级本科学习，对七九级同学并不熟悉。向同系的一位老教师打问，他说连金祥荣都不知道？这可是我们七九级的才子，这几年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了！于是按照信里留的电话打了过去，是他家电话。虽然初次接触，但一听就是个惜才爱才的爽快人。聊了很久。我也表示希望早点去杭大。

话虽这样说，但心底里还是惦着浙大，因为自己原本在部属大学任教，还想去个级别一样的学校。要知，那年头，省属院校工资都比部属的要低些。然过了几个月，事情越来越清楚。去浙大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而杭大已经踏踏实实地在办理。事情是这样的，为稳妥起见，朋友托人专门去浙大人事处问了，说尚未收到对外经贸学院的进入申请材料。而杭大这边，已经经过学校人事处会上通过。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来杭大，先去看一下。

（二）

那是临近岁末，十一月上旬的样子，依旧坐火车在无锡转车。到杭州已是黄昏，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办公室主任陈高杨，一位说话办事有板有眼的中年女士。先安排我在杭大招待所住定。次日上午去经济系，见到系主任史晋川教授，副主任金祥荣教授，以及总支书记李庚锦老师。见面一谈，告知我的调动已经定下，马上可以去人事处见主管人才引进的处长。他们派沈满洪陪我去。沈那时是杭大经济系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在职读研。沈热情健谈，带着我先去人事处，后去杭大新村看预留的引进人才房。跑前跑后，帮了不少忙。十多年后，沈先后读了博，当了研究生院的处长，后去外校竞聘副校长，而今已任宁波大学的校长多年。成长之快，实在难料！此为后话。

杭大人事处主管人才引进的处长是位女士，五十多岁的样子，说的一口东北普通话，待人热情，办事利落。进门让座后即告我，人事处商调文已上报省厅，在等着批准，由省人事厅发调令。我的房子已经落实，现在就可以去看，说着找出钥匙，交沈满洪带我去看房。那个年头，高校里管人事的干部大多很牛，我待的那所高校，人事处有名的门难进、脸难看。遇到这样热心的处长，让人心里暖暖的。出来后，沈满洪告诉我，这是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的夫人。李书记调来浙省时，夫人以正处级职位调杭大任副处长。而杭大爱才惜才的沈善洪校长，将其安排在人事处，专门负责人才引进。因为杭大是省属院校，进入得省里职能部门批准。书记夫人管这事，这些部门得给点面子吧？当然这只是局外人推测。实际上，在李夫人主管人才引进的那几年，

杭大进了一批优秀学人，这为后来晋升“211”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后话。

人事处出来，还是沈满洪带着去看房。房子在杭大正门对过的杭大新村西溪路南，看得出是刚建好不久的一座七层楼。最里面一个单元十几套房子专门为引进人才预留。早到的已经入住，给我留下的在三楼，两室一厅。不仅楼层好，且比我在兰州的房子大许多。那年，我在母校只住了一间半房子，女儿一天天在长大，没多余的地方摆放另一张书桌。学校里协调多次解决不了，这也是促使我最终下决心调走的原因之一。既然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住，如此热心的未来同事，又位于国人皆向往的西子湖畔，何乐而不往呢？

回兰后，一边上课一边等调令，但调令迟迟不见踪影。打电话去杭大人事处，告知省里人事调动冻结，得等次年开春才解冻。但我的调动没问题，因此可以先来报到。考虑到孩子假期转学最方便，和系里几位领导商量，都认为人可以先来，把房子装修好，先在这里工作，而后待调令下来后回去转关系。李庚锦书记和满洪都说，既然处长这样承诺，应该没问题。于是在那年十二月底，主讲的课程一完，便只身赶往杭州。在杭大招待所住下，拿到房子钥匙，开始装修房子。

虽然尚未正式报到，但系里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岁末年初，发钱发物，都给我一份。印象最深的是领了一箱苹果，住在招待所，每天两只下饭吃。那些年份吃饭要粮票，大学食堂伙食很一般。苹果就米饭或馒头，是我的一大偏好！

临过年两周，房子装修好了，妻也用集装箱把家具书籍从兰州托运来。妻女乘火车来到杭州，一家人在杭州过年。那年杭州特冷，下了雪，没暖气，临时买了只油汀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在北方住惯了暖气房，一下子感到像掉进冰窟窿里似的，很难受。妻抱怨来这么个鬼地方！

年后一开学，就开始在杭大讲课。直等到三月份，省里人事调动才“解冻”，拿了调令径直回兰州，正式向系里的同事告别。母校经济系给我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这样就告别工作了十多年的母校，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大西北。

(三)

到杭州虽是隆冬，天气很冷，但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新单位领导兼同事们的真诚与关爱，尤其令人暖心的是经济系的几位领导，为我的事跑前跑后，操心不少。

初到杭州，最紧迫的两件事是女儿转学和妻子的工作。

那年女儿已上初三，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异地转学最难。系主任史晋川教授自告奋勇包揽了给女儿联系学校的事，自带一瓶茅台，领着我去拜访其母史妈妈熟识的一位中学书记，几句话就落实了下来，算是解决了一件大事。

妻在医院搞心电图检查与分析，这个职位比较清静，向往的人较多。但小医院往往只有一个位子，一般是老的不退新人很难进去。那年比较走运，杭大校医院的心电图医生刚好退休了，系书记李庚锦听到消息紧追不舍，加上晋川教授在学校的影响力，人事处让医院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引进人才的配偶！这样妻的工作完全对口地安排了。

第三件事是我的职称。那年我是以副教授身份调来杭大的。原本在兰州当年就可晋升教授，但条件是得再服务五年。把这情况讲给晋川教授，他代表系里答应当年可参加教授评审。还在调动过程中，系里发现，当年晋职外语考试报名已经截止了，为了不影响我后半年申报，通过人事处人才引进办直接给省里报了名，次年三月顺利参加了职称外语考试。这为年末晋升教授创造了一个必备条件！

除了这些正事，平时生活上也处处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初来杭州，感觉物价比兰州要高许多，搬家、装完房子后，多年省吃俭用结余已经见底。尚未开口，晋川、祥荣两位领导显然已经看出，让系里将我住招待所的费用悉数报销，还参照在职职工标准发了部分年终奖。接下去近一年时间，晋川、祥荣二位，隔三差五送来茶叶、水果什么的。大凡朋友送给他们的茶叶、香菇等特产，总会给我一份。

(四)

到杭州的第一年是幸运的，某种程度上可谓好事连连。幸运事首推三件：

第一件是拿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还在调动期间，上面发文让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主管系主任金祥荣给我一张表，说可以考虑报一报。那几年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是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围绕那个话题已经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感觉可以试一下。于是抽了一个上午，坐在杭大经济系资料室，拿支笔边构思边填写申报书。由于对所研究的问题很熟悉，两页多的项目论证几乎是一气呵成的，而后凭记忆列出前期研究成果。因为表格上要求有个课题组，除了写上一位老同学的名字，祥荣临时给凑了两个新单位青年教师的名字。好在那些年份不要课题组成员签名，也无需填写人家的身份证号码。心里很清楚，课题完全是一个人承担。

报上去也就忘了。临近暑假前，忽一日，接到晋川兄电话，告知我得了项国家社科基金。并说为杭大经济系争了光！那年头国家社科基金名额很少，申报的人虽然也不如而今这样多，但获准者更少。据说，那年全浙江省获得经济类方面的课题就两项，浙大和杭大各获一项。那几年，各高校都在备争“211”，这个项目自然对杭大经济学的评价有利。故而很受重视。

第二件事是社会服务的突破。所谓社会服务就是出外讲课。那几年，高校教师工资很低，物价又高，出外讲课是不可或缺的一笔收入。在兰州，这方面收入原本还可以。初来杭州，校外未有任何联系，失去了这块收入，几乎陷入贫困。正在犯愁，机会接踵而至。先是讲座机会。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旭东教授请我去他们学院做一次世界经济形势报告。陈系晋川兄大学同学，又与晋川兄住同一幢楼，常听晋川兄讲起新引进了一位学术带头人，于是慕名请我去做报告。报告做的很成功。无疑是陈旭东院长的宣传。那以后，不断有人来约我讲经济形势，主要是校外的。实际上，从讲世界经济形势开始，逐步拓展至加入WTO话题。一两年后，入世话题成了最有卖点的讲座，助我一家摆脱了贫困进入“小康”。这比全国人民整体上早了两个“代刻”（decades）！

接着是在在职研究生教育。到杭大不久，接到浙大宋玉华老师的电话，邀我给浙大外经贸学院在宁波开的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研究生班讲

国际贸易课。原来，他们派了一位青年教师去讲，讲砸冷场了。紧急找我去上，希望能够镇住那帮人。应约去了，发现有一百多人，皆系宁波市属县局级领导干部。那几年，正在将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国际贸易课引进国内，舍去数学模型，只以几何图形描述，深入浅出，一讲大受欢迎。我还手写了教案，学员们拿去复印了，人手一册。这个课的成功引出了一系列同类办班单位的约课。浙师大联手北师大在衢州也办了一个领导干部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慕名来聘我去上课。讲得也很成功。通过讲座和上课，不单是有了一笔不可或缺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走出了校园，去了浙江许多地方，对浙江经济现实有了大量感性认识。后者，则为我后来研究温州模式与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模式，积累了足够的认知。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幸事，就是晋升教授职称。那是我到杭州第一年的年底，系里按照破格方式给我做了申报。之所以走破格，是因为提副教授未满五年。我从研究生毕业到晋升副教授，度过了漫长的十一年时间。除了早几年学术成果不够而外，后来主要是赶上提职冻结。那些年，但凡政治上有点风吹草动，高校系统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冻结职称和工资，西部高校尤其跟的紧。几次想报职称都赶上这个坎。直到1993年才以全票晋升副教授。而从副教授到此次申报教授，也就三年半时间。按理说初来咋到，难度应该不小。但结果超预期地好！这部分地要感谢晋川兄鼎力推介，部分地还得益于沈善洪校长主政那几年杭大形成的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沈先生力主的，在晋职、住房等方面向青年学人倾斜的政策。

这样，到杭州不足一年，在业界的声誉颇有些“鹊起”的意境。以至浙大外经贸学院姚先国院长为未能将我引进浙大而深感惋惜。据说在院里开会，批评底下人办事不力，有武大郎开店之嫌！然几年后两院合并，我最终还是归于浙大，惜才爱才的先国兄为首任院长。

(五)

第二年遭了一场无妄之灾，正应了乐极生悲的说法。然身处绝境感受到的，依然是浓浓的同事情。是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爱，帮我走出了困境。

那是来杭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学校给高职们体检，查出我左肺有一阴影。进一步复查，用了CT等高技术设备，得出的诊断是肺癌，概率在八成以上。

这样，我以癌症病人的身份入住浙大第一附属医院。很快挨了一刀，取出病灶，一化验，发现是个结核结节。排除了肺癌。很庆幸，有大惊险而无大灾难！

然遭难之际，最令人感动，迄今记忆犹新的，则是同事们的关爱。

先是系秘书杨庄敏热情地介绍了她丈夫的哥哥，浙一胸外科主任倪一鸣大夫。倪大夫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学了一种做胸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很快安排了手术，做得干净利落，排除了癌症诊断。虽然吃了一刀，但未留下明显的后遗症，迄今二十多年未曾发生过任何问题。

住院前夕，杭大经济系和财金系合并组建了新的学院，史晋川教授任院长。新上任的总支书记杨爱群老师跑前跑后，又是找熟人又是帮着筹款。要知，爱群老师那年哮喘病很严重，自己隔三差五得跑医院。但几乎隔天来医院看我一次，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这么好的人，四校合并后未能留下，而调往校外银行任职！这也是后话。

晋川兄更是关怀备至，利用他的影响力找了浙一的院长，让把我当作省里重点引进人才予以照顾！院里直接开了张支票先垫付了我的医疗费。

手术后，几天不能动，国贸系主任戚译给青年教师们排了班，轮流来医院照顾我。黄先海、何樟勇、蔡庆兵、蒋文杰等青年才俊等，更是丢下手头的学术研究，轮流来医院陪护，在闷热的病房里通宵达旦地看护着我。腿部残疾自己走路都不很方便的青年教师危启才，大热天拎着一只西瓜来看我，令人感动！

妻子刚工作不久的校医院的同事们，同样关怀备至。从医院领导到一般同事，纷纷伸出温暖之手，有熬粥送来医院的，有结伴来医院陪护的。而与我家同一单元的刘萍医生，则包揽了照顾我女儿的义务。

一场误诊虽然是不幸的，但落难中体验到的人心的善良和同事们的关爱，却是不可多得的。时间愈久，亲切感愈烈。在此，我要感谢那年所有帮助过我及我一家的杭大人！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六）

过不多久，四校合并，我也随着这个合并进入了浙大。当年原本的第一选择是浙大，退求其次进了杭大。而随着四校合并，最终依然进了浙大，真所谓天随人愿！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曾经朝气蓬勃，人文情怀超强，学术影响力日增的一所大学，就此销声匿迹了，虽然它哺育和吸纳的知识人的影响力依然强烈！

回头来看，我当初的选择实在是幸运的，可谓歪打正着的选择。没有这个选择，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幸运，或许不会有癌症误诊那样的灾难。但如此一来，也就无从体验美好而温暖的同事情，也就不会对人心的善良与美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人的认识是随着磨难的增多而深化的，这并非哲学家的话，而是我的一个感悟。

（2019年9月26日草于杭州阳光地带寓所）

[返回目录](#)

杭大四年，我的快乐时光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西廷

都说年纪大了喜欢忆旧。这不，每每看到“老杭大”师兄们的回忆文章，我的心里便蠢蠢欲动。最后终于忍不住，在手机写作软件上回忆起我的杭大经历来。

意外进杭大

我进杭大读书，纯属偶然中的偶然。一是本人出身农家，更因父亲年轻时曾参加性质不明武装（“文革”结束后才知道是新四军金萧支队属游击队）受过组织调查，作为其子女前景自然暗淡）；二是当年山区喜欢读书者少，稍一用功便名声大起，不仅从小学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而且读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时，还因班主任病休而代教自己班的语文。临毕业时，学校讲好让我留校代课，不曾想却被一位七旬老叟以一担番薯为代价，抢走了我的饭碗。愤闷中，回家务农。绝望中，自艾自怨。

不曾想，一年过后，因公社高考成绩差而被县教委批评，分管教育的领导坐不住了，居然几次屈尊到我家，动员父亲让我参加高考。而我一字不识的父亲，居然在受宠若惊之下答应了。于是我就担负着为公社荣誉而战的使命出征了，甚至……甚至令人不可思议地上榜了。

但是，说实话，当时我并未填杭大。并不是看不上，而是不敢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只要有只饭碗即可，大学好差根本就不考虑。那么，填哪里呢？查来翻去，异想天开：兰州在西北，应该没人去，那么就填上。

接下来的日子，便伸长了脖子等兰大的通知书。

8月底，通知书来了，却不是兰大，而是想都不敢想的杭大啊。

事后才知道，我原本已考取了兰州大学政史系，而杭大中文系在当年招生时恰好缺少一个名额。任教于杭大中文系的才子王养兴，与

兰州大学的老师互相询问招生情况，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就把我的档案偷偷地调了过来。

从没出过远门，甚至连县城外面都没出去过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杭州大学。当看见杭大“欢迎新同学”的大红横幅时，心中感到莫名的激动。

一到寝室，王养兴老师就赶了过来，用他特有的糯糯的声音说：“张西廷啊，你是我‘偷’来的，可要给我争气啊！”就这么一句话，让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后来的四个年头里，我的读书，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王老师的面子。

傻事一箩筐

杭大四年，年少懵懂。书读得不算好，傻事却做了一箩筐。

刚报到那一天，还没整理好行李，班主任便塞给我一辆三轮车，让我帮助去接新同学。可怜我连自行车都没碰过，就硬着头皮，骑上三轮车，一趟又一趟把同年级的同学接回来。有一趟接同宿舍的“飞狐兄”，不知怎么的特别吃力，还惹得他板起脸吼道：“拉不动赚什么钱！”事后才发现，我居然是忘了打开手刹。

一次，王养兴老师搬家，叫了搬家公司，也叫上了我。在王老师搬家过程中，倒茶一喝，发现茶水有点香却有点焦苦，暗自纳闷：

“王老师怎么让我们喝锅巴水？”原来，在小时候，只要肚子消化不良，妈妈就会煮碗混合了锅巴、鸡蛋壳等烧焦了的锅巴水，让我喝下去用来消食。于是，自作主张，把水倒了，自己花了几毛钱灌了瓶红色的冷饮水。过了几分钟，王老师来了，倒了杯水一看，纳闷：“怎么变成冷饮了？”我心中暗自“得意”。谁知，王老师又着急又无奈地笑着说：“张西廷啊，你把这一瓶咖啡倒掉了。我昨天可是熬了一个晚上啊，这是我同学从非洲带来的正宗咖啡啊。”

平日里，小小个子的我，闷闷的话也不多，一副乖孩子模样，其实暗地里可皮着呢。当室友们抢着扒在窗口看对面楼上的女同学时，里边肯定有我；当同学们从小方孔爬上楼顶避暑时，当中也一定有我。

中秋时，我们寝室八个同学还曾徒步从杭大走到南高峰，喝完一瓶啤酒、两只月饼，背靠背在山顶露天睡了一宿。下雪天，则一条街一条街几乎走遍了杭城的大街小巷。更可笑的是，临毕业时，极度无聊的我们，还举行了一次“握手比赛”。一开始时，参加者居然有四五对，而坚持到最后的自然是我，还有来自宁波的“波波”同学。前后不间断动态握手一个半小时，夺取“冠军”，创造了杭大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纪录”（估计至今无人打破，也没人再感兴趣）。而获得“冠军”的我俩，至少一个星期连吃饭也抬不起手臂。

读书很享受

在杭大读书，其实是很享受的。当时，中文系的作业很少、授课很活、讲座很多。思想活跃的老杭大，经常有许多名人名家来做演讲。大作家曹禺及其家属李月茹、京剧大师宋宝罗等等，都来给我们讲过课。听这些课，对我而言，如同节日。

平日没课，反正也没老师管着，要么挤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小说；要么去黄龙洞，扯着嗓子背唐诗宋词。那时的黄龙洞，游客罕至，安安静静，且古树参天，夏日里凉风习习，是读书的绝佳去处。我在这头背课文，不远处是艺校的女孩子们在吊嗓子。长期下来，彼此熟悉而又不熟悉。背累了就停下来静静听他们唱越剧；而他们唱累了，就听我背诗词。熟悉彼此的存在，却不知晓彼此的名字。这样的气氛也让读书变得有滋有味。

心情不好的时候，或爬上初阳台、或徜徉在白堤上，进行心理疗伤：看看风景、发发呆、背背诗。很快地，抑郁就一扫而空。

最大的享受还是看小说。从小学到中学，我多少次因为上课看小说而被老师批评。一部《红楼梦》，我可是从小到大读了一二十遍不止。而到了杭大中文系，主要的任务便是看小说。老师还每个学期开了个长长的书单。呵呵，这不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么？

遗憾的是，刚适应了大学生活，刚刚读出滋味来，大学就毕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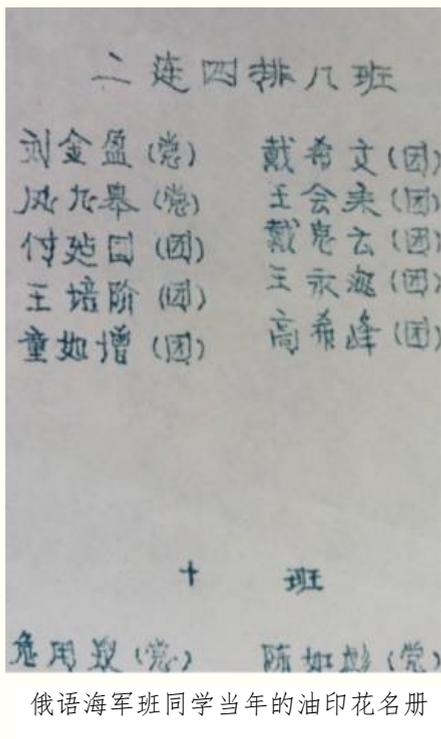
回忆杭州大学 70 级俄语海军班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70 级 王永海
(2019 年 11 月 10 日)

1970 年秋，停课闹革命 4 年多的全国大专院校开始陆续招生。史料记载：1970 年，全国从工人农民战士中择优推荐上大学总数为 16 万人。从 70 年起至 77 年恢复高考期间全国高校的毕业生，史称“工农兵学员”。

一、11 月 12 日进杭大 命运从此改变

1970 年秋，东海舰队选送了约 100 名干部战士，到杭州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招生时，明确学制二年半。



俄语海军班同学当年的油印花名册

这近百名海军干部战士中，约 40 人到浙江医科大学学医，有近 60 名入杭大，其中约 20 名到地理系学习气象专业，31 人学习英语。

学习气象和英语的近 50 名学生是东海舰队的舟山、福建、上海三大基地和东海航空兵等正军级单位从所属各部队选送到大 学来学习当时海军急需专业的优秀干部战士。

东海舰队另还选送 10 名战士到杭大学习俄语。他们来自东海舰队司令部直属政治部所属的警卫连、防化连、通信连，东海舰队保卫部看守所（现军事法院看守所）和技术勤务部队 68、69 年入伍的警卫兵、防化兵、报话兵、执法兵、器材维修兵、炊事兵和驾驶

兵。进杭大时，10人中年龄最大的48年出生，最小的52年出生。每人每月可支配的全部收入(津贴)：4人为8元/月，6人为7元/月。10个战士当年特穷，进校时没一人戴得起手表。

如今10人中，河南籍2人和江苏籍1人转业回原籍、山东籍3人中有1人转业随妻安家郑州，陕西、安徽、山东籍各有1位成为宁波市永久居民。令人伤悲的是，安徽籍建国和山东籍培阶俩同学已因病去逝。



俄语海军班全体当年在校园合影
前排左起：高希峰、王永海、刘金盈、王会来
后排左起：付建国、戴希文、童如贞、凤九皋、王培阶（戴克云在拍照）

1970年11月12日，是改变这批海军干部战士一生命运的一天！

这天下午，约60名海军官兵背着被包，提着行李，成四路纵队，从当时位于延安路东侧的海军杭州招待所出发。他们一路高歌走到杭大，在校门口受到杭大校系领导、工军宣队员和老师员工们热烈的夹道迎接。

去气象专业学习的近20名官兵很快被领去地理系报到；学英语的31人报到后，由老师们领去宿舍。学俄语的10名战士跟随周宗复、沈湛澄老师走到第六学生宿舍二层，在204、205宿舍，按上下铺边沿贴的各人姓名找到各人床位。

当年杭大南大门西侧有个二个房间的全校师生信报箱房，分配俄语海军班的信箱是杭州大学外语系 343 信箱。



刊物邮寄外语系 343 信箱的原始收据

二、天目山路见证了海军班成长

1970 年 11 月 12 日！

从这一天起，杭州大学就成了我们永远的母校！

从这一天起，我们学生的生命里就溶入了杭大的基因。

197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我们由天目山路走进杭大读书，个人命运由此改变。

1973 年 7 月 11 日上午，我们从天目山路告别杭大去远方，各展双翅，追逐梦想。

那时，杭州长途客运汽车站在天目山路，叫“杭州武林门长途汽车客运站”。进出口南大门直对着天目山路。天目山路上往西的公交只有 6 路一条线路，半小时发一辆车，经杭大，开往终点站余杭县留下镇。

1970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22 日，外语系领导带领师生员工背着被包，从杭大出发，沿着天目山路向东，历时约三小时，走到乔司陆军农场，进行一个月的“学军训练”。

1971 年 2 月 8 日，杭州大学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为期 26 天的野营拉练。

8日上午，全校师生沿着天目山路向西行军。我们知道了，天目山路一直通到留下镇。

那时，天目山路从武林门车站向西，两边是大片农田，沿路没路灯。每年寒暑假，各系都关照各班男生们，早晚要到武林门车站接送往返学校的女生。

记得1971年秋，杭大的海军战士学员每人领到一条回纺线织的海军灰线毯，而陆军学员没发。有陆军同学就问军区后勤，为什么陆军不发？省军区答复是，南京军区的规定，因线毯数量有限。今年以天目山路为界，驻路北侧的陆海空部队战士，每人增发回纺毯一条；驻路南侧的部队，今年暂不发。因省军区驻路以南，今年暂不配发。这条约1公斤的线毯，当年温暖了多少冬夜被冻醒后在4斤棉被上加盖

雨衣取暖的战士。



老杭大南校门

那时杭大没门牌号，招生及对外宣传时只有地址：天目山路，电话24006（总机）这行字。现有地址门牌：天目山路148号。

1973年7月11日上午，我们最后一次站列校门口天目山路上，向杭大致敬军礼！摇手向母校泪目告别。

天目山路记录了我们一生前途由此的改变，见证了海军俄语班10名同学在俄语老师们呕心沥血教学中进步、成长、成熟。

三、心中永远的 141 读书教室

俄语海军班当年在外语系教学楼 141 教室上课。外语系当年为每个班都配备一台磁带录放机，供课堂教学使用。

那时，杭大各班上课教室固定。所以，海军俄语班上晚自习时，任课老师周宗复、叶志宏，林薇娜、顾建华、王自杭，邱国倩、韩志咏会晚上轮流来 141 教室辅导学生们。



俄语海军班 5 同学西湖边留影
后排左起：戴希文、刘金盈、王培阶
前排左起：凤九皋、王永海

俄语教研组的老师们努力改革教学方式。为此老师们精心准备了一堂室外俄语教学。那知，这次教学试验彻底失败，并被人为定性为一起政治事故。

71 年 3 月 25 日上午，周宗复等老师带着海军班学生到 141 教室外的路上进行室外教学试验。老师们将 10 名同学分成二组，一组同学用俄语喊“缴枪不杀、举起手来”等战场喊话用语；另一组同学按听懂内容做肢体动作。因海军班 10 人当时都戴着军帽穿着军服。穿戴领章帽徽的人民战士举手投降这还了得！立即有人举报到外语系领导。室外教学课被立即喊停。午饭后，军宣队负责人和海军学员带队的丁指导员等人，先后到学生宿舍找 10 名同学了解情况。晚上，又到这个班召开专题班务会。此事件后，担任学生二连付指导员的周宗复老师再没来给海军班上过课。

四、50年前杭大的校园生活

那年代的大学生，没人有收音机，极少学生穿皮鞋戴手表。学生们早上起床上早自习，包括出晨操、去食堂用膳及到教室上课，多是以听校园高音喇叭里定时播放军号，或以连排值班员的哨声来掌握时间。早晨以连或排为单位集合集体出操。每周的劳动课，师生一起参加防空洞挖土运土。

那时，学生日常活动，各语种的专业学习，各班在各自教室进行。其他时间，全系各语种师生日常活动基本全在一起进行。

1971年3月31日起，杭州大学革委会在全校开展以“鉴别校领导、评教、评学”为内容的“三评运动”。师生们按照系革委会工宣队全系动员会要求，一天内，全系师生抄写的大字报就挂满外语系教学楼一层走道两侧和252大教室。252大教室成为全系师生交流和增进师生感情的大平台。凡室内活动或政治学习，召开各种批判、批斗会，全系师生全在一起活动。包括政治、历史等公共课，全系都不分语种集中在252阶梯教室上大课。

252教室，至今仍让我深深的怀念！

外语系学生食堂，当时硬件和厨师人员配备，是杭大各系最好的学生食堂。那年代，燃煤全国紧缺，集体单位、居民生产生活用煤全凭计划供应。那时，各学生食堂不在杭州市用煤指标供应计划之内，全校所有食堂烧煮全靠烧柴火。所以各系每月都要排计划，安排各班壮男生，轮班去食堂劈柴。

那时，学校食堂米饭1斤2毛钱。同学们一般每周买1次饭菜票，（见右图）每天饭菜不能超过2角钱。每人全月伙食费必须控制在10元以下（那时部队发给战士学生伙食费每天大概四毛七分）。

五、141教室对面是俄语工农班同学

俄语海军班上课教室位于外语系教学楼一楼最西头的141教室。

141 教室对面是俄语工农班一连二排四班。全班 19 名学生中，7 名男生和 12 名女生。那时的女同学多数是梳两条辫子，极少女生留短发。工农班的金保仁、余小牛、徐永明、翁祖福、卢成富、胡仕兴及小许等男生，

课间休息时，常来朝阳的海军班教室说笑。两个班男生常在两教室之间追逐嬉闹。那时，担任工农班任课老师之一的许高渝老师，比我们学生年长不了几岁，也是年青人。也常从对面工农班教室来海军班，一起谈天说地。许老师和工农班几位男生经常爱拿海军班上脸长得白的女同学开玩笑。

（1973 年 7 月毕业离校，与其中 10 多位同学 50 年未再见过面。脑海中相互容貌仍定格在青涩的校园学生时代。）

工农班东隔壁是男厕。当年我们特开心，因为那年代我们早餐都是一两一大碗的稀粥（好象食堂一直都没卖过馒头，更谈不上油条豆浆），一下课，须立马奔厕所放松。

俄语海军班 141 教室西隔壁是杭州新华书店设在杭大的一间书店。几年来，就一位长相富态年龄近 50 岁的李阿姨，既是经理又是营业员。书店是俄语海军班和工农班同学们课间几乎必进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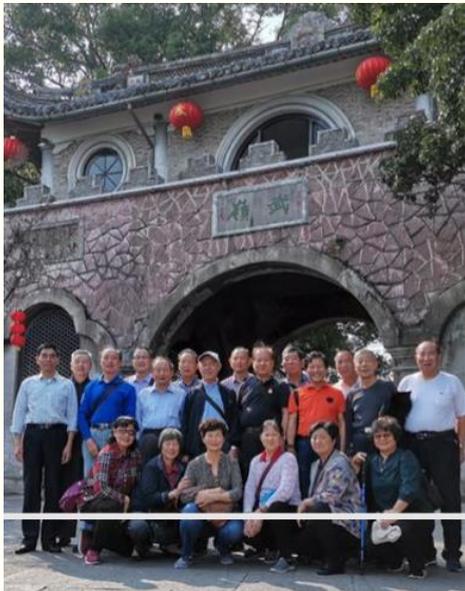
俄语海军班是个只有 10 个学生的小班。在 141 教室上课一年多后，杭大 71 级新生入学前，该班被调整到书店门前向北，通向中文系方向的楼道靠东门朝西的小教室上课，直至毕业离校。



六、俄语陆军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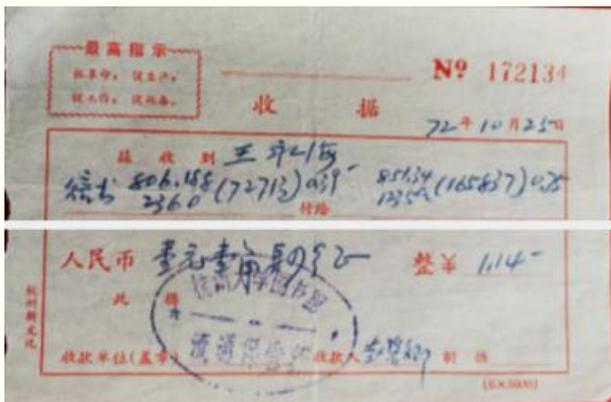
1971年3月16日，陆军第20军及浙江省军区选调约50名战士到外语系学习。陆军来学习的战士分两个英语班，一个俄语班也是10名战士。孙绍富、章近富、徐振东、樊敬朝、吴咸斌、祝永华六位战士来自省军区；周辉弟、戴承恩、朱东辉、朱浙东四人来自20军。

俄语陆军班也分住2间宿舍。两军种两个俄语班同学相互之间宿舍来往特别勤。那时，大学宿舍内没有扑克牌、象棋类娱乐工具。一个宿舍有人买副军棋大家一齐玩。那时，经常在宿舍陆军海军各自出一名同学下军棋搞对抗赛，其他人挤成圈观棋，并嚷着瞎参谋。两军种同学经常在宿舍内掰手腕决胜负。



后排左起：江贵土、桂利华、孙绍富、马云峰、张永文、章近富、陈翔涵（当年带队指导员）毕阿芝、孔斌、谢国和、马顺汉、徐卫国、王长生、蒋文潭

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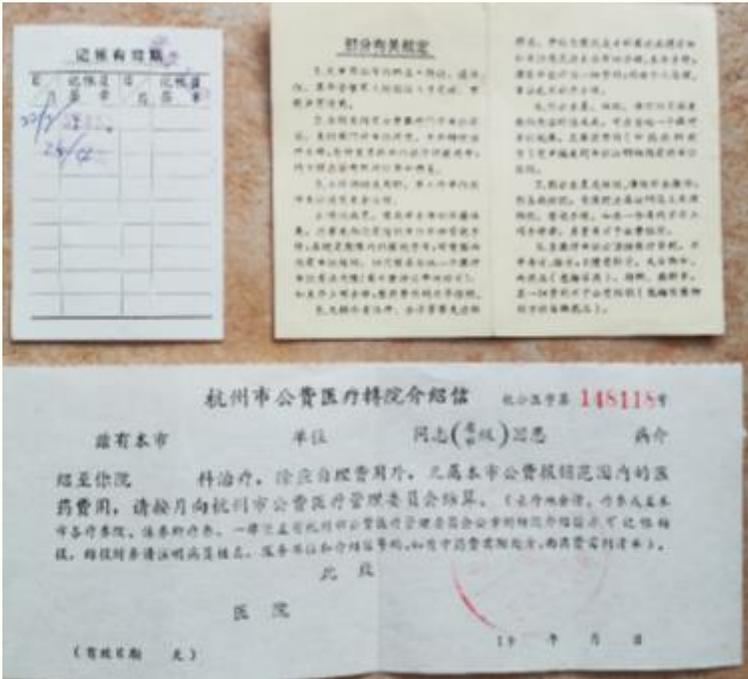
点一线是我们三年多杭大校园生活的主旋律。杭大图书馆是同学们最爱去的场所之一。那年代学生借阅书刊如遗失，不论书的新旧程度和价值一律按书背面的定价全额赔偿。

七、海军俄语班秒成二连四排八班

71年4月14日晚，全系召开总结“三评”运动会议。系领导接着在会上宣布了外语系学生新的编制：由于又一批陆军新生入系，系革委会工军宣队研究决定，从4月15日起，外语系学生编成二个学生连。俄语海军班被编为外语系二连四排八班，但日常生活中师生们仍习惯

称八班为“俄语海军班”。

1971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率领舰队所属三大基地和东航的首长们来杭大看望在外语系和地理系学习的海军学员，并分别开座谈会，听取来自各基地同学的学习汇报。杭



当年借阅书刊遗失赔款收据原件

大的全体海军学员受到极大鼓舞！

1971年12月4日7时30分，外语系师生集中欢送一连六班一行32人去梅蓉大队教学试点基地。外语系原计划全系明天都去梅蓉大队进行教学改革试验，但此次校革委会仅批准一个班先行试点，为明年二月全系下基地教学探索出成功经验。

那时学生去校医院看病和去市定点医院凭转诊单看病，从挂号到住院，不需个人化费一分钱。那时，医院而且不忙。

八、全国取消多年的 “天天读”制度

1972年1月26日起，外语系开始执行新课程表，取消了进校以来教学课程表上每天第一课必须是“天天读”的制度。文革中，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并坚持了四年的“天天读制度”，也是从这时起取消，进入历史。



当年《天天读》部分教材

九、美国总统访杭州 禁穿解放鞋上街

1972年1月29日，杭大革委会通知全校师生，因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国并第一次访问杭州，尼克松访问杭州期间，要求学生从2月1日起，不出校门进城。如实在有事需进城，必须戴棉帽，穿布鞋，不得穿解放鞋和皮鞋上街。那时我们部队陆勤战士也就解放鞋低腰一双，中帮一双；塑料凉鞋1双；大头棉鞋1双，压胶布鞋1双，一年春夏秋冬也就5双鞋两双袜。对进城只许戴棉帽穿布鞋的规定，虽有同学有看法，但都严格遵守了规定。

十、杭大召开“党代会”“团代会”

1972年4月1日至3日，“中共杭州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校礼堂隆重召开。191名党员代表出席大会，浙江省委常委周健人来校出席大会。



杭大第九次团代会发给代表的笔记本

4月28日上午8时，召开“共青团杭州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海军俄语班有团员当选代表出席大会。

5月15日，外语系师生集中在南校门，欢送又一批老师去“杭大五七干校”。海军俄语班10名同学一起来欢送林薇娜，以及春节后与叶志宏老师对调来海军班授课的韩志咏两位老师去干校。正给海军班当任课老师的邱国倩老师，以及一周前刚教海军班的王自杭老师，也来欢送去干校的老师。

十一、省委决定70级学生延期毕业

1970年秋季，浙江省仅杭州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招收学生，并明确学制两年半。两所高校学生73年春节前毕业。

1972年春节后，这届学生要延期毕业的传言就在杭大师生中议论。当时，多数师生态度是不希望延期毕业。学生希望早日毕业，分配到工作单位。

1972年5月28日下午，外语系党总支在252大教室召开全系党员教师和学生党员会议，先党内传达省委文件。浙江省委决定，杭大浙江医科大70级学生的学制延长至73年7月毕业。党内传达后，系党总支、工宣队又接着召开全系师生大会，传达省委这一决定。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70级学制延长，应该不仅是浙江省委的决策，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因为全国工农兵大学生从70级开始，学制基本都三年。

8月20日新学年开学。8月25日，杭大通知全校学生交照片，统一换发新学生证。直到我们这届学生毕业离校，杭大也一直未制发校徽。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海军班整建制被分配到海军某情报部队，从此他们就无声无息地隐入了方圆二公里内无一住户的深山野岙。

杭大外语系历史上也许是唯一的俄语海军 10 人班由大学同学又成为战友。他们用在杭大学习的俄语，头戴耳机，手握铅笔，日夜守候在机房，眼巡五洲，耳听四海，为祖国安全，监巡着浩瀚海空。

在这个新阵地，他们有幸与已在此战斗多年的 70 届母校俄语专业的徐阶华学姐并肩战斗（徐阶华与其日语专业丈夫俞忠树 1975 年 9 日一起从部队转业回杭州）。

一年后，1974 年上半年，俄语海军班 10 名同学在该部队分二批全部提干。

1974 年 7 月，俄语班的同学们在大山深处迎来 74 届杭大母校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此的几位学弟校友。

因战备业务需要，10 人中两人又先后被送去北京大学继续学习。

一年一年弹指而过。在机场战鹰旁，在海岛舰艇潜艇里、在大洋远航的中国科考船海洋调查船上，都曾出现过俄语海军班 10 名同学中几位“捕风逐浪”紧张工作的身影。

1980 年，中国向世界宣布，用 3 年时间裁军 200 万。历时 3 年的大裁军，没有涉及到 10 名同学。

1984 年我国又一次宣布裁军 100 万。

1984 年俄语班 10 名同学中 3 人结束军旅生活，脱军服出山回故乡。

最终，10 名同学战友中有一位，一生奉献军队情报事业，直到光荣军休。

杭州大学——我的母校！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人问起，我都会骄傲地回答“我是杭大的！”因为我的性格中脉动着老杭大您的基因。

感恩我杭大的恩师：周宗复、沈湛澄、叶志宏、林薇娜、顾建华、王自杭、邱国倩、韩志咏、许高渝、陈纲。

我喜欢《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这首歌，吟唱时常让我流泪。引用其中一段歌词来结束我对杭大的回忆：

“有一种情缘不用来诉说，
提起来总是难以放下，
有一种牵挂不用你来叮咛，
说起来总是让人淌泪花。
有一种爱恋不用你来报答，
守望着你一生
青絲变白发。”

想您——母校——杭州大学！

感恩——杭大我们的俄语老师们！无论在部队情报战线听风看浪，还是在为改革大潮出力流汗，俄语海军班 10 名战士学生没有辜负你们的厚望。

注：

王永海依据记忆及当年日记，2019 年 10 月 31 日初稿于浦东，2019 年 11 月 10 日定稿于浦东。

[返回目录](#)

“嵌名文”入馆记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1978 年 3 月 3-6 日是 77 级同学报到的时间。为了纪念我们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同学相识 40 周年，我用 120 位数学系 77 级同学的名字写了这篇《同学四十年志》“嵌名文”初稿。然后将此文放到我们数学系 77 级同学群里征求意见。周遇春同学给予了修改，许多同学提出了建议，最后我将其成现文。

之后，我与书法家钱塘洁莲居士王成章先生讨论了书法的字体，确认使用汉朝《曹全碑》的隶书来书写。因为该碑为隶书的代表作品，结构匀整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现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一稿写成，按照惯例，没有标点符号。本来此“嵌名文”就比较特别，读者阅读相对困难，为了交流方便，我坚持增加标点符号的书写方式。最后装裱成件。

2018 年 5 月 19 日，在绍兴君澜鉴湖大酒店举行的“四十周年同学聚会”上，我将此件交于朱兴福同学，以代表全体同学对朱兴福同学对历次同学会的支持表示感谢。此件因此也留在他处作永久保存了。

2019 年 6 月 3 日，邹卫华同学和我在嘉兴与朱兴福同学相会。退休 4 年的朱兴福同学向我们表示：《同学四十年志》“嵌名文”是珍贵的、集体的东西，应该保管好。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将来也没有能力了，所以想现在把她处理好。

于是，我请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全根先校友，请他帮我出主意。起先我将“嵌名文”书法件寄与全根先校友，希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没有遇到过书法作品的收藏，作品的归类和提供给读者的合适部门不能确定下来。我建议：参照一般图书馆对于家谱的管理办法处理。由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在筹备 9 月 9 日的建馆 110 周年的大型活动，之后又是 10 月 1 日建国 70 周年的活动，所以无暇顾及。全根先校友联系了中国民族图书馆的吴贵飙馆长。吴

馆长表示：这是有意义、值得收藏的物件。2019年8月14日，吴贵飙馆长亲自从全根先校友手中接收这《同学四十年志》“嵌名文”书法件，作为“名家手稿”收藏于该馆。



77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被称为“时代的符号”。1977年9月25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10月21日，《人民日报》才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之文发布恢复高考

消息的。我是11月上旬参加浙江省的初试，25日参加复试的。这次高考的复习时间最多只有一个月左右，太短、太突然了。教育部当时预计13个年级（1966年停废高考，中断11年，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者）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只有1%。后来，预设了初试，将复试的报名下降到了570万人，招收新生21.1万人，录取率为3.7%。又经过扩大招生6.2万人，实际录取人数为27.3万人，录取率为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由于浙江省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相对报考人数比例较高，所以录取率会比全国平均数还要低。我记得当时在还没有扩招人数时，报名和录取比列是44:1¹。

在如此复习时间短、录取率低的情况下，这一群体的其他因素就值得观察了。《同学四十年志》“嵌名文”和本文，可以引导、产生各种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内容。

¹ $1/44 = 2.27\%$ ，实际初试录取率应为 $1/69$ ，因为浙江省参加初试考试的有370339人，录取5346人，录取率为1.44%。详见：陈侃章校友《冬季里的春闹——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P126，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

直接人名查询可以看到：这群人国内外科学、行业最前沿的领头人：

王所进，当选美国数理统计研究院院士、当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士、当选国际统计学会会员、非参数统计杂志总主编以及前后兼任五个统计学学报的副主编；

来明骏，美国佐治亚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国际上多元样条顶尖专家；

严伯平，加拿大宏利保险资产债务管理部主任；

鞠实儿，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逻辑学研究》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

陈杰诚，曾任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系主任、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和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

戴志敏，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风险投资协会理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理财研究中心副主任；

洪玉，曾任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

.....

由于 77 级处于高考的转折点的特性，决定了这群人是走在社会最前面的人。又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群人有的成为了最早的“自费公派”留学生；有的在国内，成为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做出了许多“中国第一”的开创性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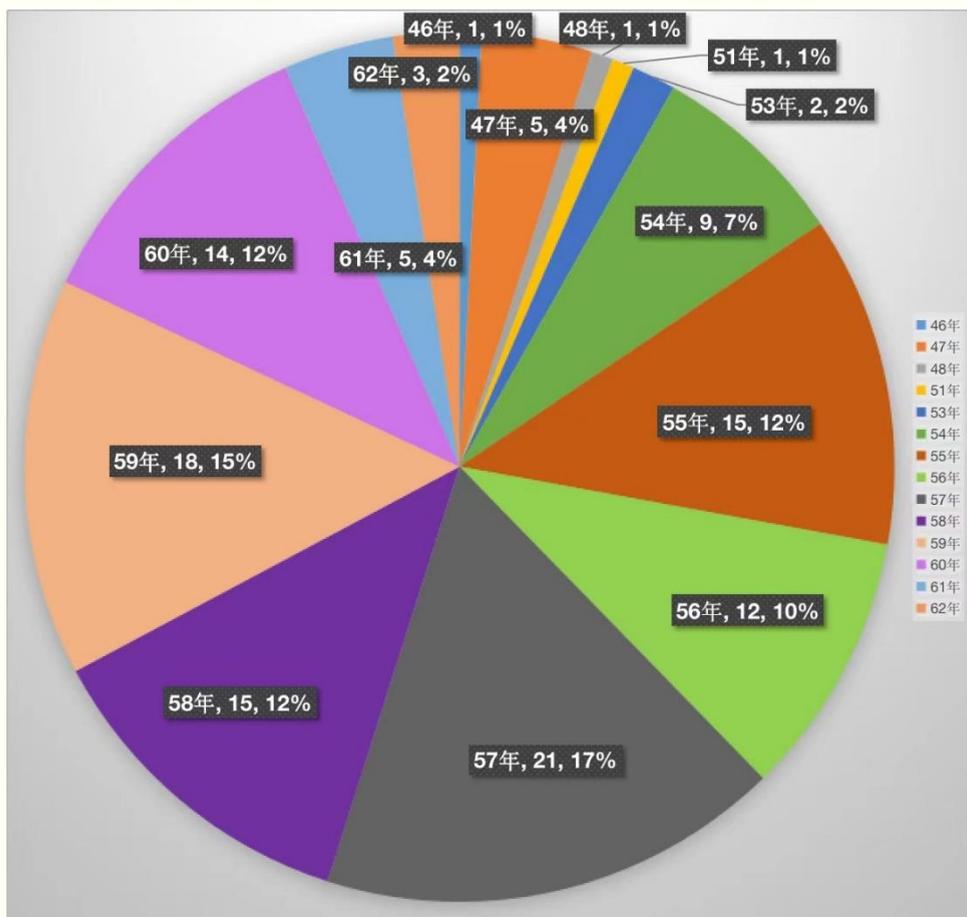
如果结合浙江大学档案馆资料，可以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增值性内容。比如，得到一个难得的家庭样本。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122 名学生的样本情况是：父母中，教师有 44 位，加上医护药剂、会计出纳、编辑记者、音乐作曲、工程技术、电影摄制等专业人员 26 位，合计拥有专业知识的父母有 69 位，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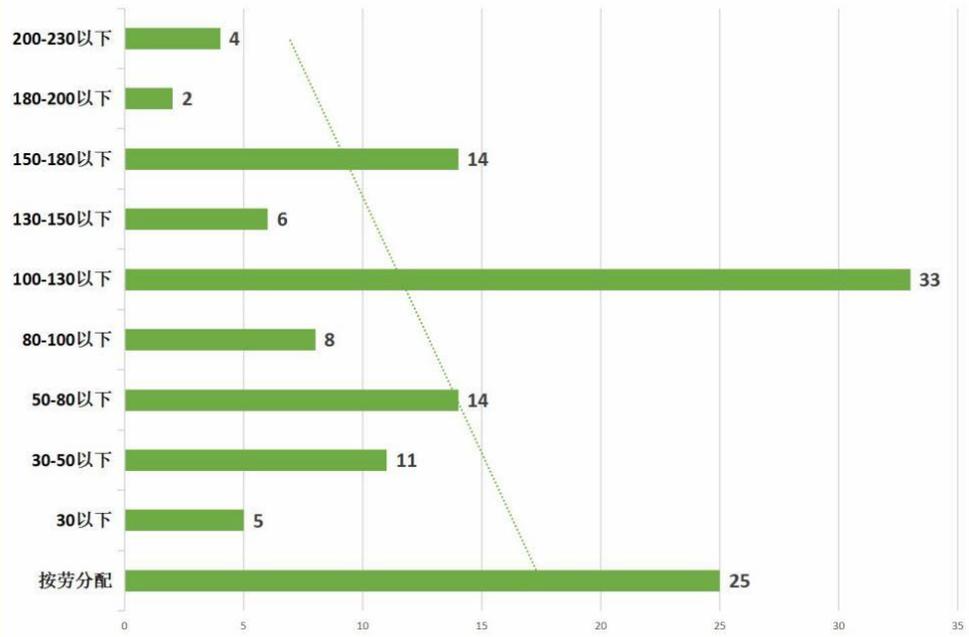
生的比例 57:100。这 46 个家庭占比 38%。家庭的教育和知识氛围与孩子的高考成功存在着较高的统计相关性。

类似统计还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曾以厦门大学 8821 名学生有效档案样本作研究，结果显示：77 级学生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比例为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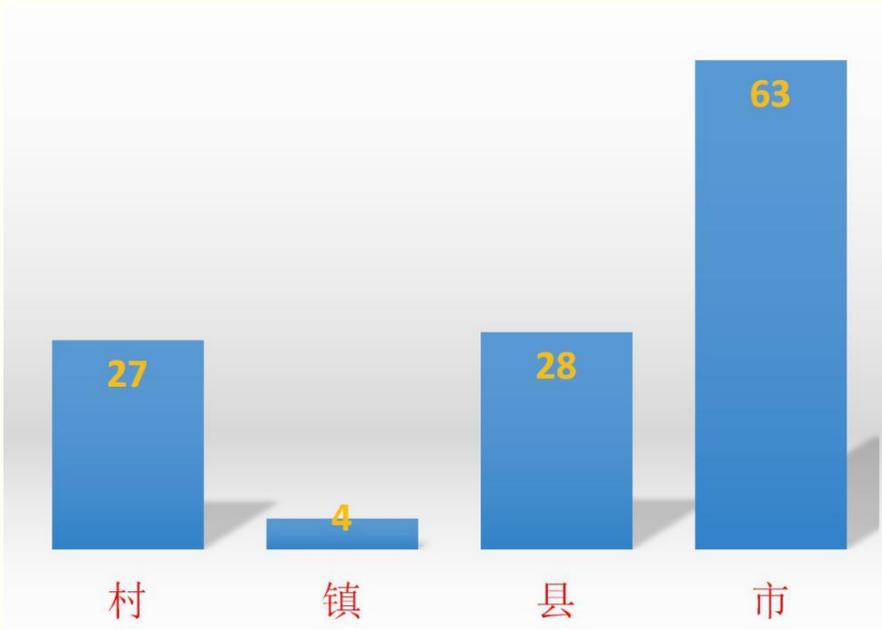
又比如，年龄分布图：



家庭收入分布图：



生源分布图：



进一步解剖、分析，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这个只用名（336 个字）、不用姓的《同学四十年志》添加了 100 个字的“嵌名文”（436 个字）已经由同学间的感谢、联谊物件转化为了一件具有引导性、文献性、佐证性的物件了。将此孤品原件做永久保存，应该有意义。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入学时，我们有 122 名同学。但是，沈学宁同学提前考取研究生离开了，陈晓莹同学因为身体原因休学至 78 级了。所以，我们很多时间是 120 名同学在一起的。后来又有陈天伦因为身体原因休学至 78 级了，华家雄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这四位同学的档案编号归在其他地方。所以，资料分析是按照 122 位统计的，“嵌名文”则按照 120 位写就的。

这里可以看到，四位档案他移的同学只有两种情况：提前考研了，或身体压垮了。这也再次展现了当年大家拼命读书的景象，也反映了在文化断裂年代注重学习的人群是普遍存在知识饥饿感的。

特此记。

（2019 年 7 月 20 日；修改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

附件：

1、“嵌名文”

同学四十年志

噫乎！自古以来，杭城乃智丰哲鸣、建翔凌云者兴福罕幸之地。

七七冬月，高冷剑寒，然丽华明高，煜明觉亮。万瑞待举之时，百廿名同学遇春于七八，全省各地良材元奎云集杭大数学系，未材学子培明嘉荣之旅由此而始。聪女毅男无畏勇为，志伟所进，不敢振宙世杰，却也坤乾苗成。

伟荣、伟强、吴周伟国等兄弟，海英、建英、素毓二琴诸姐妹，竟有缘与大伦、天伦大哥同桌于西二教 218 室。各位明骏维真 $\varepsilon - \delta$ 世界，徜徉校园周南。携手延平，越岳云柏松关森，掠海国永江竞波，穿道柳青桦林间，一路向南向阳，以勤得胜，羽猎峥嵘。

学成后，仍志敏德明。内，纪宁于兴持家业，小宝炳杰，幼薇建兴，鹏严家雄，贵硕家侃，成坚惠传，终获孝安卫平之实儿，可谓不二凡致。外，亦玉亦钢，绍华维超，硕果申生，成绩荣荣，耀民卫华，赶美超英、联荣长荣于东西半球，真乃杰诚德生。

光阴似箭，无论维亚妮娅（范），还是伯跃建三平及所有同学韬于四十载之海波，视为璇璇，于延安和平中，迅敏飞跃。只惜郑明、晓华、妮娅（刘）、松雷、学宁学友与众相处太短，不禁唏嘘！

值国庆相识四旬之际，吾等当中元班长之面，在此一表：牢记师恩之厚，同窗之谊，继续林德国成，月明乃昱，淑萍焕镇、梁红加红，昌福永富。以饱满之精神，健康之体魄，同迎臻和盛世！

此志以纪念同学四十周年。

3、按照“嵌名文”顺序，120位同学的姓名：

张智丰、洪哲、张鸣、顾建、吴翔、潘凌云、
朱兴福、徐罕、张幸、郭剑寒、郭丽华、史明高、
彭煜明、胡觉亮、周遇春、包良材、尤元奎、李未材、
马培明、傅嘉荣、蔡聪、杨毅、章无畏、张勇为、
方志伟、王所进、王振宙、郑世杰、刘坤、沈乾苗、
赵伟荣、吴伟强、吴伟国、周伟国、王海英、马建英、
蔡素琴、陈毓琴、陈大伦、陈天伦、来明骏、顾维真、
周南、何延、周平、陈岳云、赵柏松、赵关森、
殷海国、沙永江、罗竞波、汪道柳、杨青、沈桦、
卢向南、廖向阳、王勤、陈胜、陈羽、戴志敏、
于德明、李纪宁、严小宝、刘炳杰、施幼薇、方建兴、
郑鹏严、华家雄、林贵硕、汪家侃、周成坚、张惠传、
张孝安、周卫平、鞠实儿、张二凡、洪玉、沈钢、
陈绍华、潘维超、陈申生、景荣荣、朱耀民、邹卫华、
林超英、王联荣、金长荣、陈杰诚、丁德生、李维亚、
范妮娅、严伯平、夏跃平、王建平、孙韬、袁海波、
臧璇璇、徐延安、俞和平、蒋迅、赛敏、张跃、
郑明、陈晓华、刘妮娅、韩松雷、沈学宁、王国庆、
余中元、徐林德、王国成、彭月明、宋乃昱、曾淑萍、
张焕镇、赵梁红、沈加红、王昌福、夏永富、周臻和。

注：书法稿有误

1. “顾健”应为“顾建”。
2. “值同庆相识四旬之际”，应为“值国庆相识四旬之际”。

4、档案馆 122 位同学的档案号、姓名、学号、籍贯：

序号	电子档案编号	姓名	专业	学号	籍贯
1	HD-1982-JX1412-0008-1	刘炳杰	数学系	770546	广东省揭阳县
2	HD-1982-JX1412-0008-2	赵梁红	数学系	770547	浙江省绍兴县
3	HD-1982-JX1412-0008-3	史明高	数学系	770548	浙江省吴兴县
4	HD-1982-JX1412-0008-4	李未材	数学系	770549	浙江省温岭县
5	HD-1982-JX1412-0008-5	余中元	数学系	770550	浙江省义乌市
6	HD-1982-JX1412-0008-6	郑世杰	数学系	770551	浙江省宁波县
7	HD-1982-JX1412-0008-7	林贵硕	数学系	770552	浙江省文成县
8	HD-1982-JX1412-0008-8	汪道柳	数学系	770553	浙江省临海县
9	HD-1982-JX1412-0008-9	沈干苗	数学系	770554	浙江省慈溪县
10	HD-1982-JX1412-0008-10	周臻和	数学系	770555	浙江省温州市
11	HD-1982-JX1412-0008-11	林超英	数学系	770557	浙江省温州市
12	HD-1982-JX1412-0008-12	罗竟波	数学系	770558	浙江省富阳县
13	HD-1982-JX1412-0008-13	章无畏	数学系	770559	浙江省定海县
14	HD-1982-JX1412-0008-14	夏永富	数学系	770560	浙江省宁波县
15	HD-1982-JX1412-0008-15	郑鹏严	数学系	770561	浙江省鄞县
16	HD-1982-JX1412-0008-16	张惠传	数学系	770562	浙江省慈溪县
17	HD-1982-JX1412-0008-17	王振宙	数学系	770563	浙江省东阳县
18	HD-1982-JX1412-0008-18	吴伟强	数学系	770564	浙江省海宁县
19	HD-1982-JX1412-0008-19	孙韬	数学系	770565	山东省德县
20	HD-1982-JX1412-0008-20	周成坚	数学系	770566	浙江省桐乡县

21	HD-1982-JX1412-0008-21	臧旋旋	数学系	770567	山东省□县
22	HD-1982-JX1412-0008-22	张鸣	数学系	770568	浙江省嵊县
23	HD-1982-JX1412-0008-23	杨青	数学系	770569	浙江省江山县
24	HD-1982-JX1412-0008-24	包良材	数学系	770570	浙江省宁波县
25	HD-1982-JX1412-0008-25	吴翔	数学系	770571	浙江省海盐县
26	HD-1982-JX1412-0008-26	杨毅	数学系	770572	山东省阳谷县
27	HD-1982-JX1412-0008-27	徐林德	数学系	770573	浙江省临海县
28	HD-1982-JX1412-0008-28	夏跃平	数学系	770574	浙江省定海县
29	HD-1982-JX1412-0008-29	吴伟国	数学系	770575	浙江省仙居县
30	HD-1982-JX1412-0008-30	韩松雷	数学系	770576	浙江省余姚县
31	HD-1982-JX1412-0008-31	方建兴	数学系	770577	山东省招远县
32	HD-1982-JX1412-0008-32	王海英	数学系	770578	浙江省宁海县
33	HD-1982-JX1412-0008-33	陈岳云	数学系	770579	浙江省慈溪县
34	HD-1982-JX1412-0008-34	廖向阳	数学系	770580	浙江省武义县
35	HD-1982-JX1412-0008-35	沈刚	数学系	770581	浙江省绍兴县
36	HD-1982-JX1412-0008-36	张勇为	数学系	770582	浙江省萧山县
37	HD-1982-JX1412-0008-37	彭煜明	数学系	770584	浙江省吴兴县
38	HD-1982-JX1412-0008-38	陈绍华	数学系	770585	浙江省黄岩县
39	HD-1982-JX1412-0008-39	付加荣	数学系	770586	浙江省杭州市
40	HD-1982-JX1412-0008-40	赛敏	数学系	770587	山东省文登县
41	HD-1982-JX1412-0008-41	刘妮娅	数学系	770588	浙江省嵊县
42	HD-1982-JX1412-0008-42	王联荣	数学系	770589	浙江省义乌县
43	HD-1982-JX1412-0008-43	邹卫华	数学系	770590	山东省庆云县

44	HD-1982-JX1412-0008-44	陈杰诚	数学系	770591	浙江省乐清县
45	HD-1982-JX1412-0008-45	丁德生	数学系	770592	浙江省缙云县
46	HD-1982-JX1412-0008-46	徐延安	数学系	770593	浙江省绍兴县
47	HD-1982-JX1412-0008-47	蒋迅	数学系	770594	四川省重庆市
48	HD-1982-JX1412-0008-48	朱兴福	数学系	770595	浙江省嘉善县
49	HD-1982-JX1412-0008-49	洪玉	数学系	770596	江苏省泰兴县
50	HD-1982-JX1412-0008-50	蔡聪	数学系	770597	浙江省杭州市
51	HD-1982-JX1412-0008-51	陈毓琴	数学系	770598	浙江省宁波市
52	HD-1982-JX1412-0008-52	景荣荣	数学系	770599	浙江省慈溪县
53	HD-1982-JX1412-0008-53	俞和平	数学系	770600	浙江省永康县
54	HD-1982-JX1412-0008-54	王国庆	数学系	770601	江苏省兴化县
55	HD-1982-JX1412-0008-55	陈晓华	数学系	770602	浙江省新昌县
56	HD-1982-JX1412-0008-56	赵关森	数学系	770603	浙江省义乌市
57	HD-1982-JX1412-0008-57	尤元奎	数学系	770604	浙江省宁海县
58	HD-1982-JX1412-0008-58	沈加红	数学系	770605	福建省福州市
59	HD-1982-JX1412-0008-59	潘维超	数学系	770606	浙江省余姚县
60	HD-1982-JX1412-0008-60	马建英	数学系	770607	浙江省嵊县
61	HD-1982-JX1412-0008-61	张跃	数学系	770608	浙江省嵊县
62	HD-1982-JX1412-0008-62	李林	数学系	770609	浙江省杭州市
63	HD-1982-JX1412-0008-63	李纪宁	数学系	770610	江苏省武进县
64	HD-1982-JX1412-0008-64	董大伦	数学系	770611	浙江省临海县
65	HD-1982-JX1412-0008-65	王国成	数学系	770612	浙江省新昌县
66	HD-1982-JX1412-0008-66	王建平	数学系	770613	浙江省绍兴县

67	HD-1982-JX1412-0008-67	严小宝	数学系	770614	浙江省奉化县
68	HD-1982-JX1412-0008-68	来明骏	数学系	770615	浙江省杭州市
69	HD-1982-JX1412-0008-69	沈桦	数学系	770616	浙江省温州市
70	HD-1982-JX1412-0008-70	蔡素琴	数学系	770617	浙江省鄞县
71	HD-1982-JX1412-0008-71	范妮亚	数学系	770618	浙江省慈溪县
72	HD-1982-JX1412-0008-72	曾淑萍	数学系	770619	浙江省杭州市
73	HD-1982-JX1412-0008-73	周伟国	数学系	770620	浙江省定海县
74	HD-1982-JX1412-0008-74	李维亚	数学系	770621	浙江省海宁县
75	HD-1982-JX1412-0008-75	戴志敏	数学系	770622	浙江省镇海县
76	HD-1982-JX1412-0008-76	陈胜	数学系	770623	河北省吴桥县
77	HD-1982-JX1412-0008-77	张焕镇	数学系	770624	浙江省慈溪县
78	HD-1982-JX1412-0008-78	金长荣	数学系	770625	浙江省温州市
79	HD-1982-JX1412-0008-79	陆月明	数学系	770626	浙江省海盐县
80	HD-1982-JX1412-0008-80	顾维真	数学系	770627	浙江省平阳县
81	HD-1982-JX1412-0008-81	徐罕	数学系	770628	浙江省嵊县
82	HD-1982-JX1412-0008-82	郭丽华	数学系	770629	山东省荣成县
83	HD-1982-JX1412-0008-83	于德明	数学系	770630	山东省荣城县
84	HD-1982-JX1412-0008-84	殷海国	数学系	770631	浙江省奉化县
85	HD-1982-JX1412-0008-85	郭剑寒	数学系	770632	浙江省诸暨县
86	HD-1982-JX1412-0008-86	汪家侃	数学系	770633	浙江省开化县
87	HD-1982-JX1412-0008-87	王昌福	数学系	770634	浙江省义乌市
88	HD-1982-JX1412-0008-88	张二凡	数学系	770636	浙江省杭州市
89	HD-1982-JX1412-0008-89	陈申生	数学系	770637	浙江省义乌市

90	HD-1982-JX1412-0008-90	王勤	数学系	770638	湖南省邵东县
91	HD-1982-JX1412-0008-91	卢向南	数学系	770639	浙江省永康县
92	HD-1982-JX1412-0008-92	周卫平	数学系	770640	浙江省余杭县
93	HD-1982-JX1412-0008-93	朱耀民	数学系	770641	浙江省缙云县
94	HD-1982-JX1412-0008-94	赵伟荣	数学系	770643	浙江省永嘉县
95	HD-1982-JX1412-0008-95	王所进	数学系	770645	浙江省遂昌县
96	HD-1982-JX1412-0008-96	马培明	数学系	770644	浙江省嘉兴县
97	HD-1982-JX1412-0008-97	沙永江	数学系	770646	江苏省东台县
98	HD-1982-JX1412-0008-98	宋乃昱	数学系	770647	浙江省吴兴县
99	HD-1982-JX1412-0008-99	张孝安	数学系	770648	浙江省象山县
100	HD-1982-JX1412-0008-100	周南	数学系	771205	浙江省杭州市
101	HD-1982-JX1412-0008-101	潘凌云	数学系	771206	浙江省杭州市
102	HD-1982-JX1412-0008-102	严伯平	数学系	771207	浙江省宁波县
103	HD-1982-JX1412-0008-103	洪哲	数学系	771208	山东省河口县
104	HD-1982-JX1412-0008-104	施幼薇	数学系	771209	浙江省杭州市
105	HD-1982-JX1412-0008-105	周遇春	数学系	771210	浙江省杭州市
106	HD-1982-JX1412-0008-106	袁海波	数学系	771211	山东省莱城县
107	HD-1982-JX1412-0008-107	鞠实儿	数学系	771212	江苏省泰兴县
108	HD-1982-JX1412-0008-108	方志伟	数学系	771214	浙江省淳安县
109	HD-1982-JX1412-0008-109	陈柏松	数学系	771215	浙江省诸暨县
110	HD-1982-JX1412-0008-110	张智丰	数学系	771216	浙江省杭州市
111	HD-1982-JX1412-0008-111	顾建	数学系	771217	浙江省象山县
112	HD-1982-JX1412-0008-112	周平	数学系	771218	浙江省绍兴县

113	HD-1982-JX1412-0008-113	胡觉亮	数学系	771219	浙江省绍兴县
114	HD-1982-JX1412-0008-114	陈羽	数学系	771220	浙江省遂昌县
115	HD-1982-JX1412-0008-115	刘坤	数学系	771221	广东省揭阳县
116	HD-1982-JX1412-0008-116	张幸	数学系	771222	江苏省上海市
117	HD-1982-JX1412-0008-117	何延	数学系	771223	浙江省杭州市
118	HD-1982-JX1412-0008-118	郑明	数学系	771224	山东省沾化县
119		华家雄	数学系	770642	浙江省青田县
120		陈天伦	数学系	771213	浙江省嘉兴市
121		沈学宁	数学系	770635	浙江省海盐县
122		陈晓莹	数学系	770556	浙江省诸暨县

注：

籍贯中出现宁波县、温州县等，是原档案资料，未做修改，这里特加说明。

5、毕业照：



[返回目录](#)

毕业离校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毕业分配改方案，数学中文成试点。
综合考评德智体，二七一开做加权。
智育体育分好算，德育评定变焦点。
班组年级上报系，综合成绩公开版。
分配单位也公布，双向选择志愿填。
七月十六年级会，西二楼内定方案。
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家满意有困难。
毕竟涉及切身事，现场发泄亦难免。
尘埃落定忙留言，留住师生同窗缘。
四年往事点滴记，化作诗文付笔端。
依依不舍挥手别，别后思念看留言。
毕业合影成定格，青春形象刻瞬间。
注销户口迁新址，粮油组织关系迁。
毕业证书挺珍贵，报到证件不一般。
心潮起伏送学友，行李托运帮忙办。
七月十八去报到，计量学院新家苑。
同学返校补手续，欣然接待相聚欢。
全国首发身份证，吾辈终于身份鉴。
宿舍楼顶再露宿，夏日夜空望星汉。
诸事办妥赴湖州，江南水乡访树元。
心情放松回老家，告慰祖先父子伴。
挚友回访来兰溪，浙中丘陵美景观。
返杭再回十一幢，整理行装离校园。
雏鹰展翅新希望，工科数学事教研。
杭大数学精神园，计量生涯展新篇。
重温日记深感悟，杭大印记烙心田。

春夏秋冬四度轮，潜移默化成铁杆。
杭大之大在胸怀，母校之美在内涵。
学科齐全综合性，博大精深富资源。
名师荟萃专业强，数学中文树典范。
办学精神凝校训，求是育英永流传。
母校之恩难忘怀，杭大情缘扣心弦。

[返回目录](#)

时间开始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我能回到昨天吗，也许能，也许不能。说不能，是因为我们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离七八十年代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说能，是我们的记忆今天还比较忠实于我们，没有发生重大叛乱（奥顿有诗曰：身体的各个部份都在反叛）。

无疑，在我这大半生中，最值得留念的就是大学这四年。这是刻骨铭心的四年，是决定性格与命运的四年，更是青春激扬、从未想到我们有一天也会垂垂老矣的四年。

真想一天一天地进行回忆，因为那么多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可是，我真的了解或理解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吗？我真的认为 77 级有点了不起或一无是处吗？我真的能写出 77 级的精神和精髓吗？临近提笔，我大幅度地犹豫起来。是的，我其实不了解我们四年的全部，不了解那些著作或许不等身但学问深奥非常值得我们敬仰的老师们，我肯定不了解我们的两层楼宿舍，不了解那座留下多少美好记忆、屡屡上大课的礼堂，不了解杭州大学校园的分布，不了解别的系。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都不了解当时的我。所以我决定选择一个角度、几个片段，也算为这本集子贡献一点资料。

我的角度就是一首诗歌的写作。那时诗歌算是比较时兴的玩艺，我们即使没有为之疯狂，也至少苦吟了一番。

我想，在临近毕业时，到杭州葛岭一个亭子里去撰写诗歌，这大约是大学生活比较有趣的插曲之一。何况那天还飘着雪花，在石板路上行走，感觉上有点怪异。我们一路从黄龙洞这边上山，沿着山路蜿蜒而上，这于我是第一次，至今为止可能都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这首诗的诗句“雪与血铸成的大道”、“忧郁，像雪花一样”的来历。而真实情况是，在初阳台，当雪花下下来后，我们的反应是欢呼雀跃。这或许就是虚构与现实的所谓反差。

我已经不记得是王依民、王自亮还是陈文育发起，反正我是一个响应者，一个对这件事整个过程的认真阅读者，甚至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当然最后是一个饶有兴致的参与者。我只奇怪，一向对理论和戏剧感兴趣的陈文育为什么会加入，他的加入无疑增大了我们对诗歌写作成功的信心。对我们三个诗歌爱好者来说，四个中他无疑起到了“鲶鱼效应”的作用，一个启智者。事实上就在那一次，我充分领略了他的文学才华，他的组织能力，他的隽言妙语。

虽然王自亮在同一座城市，王依民我可以马上联系上，但我愿意在这里猜想，这一定是陈文育的主意。他精力充沛到过剩，在大一时，他谈论的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到大三、大四，他还参与到戏剧表演中，好像是和黄海滨、王自亮、陈红捷等一起上台演出。我同寝室的黄海滨当时写了《在酒楼上》等几个话剧剧本，他也在构思写古代发明浑天仪的一个科学家的剧本。所以，他参加到诗歌的写作中来，也是他的神来之笔。这为他后来不幸卧床后的诗歌写作埋下了“伏笔”。

我想，我说的这首诗，我们杭大中文系 77 级的人一定知道，就是《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当年，它的待遇不错，有人为它配乐，好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有人为它朗诵，不知是吴雪景还是岳耀勇。总之，受到了一些称赞，以至于过了三十年后卫军英还能将其背出。在毕业五周年还是十周年同学会上，有人还提议将其拿到电视台播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首诗已经不属于几个人了。它属于大家，属于杭大中文系 77 级。至于能否代表杭大中文系 77 级就很难说了，毕竟诗歌已经从大众走向了小众。谁还在乎咬文嚼字的东西。

不过，这首诗在当时确实热闹了一番。现在看来，它的主题还是很有意思。这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已经超越了上下五千年，指向了无穷无尽，而结尾也留下了不是悬念的悬念：消逝者的脚印。顺便说一句，当时我们在山上根本结不了尾，后来还是回到学校后才将其写完整的，而诗的结尾经争论后

终于得到一致认可。我想，当时写作这首诗共同的心情是舍我其谁，其色调是明朗多于激愤。它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是低于前人或高于前人。当然诗的主体一定是写当时的，写自己的，写世界的，甚至是写宇宙的，否则没有意义。这在诗里面的很多比喻和暗示可以看出。但是，不管这首诗的艺术性是否馥郁，我还是应当承认，它受到了当时“今天派”诗风的影响，留有一点痕迹。这在当时是免不了的。

为什么在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情绪流露？高昂的、低沉的、不知所措的，甚至是难以言说的，主要是当时我们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通俗地说，就是临近毕业。四年热血沸腾的生活就要结束。我不知道其他三位的感受如何，反正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茫然。不但茫然，而且有着深深的忧虑。就像我中学毕业后一样，对前途充满了迷茫：在文革中我们不可能上大学，上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奢望。

我是小地方的人。我对于在小地方要生活一辈子感到不可思议。这当然源于1976年我参加第一次作家协会会议，会议组织我们去采风，一位杭州诗人对那些山沟里的人的生活的一番评价。他说，这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去，一辈子都是无声无息。他认为不可想象。

对于待业两年、在家无所事事、读着陶渊明和何其芳的诗、当了几个月初中代课教师、后到一所粮站工作的我，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也是我为什么十分认同北岛“恶梦醒来是早晨”这句诗的原因之一。

到杭州大学后，一切都是新鲜的。就像后来写出好诗《诺日朗》的诗人杨炼所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现在想来，是我人生中最最好的四年。因为我感到生活是如此的厚待我，让我有机会走进高等学府。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课外书读了不少，但古书和文学理论读少了，这造成我的基础很不扎实。这点给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困难。也是至今我的知识不够健全、人生不够自信的原因之一。

书读少了，这点不妨碍我们在寝室里、教室里、学校里快快乐乐。所以四年很快就过去，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到学校里连夜排队买书。到解放路书店的二楼购买内部书。到文二路看露天电影。观看足球世界杯比赛。看女排比赛。总之每一天都快乐、充实。

但对我来说，内心有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写作。这使我孤注一掷，放弃了很多。我在中学就开始写作诗歌。蔡良骥老师到福建开会带回了今天派的诗歌，在我们《扬帆》诗社的同学之间传阅，我受到的冲击极其内在。我想，我的诗风的改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很可能，这首《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就是我们的一次冒险和实验。

能够到大学念书，肯定是一个转折。能够在比较早的时候接触内部书籍和今天派诗歌，这又是一个转折。虽然我的诗风从明朗转向晦涩还要稍后几年。我很愿意将这次在葛岭上的写作看成是一个标志。我愿意这样来形容，即，它像是葛洪的一次炼丹，但这炼丹又不够成功。我还将它比作是一次集合，同时又是一次分离。所谓集合，是我们把我们的思想通过分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将其集合在一起。所谓分离，是知和行的分离。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有距离，虽然诗里面有批判，有的地方还很意气风发，比如我们宣称是“为人类工作”，显示了理想主义情怀。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显然情况不是这样的。走出校门后，我们肯定都被改变了。这是我后来体会到的。美国当代诗人勃莱是一位捧着吉他的朗诵大家。可有一次，一个听众居然当着他的面走掉了。他大怒，并冲着那位听众的背影大叫：“当你走出大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走出校门后的写照吗。

还有两件事不能不说。

首先，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海边。这要感谢王依民。大三暑假时，在他的邀请下，我与王自亮、杨甘霖，到了他的家乡舟山白泉镇。在王依民的安排下，我们登上渔船，跟随着渔民出海打鱼。当渔民将渔网放到海里时，渔船一下浮起，在浪涛上颠簸，我很快晕船。回到陆地时，还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摇晃。我们还去了普陀，在百步沙沙滩，我们像孩童一样玩耍。这有照片为证。那是我第一次下到海水里，这次亲密接触大海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临近公海的空旷海面，我第一次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无助。但大海又给了我们宽广的胸怀和无

尽的想象。落实到这首诗，“我们从海滩起步/地平线便有了新的意义”这两句，对我来说就很踏实了，心里也不那么发虚。毕竟我见过大海，在海滩留下了脚印，也在海水里游泳了。

其次，这首诗将我们几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不管在不在杭州，大家都在不断地联系。我记得去年王依民到杭州，我们一起到王自亮家。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这首诗。当时我与王依民感叹，这首诗的原稿找不到了，有点可惜。谁知王自亮说，在我这里。话音未落，他就冲进书房，把一大叠当时的诗稿和《扬帆》诗刊油印本拿了出来。一翻，果真找到。不但看到了原稿上修改的字样，还发现那天我们四人互相取的绰号。当时三人大笑一番。又说起了很多当年的事。事实上，说起这首诗的次数是很多的。

这首诗中有一句是“时间开始了”，它其实来自于一位历尽沧桑的诗人胡风的句子。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时间开始了”。因为相对于未来、今后几年，甚至是明天，今天做任何事情都不为晚。是的，当年是时间开始了，现在依然是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这个句子太大气了，太开阔了。

可以想象，大家对校园生活肯定作了很多详细、生动的回忆。而我，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算是为这首诗注上我的片面注解，也算是献上我的点滴回忆。

2012冬到2013年春，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的同窗们相约，为四年的大学生活留下一些文字，以记录我们或中年或青年或少年的时光，记录我们老师的馨效春风，记录我们那似有似无的母校——永远的杭州大学。

于是，时间开始了。

附录：

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余刚 陈文育 王依民 王自亮

在黑沉沉的宇宙空间

成千上万个太阳
涌动着无数盏红色的梦
时间被拉近了，纠缠着
在远古的荒原
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诞生了一群脚印
雪与血融铸的大道
切开了混沌的记忆
时间开始了
大陆在黄色的地图上漂移
古老的传说无情地剥落

断层横亘在红色的天幕上
思想在造山运动中辗转
忧郁，像雪花一样
世界变得模糊
凝聚成巨大的冰块，渐渐透明
依稀斑驳的墓碑
压在周口店人的颅骨上
使我们痛苦
我们唱完了二十支情歌
而最后一支绝望的歌
却难以出口
于是，我们从海滩起步
地平线便有了新的意义

在白昼和黑夜的低洼处
坚实的对话
敲打出久远的回声
江河和熔岩酝酿着新的悸动

浑朴的画面破碎又合拢

世界算得了什么
既然它堆满了化石
我们鄙视直线和平衡
因为阳光也是弯曲的
只有人的脊梁才挺拔而起
我们寻觅深沉的存在
擎起金黄色的思维
把所有的秋天连成一片
让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都变成鸽子的故乡
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收获
人类还有什么值得赞美
我们要使每个人都演化成新星
写进永恒的空间
在宇宙和更远的宇宙之间
将留下我们这消逝者的微笑

(1982年1月13日)

[返回目录](#)

致杭大青春 诗两首

——杭州大学经济系 86 级 魏志锋



那时

——致杭大青春

那时没有手机
更没有微信，联系不易
那时也有朋友圈，但聚散需要真实的场地
神聊只能通过纸和笔
通过写信和邮寄
然后等待回信
在这样的往复中心生忧喜

那时拍照需要胶卷和相机
从黑白到彩色的经历
颠覆几千年记忆
难得合影，将芳华印记
那时的你我相聚校园不易
穿着朴素，影像中的容颜一样美丽
年轻的同学三点连线宿舍、食堂与教室
天天走过生活的轨迹

那时的我们大多羞于欢喜
在八人一间宿舍的上下铺蚊帐里
胆怯的少年揣摩情书的字迹
总将暗自的倾慕藏起
那时月亮一样照明心思
冷色银辉透过校园路边梧桐树叶的缝隙
将少女的忧伤清洗

那时的第四食堂每逢周末改装成舞厅
球型的彩灯转动斑斓的乐曲
青春的气息混合成长的勇气
旋转的旋律带领旋转的身姿
每次舞会跳起
也总有每次曲终散去
未及思量匆匆四年流逝
偶然翻出一张那时的合影虽然模糊，却有心念清晰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执意给她写信
在台灯下抛开网络的痴迷
执意用纸和笔
向那处往日的地址
书写往日的情意

端坐于书桌前
温馨的灯光漫溢一张洁白的信纸
遐想撤退于前夕的前夕
返回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个青葱的园地
从现在开始
在春困中停滞
在秋收的想望中行走的你
将匆匆那年的梦想一再唤起

在网络时代成功为忙碌解释

瞬息间指键

将远在天边的敏感触及

轻轻一点

即刻带给你忧伤及别离

一切都太急

来不及回顾青涩的往昔

来日还尚未明晰

不得不以休息的名义辛勤

乃至至于不得不以辛勤的名义休息

只想停留于当下

让慢慢的消磨

挤占每一寸光阴的缝隙

让欢欣在缝隙里沉溺

尽情回味年轻时

从现在开始抛开网络的痴迷

用纸和笔表达初心

小心封好，贴上邮票

寄往那处往日的地址

叙述一段春天的真实

字里行间流露的质朴无须藏匿

不论她是否还在那里

不论岁月留下怎样的痕迹

朴素的书写将记忆重启

从现在开始写信，等信

相信前夕的前夕

相信明日的明日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37-1